



# 德州学院 学报

双月刊

1985年创刊

2025年第41卷第1期

(总第199期)

2025年2月出版

编委会主任：刘印房

编委会副主任：孙乃龙 唐延柯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家峰 马锡骞 王丽燕 王新芳

王鹤 冯琨 曲铭海 吕志轩

朱超 仲冲 刘印房 刘丽霞

刘艳芹 许士才 孙乃龙 杜亚丽

李春光 李春辉 李亭 李洪亮

杨振生 杨颖 张锦辉 陈伟

陈超 房敏 顾相伶 徐慧清

郭长友 唐延柯 董文会 曾强成

主编：刘印房

常务副主编：孙乃龙 唐延柯

副主编：李春辉 李亭 徐慧清

#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25年 第1期  
第41卷(总第199期)

## 文学·艺术研究

- 两汉三家《诗》流传考论.....居晓倩(1)
- 《正好遇见你》:非遗题材电视剧的创新与不足.....李莉程军(6)
- 真实与想象的结合
- 论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杜越(12)
- “后卡特里娜”小说《拾骨》中的新物质主义和时间性书写.....唐红张俊萍(17)
- 基于概念隐喻视角《紫色》中女性主体建构解读.....宋亮亮(23)
- “背过”的语义扩展及句式适用性分析.....唐艳(28)

## 哲学·政治学研究

- 解析拉康主体与视界驱力的内在关系.....王国华王芷若(34)
-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民主主体的分野与意涵.....马艳玲(41)

## 法学·社会学研究

- 论数据加工者的权利配置
- 基于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郑启福吴晨霖(47)
- 集体的欢腾: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的“心灵革命”(1949—1966).....袁博(52)

---

---

## 历史文化研究

- 伏流：顾颉刚社会党经历与其古史理论的发轫……………张子帆（58）
-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归依与路径优化  
——以冀鲁边区为例……………顾尧 侯彦杰（64）
- 价值·挑战·路径：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机理……………王翔宇 李兴平（69）

## 地域文化研究·黄河运河文化研究

- 清代越南燕行使阮辉莹的大运河书写……………胡梦飞 程明亮（74）
-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山东运河区域方志所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周嘉 赵传（79）

## 地域文化研究·德州世家名人研究

- 卢见曾与两淮盐引案考述……………王守栋 王瑞（85）
- “重回荒芜”：论臧海英诗中的土地想象……………周水寿（92）

## 高校教学研究

- 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道”眼观照……………昝风华（100）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探究  
——以山东省普通高校为例……………侯深燕 刘文霞 桑艳霞（105）
- 
-

#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 41 No.1

February 2025

---

## MAIN CONTENTS

- A Study 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三家《诗》) in the Han Dynasty  
.....JU Xiaoqian (1)
- Hi, Producer*: Innova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d TV Dramas  
..... LI Li CHENG Jun (6)
-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cited” “Read” and “Written” .....TANG Yan (28)
- Analyz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can’s Subject and the Scopic Drive  
.....WANG Guohua, WANG Zhiruo (34)
- The Assignment of Rights to Data Processors  
——Based on the Labor Valu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ZHENG Qifu WU Chenlin (47)
- Undercurrent: Gu Jiegang’s Experience of the Socialist Party and the Origins of His Ancient  
History Theory..... ZHANG Zifan (58)
- The Grand Canal’s Writing by Nguyen Huiying a Vietnamese Envoy to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U Mengfei CHENG Mingliang (74)
- Lu Jianzeng and Case of Salt Tax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WANG Shoudong WANG Rui (85)
- The Exploration of “Tao”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Universities  
.....ZAN Fenghua (100)

# 两汉三家《诗》流传考论

居晓倩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207)

**摘要:** 三家《诗》显盛于两汉时期, 魏晋改代以后, 逐渐散佚消亡。清人为辑佚三家《诗》, 非常注重收集各家的师承情况, 但忽略了师承流传本身所蕴含的史料价值。通过梳理齐、鲁、韩三家之师承, 可以归纳三家《诗》流传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进而考察三家《诗》在两汉魏晋时期的发展脉络, 亦有助于辨析清人辑佚原则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三家《诗》; 师承流传; 时代特征; 地域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1-0001-05

齐、鲁、韩三家《诗》形成于西汉初年, 皆注重阐发微言大义, 以求经世致用。齐《诗》学派始于齐国辕固生, 鲁《诗》学派肇自鲁国申培公, 韩《诗》学派则起于燕国韩婴。由于三家《诗》之经文均由隶书写定, 晚出的《毛诗》则由古籀文书写, 所以学人划定三家《诗》为今文经, 《毛诗》为古文经。二者所属的经学体系亦有不同, 前者属今文经学, 后者属古文经学。武帝时采纳董仲舒之法, 制定“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sup>[1][2]</sup>的政策, 设立五经博士, 三家《诗》均被列为学官, 成为两汉《诗经》解读的官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三家《诗》派的师承流传, 盛极一时。《毛诗》则只能以地方之学在民间流传。不过随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论争的消长沉浮, 三家《诗》与《毛诗》的命运也开始发生转变。

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 试图打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界限, 使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融为一统, 所以他在吸收三家《诗》说的基础上, 为《毛诗》作笺。此笺颇受儒生推崇, 《毛诗》之学也愈加显盛。汉末三分, 魏晋改代, 《毛诗》成为解《诗》显学, 而为汉王朝政权服务的三家《诗》随着汉室的倾覆则逐渐落没。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齐《诗》魏代已亡; 鲁《诗》亡于西晋; 韩《诗》虽存, 无传之者。”<sup>[2][9][18]</sup> 至宋代《韩诗内传》等著作已因无人研习传承而亡佚<sup>①</sup>, 仅有《韩

诗外传》留存。幸运的是南宋时期王应麟受朱熹等人启发, 对三家《诗》进行系统的辑佚工作, 并作《诗考》一书, 开辟了三家《诗》辑佚与研究之路。此后三家《诗》的辑佚与研究不绝如缕, 更在清代形成高峰。

前人为辑佚三家《诗》非常注重收集和梳理三家《诗》之师承流传, 但却忽略了师承流传本身所蕴含的史料价值。通过梳理三家《诗》之师承, 可以考察三家《诗》流传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探究三家《诗》在两汉魏晋时期的兴衰存亡。是以本文将从时空角度探讨三家《诗》的流传情况, 直观展现三家《诗》派的兴衰脉络, 讨论和辨析清人辑佚的失误所在。

## 一、三家《诗》流传之时代特征

本文主要依托历代史书、别传、碑刻汇编等文献材料, 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隶释》《隶续》等书, 其次参考宋至清辑佚著作中的师承流传考述和今之学人对师法的再讨论<sup>②</sup>, 对三家《诗》学人之基本情况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见表1。

表1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的流传兴衰面貌。西汉时期基本情况可考的鲁《诗》学人有35人, 至东汉时仅有14人。由此可以推断,

收稿日期: 2024-05-28

作者简介: 居晓倩(1993—), 女, 山东临沂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诗经》相关研究。

①《新唐书·艺文志》记载, 唐代存有韩《诗》著作《韩诗注》(即《韩诗内传》)《韩诗集序》《韩诗外传》和《韩诗翼要》。至《宋史·艺文志》时, 已仅剩《韩诗外传》, 由此可见, 宋代韩《诗》著作多已亡佚。又据吕冠南考证, 《韩诗内传》大致亡于北宋1008—1041年间, 此说可从。具体论证可参看吕冠南的博士学位论文《〈韩诗〉研究》(山东大学2019)。

②王应麟、范家相、冯登府、魏源、陈寿祺、陈乔枏、王先谦等人, 均于其辑佚著作中梳理和讨论三家《诗》之师承关系。今之学人如吕冠南、郝桂敏、赵茂林、房瑞丽、俞艳庭、董超等, 亦对三家《诗》的师承进行了梳理。

表1 汉至魏晋三家《诗》学人统计表（单位：人）

活动时代 <sup>①</sup>	西 汉	东 汉	三国至魏晋	总计
韩《诗》学人	韩婴、韩商、韩生、贲生、赵子、蔡谊（义）、 食子公、栗奉（丰）、张就、王吉、长孙顺、 发福、陈器、侯芭（包、苞）、夏恭（15）	薛汉、杜抚、廉范、澹台敬伯、韩伯高、 尹勤、赵晔、冯良、召驯、召休、崔琰、 濮阳闾、张紘、张匡、杨仁、郑玄、刘宽、 郅恽、梁商、梁妘、杜乔、李恂、廖扶、 唐檀、朱勃、夏牙、谒焕、公沙穆、张恭祖、 王阜、祝睦、马江、丁鲋、樊安、冯焕、 冯緄、田君、田君 <sup>②</sup> 、武梁、梁景（40）	杜琼、 何随、 董景道（3）	58
鲁《诗》学人	申培、刘戊、徐偃、孔安国、周霸、夏宽、鲁赐、缪生、 阙门庆忌、王臧、赵绾、（大）江公、许生、徐公、 江公、韦贤、韦玄成、韦赏、王式、张长安、唐长宾、 褚少孙、张游卿、王扶、许晏（晃）、薛广德、龚舍、 龚胜、李业、高嘉、高容、高翊、右师细君、卓茂、 包咸（35）	包福、黄谿之子、刘伉、魏应、鲁恭、鲁丕、 陈重、雷义、陈宣、李昺、李咸、蔡朗、 鲁峻、武荣（14）	无	49
齐《诗》学人	辕固生、后仓、夏侯始昌、夏侯胜、萧望之、 白奇、匡衡、满昌、皮容、师丹、刘欣、班伯、 伏理、伏湛、伏黯、翼奉、张邯、马援（18）	伏恭、伏寿、伏无忌、任末、景鸾（5）	无	23

鲁《诗》之兴盛主要在西汉时期，至东汉时其流传已经出现疲势。西汉时期齐《诗》学人为 18 人，至东汉时可考者仅 5 人，学人数量仅为西汉时期的三分之一。可见齐《诗》与鲁《诗》的发展高峰均西汉时期。东汉时齐《诗》明显衰落，学人寥寥无人。而韩《诗》的流传则与鲁、齐两家有别。西汉时期韩《诗》学人可考者为 15 人，至东汉时期竟达到 40 人之多。不仅如此，到三国魏晋时期，仍有学人可考。因此可知，韩《诗》的发展高峰在东汉时期，且延续至三国魏晋时期。通过梳理三家《诗》学人之数量，我们发现鲁《诗》、齐《诗》的发展从东汉时期便开始衰落，魏晋时传习者已非常少了，而韩《诗》则在东汉时期形成发展高峰，魏晋时才逐渐走向衰颓。是以《隋书·经籍志》所言“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sup>[2]918</sup> 的论断是可信的。

表 1 也直观地呈现了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关系。在西汉时期鲁《诗》学人有 35 位，齐《诗》18 位，韩《诗》15 位。齐、韩两家学人数量明显少于鲁《诗》。由此可见，相较于齐、韩两家诗说，鲁《诗》更受西汉学人推崇，处于三家《诗》解《诗》的主导地位。至东汉时期韩《诗》后来者居上，超越鲁、齐两家，逐渐成为显学。鲁《诗》学派已不复西汉盛况，屈居

第二，不过仍有稳定的学人群体。只有齐《诗》不仅没有同韩《诗》一般迎来转机和发展高峰，反而在东汉时期继续式微下去。可以说从西汉到东汉，齐《诗》都是在鲁《诗》、韩《诗》发展的夹缝中生存，其《诗》说一直未能成为三家《诗》中的主流。这应该是其《诗》说本身的特殊性和弊病所致。此外，通过爬梳各史书中的三家《诗》师承情况，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史书所载学人数量与上文所言三家《诗》流传情况相合（见表 2）。

通过对比三家《诗》学人在《史记》中的记载情况，可以推测鲁《诗》在西汉时期最先开始发展并显盛。《史记》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公元前 3000）直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近三千年的历史。可见，至少在汉武帝元狩元年时，鲁《诗》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诗派也已有较扎实成熟的理论根基，其师徒传授情况较为清晰。因此司马迁之记载自然要比韩《诗》齐《诗》详细、明晰、系统。而齐《诗》、韩《诗》之师承记录在《史记》中还只是只言片语。直到《汉书》中，齐、韩两家之师承才有系统、细致的流传脉络。这说明齐、韩两家《诗》说在汉武帝元狩元年之前影响范围较小，徒众规模不够，且为官者较少，故司马迁所载无多。

① 西汉、东汉末都为政权迭起时代，故此期学人活动时代或非归一朝。需结合其人在某时代有无为官或教《诗》、传《诗》之举，来划定其活动时代范围。如经历两汉，只看有没有在西汉或东汉任官、教学传播《诗》学。

② 此二田君有别，一者为关中人，官斥彰长。参见《隶续》卷二十《斥彰长田君断碑》所载。一者为泰山东平阳人，官至太尉。参见《集古录》卷二所载。

表2 常见史书所载三家《诗》学人统计(单位:人)

书目	鲁《诗》学人 <sup>①</sup>	齐《诗》学人	韩《诗》学人
《史记》	11	2	4
《汉书》	17	13	8
《后汉书》	18	8	25
《东观汉记》	0	0	4
《三国志》	0	0	4
《华阳国志》	0	0	1
《晋书》	0	0	1
《隋书》	0	0	1

从三家《诗》学人在各书中所占之篇幅,亦可得见三家《诗》在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延续情况。鲁《诗》之师承流传,《史记》载11人,《汉书》载17人,《后汉书》载18人。三书所载人数较为均衡,可见鲁《诗》在两汉时期发展稳定,徒众不衰。韩《诗》之师承,《史记》载4人,《汉书》载8人,《后汉书》载25人,《东观汉记》载4人,《三国志》载4人,《华阳国志》《晋书》《隋书》均各载1人。可知虽然韩《诗》在西汉时发展逊于鲁《诗》,但至东汉时逐渐成为三家诗学之主力,并能够在齐、鲁两家《诗》说逐渐消亡之时,历经战乱,于三国魏晋时期仍有传习。齐《诗》之师承,于《史记》中仅有2例,《汉书》中有13例,《后汉书》有8例,说明齐《诗》之流传相较于鲁、韩两家,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通过对三家《诗》学人流传情况的整理和描述,可以对三家《诗》流传的时代特征作一总结。第一,虽然三家《诗》均在两汉时期列为学官,但是三家的发展与显盛却有不同步调。唐晏于《两汉三国学案》中提出的“大抵《鲁诗》行于西汉,而韩《诗》行于东汉”<sup>[3]299</sup>的论断,在此得到印证。第二,三家《诗》的流传存在竞争关系,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清儒辑佚与研究三家《诗》,将其与《毛诗》对立,不免过度地将三家《诗》织联在一起,“三家同体”之论<sup>②</sup>盛行。实际上,通过梳理三家《诗》的师承流传可知,即使同为今文经学,三家《诗》的关系并不似清儒所描述的那样紧密,甚至在发展上具有竞争关系。第三,三家《诗》之流传兴衰皆具有阶段性。立为学官后的三家《诗》派发展,没有一直处于传播和发展的高峰期,而是依然遵循着“初期发展—中期显盛—后期衰落”的自然趋势。由此可见,即使存在政治导向,三家《诗》也并不会一直处于《诗经》解读的权威地位。《毛诗》的上位,并不只是政权更替的结果,亦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

## 二、三家《诗》流传之地域特征

齐《诗》与鲁《诗》都以诗派创始人所在地来命

名。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在介绍齐《诗》韩《诗》学人时,亦有“齐言诗皆本轲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sup>[4]3124</sup>,“燕赵闲言诗者由韩生”<sup>[4]3124</sup>之论。由此可见,前人已经开始关注到三家《诗》的地域传布存在一定的特点与差异,此亦给清人辑佚三家《诗》带来灵感。是以清儒对两汉学人归家分派的方式之一就是依据地域来对其进行分类。或因某人为鲁国人,其《诗》论又与《毛诗》相左,便将此人归入鲁《诗》一派;或因某人教《诗》于齐,便认为其所持《诗》论当为齐《诗》。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这种考量和方法或许说得通,但人并不是静物,尤其在两汉时期,游学之风盛行,远在巴蜀之人都会聚集到长安太学受教,更何况齐、鲁之人。马昕《对三家〈诗〉辑佚的系统反思》对清人依据学人所处地域进行定派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从《汉书》《后汉书》传记中看到很多关于游学的记载。当时的儒生或是从家乡来到帝都太学投身博士门下,寻求晋升之阶;或是登名山访高士,执礼求学,这些行为都会重新塑造他们的学术取向。一个鲁地出生的人完全可能在成年后拜访齐地受齐学熏染从而改变过去的学术风格;反之亦然”<sup>[5]70</sup>,这种思考不无道理。是以清人依地定派之法到底有多少依据,三家《诗》之师承存在怎样的地域流传特点和规律,都需对学人地域进行统计才能窥探一二。

表3共统计三家《诗》学人121位,其所在地区共涉两汉时期郡国40处,各家在不同区域的学人分布存在差异。

首先,三家《诗》学人南北分布不均。北方学人所在郡国多达32处,而南方所在郡国只有8处,北方三家《诗》学人数量也远远超过南方。即使是南方学人数量在三家中最多的韩《诗》一派,其南北分布也有很大差距,并且习治三家《诗》的南方学人中,有一部分还是自行游学至首都太学进行学习的。造成南北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三家《诗》创始人均为北方人。其诗派流传最开始应在周边地区展开,直到徒众尤胜,立于学官,其辐射范围才覆盖至南方郡国。其二,两汉之首都均在北方。南方相较于北方而言,经济、文化、教育水平都要落后一些。其三,北方郡国密集,平原多,交通相对便利,土地所载人口也多,再加上各区域联系相对紧密,非常利于学说发展。是以三家《诗》在北方的流传时间和广度,都要胜于南方。

其次,鲁《诗》、齐《诗》的流传具有区块性特征。鲁《诗》之流传多在鲁国、楚国、东海、山阳、沛郡、

① 史书写作本多有因袭之举,且同时期之史书所载史实和人物亦不免有重复,是以本表搜集各史书中的鲁《诗》学人时,如遇有多书皆有记载的情况,便以成书时代早晚为限,将学人划属首次出现记载的史书。齐《诗》、韩《诗》学人之归属方法同鲁《诗》。

② 赵茂林于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三家同体论”一说。具体可参看赵茂林的博士学位论文《两汉三家〈诗〉研究》(扬州大学2004)。

琅琊、平原、京兆尹、河南、汝南、右扶风等地，其中鲁国学人最多。这些区域大多分布在山东平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齐《诗》之流传地域与鲁《诗》相近，亦多在黄河流域和山东平原地区。但韩《诗》的流传范围则扩大至长江流域和西南巴蜀之地。

再次，三家《诗》学人地域分布具有时代性。三家《诗》流传地域以表3中的南阳郡为界，以上郡国多为西汉学人所属地区，以下郡国则多为东汉学人所在地区。在统计韩《诗》学人的归属地时，发现很多鲁《诗》齐《诗》学人地域统计中没有出现过的“新”地区，如清河、济阴、犍为、安定。存有相当数量且独属韩《诗》的流传地域的原因或有三点。第一，某些郡国是东汉时

新设立的，西汉时不曾有。第二，由于三家《诗》中，韩《诗》亡佚时间最晚，其师承脉络相比其他两家要清晰、完备，典籍记载者颇多，自然出现的“新”地就多。第三，鲁《诗》齐《诗》在东汉时期确实逐渐走向没落，影响力和热度均逐渐不及韩《诗》。是以东汉时期，韩《诗》传播甚广，学区甚多。

最后，三家《诗》流传具有地域互斥性。虽有某地三家《诗》学人并存的情况，但这仅是少数。当某一家《诗》在一地流传广泛，学人数量较多时，此地其他两派学人则很少。如巴郡学韩《诗》者有4人，则无学齐《诗》鲁《诗》者。沛郡学鲁《诗》者有4人，则无学齐《诗》韩《诗》者。琅琊学齐《诗》者有8人，但

表3 三家《诗》学人所处地域论学人数统计（单位：人）

	所在郡国	鲁《诗》	齐《诗》	韩《诗》	总计
	1 鲁国	11	2	0	13
	2 齐郡（国）	0	1	0	1
	3 楚国（彭城）	3	0	0	3
	4 东海	2	4	0	6
	5 代郡	1	0	0	1
	6 山阳郡（国）	4（西3，东1）	0	2（西1，东1）	6
	7 东平（大河）	2	0	0	2
	8 沛郡（国）	4（西2，东2）	0	0	4
	9 琅邪	1	8（西5，东3）	1	10
	10 陈留	2（西1，东1）	0	1（东）	3
	11 平原	3	0	0	3
	12 京兆尹	1	0	1（东）	2
	13 南阳	1	0	3（东）	4
	14 河南郡（尹）	1（东）	0	0	1
	15 任城	1（东）	0	1（东）	2
北	16 右扶风	2（东）	2	1（东）	5
方	17 汝南	1（东）	0	2（东）	3
	18 颍川	0	1	0	1
	19 定陶	0	1	0	1
	20 巨鹿（广平）	0	0	2（西1，东1）	2
	21 河内	0	0	4（西3，东1）	4
	22 泰山	0	0	2（西1，东1）	2
	23 淄川	0	0	1	1
	24 淮阳	0	1（东）	0	1
	25 北海	0	0	2（东）	2
	26 弘农	0	0	2（东1，晋1）	2
	27 安定	0	0	4（东）	4
	28 梁国	1	0	2（西1，东1）	3
	29 东郡	0	0	1（东）	1
	30 清河郡（国）	0	0	1（东）	1
	31 济阴	0	0	2（东）	2
	32 广阳（燕国）	0	0	2	2
	33 会稽	2（西1，东1）	0	3（东）	5
	34 豫章	2（东）	0	1（东）	3
	35 九江（淮南）	0	1	2（东）	3
南	36 犍为	0	0	1（东）	1
方	37 蜀郡	0	1（东）	3（东1，三国2）	4
	38 广陵国（郡）	0	0	1（东）	1
	39 巴郡	0	0	4（东）	4
	40 广汉	1	1（东）	0	2
	总计	46	23	52	121

学鲁《诗》韩《诗》者各只有1人。特别是表3中自颍川以上地区，鲁《诗》学者甚多，而自颍川以下地区，则大多只有韩《诗》学者。三家《诗》的地域互斥性也是三家《诗》本身存有分派差异的体现。由此也可佐证三家《诗》之关系并不如清人所言的“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sup>[6][24]</sup>。

此外，由表3可知，鲁《诗》学人中处鲁国者确实最多。或许可以证明前人所言鲁地人多学鲁《诗》。但齐《诗》学人最多之地不在齐郡而在琅琊。在春秋战国时期琅琊虽曾属齐国，但在秦时便已分置琅琊郡与齐郡。前人所言齐地多学齐《诗》者，在此表中确实凸显不出。是以清人运用地域对三家《诗》学人进行归家定派，还需辩证看待，不可全盘接受，当然也不急于全部否定。因为有的汉儒一生之中会至多地师从多人。若想利用地域来对三家《诗》学人进行划分，还需结合学人所处时代背景、具体诗论、个人生平及行状来判断。

### 余论

通过对三家《诗》流传发展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我们已经对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脉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同时也发现，即使三家《诗》同属今文经学，均在两汉时被列为学官，并遭受同样的亡佚命运，但其内部联系并不像清人说的那般紧密，三家《诗》的发展和流传甚至存在明显的排斥性。是以我们不得不反思清人辑佚三家《诗》时存在的问题。首先，清人过于执着于强分今古，而忽略了三家差异。清代学者大多将四家《诗》依据今古文之别强分今古两派，并且对今文派之三家，自

动归为一体。三家同体之论盛行，魏源有“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sup>[6][24]</sup>的言论，王先谦也有“综览三家，义归一致”<sup>[7]</sup>之说。虽说三家《诗》都是今文经学，且在汉代流传之中互有借鉴，但《诗》既然能归四家，就说明各家是有区别的。这种只看到共同性而忽略差异性的观点对于三家《诗》研究来说带有片面性。其次，清人辑佚时贪求辑佚数量，导致辑佚原则有失严谨。出于增加辑佚内容的目的，清人相较于前人，作了非常多的努力和尝试，开辟了依据学人辑佚诗说的方法。但在学人诗派的归属问题上，却有犹不及之嫌。如清人依据三家《诗》传播的某些地域特点，便大胆推断某地学人均学某家《诗》，或者认为某一时期只有某家《诗》，则此一时期的学人均习某家《诗》，等等。这类说法看似合理，但通过细致梳理三家《诗》流传的时代与地域特点，便可发现疏漏所在。辑佚原则存在问题，辑佚的成果也不会可靠。因此，当下的三家《诗》研究，若想突破清人的框架，需从辑佚原则入手，重新审视和辨析，破除重立。

### 参考文献：

- [1] 班固，著.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魏征，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 唐晏. 两汉三国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司马迁，撰. 史记[M].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马昕. 对三家《诗》辑佚的系统反思[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63-74.
- [6] 魏源. 诗古微[M]. 长沙：岳麓书社，2004.
- [7]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A Study 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三家《诗》) in the Han Dynasty

JU Xiaoq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flourishe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gradually disappeared after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Qing dynasty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the lineage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but overlooked the historical value inheren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se lineages. By sorting out the lineage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we can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and further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Poems* during the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also helps to distinguish the problems of the Qing Scholars' principle of collecting lost poems.

**Key words:** three schools of *Poems*; succession and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gional features

# 《正好遇见你》：非遗题材电视剧的创新与不足

李莉, 程军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 安徽蚌埠 230030)

**摘要:** 利用电视剧形式呈现非遗元素、讲述非遗故事, 一直是传播、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然而, 目前国内电视剧市场上的非遗题材剧在创作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严重影响了非遗文化电视传播的效果。《正好遇见你》作为非遗题材的职场剧, 在展示非遗文化节目的完整制作和生产过程的同时, 通过多种非遗节目形式的有机融合、非遗故事的精彩讲述、文化遗产的“活”化呈现以及职业精神的坚守和弘扬, 创新了非遗文化的电视化表达, 开辟了非遗文化影视传播的新形式、新路径。

**关键词:** 《正好遇见你》; 非遗题材剧; 非遗文化节目;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06-06

利用电视剧形式呈现非遗元素、讲述非遗故事, 一直是普及、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从20多年前红极一时的《大宅门》《天下第一楼》到近年大火的《延禧攻略》《梦华录》等, 无不展现出“非遗+电视剧”的巨大魅力和超强传播力。目前, 非遗与电视剧的“联姻”方式主要包括两种: 一种是在电视剧中“植入”非遗元素, 让非遗作为“配角”和辅助元素为电视剧的剧情、内容和背景(包括服装、化妆、道具等)服务,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如《清平乐》《延禧攻略》《长安十二时辰》等; 另一种是将非遗作为电视剧“主角”, 以某项非遗作为剧情切入点并围绕它的变迁、传承展开电视剧的叙事, 如《鬓边不是海棠红》(京剧)、《芝麻胡同》(酱菜)、《后浪》(中医)等。显然, 这种联姻方式带来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一方面, 非遗的融入整体上提升了电视剧的文化含量和审美魅力,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下电视剧收视的“流量密码”; 另一方面, 借助电视剧的通俗化、生活化、审美化的传播方式及其巨大传播力, 非遗得以顺利“出圈”, 从小众逐步走向大众。

然而, 在目前国内电视剧市场呈现“非遗”热潮的同时, 非遗题材剧的创作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 在剧中“植入”非遗元素仍是目前该类电视剧的主流, 它们大多以剧情、叙事为主, 非遗仅作为背景元素和文化点缀以一种视觉“奇观”的方式得以呈现和展

示, 观众从电视剧中只能得到浮光掠影的非遗印象, 很难获得对其历史内涵、文化价值的深入了解; 其次, 即使是以非遗作为剧集“主角”的作品, 也常常出现故事讲述与非遗呈现发生冲突、剧情的娱乐性需求与非遗的知识性要求难以平衡的问题, 使得非遗元素难以真正有机融入电视剧的剧情叙事当中; 再次, 目前的非遗题材剧仍以古装戏、(民国)年代戏为主, 在总体风格上显得“老气横秋”, 所讲述的非遗故事与当下非遗传承的实际状况存在较大距离, 因而显得缺乏现实意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是目前困扰非遗题材剧创作者的难题。诚如学者郭梅所言: “如把非遗元素当做葱花撒在电视剧这盘菜上, 那着实不难……但如把非遗作为核心, 既要把非遗文化的子丑寅卯介绍清楚, 又要将之如盐入水地结合进人物和故事里, 诚非易事。”<sup>[1]</sup>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不仅会大大影响电视剧的非遗传播效果, 同时也会影响非遗题材剧的发展繁荣。此时, 由欢娱影视、爱奇艺联合出品的非遗文化大剧《正好遇见你》的出现, 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思路, 为当下创新非遗题材电视剧, 提升其非遗传播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 一、多种非遗节目形式的有机融合

一般来讲, 目前出现在电视媒体上的非遗节目形

**收稿日期:** 2024-09-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现代主义文学戏仿研究”(19BZW034); 安徽财经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研究”(acjydz2023026)。

**作者简介:** 李莉(1980-), 女, 安徽含山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研究。

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晚会表演形式,包括综合性晚会或非遗专题晚会的舞台表演,前者如央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其中包括很多非遗题材的节目,以歌舞类、杂技类和戏曲类非遗为主),后者如《中国非遗春节联欢晚会》(2018年开始举办)、天津卫视的相声晚会等;第二,以非遗为题材的文化综艺,如中央广电总台推出的《非遗公开课》《非遗里的中国》,河南卫视制作的《端午奇妙游》,浙江卫视制作的《还有诗和远方·非遗篇》等等;第三,非遗纪录片,比如央视推出的《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造物者》《百年巨匠·非遗篇》以及各地方卫视制作推出的《昆曲六百年》(江苏卫视)、《智在匠心》(东南卫视)、《东方全纪录》(东方卫视)等;第四,非遗题材的电视剧。尽管这4种节目形式都是传播非遗的有效途径,但每一种节目形式传播非遗的方式、重点和效果各不相同:晚会舞台节目注重对非遗的审美性、表演性的挖掘和艺术魅力的展示,文化综艺往往注重非遗呈现的趣味性、娱乐性和文化普及的效果,纪录片更关注非遗呈现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文化教育的效果,而电视剧则更加重视通过展现非遗的故事性、情节性元素来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正好遇见你》作为一部非遗题材剧,生动讲述了以编导鱼在藻、文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年轻综艺团队为呈现中华文化遗产之美,齐心协力打造、推出一档非遗类文化节目——《传承》——的故事。从内容和主题上看,《正好遇见你》与普通的非遗题材剧不同,它并未把非遗(技艺或作品)仅仅作为一种视觉“奇观”来展示,而是在呈现这些遗产的同时深入考察其历史背景和传承现状,并向观众展现非遗文化节目的完整制作和生产过程(电视剧的英文名“Hi,producer!”就明确体现出这一点)。从形式框架上来看,《正好遇见你》虽然采用了普通职场剧的形式,却又将纪录片、文化综艺、晚会表演等非遗呈现形式融于一炉,成为一个集多种非遗传播形式于一身的有机综合体。首先,在剧中每个单元的拍摄环节,通常安排专家陶唐出境,陶唐结合高质量镜头呈现出的清晰、精美的文物展品,对非遗的历史、代表作或工艺流程进行专业的介绍和解说。同时,在每个单元故事的剧集结尾,都设计一个3~5分钟的片尾访谈单元,让技艺传承人、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学者等相关非遗专家出境,介绍此项非遗的专业知识并解说其精髓和魅力。这两个环节都采用典型的非遗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其次,在剧中多个单元的节目(成品)呈现环节安排多部历史小剧场(共10部),通过挖掘文物、遗产背后的人物和历史并对其进行故事化、情感化的表现和演绎,这是

一种典型的文化综艺的非遗呈现方式。再次,剧中还采用了不少晚会表演的非遗展示形式,像第7集、第31集中重现中国历代女性妆容、服饰演变历史的两场模特表演(“中国古典传统服饰复原秀”和“中国古法妆品秀”)以及第13集陆飞羽领衔表演的“敦煌飞天舞”,都是这种呈现方式的代表。

这种包含、融合了多种非遗节目形式的剧集框架,发挥了各种节目形式的非遗呈现特点和传播优势,将电视剧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文化综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纪录片的严谨性和专业性以及晚会表演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融为一体,不仅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融合性的非遗呈现和传播效果,让观众得以在丰富、多样的视听体验中收获非遗知识、接受非遗教育,同时让融合了多种表现形式的非遗文化能够触达不同欣赏口味、不同文化圈层的观众,从而丰富、拓展了非遗传播的形式和路径。

## 二、非遗故事的精彩讲述

“电视剧是叙事的艺术。……电视剧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精彩的故事。”<sup>[2]</sup>引人入胜的情节,有趣又有内涵的故事,是电视剧吸引观众、赢得口碑的关键,也是衡量其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准。讲好非遗故事,把古老、厚重、专业的非遗文化知识融入时尚、轻松、有趣的故事和精彩纷呈的情节当中,正是《正好遇见你》取得成功的关键。该剧巧妙运用了“戏中戏”“故事套故事”的套层式叙事结构:以《传承》团队生产、制作非遗文化节目为叙事主线(第一层级的故事),在这条主线之下包含了一条叙事副线——非遗的当代传承故事(第二层级的故事),而在这条副线之下又包含了另外一条叙事副线——非遗的历史故事(第三层级的故事);在这三条显在的主要叙事线索之中,又分别包含许多潜伏的叙事辅线;同时,在每一层级的故事中都设置了激烈的戏剧性冲突,并以冲突的展开和解决为基本模式讲述每一层级的故事,增加剧情的张力感和可看性。下面对该剧的多层叙事结构作进一步的具体阐述。

第一,《正好遇见你》采用职场剧的叙事模式来讲述主线故事——一个以传承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年轻综艺团队克服重重阻力,不断创新,同心协力制作出《传承》节目的故事。这是该剧叙事结构的第一层级,构成了剧情的基本框架和走向。首先,在这个叙事层级中,要反映出职场生态,体现职场剧的现实主义要求。“职场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职场的真实呈现,这是职场剧成功的关键。”<sup>[3]</sup>《正好遇见你》秉承了职场

剧的这一传统,成功塑造了以编导鱼在藻、非遗专家陶唐为核心的文化综艺从业者群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内文化综艺产业的真实运作模式和发展现状,让观众看到了一档包含了调查采访、构思选题、策划编导、拍摄剪辑、后期制作、宣传营销等各个环节的综艺节目的完整生产流程,从而获得了对该行业的生态和发展现状的初步了解。其次,为了增加主线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趣味性,该剧设置了一个同样以非遗传承为节目宗旨(但在非遗传承理念和方式上完全对立)的《非遗物语》作为《传承》的对立面,通过二者在剧中对创意方案、行业人才、非遗传承人、广告商和市场关注率等资源的争夺、竞争引发一系列戏剧性冲突,然后在一次次解决冲突(《传承》不断战胜《非遗物语》)的过程中推动剧情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再次,作为职场剧,《正好遇见你》自然也不缺乏爱情纠葛、人事斗争、主人公身世等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职场剧必备元素。像鱼在藻和顾时雍、陶唐和庄伊伊、穆宗沅和汪希宁、谢尧和舒容之间的爱情故事,鱼在藻与袁迦莹之间的编导职位之争,鱼在藻、陶唐、谢尧等人的身世故事等等,都为该剧增添了爱情剧、宫斗剧和悬疑剧的新鲜、刺激元素,制造出许多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冲突,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电视剧的娱乐性和可看性。

第二,《正好遇见你》以“制作非遗文化节目”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剧情的16个情节单元,然后在各个单元中展开第一条叙事副线——通过《传承》节目组的摄影镜头讲述非遗的当代传承故事。这是该剧叙事结构的第二层级,讲述的是虚构的“现实”故事。在这条叙事线索中,《传承》节目组秉持文物“是打开尘封历史的钥匙”这一理念,在各个单元中大致按照“文物—技艺—人—故事”模式来讲述非遗的当代传承故事,正如剧中陶唐所说:“五分钟短片引出古代文物,寻找这件文物背后的技艺,挖掘人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故事。”由于传统的非遗项目历来就以家族、师徒(类似于父子关系)传承为主,因此这些非遗传承故事相应地采用了家庭伦理剧的模式作为基本叙事框架来进行讲述,生动展现了各个非遗传承人与其继承者(包括花丝镶嵌传承人刘大师与女儿、苏州缂丝传承人林商英与女儿、古法制香传承人丘泰与孙女、水印版画传承人赵师傅与儿子、漆艺传承人曹大师与弟子等)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使得代际冲突(子女对父辈的反抗与叛逆)这一家庭伦理剧的常规母题在当代非遗传承故事中多次重复呈现。这个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剧中引发了非常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度造成家庭内部秩序面

临崩坏,父(母)子(女)的亲情面临瓦解,形成了许多精彩看点,显示出非遗传承故事的独特魅力。当然,在中国家庭伦理剧“和为贵”“大团圆”的主流叙事模式影响下,这些故事往往最终都以两代人走向和解而收获了圆满结局——非遗技艺后继有人,同时亲情也得到圆满修复。从《传承》节目组的叙事视角出发,这些非遗传承的故事是讲述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而从《正好遇见你》剧组的叙事视角出发,则是虚构的故事。然而,尽管这些故事本质上是虚构的,但是丝毫不影响它们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些故事真实揭示了当下非遗传承所面临的现代困境和根本性难题——传统技艺与现代社会、纯手工制作与机器化大生产、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与追求快速高效的现代精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让年轻一代逐渐远离古老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这些故事也试图用父子(女)、母女、爷孙、师徒之间的伦理亲情来化解非遗传承中所面临的代际冲突和观念差异问题,为走出当下非遗传承的困境提供一条可选择的路径。

第三,《正好遇见你》在每个单元中的收官(节目成品呈现)阶段,通过历史小剧场的形式展开第二条叙事副线,讲述虚构的非遗历史故事。这是该剧叙事结构的第三层级,讲述的是虚构的故事。在这一条叙事线索中,《传承》节目组在各个单元大致按照“文物—技艺—人—故事”模式来讲述虚构的非遗故事,包括林家四代女性传承缂丝艺术的故事、成化帝朱见深与贵妃万贞儿的故事、雍正帝与年贵妃的故事等等。具体说来,首先,这些故事采用了当下流行的(植入式)非遗题材剧的方式展开叙事,以某个文物或遗产作为故事的引子,在史实基础上展开大胆的艺术想象,对历史进行情感化、浪漫化的再现和演绎,同时在剧情的展开过程中将文物和遗产作为背景或道具不着痕迹地植入其中,取得了很好的非遗呈现和传播效果。其次,历史小剧场再一次充分利用了“故事套故事”的套层式叙事结构,同时又设计了种种戏剧性冲突,以达到跌宕起伏、曲径通幽的情节效果。以第8集的小剧场为例,在这个历史故事中,第一层级的叙事场景是慈禧与珍妃的对话,前者要求后者讲一个故事,然后是珍妃讲述第二层级故事——令妃进谏乾隆,请求赦免玉匠姚宗仁的故事,接着令妃又口述了第三层级的故事——明代嘉靖年间玉匠陆子冈的故事,三个发生在不同年代但主题、情节相似的故事彼此折射、相互呼应、互为阐释,通过这种一环套一环的层层深入式的“戏中戏”讲述玉雕的故事,同时引出了妃嫔巧妙进谏之道这一主题。再次,这些故事在以历史剧为主体叙事

框架的同时,充分融入了爱情剧、宫斗剧的元素,来增加剧情的戏剧性和可看性。比如在第17集中的明孝宗朱祐樞与皇后张月容“以真心换真心”故事中,张月容从春节至中秋的每一个节日为朱祐樞制作、献上不同的节俗食品来表达爱意,虽然起初未获朱祐樞青睐,但她毫不气馁,后来凭借端午节献上的背包粽激起了朱祐樞对母亲的回忆,在选妃失败后又献上祝愿国泰民安的月饼,终于用真心感动了朱祐樞而喜获良缘。观众在这个故事中既可以“享受”一道道节俗非遗美食大餐,又能观赏刺激、跌宕的后宫争宠剧情,同时还能欣赏到浪漫、感人的帝后之间的爱情戏,获得了新奇而丰富的观剧体验。

讲述精彩的非遗故事,这既是《正好遇见你》剧组对剧情叙事的追求,也是《传承》团队在剧中设定的创新非遗传承路径、把非遗推向大众的重要创作策略,在剧中为节目赢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广泛的关注度,同时也为现实中的当下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 三、文化遗产的“活”化呈现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sup>[4]</sup>。优秀的文化遗产只有先“活”起来,才能获得生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认知习惯和欣赏口味并实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这使得“活”化呈现成为了当下文化遗产传播、传承的最有效路径之一。近年来以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视听节目纷纷采用了“活”化呈现的方式来提升节目的美学品质和传播效果,像《国家宝藏》通过明星演绎、还原可活化的历史场景,让遗产“说话”;《如果国宝会说话》利用高科技视觉特效让文物开口“说话”,讲述它们精美、优雅形体背后的生动故事;抖音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利用数字三维动画科技,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伴着现代音乐翩翩起舞;《典籍里的中国》采用“戏剧+影视化”的方式,对中国典籍中的经典文字进行故事化、戏剧化的演绎;《诗画中国》中运用音乐、舞蹈、舞台剧、三维动画等形式,对静止的传统绘画进行动态化、艺术化的演绎和呈现;等等。

同样,在《正好遇见你》里,《传承》团队也创新采用了多种“活”化呈现非遗和文物的方法,来吸引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注意力,提升节目的关注度和收视率。首先,如上文所述,把文物看作“是打开尘封历史的钥匙”,通过寻找非遗和文物后面的人物

(包括非遗传承人以及与遗产、文物相关的历史人物)并讲述他们的故事(电视剧的两条叙事副线),赋予这些“死”的文物和遗产以人的情感内涵和活生生的内在灵魂,来实现对它们的“活”化呈现。鱼在藻在电视剧第2集中所说的一段话,表达了节目组对文化遗产进行故事化演绎和“活化”呈现的明确意图:“观众要看文物有《国家宝藏》,要探寻历史文化有《上新了,故宫》,还有各种文化节目跟纪录片层出不穷……现在的节目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文物,可我认为文物终究是一件物品,观众真正关心的是人,是文物和人之间的联系。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我们的立足点是人,要给观众看的是故事。”电视剧通过两条叙事副线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对这一节目宗旨的实践。其次,利用各种现代艺术和表演形式对古老的遗产进行当代复原,对静止的文物进行动态演绎。例如,《传承》团队策划、举办的“中国古典传统服饰复原秀”(第7集)和“中国古法妆品秀”(第31集),在中国历代名画中的女性服饰、妆容的基础上,采用现代服装表演形式,通过电视画面在虚拟的绘画形象和现实的舞台形象之间不断切换,让古与今、虚与实、静与动的视觉形象形成有趣的对照和互动,既激活了中国传统服饰和妆容的当代审美价值,又赋予了时尚的服饰表演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让观众感到兴味盎然、美不胜收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中国女性服饰、妆容文化的准确认知;在第13集中,《传承》团队还依托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用中国古典舞(“敦煌飞天舞”)的形式将壁画中静止的舞者形象“活”化为矫若游龙、翩若飞鸿,充满古风古韵而又动感十足的舞蹈形象,同时辅以影视剧的叙事形式,用舞蹈讲述壁画背后感人的中国故事;在第29集中,《传承》团队还通过现场复原、重现古代祭祀礼仪的全过程,伴以中国古典乐器和西方乐器同台竞技为背景,穿插由中华古代礼仪改编而成的鬼畜舞,对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进行了年轻化演绎和“活”化呈现。再次,依托三维动画等视觉特效技术,通过大胆的创意想象让文物和遗产动起来、活起来,完成对它们的“活”化呈现。比如剧中对缙丝花鸟图上的花、鸟所作的动态处理,生动展现出春天花朵缓缓飘落、飞鸟展翅欲飞的刹那情境,让织品中鸟语花香的美丽春景获得了活泼泼的动感和实实在在的生命感;另外在第28集中,通过让醉酒后的鱼在藻在青铜展厅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以一种轻松、娱乐的方式和幽默、搞笑的风格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一向被认为最庄严、最肃穆、最厚重的国之重器——进行创造性演绎和“活”化呈现:在这里,不同的青铜器互相调侃、取笑(它们说河南方言,因为这些青铜器多

产自河南地区),四羊方尊上的四只羊争吵着要散伙分家,莲鹤方壶上的仙鹤边舞边唱《郑风·子衿》,青铜古剑飞出剑匣并与青铜兵器一起合唱《秦风·无衣》,表达它们杀敌报国的壮志雄心。借助现代技术和艺术想象的力量,几千年来一直沉默、静止的古老青铜文物被赋予了人的性格、情感以及活的形象,从而复活在当下。

《传承》团队通过采用当代大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讲述非遗的故事、呈现文物的形象,让古老、静止的文物、遗产跃出纸面、走出博物馆和展厅,走进现实、走到台前,转化为灵动的、立体的、时尚的活生生形象,让沉睡千百年的古老文物和遗产重新“活”起来、“动”起来,获得崭新的生命,焕发出青春风采和时尚魅力。同时,这种对遗产和文物的“活”化呈现,既是对其可见的外在形象的动态模拟和复原,同时也是对其深层内涵、内在精神的激活和复兴,以此推动文化遗产与时代精神、当代文化相适应、相协调,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和发展。

#### 四、职业精神的坚守和弘扬

职场剧在让观众感到精彩好看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实施职业教育、普及职业伦理、高扬职业精神的严肃任务,正如学者李磊所言:“职场剧的叙事通常框定在职业精神、职场恋情的二元性结构之上,表现为专业性和世俗性的一面。”<sup>[5]</sup>在《正好遇见你》中,职场恋情这条线索若隐若现,几对男女间的爱情也有始无终,但作为以非遗传承为主题的职场剧,非遗从业者的职业精神却在剧中作为一个主旋律随处得到彰显,凸显了该剧充满正能量的鲜明价值导向,体现出电视剧制作方的传承文化遗产的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具体来说,这种职业精神在电视剧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遗传承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与弘扬;二是文化传播者(媒体人)对传播伦理的秉持与坚守。

##### (一) 非遗传承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与弘扬

非遗的传承,从物质层面上看是技术、手艺的代代相传,而从精神层面来看,则是手艺人工匠精神的薪火相传。“非遗项目之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根基在于工匠精神的坚守,而非遗的保护和命运走向,最终亦取决于工匠精神的重塑,工匠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和保护的必然条件。”<sup>[6]</sup>基于这一理念,《正好遇见你》一方面在剧中每个单元讲述虚构的非遗传承人故事,一方面在每个单元结尾对现实中的非遗大师进行访谈,从虚构和现实两个叙事角度来彰显非遗传

承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与弘扬。在这些虚构的非遗传承人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传承人刘文福对花丝镶嵌技艺“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的坚定信念,林家五代女性传承苏州缂丝艺术长达百年的艰难历程,仿古制瓷大师杨琬为追求完美瓷艺而砸碎自己的所有略带瑕疵的作品,香艺大师丘泰对古法制香每一道工序近乎苛刻的细节追求,木版水印大师赵师傅花数十年时间费尽心力地去复刻名画的执着精神,漆艺大师曲福一生潜心雕漆艺术而不为外物所迷的专注精神,无不体现出匠人“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品质、注重细节的工作原则和热爱、专注并持续深耕的职业伦理”<sup>[7]</sup>。同时,电视剧在每个单元故事结束时安排了(现实中)非遗大师访谈录,通过这些国之工匠的现身说法来展现他们对手艺的专注、热爱与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每段访谈的最后,纪录片结合每一种非遗技艺的特点,用一句行话或经典词概括技艺背后的工匠精神,如“别让这些传承千年的老手艺绝在我们手里”(花丝镶嵌)、“用经典创造经典”(海派旗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玉雕)、“纸墨良好,镌印精工”(木版年画)、“钟其一生,表里如一”(钟表修复)、“漆器讲究,所以我们不能将就”(雕漆艺术)、“责任打磨,工匠精神”(明清家具制作)等等,这不仅是非遗传承人工匠精神的彰显,也是他们真实心声的表达——不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手艺人,还自命为“守艺人”,主动承担起非遗传承的崇高使命和责任。在这里,虚构和现实中的两条叙事线索就像两面相对而立的镜子,彼此折射、相互印证,共同讲述了当代非遗传承人的感人故事;同时,这两条叙事线索也像一首拥有双声部的二重唱,彼此呼应、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对当代非遗传承人“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这一主题的弘扬与歌颂。

##### (二) 文化传播者(媒体人)对传播伦理的秉持与坚守

在《正好遇见你》中,《传承》团队作为非遗和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者,被赋予了文化传承的崇高使命。然而,面对当下的普通电视观众,如何将专业、枯燥的文物、文化遗产知识讲述得更加通俗、鲜活,富有现代意义,是《传承》团队以及所有致力于传统文化当代传播的媒体人面临的难题。针对这个难题,《传承》团队坚持守正创新、娱乐有度的原则,努力寻求节目的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的平衡,在追求节目的收视率和市场价值的同时不盲目迎合观众,而是在充分理解、尊重文物和历史的内涵和价值,在坚守传统文化传播的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坚持鲜明的节目特色、

高质量的制作水平和高雅的文化品位。《传承》团队对传统文化的媒体传播原则和规范的坚守,一方面集中体现在团队成员陶唐身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节目的最终作品中。

1. 青年专家陶唐在剧中既是节目的顾问、嘉宾、演员和重要把关者,也担任了鱼在藻的(精神)导师、庇护者或监护者的角色(后者天马行空、自由不羁、源源不竭的奇妙创意和艺术天才需要前者提供规范和原则来进行引导,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他坚持学者的严谨治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尊重文物、历史的内涵和价值,强烈反对文化节目的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是整个节目的专业性、严肃性和高品质的保证。第6集中他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传承》节目根本宗旨的准确概括:“节目要话题、点击率和广告,我都非常理解。但是,既然来到博物馆拍摄,就必须尊重这里的文物和历史,尽量在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找寻平衡,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取向最终会被观众的需求绑架,等你没了鲜明的节目特色,第一个抛弃你的也是观众。”在剧中,正是这种理念对《传承》整个团队的节目制作和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2. 在《传承》最终完成的作品当中,也体现出团队在创新非遗表达、传播方式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媒体传播原则和规范的顽强坚守,这一点在历史小剧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历史小剧场依托大量史书和文献资料,通过深挖文物背后的人物及其故事,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故事化、情感化的合理演绎,不歪曲历史,不丑化人物,不戏说、不胡说,充分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与内涵的理解和尊重;小剧场凭借其精巧的情节设计、丰富的故事内涵、精美的拍摄画面以及对人物情感的精彩表现,引发了观众的深度共情和强烈共鸣,在保证节目严谨性、专业性的同时也赢得了好口碑、好收视,显示出《传承》团队严谨的创作态度、优秀的编导能力和专业化的制作水平。另外,为了肯定坚守传统文化的传播原则和规范的“正义性”,电视剧还特意设计了以文化遗产的娱乐化、市场化为节目宗旨的《非遗物语》团队作为对立面与《传承》团队展开全方位的竞争,然后以他们的节节败退来告诉观众:这种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商业价值而罔顾文化传播原则和底线的行为,注定无法在文化综艺市场上取得成功。

## 结语

《正好遇见你》在豆瓣开分7.4分,目前评分为6.8分,相比同时期的大多非遗题材剧(如《芝麻胡同》5.9分,《后浪》4.2分)表现出较高的艺术质量和观众美

誉度。当然,作为“一部颇具试验风格的历史文化综艺剧”<sup>[8]</sup>,该剧在突破传统、锐意创新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剧的多种非遗节目形式混搭、融合的独特形式结构在拓宽电视剧的非遗呈现方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正常节奏和速度,让剧情叙事尤其是主线故事的叙事流畅度和连贯性显得不足。其次,该剧在主线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对不少重要的辅助线索和铺垫性的情节交代不清,像电视剧的主要人物鱼在藻、陶唐、谢尧等人的童年经历和隐秘身世在剧中都交代得语焉不详,影响了故事叙述和情节发展的合理性、逻辑性和完整性。再次,在剧中第一条叙事副线所讲述的非遗传承人故事中,对两代传承人之间的代际冲突、父(母)子(女)矛盾的设定带有一定的机械性和模式化的倾向,似有专为制造故事的戏剧性和情节的曲折性而刻意虚构之嫌,缺乏现实生活依据。最后,该剧在表现情感具有温暖、治愈人心的价值的同时,过度夸大了情感的力量,把它当作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比如用亲情解决所有非遗传承的代际冲突问题、用爱情和亲情解决所有历史故事中的冲突、用友情治愈鱼在藻的严重心理疾病问题等等,都显得过于理想化,同样也缺乏现实生活基础。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但瑕不掩瑜,《正好遇见你》以多种非遗节目形式的有机融合、非遗故事的精彩讲述、文化遗产的“活”化呈现以及工匠精神的坚守和弘扬,创新了非遗题材剧的剧集结构和叙事模式,拓展了非遗文化的电视化表达方式,开辟了非遗文化影视传播的崭新路径。

## 参考文献:

- [1] 郭梅. 非遗题材剧“后浪”推前浪,如何让观众更好地“遇见你”[N]. 文汇报, 2023-06-24.
- [2] 张智华. 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
- [3] 宗波. 职场剧的叙事困境与解困方案:以《安家》《理想之城》《请叫我总监》为例[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2(6): 137-143.
- [4] 孙波,等. 陕西践行让文物活起来[J]. 瞭望, 2022(16).
- [5] 李磊. 职场剧的结构性叙事与现实性落地[J]. 中国电视, 2021(9): 47-51.
- [6] 周秀梅. 工匠精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艺术评论, 2016(10): 66-70.
- [7] 张培培. 互联网时代工匠精神回归的内在逻辑[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1): 75-81, 113, 157.
- [8] 孙海悦. “戏剧+综艺+纪录片”弘扬非遗文化[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3-07-20(3).

(下转第22页)

# 真实与想象的结合

## ——论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

杜越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207)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小说创作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问题, 引发了埃米尔·左拉、E.M.福斯特等学者的深入讨论。亨利·詹姆斯作为近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 其于1884年发表的重要文论《小说的艺术》成为文学创作领域的经典之作。在《小说的艺术》中他深入探讨小说创作原则、技巧及小说家的创作态度, 对理解小说本质和创作原则具有重要价值。詹姆斯试图表达小说创作的统一艺术: 真实与自由的统一, 这是小说创作的必备条件, 也是实现他关于小说不过于轻薄或不过于庄重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 《小说的艺术》; 真实; 自由; 想象; 亨利·詹姆斯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12-05

如何创作小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备受关注的文学问题。彼时许多文学理论作品都曾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如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的《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1880)以及E.M.福斯特(E.M. Forster)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1927)等。若要追根溯源, 19世纪美国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当之无愧的近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小说理论对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是詹姆斯于188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论, 也是文学创作领域的经典之作。《小说的艺术: 亨利·詹姆斯文论选》一书结合詹姆斯对巴尔扎克、福楼拜等小说家的评价以及其个人作品的序言探讨了小说创作的原则、技巧以及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创作态度, 对理解小说的本质和创作原则具有重要价值。

在新教社会中, 小说的艺术和形式与道德教育的目的相对立着, 因此讨论艺术是“引起大众疑虑和警觉”的事情。<sup>[1]</sup> 尽管如此, 詹姆斯勇于站出来, 站在前辈瓦尔特·皮赞特(Walter Besant)先生的肩上, 在文中洋洋洒洒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小说应该具有艺术品质、小说家需要具备艺术技巧。鲍忠明曾在《亨利·詹姆斯的“艺术统一论”刍议》一文中认为《小说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绘画和写作统一的艺术。<sup>[2]</sup> 这一结论终究是把小说放置在艺术的大范围内进行研究, 而并未从内部对小说本身的创作技巧进行刨根问底。本文认为, 詹姆斯试图从小说作者角度表达另一种统一: 真实与自

由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小说创作的必备条件, 也是达到他认为小说既不能“轻薄浮滑”, 也不能过于“庄重严肃”的基本途径。<sup>[1]8</sup>

### 一、亨利·詹姆斯对真实与自由的理解

詹姆斯对小说创作真实与自由的深入理解贯穿于他的作品和文论中, 这些理念是他文学贡献的核心, 在他的作品和文学观点中起着重要作用。

#### (一) 真实的定义与特征

真实性是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之一。“小说必须认真地对待它自己, 然后才能期望公众认真地对待它。”<sup>[1]5</sup> 詹姆斯所说的这种真实本质是小说与生活的贴近程度, 也是小说为满足读者获得他人经验的狡黠心理而作出的努力。但是詹姆斯进一步指出衡量真实性的尺度是很难制定的, 并以《堂吉珂德》为例暗示小说的真实实际是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融合, 读者需要从“虚构的花朵”中找到“真实的气味”。<sup>[1]13</sup>

小说的客观真实指的是“事物的真相”<sup>[1]30</sup>, 是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与现实世界相符合、可观察到、可验证的事件和人物等方面的真实性。小说自诞生以来因其虚构的故事和诙谐的情趣被社会看作是非正统的, 所以这种不真实的“阴魂”理应有所“歉疚”。<sup>[1]5</sup> 詹姆斯却认为, 正如图画之为现实, 小说就是历史。小说作为艺术, 不可能完全在生活以外的真空中存在, 所以小说

收稿日期: 2024-09-27

作者简介: 杜越(1997—), 女, 四川成都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的素材是以客观真实为基础的。就像屠格涅夫的作品，虽未直接描写俄国，但其对乡土环境和俄国人性格的刻画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仿佛久经俄罗斯生活的奇特感觉。对此情形，詹姆斯评论：“这就是生活本身，而不像别的某些小说家那样对生活或多或少有所精巧的‘安排’。”<sup>[115]</sup>

早在2000多年前，柏拉图就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深入探讨了艺术创作与真实之间的关系。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是真实的，世界万物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歌则是对世界万物的模仿，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因此与真实相隔三层。在《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也在承认小说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客观指出，真实性和真实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差异。虽然小说的素材同历史一样，储存在文献和纪录里，但历史也并非完全是事实。因此，小说“是被作者的想象力大事润色过的一种真实”<sup>[113]</sup>，这种加工后的真实是一种主观真实。在小说创作中，主观真实是塑造人物形象、创设情节、展现主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小说吸引读者、让读者产生共鸣的关键因素。“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巴尔扎克即在生活的经验上，凭借想象力和艺术技巧将现实生活刻画成划时代的历史画卷，以主观真实“试图表现生活”<sup>[115]</sup>为出发点，构成了小说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因此，小说的真实性是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巧妙融合。主观真实赋予作品独特性和生命力，客观真实保证作品的逻辑性和可信度。这种结合能够让作品既具有普遍性和共鸣，又不失个性和深度。

## （二）自由的定义与特征

对于皮赞特试图给一部好小说下定义的行为，詹姆斯持反对观点并指出“小说是一个在自由和严肃方面可以和文学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别的门类媲美的文学分支”<sup>[119]</sup>。他强调为了保持创作的健康，以直接展现生活为目标的艺术需保有完全自由。小说创作承担着以无数手段让读者感到有趣的责任，若被过多框架限制，只会起到负面作用。这些手段就像人的气质一样多变，它们越成功地展示独特心灵的特质，就越是成功。

小说享有“不受任何规则和限制约束的、独立的行动的乐趣”<sup>[118]</sup>。这种“乐趣”具体而言是选择的自由和创作实践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包括题材自由和主题自由，是对艺术家尊重的体现。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质疑选择的声音，我们也应坚信艺术家的选择权利和创作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艺术创作真正独特和多样的基石。艺术“它所能做的最有趣的实验中的某一些是隐藏在平凡的事物内部的”<sup>[119]</sup>。屠格涅夫和福楼拜就是用这样的题材进行自由创作的。通过着眼生活中平凡的事物（哈巴狗和农奴、鹦鹉和女仆），两人成功展示了艺术家对于真实生活的独特观察和创造力。此外，

主题自由也是选择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詹姆斯反对皮赞特关于故事必须由“冒险事迹”构成的说法，他认为作家个人也是有情感主题偏向的。我们不能给艺术家的感情设限，因此无法决定他的出发点。通过对比《有疤痕的女人玛戈》中求婚和疤痕两个主题，詹姆斯表达了对小说中事件和课题的理解以及对教条观点的质疑，强调小说应包括多样生活点滴，批判教条思维。他解释道，故事主题的固定性是使小说回到“玲珑巧妙的东西那个不幸的小角色上去——使它离开和生活之间有着广阔和精微的呼应的那种宏大而自由的特性，从而使它受到贬抑”<sup>[115]</sup>。主题选择的自由不是像巴尔扎克一样被普遍而生硬的题材所束缚，而应像乔治·桑所说的那样“向‘一切’经验开放，向一切感情、一切信念开放”<sup>[118]</sup>。因此，无论是《金银岛》中的谋杀主题还是《小宝贝》中的情感主题都可以成为小说的中心。总的来说，选择自由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意识都可以成为描写、表现的对象”<sup>[115]</sup>，在此之上，小说可以把笔触伸向世界任何地方。

选择自由固然是小说丰富取材的前提，创作自由更是小说艺术实践的保证。皮赞特关于小说的和谐、透视、比例法则可以制定并传授的观点，詹姆斯并不认同。詹姆斯并不认为小说实践具体的规则体现了前者所说的“精密性和精确性”的特点。这个精确性本身，其实是指解释和粉饰的自由，这个本身才是小说精确性的体现。而为满足这种精密性和精确性探查出一条供人遵循的路线、语调、结构都是对小说自由创作的限制，也恰恰是对小说家、评论家最关心的东西的压制。詹姆斯进一步指出，小说家具有优越的地位，他的实验、努力、发现等都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创作实践是一部小说的唯一有争论余地的地方。我们必须让艺术家决定他的课题、主题和出发点。同时詹姆斯援引莫泊桑关于作家的使命就是以所学到的并且掌握的艺术手法来忠实地再现对生活的幻觉、艺术程序而不能是泾渭分明的观点批评教条主义的顽固。“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是以什么清晰度来表现这种印象。”<sup>[122]</sup>这种价值是万不能被固定和抹杀的。

“艺术的领域涵盖了全部的生活，全部的感受，全部的观察，全能的想象。”<sup>[123]</sup>因此，小说的艺术性也体现在涵盖生活的全部经验。选择自由和创作自由是作者广泛取材和创意发挥的空间。这种自由赋予了小说创作者广阔的创作可能性，使作家能够探索各种主题、情感和观念，以独特的方式呈现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否则小说无任何艺术价值可言。

## 二、真实与自由的融合——创作理念与手法

真实与自由在文学创作中的融合是詹姆斯关注的重要而复杂的主题。他指出，许多作家尝试将这两个元素

结合到他们的作品中,这是创造小说艺术性的关键步骤。

### (一) 通过真实创造想象——生活经验的转化

依据真实创作是小说艺术性的前提,这可以从深度体验生活、维持细节真实和叙述真实三方面构建。詹姆斯指出,小说家在搜集证据和真相等非文学性劳动方面比历史学家有着更多的困难,于此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首先,依据瞬间印象和在经验基础上发挥想象补全故事。这里所说的经验不是墨守成规的法则,“不是完整无缺的”,而是“无止境”“漫无边际的感受”、是“头脑的氛围”、是“一刹那的想象力”。<sup>[113-14]</sup> 作家需要做的是把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由此制造出小说中虚构的现实。因此,小说家需要具备“从已经看见的东西揣摩出从未见过的东西的能力、探索出事物的含义的能力、根据模式判断出整体的能力”<sup>[115]</sup>。例如英国小说家利奇夫人(Lady Richie)在第一部小说《伊丽莎白的经历》中成功描写的关于法国清教青年的生活方式便是源于她在巴黎看到年轻新教徒跟牧师共食画面的瞬间印象以及基于此的个人内在想象力。因此,詹姆斯告诫新手作家“你要努力成为一个凡事莫不让你产生印象的人”<sup>[115]</sup>!对于小说家来说,他创作的来源之一便是对生活的感受,这也是他作品所提供的最有趣的东西之一。他将“记录当代风俗的历史学家”巴尔扎克引为最佳典范;高度赞赏莫泊桑强大的感官写作能力,认为他几乎是唯独通过感官如嗅觉、视觉和性感官来描述生活,并产生出经典作品的人。“最好的独创性是最不自觉的,而最好的描述一棵树的方法就是按照它给予我们的印象来加以描写。”<sup>[11239]</sup>当然,詹姆斯还多次在自己作品的序言中强调印象的重要性。如在《使节》序言中,他强调艺术处理的是我们所能看见的事物;在《金碗》序言中,他说作品中的小店铺是自己从千百家店铺的典型形象中提炼出来并加以浓缩而构成的头脑里的形象;在《罗德里克·亨德森》的序言中他坦白,这部小说最后几期稿件是作者试图重现前一年构思于佛罗伦萨的那些场景而写成的。他认为,小说作品不需要去创造,只需要对生活“最细致入微”的认识,有时毫不起眼的普通形象会在特定时刻创造奇迹。“作家对‘印象’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把生活艺术化,把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sup>[3]</sup>而再现真实生活是衡量某个作品价值和真实意义之所在。这样他使问题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来,这是作家产生主题意义的土壤。

其次,强调总体印象并不是贬低细节真实。相反,对生活印象的真实转化需要捕捉生活中的细微之处。詹姆斯认为,细节刻画的翔实牢靠是一部小说至高无上的品质。<sup>[115]</sup>只有捕捉到细节并用于小说描写才能不被火眼金睛的聪明读者识破小说的虚伪性。其中,人物细节的塑造对小说创作至关重要。例如屠格涅夫的《春潮》

虽然篇幅较短,但其通过“精细的观察”将人物的行为举止表现得活灵活现。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特定的人物凭借本性表演得有声有色。莫泊桑的诺曼农民、政府部门小职员的形象更是在文学史中长存不朽。被誉为“小说家们的小说家”<sup>[1144]</sup>的福楼拜不仅对周围的生活有着一种急不可耐的敏感,而且能够当场把它抓住用于小说创作。与之相反,詹姆斯对乔治·桑作品的粗糙描写予以批评:桑的作品没有活生生和脚踏实地的人物,且她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精细雅致和节制有度的感觉。詹姆斯强调,小说家应该成为人性的观察者和解释者,通过细腻刻画人物来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在他的个人作品创作上得到证实:贯穿《罗德里克·亨德森》一书中心的是罗兰·马利特的意识,这也是小说戏剧性和情节的中心;当《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写作意图萌芽时,他脑中一开始只有人物,即那个特定的少女性格和形象,而主题等内容都是建立在这个人物之上的。在《鸽翼》中,詹姆斯先搭建的也是两个男女主人公的砖,再把剩下的细节一块块垒上去,力争不让读者听到池塘坚冰因承受压力而产生的破碎声。他将主人公比喻成“车上的轮子”<sup>[11293]</sup>,强调人物真实是小说真实的核心,在此之上来捕捉的生活的调子、脾性和节奏,都是使小说真实性得以站稳脚跟的努力。

再次,除了强调内在的真实——对生活印象的转化和细节捕捉外,詹姆斯给予我们真实创作的第三个方法:维持表面的真实,即叙述者话语的可靠性。一直以来,叙述话语是小说创作的重要角度。即使小说是虚构的,它也需要让读者感觉到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性。因此,为维护小说真实性,叙述者需拥有严肃和正统的话语,必须用“满怀信心的”、历史学家的口吻讲话。<sup>[116]</sup>具体来说,小说家必须选择合适的语言、句式、情感表达等,以使叙述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这也有助于保持故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詹姆斯批判某些才能卓越的小说家却有着故意泄露自己机关的习惯,这种做法使得认真对待小说的读者黯然伤神,同时也使小说立足之地全部丧失。这种做法常见于松弛的第一人称,在叙述学上与隐含作者现身、作者侵入等概念相关。在詹姆斯看来,这种行为是“对神圣职业的背叛”<sup>[1144]</sup>。此外,没有这种倾向的作家也会因为矫枉过正的写作技术使叙述话语变得虚假。比如乔治·桑以她的娴熟口才而著称,但她过分娴熟的叙述风格使她的作品显得不够真实。她的叙述生动活泼、流畅圆润,甚至超越了一般叙述的水准,然而,这样的叙述效果类似于一个急于讲述更多内容而不顾事实的证人,使得她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可信度。总之,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需要构建虚构世界,还需要注意以适当的语言和叙述手法呈现出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使读者能够相信和沉浸其中。

## （二）自由的限制与突破——创作者视角的转变

如果说真实这种“真理的气息”（the air of truth）<sup>[4]</sup>是小说艺术的锚点，那么自由则是它的羽翼。怎样培养自由意识？詹姆斯所说的自由是矛盾的，既强调寻求关于想象力、批评家的突破，也承认某些涉及道德和社会的限制。

上文谈到，小说真实创作的第一要点是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但在这印象之上，更需要作家的想象力使之重现于文本。想象力是一种举一反三的才能，是小说创作伟大的力量源泉。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没有想象力的话，他的自由就没有发挥实际效用。詹姆斯认为作家的成事之道全在于他的想象，他称赞屠格涅夫的想象力极为宏大、强烈且丰富，创造了多个栩栩如生、具有各自习性的角色，这种技巧超越了大多数小说家。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琳娜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紧密融合的女性形象。这部小说既是一部家庭纪事，同时又是一部小型史诗。同样，巴尔扎克也以惊人的能力将自己对整个世界和本国、本地的想象融合，将自己的作品看作人类戏剧和多彩社会现象的镜子，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观察和描绘。与这两个作家相比稍显逊色的是存在精神和文学想象方面困扰的福楼拜。虽然在精神上他完全是入世的，然而在本质上他却又是隐士式的，因此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包法利夫人》更偏向于现实描绘，并不是一部具有想象力的作品。总之，好的小说作品使万事万物都置于想象力中，想象力容纳、接待并欣赏它们，这是将无所不在的印象转化为“故事”的重要方式。

除了要突破想象外，詹姆斯还在文中用不少的篇幅发表了对评论家的反对意见，并认为为实现小说的艺术性，作家必须独立思考且享有随心创作的自由。批评家对于小说的评价多种多样：他们共同认为一部小说应当是“好的”，但对于何谓“好”却各执己见。有人认为“好”意味着小说中展现了具有美德和抱负的重要人物，另一些人则认为小说的“好”依赖于一个“完满的结局”，也有人觉得“好”指的是吸引读者探寻故事情节的神秘之处。然而，他们普遍认同小说不应该与艺术性挂钩，“小说方面的艺术家则被看作某种多管闲事的医生，他不让人享用令人惬意的回味”<sup>[19]</sup>。因此，在评论家眼中，小说的艺术性这个话题是天方夜谭，不能也不值得去触碰。詹姆斯批评道，不要关注评论家的想法，文艺批评因其泛滥程度在美国和英国已经逐渐堕落。这些评论文章是一种“不发达的智力所作出的尝试”<sup>[137]</sup>，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小说家要尽量避免外界评价的干扰，选择更为独立和自由的创作，因为好的创作应该源自内心、真实和自由，不受外界期望或评判的影响。虽然詹姆斯对评论家的评论作出了极端否定，但他的立场被视为从“作者中心论”去看待评论家，同时对评论家设置

了规则：“以小说家的创作来规定评论的内容、方向和目的，同样无视两者的界限，无益于评论的发展。”<sup>[5]</sup>但若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待，詹姆斯宣扬挣脱评论束缚、追求创作自由的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詹姆斯一直强调小说创作拥有无限自由度，但他在暗处也时常表达对小说家创作的“建议”。这说明，他并不赞同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创作还需考虑形式、社会和道德问题。

纵使小说享有取材自由和创作自由，但在文本表达上，小说不能是松散的，它需要各个部分有机的融合统一。“一部小说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像任何一个别的有机体一样，它是一个整体，并且连续不断，而且我认为，它越富于生命的话，你就越会发现，在它的每一个部分里都包含着每一个别的部分里的某些东西。”<sup>[117]</sup>詹姆斯强调，小说各部分如叙事、描写、对话等要融为一体，不能各行其是。他在《罗德里克·亨德森》序言里指出，事物的连线性是艺术家永远的困境。小说创作就像勾勒图案一样，需要无数次飞针走线，并要从中精心地选择该刺绣的针眼。“故事和小说，主题和形式，就等于针和线。”<sup>[125]</sup>艺术家在表现事物形象和意义的同时，要使其与整体保持联系，这是一个时常棘手的情况。他欣赏经过自我妥善安排的小说《鸽翼》，称赞巴尔扎克作品形式的连贯，大力批判乔治·桑小说形式不完整。他认为，这位女作家的冗长的自传《我的一生》“缺少计划”“比例失调”“零乱不堪”，让公众“大失所望”。<sup>[1169]</sup>这位伟大的即兴作家有无与伦比的即兴写作能力，却缺乏形式感和整体性。

除了形式的整体性，詹姆斯还对小说取材加入了个人倾向。他认为，小说是对社会生动多变、充满意义的书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法展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论詹姆斯的艺术观是多么的纯粹，他仍旧坚守小说对于社会生活、‘道德智慧’的干预事业。”<sup>[6]</sup>因此，小说主题需要反映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把它丢开”。<sup>[114]</sup>既然坦荡的社会不对小说取材加以限制，那么小说对于这个社会的描绘也如同社会本身般自由自在。况且，小说家们回避那个问题将很大程度代表着他们观点的真髓。多年来，英国和美国的小说，与其他国家的小说之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差异。这个差异体现在人们所知道和愿意承认的事物，他们所看到和讨论的事物，以及他们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和允许写入文学作品的事物之间。简言之，在他们的对话和书籍中所写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小说创作这种心照不宣的规则使创作出现了很大的空白。詹姆斯欣赏那些完全可以按照小说创作本来的面目去接受它们的作家，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莫泊桑，认为他们没有回避敏感话题，从而使小说具有更强的完整性。他也赞赏乔治·桑描绘的“不健康的

爱情”，指出虽然有人对此提出指责，但她的优势在于描绘了那些蔑视她创作的人没有描绘出的东西，比如“激情”，而另一类作家则因未能展现这种情感而步履维艰。于此，勒南（Ernest Renan）称她为“我们时代的风神之琴”，说她拥有“发出洪亮声响的心灵”<sup>[1187]</sup>。通过这些例子，詹姆斯意在表明，小说作家应注意避免使用现成、破旧、模糊的材料，要挖掘生活中丰富多样、有意义的社会习尚、社会阶级、人性等素材。目前生活中存在许多有意义的素材被小说家忽略，应该加以探查和采访。小说的道德体系问题是詹姆斯在文章最后着重谈到的深度内容。他认为皮赞特将小说艺术和小说创作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但在后续论述中他自己也无意中将道德主题视为小说家创作考虑的要素。“一部艺术品的最深刻的品质，将永远是它的作者的头脑的品质。”<sup>[1180]</sup>道德观念与艺术观念的结合才能使小说具有真实的社会价值。而羞于谈论道德的英国和美国小说需要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微妙的问题上，承担起小说“自觉的道德方面的目的”<sup>[1129]</sup>。

### 结语

在《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无意构建一种小说理论，而是围绕真实和自由探讨小说创作的路径，为不受规则束缚的艺术形式辩护。真实与自由是艺术创作的基础，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真实为自由提供基础，自由赋予真实更多维度。一方面，真实是小说创作的第一要义。詹姆斯指出，小说不能与人们的观察、知觉和鉴赏力相脱离。作家必须掌握第一手印象，在印象中去努力寻找科学的写作方法并还原这种“神秘性”，“只要有供人处理的题材，小说也就可以全然地有赖于处理来

重新点燃那团火焰”<sup>[1145]</sup>。这意在表明，只要有现实的故事和内容题材，小说永远都不会消失。另一方面，詹姆斯认为小说创作不能“炒冷饭”<sup>[1143]</sup>，为此，小说作家应该设法让形象不断地呈现出变化多端和生动逼真的特点。詹姆斯解释道，小说这栋大厦不只有一个窗户，或者开的窗洞大，或者建有阳台，或者像一条裂缝，或者洞口低矮，这些便是“文学形式”<sup>[11285]</sup>。他对小说的看法“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他所说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敏锐的意识”<sup>[7]</sup>。艺术家的自由意识使小说的自由创作在表达生活多彩斑斓印象方面比任何其他事物更为出色，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对生活的印象、任何一种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方式，是小说家的创作所不能给予的。总之，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现代小说理论的里程碑。他强调的取材真实性与写作想象力的平衡、作家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关注等思想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 小说的艺术: 亨利·詹姆斯文论选[M]. 朱雯, 乔岱,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2] 鲍忠明. 亨利·詹姆斯的“艺术统一论”刍议[J]. 国外文学, 2019(4).
- [3] 董俊峰. 英美小说理论的首次崛起[J]. 贵州大学学报, 2000(4).
- [4] JAMES H. *The Art of the Novel*[M]. New York,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4: 35.
- [5] 李巧慧. “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对批评的焦虑[J]. 外文研究, 2021, 9(1).
- [6] 蒋承勇, 杨奇. 小说艺术化: 亨利·詹姆斯的叙事幽默[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5).
- [7] 斯通. 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批评生涯(节选)[J]. 乔修峰, 译. 世界文学, 2022(5).

## The Fusion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 Review of Henry James's *The Art of Fiction*

DU Yu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novel creation became a highly discussed literary issue, sparking in-depth discussions among scholars such as Émile Zola and E.M. Forster. Henry James,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novel theory, published the seminal essay *The Art of Fiction* in 1884,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classic 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is work, James delves into the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the creative attitude novelists, offering in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essence and principles of novel writing. James endeavored to express a unified art of novel creation: The fusion of reality and freedom. This fusion is deeme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novel creation and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achieving James's vision of novels that are neither too frivolous nor excessively solemn.

**Key words:** *The Art of Fiction*; reality; freedom; imagination; Henry James

# “后卡特里娜”小说《拾骨》中的新物质主义和时间性书写

唐红<sup>1</sup>, 张俊萍<sup>2</sup>

(1. 蚌埠医科大学公共基础学院, 安徽蚌埠 233000; 2.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无锡 214000)

**摘要:** 非裔美国作家杰丝米妮·瓦德的气候小说在呈现人类世灾难中黑人群体的生存境遇方面具有典型性。她创作的后卡特里娜小说《拾骨》, 从新物质主义视角出发, 解析二元论模式下种族主义和气候慢暴力之间的同构性, 以有毒土地、废弃物和海水等意象为物质媒介, 揭示黑人过去和现在所遭遇的环境种族主义危机, 展现黑人群体独有的物质观和时间观, 探颐人类世语境下非裔的未来发展路径。

**关键词:** 物质书写; 时间景观; 慢暴力; 后卡特里娜; 美国南方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1-0017-06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由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的概念虽意在凸显人类对地球环境的深刻影响, 借此打破以人类文明为主线的研究范式, 但同时也将西方先后接续的线性时间模式设置为统摄全球的“霸权校准”, 其所蕴含的“同一时间性”内核与时间多样性的发展趋势相龃龉, 且太过绵延的时间尺度和分散的时空分布遮蔽了本就处于“失语”状态的黑人群体, 将他们所遭遇的“消耗性慢暴力”和所依循的异质时间维度湮没于“长期主义”之中。时间不只是均质、量化的时长测量单位, 也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属性, 故此“时间性”成为非裔群体抵抗白人霸权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及黑人文学的重要母题。新一代非裔作家群体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展现了深层时间书写和独有的宇宙观念, 揭示黑人群体所遭遇的时间压迫的同时也建构出其在“人类世”语境下的未来发展之路, 杰丝米妮·瓦德(Jesmyn Ward)即为其中的一位。

杰丝米妮·瓦德是新一代美国非裔作家, 其第二部小说作品《拾骨》(*Salvage the Bones*)一经出版即引发学界关注并斩获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拾骨》是典型的“后卡特里娜”(Post-katrina)小说<sup>①</sup>, 瓦德直言其书写灵感源于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930年创作的《在我弥留之际》(*As I Laying Dead*), 后者以1927年美国大洪水为背景, 凸显了密西西比地区白人群众的艰难处境, 却抹除了黑人群体的悲惨遭遇。受

此启发, 瓦德在《拾骨》中聚焦生活在墨西哥湾沿岸“荒木镇”(Bois Sauvage)的非裔伊丝·巴蒂斯特(Esch Batistes)一家, 以其躲避卡特里娜飓风的12天为叙事框架, 通过丰富而细腻的物质叙事折射出南方黑人群体所遭遇的生态非正义以及贫瘠禁锢的生存现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拾骨》的关注和研究渐呈上升趋势, 有学者从“黑人人类世”角度来审视白人霸权文化对非裔群体于环境和政治维度上的双重迫害<sup>[1]</sup>, 亦有学者从心象叙事切入, 关注小说的记忆象、遗觉象等叙事策略<sup>[2]</sup>, 而从物质主义和时间景观视角进行的研究几近阙如。故此, 本文拟交叠新物质主义理论和时间景观话语, 分析小说中“有毒土地”、废弃物以及海水意象与美国南方黑人群体的交互感应方式, 揭示后者在“人类世”语境下遭遇的慢性生态暴力以及物质困境, 探讨非裔群体的未来发展路径。

## 一、土地的“不在场”和“跨体性”

生态主义学者阿莱默·史黛西(Alaimo Stacy)受到斯宾诺莎建构的“灵肉一体论”的启发, 以躯体作为物性交往的起点, 探索人类肉身与外部环境间的物质交流模式, 创造性地提出“跨体性”(transcorporeity)概念。她认为“人皆为跨身体”<sup>[3][23]</sup>, 人类躯体、非人以及其内嵌的环境之间存在不间断的物质交换和转移。

**收稿日期:** 2024-12-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项目“20世纪初美国文学中的‘国家崛起’话语研究”(23YJA752015);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医生自媒体的叙事话语和价值引导研究”(2023AH051907); 蚌埠医科大学重点项目“‘知—行—德—赛’维度下跨文化交际课程三全育人路径研究”(2023byzd170sk)。

**作者简介:** 唐红(1986—), 女, 安徽六安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后卡特里娜”小说指的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 美国文坛兴起的以此次灾难为书写主题的小说类别, 为南方文学的分支。

### (一) “离场”的土地

罗伯·尼克森 (Rob Nixon) 在《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中揭橥“‘位移’ (displacement) 不仅指涉穷人空间意义上的流离失所, 更是其生活场域中土地和其中所蕴藏自然资源的丧失”<sup>[445]</sup>。伊丝生活的周遭有一处因人工挖掘而形成的深坑, 被称为“大洼地”。“大洼地”的出现可追溯到伊丝的外祖父约瑟夫, 约瑟夫曾答应“跟他一起干活的白人在这里挖黏土”, 将其“用作盖房子的地基”<sup>[5118]</sup>。而“沿山而流的小溪使得失去土地的泥坑变成了池塘, 塘水溢出来, 会把房子淹掉, 把这块地变为沼泽”, 于是约瑟夫决定“不再卖土地赚钱”<sup>[5118]</sup>。在“白人至上”的结构性暴力框架中, 土地和黑人身体两者间存在先验性的隐喻关联。地质人文学家凯瑟琳·优苏芙 (Kathryn Yusoff) 指出, “奴隶制和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将黑人物化为惰性的、无生命的存在, 如同黄金和煤矿一般, 可任意被从其存在的土地中挖掘, 作为‘燃料’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sup>[667]</sup>。诚如“大洼地”中被强行攫取的黏土, 黑人群体被帝国霸权的铁腕从故土家园之中剥离, 两者都沦为白人眼中可肆意买卖的“物品”, 一齐被划归为没有血肉的、被动的、被摒弃于能动属性之外的“非人”和“他者”。

“大洼地”中泥土的“离场”不啻于烙印在黑人日常生活场域上的一道伤疤, 同时也是非裔族群所遭遇的经济和种族等多维盘剥的物质证明。从佃户制到“南部宅地法”, 承担着南方最繁苛田间劳作的非裔族群, 与脚下的土地有着最深厚的感情, 却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甚至是居住权, 而饱受洪水肆虐的低洼地区则成为密西西比河沿岸黑人群体被迫进入种族资本主义以降所剩寥寥的物质依靠。迥异于前者贩卖土地以谋取生计的无奈之举, 同一地区的白人对环境的破坏则是毫无顾忌的: “他们残忍地砍去松树, 树桩星星点点地杵在地上, 像一个个没人去坐的凳子。”<sup>[5182]</sup> 诚如历史学家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所言, “黑人在森林里迷路了, 被困在低地、屈服于洪水的肆虐, 而白人家庭则唤起了美国人对‘山巅之城’的幻想”<sup>[7]</sup>, 这无疑是对美国南方空间非正义生态之维的生动诠释。事实上, 水流的不断冲刷正在一点点蚕食“大洼地”中残存的土地, 终致其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撕裂成伊丝眼中“永不停止流血的伤口”: “洪水旋转, 聚集, 向四面扩散, 变成棕色, 带着暗流的红色, 这是一个毒牙粉红色张开的嘴, 它正在吞噬我。”<sup>[51296]</sup> 非裔族群囿于环境暴力的阴霾之下岌岌可危, 而本就居身高地的白人群体则得以在飓风来临之前安然撤离。“大洼地”在经年累月中积淀为见证和记录非裔族群所遭受精神和肉身双重创伤的“物质档案”, 土地的“不在场”恰恰映衬凸显出历史伤疤的始终“在

场”, 共同指向至今仍然悬置于黑人群体地缘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肤色歧视和经济压迫。

### (二) “跨体性”毒性物质

非裔群体和土地间的关联并非只停留在比喻层面, 黑人的具身肉体 and 土地的躯体化之间亦存在着阿莱默所指的物质层面的相互形塑和亲密纠缠。阿氏在《身体自然》(*Bodily Natures*) 一书中指出, “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并非是人索取利用的资源集合, 而是拥有了自身的诉求与回应”<sup>[356]</sup>, 其遭受污染而生成的有毒物质穿透自身与人体间的物质边界, 完成了不同躯体间的物质转移、交换和流通, 以生态变化给予人类回复。

步入二十世纪 80 年代, 美国化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为繁华之下的南方埋下了祸根, 有记录的中毒事件更是不胜枚举。1984 年的阿克维萨 (Akwasne) 地区就有多起居民氯联苯中毒报道, 同时期南方居民 PM2.5 的摄入量更是远超均值。作为饱受物质和医疗资源匮乏折磨的边缘群体, 美国非裔族群则毫无疑问地承载了更多的环境非正义, 他们在与非人类的强制性互动中遭受伤害, 而这些伤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白人主导、遮掩甚至消解。著名非裔学者克里斯蒂娜·夏普 (Christina Sharpe) 直言不讳道, “早在种植园时期, 在雨中、在阳光下、在潮湿和干燥的天气里, 割甘蔗, 埋粪土, 锄地, 除草, 所有的一切都对被奴役者的肺部和身体造成可怕的甚至致命的影响”<sup>[876]</sup>。小说中, 毒性物质更是渗入“大洼地”周边土地的肌理之中, 伊丝的祖父约瑟夫便因土地所含毒性物质的侵袭而罹患口腔癌, 衰败的躯体完成了对周遭环境的物质解读。而人类也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同样难逃厄运。小狗琪娜分娩不久后, 一只狗崽便因感染细小病毒而奄奄一息, 狗主人斯奇塔则坚称这种病毒源自其生活的土地:

“我觉得它患了细小。我觉得是来自于泥土。”

“也许它只是生病了。”

“如果就是来自于泥土呢? 如果剩下的狗崽也被传染呢?”<sup>[5156]</sup>

当代的美国南方依旧在复制和延续奴隶制时期黑白群体间严重失衡的资源分配比例, 白人享受着少数族裔无法企及的环境特权。为了挽救患病的狗崽, 伊丝姐弟无奈闯入一处白人农场盗取驱虫药, 却因遭遇后者豢养猎狗的追击而夺路狂奔: “大亨利穿过低矮的树丛时, 脚步沉重得像一只受惊的熊。兰德尔跑的时候躲开大树。狗还在后面叫, 我真的好像感觉到它的唾液都滴到我的腿上了。”<sup>[51101]</sup> 仓惶逃遁的非裔、紧追不舍的猎犬动态交织出的场景仿若黑奴逃离南方悲惨过往的跨时空投射和复刻, 历史和现实于瞬间交叠并置, 尘封于记忆深处

的集体种族创伤被再度唤醒。而循环上演的追逐场景介入和扰乱了密西西比地区的时间进展路径,从奴隶制阶段延展至当下的漫长岁月仿佛历经了一场坍缩,致使“黑人时间”在昔日的蓄奴重灾区压缩、变形、几近凝滞。如同小说中“海岸边停留的由奴隶船改造的旅社”一般,“大洼地”中的有毒土地亦是残留过往印记的物质景观,无时不在提醒发端于种植园时期的奴隶制“幽灵”至今仍盘旋延宕于墨西哥湾沿岸的残酷现实。

## 二、作为“档案”的物质——哥特式物质主义

南方哥特小说是在美国南方动荡创伤的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且随着哥特意象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和拓展,衰败和腐朽亦被纳入其审美范畴。而受到近来“物转向”思潮的影响,哥特物质主义(Gothic materialism)渐成这一理论范式的新旨趣,其既不再专注于“无生命体”的内涵建构,亦不再执着于恐怖阴森的氛围营造,而是借助衰败和本体论的勾连,搭建缅怀过往、疗愈创伤的物质通道。

### (一)“捡拾”的废弃物

1. 废弃物的能动觉醒。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商品突破“作为交换的劳动产物”<sup>[9]45</sup>的定义范畴,化约为人类赋予它们的意义、意图或象征性价值,并严格遵照程序化的社会生命的运转轨迹。而人、物二分背后的权力机制延续了西方知识论对物的迷思,融入形而上范畴,继而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物质化走向。在商品逻辑的驱动之下,黑人团体被当作“人货”强行运送至美洲大陆,自此便遭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间断的“物化”修辞的贬斥,沦为卢卡奇所言的“魔影般的对象”<sup>[10]89</sup>;此外,物质数量的日趋丰盈以及生命周期的加速迭代也造成废弃物数量不可避免地急剧增长,加之彼时美国社会大肆鼓吹的“种族污染”论调,白人阶层为保持自身的“白人性”便选择将包括垃圾处理等在内的“脏活”转包给非裔群体,这从根本上固化了白人优越主义的文化价值导向,将种族主义和物种歧视语境化到环境伦理之中。

萨拉·摩尔(Sarah A. Moore)指出,“废弃物是记录过去和当代社会关系的档案,与身处边缘的、被遗弃的人们息息相关”<sup>[11]</sup>。伊丝家庭场域中堆积的废弃物一方面指征美国南方黑人团体窘迫的经济状况和边缘化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痕迹伴随着自身步入人造物生命循环新阶段而全面消除,这为同处“他者”范畴的非裔群体指明一条突围之路。白人社会商品拜物教的盛行成为对资本主义商品化和人工制品生命力的唯一回应,而成为废弃物则为商品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桎梏提供了可能。首先,小说作者瓦德

对伊丝一家院落中堆积的废弃物的呈现并未放大“哥特式”书写所营造的凄然氛围,而是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还原物质的本真面貌。物质在院落中随意地堆积,恰巧和依恩·博古斯特(Ian Bogost)构建的“薄本体论”(thin ontology)有着相同的理论旨趣。博古斯特将这种物的罗列看作是物质本体书写的一种特殊方式,不仅可以切断“语言的连接能力”,还可以切断“物本体之间的连接能力”<sup>[12]42</sup>。神奇的是,罗列被切断了联系的物本体反而因此摆脱了人类中心“再现的牢笼”,显示出勃勃生机。小说中伊丝家的院落中充斥着物的无序陈列:“到处是敞开前盖的空车,卸下发动机的这些汽车的空壳子”<sup>[5]29</sup>,物质以超然姿态出现于叙事中,完成了对人类主体化修辞的稀释和淡化,呈现出康德所谓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或者说“物性”(thingness)状态。

此外,人类行动的目的导向性决定了人与商品“互动”的形式、程度和结果,商品被迫按照人类设计的轨迹并配合工具性的使用初衷,这种主客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了人类拥有的宰制性力量,因此物质主义学者简·贝尼特(Jane Bennet)断言,“超消费文化在根本上掩盖了物质活力,只有被当作垃圾丢弃后方可使其物性归位”<sup>[13]56</sup>。转化为废弃物的商品挣脱出“生产—交换”的文化符号模式,归入“某种记忆矩阵,是远离人类关注和兴趣的矩阵”。此处的“记忆”(memory)一词在《朗文词典》中的释意为“约束被移除后材料恢复到先前状态的能力”<sup>[14]33</sup>,其所表现出的物质逆向追踪特质生动演绎了贝氏所言的物力的回归与复现。伊丝家院落内“堆砌的上了锈的冰箱、看上去像伴着辣椒的芥末蘸蛋、发动机上拆下来的零件、一台老式洗衣机——一边支出一个搅动衣服的遥杆,看起来像手动蛋糕搅拌机”<sup>[5]14</sup>,这些本该被丢弃的物品在划归为废弃物的须臾便脱离了人类文明的指涉,工具属性的逐渐离场催生出自身物性的快速显现,助其迅速建构起自己的“逃逸线”以扰乱人类拟定的“生产—使用—死亡”的线性社会生命历程,回归其原有的运动轨迹和属性。此外,冰箱上遍布的斑斑锈迹亦是废弃物摆脱人类施动后积极参与自身形态动态演化的证明,驳斥了美国社会主流技术“将废弃物定义为需要迅速消除的死物”<sup>[11]</sup>的论断,其在“社会生命”宣告消逝的同时也迎来了“物质生命”的全面复苏,不同生命形态在“脱嵌”和“入嵌”的交替间完成了对人类绝对主体的“祛魅”,反映了新物质主义内在的本体论。

2. 另类的“捡拾”——“改作他用”。小说中除了被伊丝一家“捡拾”来的作为维系生计的物质手段废弃物,那些无法继续使用的废弃物也被频繁地“改作他用”。琪娜的狗舍是用“废弃的卡车车斗做的,把车斗插进地里,外面用铁丝网缠了一圈”<sup>[5]5</sup>;兰德尔自制的篮筐“是他从

镇上公园里拿来的,绑在一棵枯死的松树主干上”<sup>[58]</sup>。“卡车车斗”本是冰冷的资本工业的产物,如今却成为温暖的动物之家;“篮球筐”将木材和金属连接,以“混杂”的崭新形式出现,并帮助兰德尔获得大学奖学金。改造过的物件变换了原本存在的形式,所携有的功能和意义遭到了消解,既不是纯粹的人工制品也不是完全的生态制品,而是一个纠缠在文化和自然过程中的动态实体,是废物与生活、颓废与活力的混合物,是从不连贯的碎片中拼接出的新整体,展现出一种极富创造力的黑人生存主义,为自身在逼仄的生存空间拓宽物质通道的同时,也将“捡拾”这一物质经验和追溯物质活力的拼糅手段观照进同一网络之中的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之中,渗融于黑人族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小说中,当伊丝不慎割伤手指时,弟弟奥兰多将伊丝的大拇指“压到伤口上”,因为“每次当他们割伤身体,妈妈会往伤口上擦些酒精,然后按住,在伤口上吹气”<sup>[516]</sup>。伊丝姐弟尝试将母亲在世时的做法“再语境化”来延续血缘温情。此外,当巴蒂斯特一家为即将登陆的飓风做准备时,兰德尔和伊丝“俯身朝向朱尼尔,跟他讲以前妈妈是如何教他们找鸡蛋的:你要注意观察,但是不要寻找。鸡蛋会自己找上门的、你只需要四处闲逛,逛着逛着,鸡蛋就在不经意出现了”<sup>[5255]</sup>。伊丝的母亲无疑选择了将自身从叙事中心位置移除转而突出物的灵性与主体性。通过“捡拾”母亲秉持的朴素的“实体本体论”,伊丝姐弟亦将自身嵌入与非人织结的共同体中,通过不断汲取新的生存动能进而反哺和重塑传统的、沿血脉“垂直”分布的亲缘关系,实现情感的“平行化”铺陈和绵延,缔结更广泛意义上的人与物质的情感联盟,促进和保障了黑人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 (二) 老物件的记忆形塑与生命表达

小说中的物质景观除“捡拾”而来的废弃物之外,巴蒂斯特家原有的物件也在不断趋于衰败。与白人社会物质的丰盈形成鲜明对比,黑人群体物质的匮乏以及所属物的不断消耗使得伊丝一家不得不将祖父家的老物品进行挪移:

约瑟夫外公和外婆两人去世后,我们开始一样一样地拿走他们的东西,从沙发到椅子,再到盘子——最后什么摆设都没剩下。妈妈本来还想让他们的房子保持原样,可是我们总是需要点什么,比如斯奇塔睡觉用的床啦,或是家里的锅熏黑了要换新的啦……<sup>[5]75-76</sup>

老物件物质动能的萌蘖使其在代际传承间自主赓续了人为规划的生命期限,不仅丰富了这个贫瘠家庭的物质选择,更是参与到人类社会的多维塑造之中。比尔·布朗(Bill Brown)认为,“物质维系记忆,承载着思想与情

感”<sup>[15]</sup>。“位移”的老物件触发了一种记忆过程,这种过程并不通过对静态纪念遗迹的反思来进行,而是通过将遗迹慢慢拉入其他生态和价值表达的过程——适应死亡和重生、损失和更新的同时共振。老物件在与伊丝祖辈经久的、深刻的交互中逐渐积淀为黑人文化记忆的动态承载物,重叠功能和情感层面的双重所指参与到黑人群体历时和即时日常生活和文化身份的形塑之中,渐渐成为这个空洞所指的关键性能指,而两者间多面向的高度重叠和互相指涉使得物质成为人类生命的另类表达。根据这一思路,老物件的在场即为伊丝逝去家人和种族文化的在场,亦是哥特式物质主义的典型呈现。

此外,物与人的互动、物性与人性的关联也都指向物的崛起,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物质活力”的实现也并不囿于“物质内在能动性”,更是源自“承载者之间构建的相互关联”<sup>[162]</sup>。物质是充满能量的存在,能够给予他者能量,物质亦是充满活力的行动者,能够给予他者活力。在与黑人家庭共同缔结的集合之中,磅礴生命力的涌动使得物质在摆脱客体地位的同时也助力后者冲破主流社会“生命度等级”的藩篱,共同批驳了“贫困者、酷儿和种族化的群体社区是动物性的/或无生命的物质,且远低于白人尤其是男性群体”<sup>[1744]</sup>这一种族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共同编织的强权话语。物质活力的自反叙事锚定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本体性逻辑谬误,将黑人群体从物种主义这一创造人类优越性和例外性的核心工具中解放出来;此外,祖屋顶层的阁楼亦在大洪水期间成为巴蒂斯特一家得以逃出生天的诺亚方舟,为其提供了维系生命所需的物质支撑,至此,物质在自身活力的凝聚和弥散间完成了其对人类“生命力”的双重指涉。

## 三、水体“余波”和生命意象

后人类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阿斯特里达·奈伊玛尼斯(Astrida Neimanis)受到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身体现象学的启发,提出“水体现象学”理论。“水体”哲学呼唤了被笛卡尔主义所剥夺的物的意向性,聚焦于水的媒介特性本身,延续了反二元论的逻辑思路,具有生产一套新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范式的潜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灵活辩证的认识论界面。

### (一) 物质化的种族记忆和“环流”历史

新物质主义学者蒂姆·莫顿(Tim Morton)引入“超物体”(hyperobjects)概念,认为其“具有粘黏性,涉及不同的时间性,与人类时间尺度不一致”<sup>[18]1-2</sup>,借此打破曾经定义世界的人类审美泡沫。卡特里娜和将无数黑奴无情吞噬的汹涌大西洋无疑都可被划归为这一范

畴,且后者与黑人民族志和集体记忆双重维度层面存有紧密关联,隐匿于“黑色大西洋”波涛之下的“中间航道”更是成为指涉黑人群体种族创伤的文化隐喻,且随着骤起的飓风而再次浮出水面。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隐喻也可能涉及两个参照物之间的某些实质性关系”<sup>[19]</sup>。从“中间航道”到卡特里娜,海水作为勾连黑人群体过去和当下的物质媒介,使得两者间的关联不再囿于似有还无的提喻维度,而是完成了“物质化”的转向。淹没于旧日汪洋之中的黑奴群体虽已走向虚无,但其腐败躯体中的原子持续地散落、飘荡于海水之中,而鉴于人体血液中钠离子的存在时间为2.6亿年,故自16世纪开始便陆续陨落于这条血腥海上商道中的黑奴被集体封存于“滞留时间”这个异质化的时间维度之中,以物质化的形式徘徊于当下的密西西比河沿岸,完成了对那段晦暗历史的具身书写。

杜赞奇指出,“海洋流动可被视为一种范式,用以阐明人类和其他自然活动的时间进程”<sup>[19]</sup>。人与非人的纠缠方式与海洋的环流运转相吻合,非线性的流动路径使得二者间的作用和感应更具互动性和广阔性。小说开篇提及,“现在是夏天,总是有飓风来袭或离开这里”<sup>[15]</sup>,表明此种“周期性”环境灾难是海边洼地的常客。飓风牵引下的浪潮重复地冲刷、湮没这片黑人群体被迫聚集的沿海场域,借助这条物质通道一次次将葬身海底的族群先辈们从过去拉回现在,自记忆照进现实,亦将制度性种族主义与当下弥漫于美国南方的结构性暴力不断交叠和串联。殖民历史伴随着经年往复的洪水意象对黑人当下生活进程的不间断介入模糊了过去和现在的边界,将后者禁锢于一个停滞不前、循环往复的时间景观之中,即“逝者的身影挥之不去,而新的死亡威胁又迫在眉睫”<sup>[18]</sup>,如同数年前因医疗条件匮乏难产而亡的母亲,亦如同因物质基础受限而被迫直面卡特里娜的洼地居民。“渺茫的生存希望、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贫困以及疾病”磋磨下的黑人群体似乎一直生活在“‘中间航道’行驶的运奴船只的‘余波’之中”,且这条航道“始终是开放的”。<sup>[15]</sup>

## (二) 死亡与新生

奈伊玛尼斯认为“宇宙是由各类水体(bodies of water)组成”<sup>[20]</sup>。海洋与人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谱系,前者所携有的“生成”特质扰乱了身体与身体间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时刻提醒着同处“湿本体”中的人类所依靠的肉身具有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主体性和孕育万物的能动性。诚如最初的物质形式萌生于深海之渊,人类生命的缘起也是缔结于母体之内。此外,水的流动与翻涌“不仅维系着人类身体的运转,也将我们与其他身体、与人类之外的世界相连”<sup>[20]</sup>,建立与包括海洋在内的自然世界之间具身与情感双重层面上的相互

依存。然而,水体在孕育新生的同时也“意味着死亡”<sup>[5]</sup>。作为物力凝结汇集而成的“超物体”,具有强大施事力的卡特里娜将黑人群体再次笼罩于死亡的阴影之下,“海滩上、大街上、树林里,到处都是新新旧旧的尸体”<sup>[5]</sup>,作为伊丝家人般存在的小狗琪娜也消失在这茫茫洋国之中。海水覆盖和吞噬了伊丝一家生活的一切场域和地方性,践行着一种暴力关怀,将所经之处的一切人与非人包裹糅合成难分彼此的共同体,浸泡于浑浊洪流中的伊丝一家在与海水的相互对望中真正实现了深层生态意义上的平等,即人和非人都具有能动性,同属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共同遵照人类经验之外的时间标度,如海水潮汐在环流作用下依循着往复循环的节奏与韵律,黑人群体也随着潮涨潮落经历着新生与死亡,离去和归来。

自小缺乏母爱滋养的伊丝,虽在故事开篇以母亲形象存在,但其对于母性认知和自我身份认同的不断修正是伴随着与卡特里娜的深刻交互而逐渐完成的:“她教会我们爬行,她留下我们在这里捡拾。我们会永远记得卡特里娜这位母亲,直到下一位嗜血的母亲伸出巨大而无情的双手,来到我们面前。”<sup>[13]</sup>历经飓风洗礼后的伊丝接纳并认同一部分事物消逝而另一部分则转变、演化和重新回归的生命法则和自然规律,摒弃了根植于认识论中人与非人的主客之别,在怀揣着生的希冀期盼小狗琪娜平安归来的同时也坦然接受大洪水对生命的再度洗礼,而这也是黑人群体独有的物质视角和时间观念的最佳映照。

## 结语

杰丝米妮·瓦德以丰盈细腻的物质书写以及对线性时间传统的不断突破展现出人、非人以及时间三者间的深刻纠缠:毒性物质指向绵延至今的环境种族主义迫害;废弃物在彰显物质动能的同时也指明了非裔族群的前行方向;而环流的海水与黑人群体潮汐式时间刻度的耦合则将两者推向混溶共生的物质联盟。交互式的时间景观和物质书写共同完成了南方黑人场域的“时间空间化”建构,不仅重新定义了气候叙事的写作范式,也于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主体与客体的共建之中抚平了黑人群体的历史创伤,照亮了非裔族群的未来发展之路。

## 参考文献:

- [1] 赵冰扬,荆兴梅.论《拾骨》中的卡特里娜飓风书写与种族政治[J].当代外国文学,2024,45(1).
- [2] 鹿好农.论杰斯敏·沃德《拾骨》的心象叙事[J].英语研究,2024(1):127-136.
- [3] ALAIMO S. *Bodily Natures*[M]. 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
- [4] NIXON R.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 [5] 瓦德.拾骨[M].付焱,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 [6] YUSOFF K. *A Billion Black Anthropocenes or None*[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 [7] CLARK C W. *What Comes to the Surface: Storms, Bodies, and Community in Jesmyn Ward's Salvage the Bones*[J].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15, 68(3-4).
- [8] SHARPE C. *In the Wake: On Blackness and Be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6.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1] MOORE S A. *Garbage Matters: Concepts in New Geographies of Wast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6).
- [12] 唐伟胜. 物性叙事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4.
- [13] BENNETT J.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0.
- [14] 柏格森. 物质与记忆[M]. 姚晶晶, 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
- [15] BROWN B. *Objects, Others, and Us (The Refabrication of Things)*[J]. *Critical Inquiry*, 2010, 36(2).
- [1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7] CHEN M Y. *Animacies: Biopolitics, Racial Mattering, and Queer Affect*[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2.
- [18] MORTON T.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 [19] DUARA P. *Oceans as the Paradigm of Histor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21, 38(7-8).
- [20] NEIMANIS A. *Bodies of Water: Posthuman Feminist Phenomenology*[M]. Bloomsbu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 Material Writing and Time Landscape in *Salvage the Bones*

TANG Hong<sup>1</sup>, ZHANG Junping<sup>2</sup>

- ( 1. School of Public Foundation, Bengbu Medical University,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2. School of English,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000, China )

**Abstract:** Jesmini Ward is typical in present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black community in the Anthropoce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racism and climate injustice under the dualistic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aterialism, via toxic land, waste and flood as material media. It presents the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 encountered by the black community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constructs the future of the African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the hybrid network with the material, and explores the unique material view and timescape in the Anthropocene.

**Key words:** material writing; timescape; slow-violence; post-katrina novel;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 上接第11页 )

### *Hi, Producer: Innova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d TV Dramas*

LI Li, CHENG Jun

-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

**Abstract:** The use of TV dramas to pres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and tel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ories has always been an effective way to popularize and disseminat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re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d dramas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television drama market,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elevision dissemination. As a workplace drama with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 *Hi, Producer* not only showcases the complete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grams, but also innovates the television expre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grams, wonderful story tell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live”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ersistence and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spirit, opening up new path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film and television.

**Key words:** *Hi, Produce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d dram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programmes; cultural inheritance

# 基于概念隐喻视角《紫色》中女性主体建构解读

宋亮亮

(安徽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学院, 合肥 231201)

**摘要:** 概念隐喻作为感知世界的认知机制是语篇组织构建的重要方式, 助力揭示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基于概念隐喻视角解读沃克《紫色》中女性主体建构, 发现小说围绕“人生是战争”和“妇女主义是紫色”两个中心隐喻展开, 从语篇底层促成小说整体连贯。黑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迫于男性权威, 麻木压抑自我, 被动内化父权制文化, 自我意识逐渐缺失。黑人女性立足黑人文化、姐妹情谊最终实现两性和谐共存, 重构自身主体性。沃克致力于人类两性共同命运的探讨, 她所倡导的妇女主义为两性之间和谐相处提供了合理的解救路径, 对当下女性话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概念隐喻; 《紫色》; 女性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1-0023-05

George Lakoff 认为概念隐喻涉及将源域元素映射到目标域元素, 影响和重构目标域元素。<sup>①</sup>利用概念隐喻理论解读和分析文学作品, 有利于透过文本表面挖掘隐藏的深刻内涵, 深化对作品主题思想的理解。《紫色》是沃克最有名的书信体小说, 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涉及美国基本的社会问题——种族、性别矛盾以及黑人妇女问题等, 是当代非裔美国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的代表作, 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 主要通过妇女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比较研究等研究小说的主题思想、写作手法等。最有影响力的是王成宇教授从非洲中心主义、民族意识等角度对《紫色》进行系统研究, 深入探讨非洲中心主义的含义及其对美国黑人女性寻求解放的意义。<sup>[1]</sup>目前基于概念隐喻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 大多将《紫色》当作语言材料, 对小说中的概念隐喻进行简略分析和概括。鉴于此, 本文以“人生是战争”和“妇女主义是紫色”两个中心隐喻为研究对象, 分析《紫色》中女性主体意识探寻和建构的过程, 深化概念隐喻构建《紫色》语篇连贯的认知, 同时加深对沃克“妇女主义”中的两性和谐共存、人类完整生存理想的理解, 对解决两性对立以及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立矛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一、《紫色》中的中心隐喻

两个概念隐喻与小说密切相关, 一是战争性隐喻,

有的凸显黑人女性遭受黑人男性的性别压迫, 有的凸显黑人承受来自白人的种族压迫。“人生是战争”是小说的中心隐喻之一, 反映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主题, 战争隐喻反映黑人混乱、暴力、痛苦的生活状况。二是妇女主义隐喻, 妇女主义隐喻是沃克向所有人, 尤其是黑人女性在战争般生活中幸存提出的策略。“妇女主义是紫色”, “紫色”贯穿全文, 坚持和谐共存为核心。两个中心隐喻贯穿全文, 是全文的主导概念隐喻, 助力构建小说语篇层次连贯。

### (一) “生活就是一场战争”

男性和女性之间战斗般的生活反映了小说的性别主义主题。耐蒂、凯特和索菲亚皆视西丽的生活为战争, 目睹某某先生和他的孩子虐待西丽, 耐蒂鼓励并建议西丽“得跟他们斗”<sup>[2]18</sup>, 凯特鼓励西丽为自己而战, 索菲亚建议她直接使用暴力——“你应该狠狠地把某某先生揍一顿, 之后再想天堂”<sup>[2]42</sup>。小说中意志力坚强的索菲亚视自己为一名女战士, 她坦言“我的一生都必须战斗, 我必须和父亲、兄长、表兄弟以及叔伯战斗, 一个女孩在一个男性家庭中是不安全的”<sup>[2]40</sup>, 她视所有男性甚至男性家人为敌人, 为了存活下来, 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反抗时, 索菲亚手中的任何物品都可以被用作战斗武器, 她与丈夫哈波斯扯扭打, 扯破窗帘, 摔裂镜子, 砸碎盘子。索菲亚“只剩下衬裙, 却眼睛都不

收稿日期: 2024-09-03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哲学社会科学)“‘他者’的叙事: 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儒家孝道思想研究”(2022AH052809); 安徽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概念隐喻理论在英汉广告中的应用研究”(Awky2022039)。

作者简介: 宋亮亮(1984—), 女, 安徽合肥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研究。

①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眨一下,他跳起来用两只胳膊紧紧压住她的下巴颏,她把他从头上摔过去,他砰地摔着炉子上”<sup>[2]38</sup>,女战士般的索菲亚和默默忍受的西丽形成鲜明对比。

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战斗揭示小说的种族主义主题。代表白人种族压迫的市长被黑人索菲亚击倒,意味着白人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因此索菲亚的肋骨被白人警察打断,半个鼻子被掀开,一只眼睛被打瞎,从头到脚浮肿,舌头粗得像块橡皮,浑身青紫,像个茄子似的,更严重的是,她失去了 12 年人生自由,沦为市长家一名女仆,住在满是苍蝇的房间里,照顾市长家的孩子而不能抚育自己的孩子,为种族主义之战付出惨痛的代价。通过索菲亚的惨败,沃克暗示个人无法赢得种族主义之战。在非洲大陆上,白人入侵者利用先进武器强行占领奥林卡领土,修建道路;奥林卡人的教堂、学校、屋子在几小时内都被夷为平地,“村子好像给破了腹,抽掉了内脏”<sup>[2]170</sup>,古老参天的桉树和其他各种树木、猎物以及树林里的一切都被砍倒杀死,奥林卡以及千百个像奥林卡这样的村庄遭到毁灭,奥林卡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且无法维持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

沃克将“人生是战争”贯穿小说,借助战争特点展示黑人遭受的困难和压迫,总结黑人苦难的人生,回应小说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主题。

## (二) “妇女主义是紫色”

“生活是战争”隐喻了黑人的苦难人生,沃克赋予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改变自我命运和战胜这场战争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武器,即妇女主义。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对“妇女主义”作如下定义:妇女主义从 womanism(女孩子气的)和 girlish(女孩似的)发展而来;这类女性通常勇敢、行为不同寻常,团结其他女性和男性,团结其他种族,反对二元对立,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最重要的是鼓励女性肯定自己的价值,并热爱自己。<sup>[3]</sup>基于人文主义关怀,沃克倡导的妇女主义承认女性的力量,重视女性的团结,反对种族间和性别间对立,跨越某一群体的男性和女性,期待不同种族、性别的人类能够和谐共存,实现人类完整性生存。

“紫色”在英美文化中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象征皇权、尊严和坚毅,映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对尊严、平等生活追求的美好愿望,同时映射黑人女性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紫色是红色和蓝色的融合,红色代表热情希望,是黑人向往和追求美好平等生活的象征,蓝色是瘀伤的颜色,和阴郁痛苦联系在一起,是黑人主人公黑暗阴郁生活的象征。叛逆的莎格在出场时,身穿红色大衣,唇抹口红,鲜艳的红色表达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反抗精神。紫色也指美国黑人的肤色:黑人和白人的融合使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肤色变成紫色,

紫色是一种融合的颜色。这种融合对应妇女主义中的核心思想:和谐共存。

“紫色”被映射到西丽成长为一名妇女主义者的四个重要阶段。第一次,西丽渴望购买一件紫色的衣服,映射西丽希冀成为自尊自爱的女性;第二次,西丽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魅力,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第三次索菲亚在种族主义战争中幸存下来,西丽为她缝制一条带有红色和紫色两种颜色的裤子,映射西丽欣赏索菲亚的战斗精神,红色代表自由和希望,紫色代表不屈不挠的女性精神,西丽意识到想要获得权利,就应当为自己而战;第四次西丽和某某先生走向和解,获得梦寐以求的紫色房子,获得“紫色”所代表的尊严和幸福。

紫色,映射“妇女主义”所倡导的人类和諧共存,“妇女主义就是紫色”是贯穿全文的另一中心隐喻,是沃克赋予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斗争的指导思想,反映小说妇女主义主题思想。

## 二、麻木的黑人女性

黑人女性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在父权制社会下被物化为一件可以交换的商品、工具和机器。黑人女性在意识层面上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压迫和影响,无意中将自己视为低等的骡子,麻木自我,压抑自身的情感,无视内心需求和自身价值,只为活着,逐渐丧失主体意识,最终沦为失去自我任凭男性摆布的奴隶,成为照顾家庭的工具和满足男性需求的附庸。在男性绝对权威压迫下,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甚至逐渐内化父权制文化下的男性价值观,用实际行动赞同和支持黑人男性对其他女性的压迫,沦为男性准则束缚下的有力帮凶和助力者。

### (一) 压抑的自我和情欲

西丽 14 岁时被继父强暴,生下两名小孩后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继父残忍地将孩子送人,亲手毁了西丽的母性,对她失去兴趣后,又将她像商品一样卖给已有 4 个孩子刚刚成为鳏夫的某某先生,成为某某先生照顾孩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婚后西丽背负最沉重的家庭重担,忍受某某先生的非人待遇,某某先生却将西丽视为畜生,把所有不满通通发泄在她身上。西丽遭遇更严重的家暴和性侵害,身体被无情地摧残,上面满是羞辱和疤痕。西丽的继父和某某先生一贯用丑陋来形容她,西丽一直回避厌恶自己的身体。目睹母亲和妹妹的遭遇,西丽最终放弃抗争,“西丽,你是一棵树,我就这样知道树是怕人的”<sup>[2]23</sup>,活的树木一但被砍伐就毫无生气,沃克通过“西丽是树”隐喻映射黑人女性没有意义和希望的人生,西丽默默向白人上帝祈祷,接受一切不公。在男

性权威的威压下，反抗意味着死亡，西丽不敢抗争，不知如何去反抗，唯有逆来顺受，无声地屈服。“女人是树”隐喻凸显西丽麻木的人生，在人类意识和上帝意识双重缺失的驱使下，西丽的自我意识逐渐丧失。

西丽的麻木还体现在对男性的认知上，她对男性没有任何感情，拍哈波的后背就跟拍一条狗一样，更像是“一块木头在拍另一块木头。不是一颗活的树，而是一张桌子，一口五斗橱”<sup>[2]</sup>。西丽内心独白中包含三个概念性隐喻：黑人男子是一种动物、一块木头和一件家具。三个不同源域之间似乎没有明显关联，但从重叠隐喻视角来看，三者之间可以构建一致性。动物、木材和家具之间具备深层次关联，即三者都不具备人类意识，此隐喻凸显西丽对男性的麻木。生活的遭遇使西丽害怕和厌恶男性，在她眼中“男人脱掉裤子都像青蛙，不管你多么亲他们吻他们，他们始终是青蛙”<sup>[2]258</sup>。青蛙皮肤黏黏的潮湿的，还有令人厌恶的分泌物，对于西丽而言，男性和青蛙有相同的特征——丑陋而冷血。西丽不但厌恶男性甚至恐惧性爱，莎格曾声称西丽是一名处女，对性爱一无所知。西丽的情欲遭到继父和某某先生的强横掠夺，她恐惧抵触美好的性爱。此时西丽的自我和情欲被深深地隐藏和压抑，她逐渐丧失自我意识，沦为麻木的家庭劳作机器和满足男性需求的工具。

#### （二）男性价值体系内化的西丽

父权制社会体系下，男性为维持对女性的统治，制定一套标准束缚女性的主体意识发展，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迫于生存需要和对男性权威的恐惧，会主动内化这些准则，以此约束自己和其他女性。在这种循环的怪圈中，女性不仅沦为没有主体意识的奴隶，甚至对父权制社会下的压迫文化产生认同，成为男性统治的助力者。从思想层面分析，西丽的麻木主要是因为内化了男性价值体系。背负奴隶身世的西丽承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沉沦为社会最底层、孤立无援的她只能从白人上帝那里寻求慰藉。基督教白人上帝宣传的顺从和忍耐不能改变她苦难的生活，反而从思想层面麻痹她。在写给上帝的信中西丽祈求上帝显灵，西丽质疑自己是一个和父亲发生乱伦关系的坏女孩，负罪羞耻感以及继父的威胁剥夺了西丽的话语权，阻碍西丽与他人的沟通，西丽陷入沉默孤独的深渊。此外，母亲和妹妹的经历也加深西丽对男性权威的恐惧。西丽的妹妹耐蒂因反抗男性权威被赶出家门，从此杳无音讯，母亲沦为继父发泄性欲的工具，最终被折磨致死。西丽目睹男性霸权对女性命运的绝对掌控，这些经历迫使西丽不得不向男权屈服，她甚至认为黑人女性本该被如此对待。话语权被剥夺致使西丽难以清晰认知自我，

她沦为没有自主意识的一颗树，只为生存。

《紫色》中，黑人男性作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为重获种族主义之战中失去的尊严，物化女性并将自己转变为家庭中的压迫者，他们把女人看作动物。在某某先生眼中，西丽虽然丑陋但她不怕干重活，对她可以随心所欲。黑人女性被这些男性肆意奴役，像骡子一样无声无息地劳作、不被看见。“女人是骡子”映射黑人女性失去了话语权，隐形且卑微。可悲的是许多像西丽这样的黑人女性也无意识地将自己视为骡子，默默地听从男性的一切指令，麻木地生存在男性世界中，没有丝毫反抗意识。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男性以及黑人女性已然把女性视为骡子。黑人女性不光麻木自己，还成为父权制的帮凶。当哈波向西丽求助打压自己妻子的方法时，西丽的回答竟然是揍她。面对不屈服的索菲亚，失去主体意识的西丽显然默认甚至支持男性暴力镇压女性的反抗，西丽无法意识到反抗带来的积极效果，更意识不到女性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男性的附庸，男女两性应该以平等姿态和谐共存。男性价值体系已完全控制西丽的思想，西丽在无意识下主动固化男性对她的要求，对被奴役的处境安然接受。在父权制传统的钳制下，西丽显然已接纳男性强加于她的角色，并内化种族主义和父权制文化下的种种价值标准和规范，也以此作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基础。

### 三、黑人女性主体建构

沃克倡导的“妇女主义”，重视黑人女性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承认女性的力量和价值，强调女性之间团结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不贬低男性的力量，坚持女性的主体性建构离不开男性的成长及其思想的转变，期待两性的和谐共存。沃克的妇女主义希冀消弭种族间与性别间的对抗，超越某一群体的男性和女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构二元对立，期待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的人类能够和谐共存。妇女主义以两性以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完整为目标，在思想层面和核心内容上比女权主义更具有包容性，更加丰富和完善，是黑人女性主体意识探索和建构的强大思想基础。

#### （一）黑人文化

白人主流文化和传统父权制文化的侵害导致黑人女性主体性缺失，沃克一直坚持非洲传统文化有助于维护黑人的民族特性。在非洲缝制百纳被是黑人妇女的一项传统劳动，即将旧的衣物、布料，裁剪、缝合成一个整体的图案作为被子的面料。百纳被在黑人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美国黑人妇女的一项美学传统。在缝制百纳被的过程中，西丽和索菲亚之间的隔阂消弭，索菲亚决定离开哈波，西

丽送给她一床被称之为“姐妹的选择”的被子，暗示她对索菲亚抗争精神的支持和赞同，这一隐喻概念映射沃克妇女主义思想中所倡导的姐妹情谊。在缝制百衲被时，黑人女性彼此之间要协作、交流，这样就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理解，隔阂也在缝制过程中化解，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百衲被和姐妹情谊都有重叠的蕴涵，即统一、团结。不同的布料组合形成美丽的被子，同样不同的黑人女性也因姐妹情谊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通过重叠蕴涵，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连接得以构建。黑人女性若想实现自我成长与解放，不能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姐妹情谊是建构自我主体性的有效资源。黑人女性只有凝聚在一起才能具备解构白人中心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理念的强大力量，才能从欲望客体成长为拥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主体。

布鲁斯作为黑人传统文化形式，是黑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备受歧视压迫的黑人发泄和表达悲伤的方式。“蓝色”代表忧郁和沮丧，蓝调隐喻映射黑人苦难的生活，沃克借助忧郁的声音让失去话语权的黑人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蓝调歌手莎格是沃克塑造的最完美的妇女主义者，莎格凭借音乐成功走进禁止女性进入的娱乐社交场所，在中心舞台歌唱，获得大批男性粉丝追随者。莎格不仅借助音乐夺回失去的话语权，实现自身价值和经济独立，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还通过歌声慰藉和鼓励其他黑人女性同胞。她创作和演唱的《西丽小姐之歌》，使西丽第一次感受到被平等对待和尊重。布鲁斯蓝调音乐是沃克赋予黑人女性对抗父权制社会的有力武器，布鲁斯映射黑人女性的精神力量来源，帮助黑人女性寻求和实现自我价值，助力女性主体建构，沃克采用非洲传统音乐和歌唱深化小说主题。黑人女性历经最贫贱、最苦难的生活，磨炼出乐观、强韧、热爱生活的品质，这些品质是黑人女性的精神之源，黑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即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是主体建构的精神基础。

## （二）姐妹情谊

沃克主张重构女性主体要从认知被压抑的身体和情欲开始，贝尔·胡克斯主张建构女性主体应该以对情欲的接纳为基础<sup>①</sup>。完美的妇女主义者莎格对西丽的帮助无疑最具有启发性，莎格鼓励西丽用镜子观察身体之美；西丽对性生活几乎一无所知<sup>[2]66</sup>，甚至对异性情欲充满恐惧。西丽在莎格的帮助下开始认识和接纳被压抑已久的自我和情欲，跨出女性主体建构的第一步；莎格教导西丽要勇于与男权作斗争，启发西丽“你要走过一块紫颜色的土地却没有注意到，上帝就会很愤怒”<sup>[2]197</sup>。文中紫色代表自然创造的价值和美好，西丽意识到即使

像她这样丑且贫穷的黑人女性，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神圣和美丽的。莎格的泛灵论帮助西丽摆脱宗教的桎梏。西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魅力，女性主体被成功唤醒。身心的解放促使西丽缝纫才华迸发，西丽在莎格的引导下走上经济解放之路，成为一名经济独立的妇女主义者，最后西丽把自己的新屋粉刷成紫色和大红色，映射西丽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

女战士索菲亚勇敢反抗男性压迫的行为潜移默化地促使西丽对女性自身的处境进行反思，是西丽奋起反抗的标杆。索菲亚劝诫西丽不要迷信白人上帝，应该把某某先生的头揍开花，勇敢反抗男性的压迫。西丽亲眼目睹索菲亚与哈波之间战斗般的生活，发现哈波经常被索菲亚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同于一般的黑人女性，索菲亚并没有向不幸福的婚姻屈服，而是积极改变自己不幸的处境，她带着孩子决然离开，组建新的家庭，寻找平等基础上的新婚姻。她独立自信的人格、强烈的反抗精神深深启发了西丽。受索菲亚的鼓舞，西丽意识到女性不应该被男性压迫和默默忍受一切，她开始奋起反抗。索菲亚是西丽的引导者，在索菲亚的启发下，西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软弱可欺的黑人女性，她不断地反驳某某先生，直至说出最有力的女性宣言：“不过我就在这里。”<sup>[2]210</sup>此时的西丽已经开始从以往痛苦的生活经历中解脱出来，认识到面对男性霸权和压迫，女性不能逆来顺受，应当发出反抗的声音，抗议男性的压迫。

在莎格和索菲亚的启发鼓励下，西丽成长为经济上独立，精神上摆脱宗教束缚，勇于反抗的女性，但此时还不是一名彻底的妇女主义者。

## 四、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两性完整性回归

女性主体意识的探索和建构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和成长，也需要依靠其他女性的帮助，更需要男性的共同参与。黑人女性不仅需要向男性敞开心扉完成自我救赎，还要协助男性成长，帮助男性彻底根除父权制文化的影响，摆脱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实现性别权力结构的动态平衡，以此建立差异为基础的平等的相互主体，即男女双方首先作为独立的主体，同时以相互理解和平等为基础的交流、交往行为。

### （一）父权制文化下的受害者

黑人男性不仅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且内化父权制社会传统价值观。为了重获在种族主义之战中失去的尊严，他们把自己转变成女性的主宰者和压迫者。某某先生告知西丽：“我过去总是觉得你像一只鸟，你真

<sup>①</sup> Bell Hooks. *Selling Hot Pussy: Representation of Black Sexuality in the Cultural Marketplace* [M]//Katie Conboy, Nadia Medina, Sarah Stanbury, eds.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e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8.

是瘦小，出了一点点小事情，你就吓得跟小鸟一样，像是要飞走一样。”<sup>[2]257</sup>当鸟的概念隐喻被用来描述黑人女性时，黑人女性娇小软弱被男性控制在手心的对应关系得以映射，同时黑人女性就像鸟儿一样遇到任何危险就会飞走映射尽管女性暂时被主宰，男性却每时每刻都害怕失去家庭地位。某某先生需要一个照顾孩子的母亲，西丽继父建议娶西丽，因为“她不怕干重活，你对她可以很随便，她绝不会向你吃要穿的”<sup>[2]18</sup>。对话中包含两个概念性隐喻：黑人女性是一种工具、一种动物。某某先生强调工具的应用，认为黑人女性只是一种照顾孩子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西丽继父强调女性是一种动物，不需要喂养和来自他人的特殊照顾，两个概念隐喻构建了黑人男性眼中黑人女性的形象。

男性的男权至上和男性中心理念并不是天生就具有的，在父权制社会下男性被社会指定角色，在性别主义观念的反复内化下，男性成为父权制的助力者。莎格坦白“他爸爸和哥哥对他说我是一个贱坯，我妈妈以前也是贱坯，艾伯特想据理力争，可被他们驳倒”<sup>[2]124</sup>，某某先生和莎格彼此相爱，然而由于老先生对莎格和她母亲的偏见，他们最终分手。为了捍卫爱情，某某先生与他的父亲辩驳。在方位概念隐喻中上为大下为小，黑人儿子倒下映射某某先生在父亲面前没有话语权，抵抗是无效的。某某先生没有能力捍卫自己和莎格的爱情，愧疚之下，就会加倍折磨卑微低下的西丽，弥补无法拥有充满活力莎格的缺失。某某先生遭受父亲的压迫，为了发泄而走向女性对立面，这种与女性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只是通过对失去主体意识的女性加以父权制的迫害以弥补自己失去的尊严和地位。在《紫色》中，在社会、种族和父权制文化的交互压迫下黑人男性无法获得自己的存在感，家庭已然成为男性确定主人公身份地位、构建霸权体验的理想场所，黑人男性依靠家庭慰藉疗愈被父权制扭曲的灵魂。

### （二）两性的和谐共存

父权制社会下，男性价值体系已渗透进人们的思想意识，父权制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为了解构内化的价值体系，妇女主义者往往会陷入二元对立的处境。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的交往前提下，才能建构起一种较高层次的主体间性，让每个人的视角与所有人的视角相互重合”<sup>[4]85</sup>。哈贝马斯倡导的主体间性强调男女双方作为相互独立的主体，以彼此理解和平等的原则进行交流交往，承认彼此的主体性和差异性。沃克一直呼吁世界关注黑人女性的遭遇，赞美黑人女性的价值和力量，但从未轻视男性，而是期待男性思想的转变和成长，坚持妇女主义要脱离女性中心主义的漩涡。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与沃克的妇女主义观点在两性关系上几乎是相同的。传统意识形态下女性的主体建构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彻底消解男性的主体性，将男

性放在客体的位置，陷入另一种女性霸权。这种偏激的二元对立是沃克所反对的，沃克提出一个重要而有用的策略——用妇女主义来终结男女之间的战争。在妇女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女性可以让男性停止虐待女性并重新审视对待女性的方式，实现平等基础上的共同成长进步，彼此独立前提下的和谐共存、两性和谐，某某先生的转变是最好的证明。莎格的不断教育和西丽的出走，促使某某先生性格开始发生变化。目睹西丽的转变和进步，某某先生不再歧视像西丽这样的黑人女性，开始理解西丽曾经的痛苦，主动帮助她打探耐蒂的消息，陪伴西丽做针线活，视她为一个很好的陪伴者。西丽在莎格离开后把某某先生视为倾诉的对象，某某先生终于拥有自己的名字艾伯特。某某先生第一次感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开始摆脱父权制对他的负面钳制，西丽也成功摆脱男性霸权对她造成的负面影响，两人在相互沟通陪伴中实现和解，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和自由。由此可见，男女两性可以建立真正的感情，女性身心的解放不仅可以实现自身价值，促进主体意识的建立，而且也促进两性和谐共存。重建主体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和觉醒，还需要男性思想的转变和成长，需要彻底根除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某某先生对女性的认知从女性是动物转变为女性是人，在小说的结尾某某先生送给西丽一个紫色的青蛙，这隐喻某某先生和西丽的和解，西丽对男性的接纳。至此西丽成长为一名完全的妇女主义者，完成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主体重构。传统的性别角色和二元对立模式得以解构，西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涂满紫色和红色的房子，最终实现两性和谐共存和完整回归的理想世界。

### 结语

概念隐喻透过文字表层，深挖隐藏的内涵。通过概念隐喻视角可以深刻理解《紫色》中的中心隐喻：黑人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坚持两性和谐共存的妇女主义就如蓝色和红色融合形成的紫色，妇女主义即紫色。黑人文化是《紫色》小说中西丽女性主体意识探索建构的精神基础；女性主体性建构是依托女性个体和集体力量实现的，也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下的成果，女性主体建构离不开男性的理解和共同参与。立足于黑人文化，坚持和谐共存的妇女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就像紫色对于淡紫色，是黑人女性实现主体建构的最佳武器。女性主体建构围绕“妇女主义是紫色”中心隐喻展开，此中心隐喻加深对沃克“妇女主义”中男女和谐共存人类完整生存理想的理解，沃克倡导的妇女主义对解决两性矛盾和女性话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下转第40页）

# “背过”的语义扩展及句式适用性分析

唐艳

(德州学院, 山东德州 253023)

**摘要:** 根据汉语词语的构成方式,“背过”(“动作完结,记忆并能复述”义)与“读过”“写过”都可以写成“动词+过”,但是在用法上并不是完全相同,“背过”表现出更加强大的适用性,在现代汉语中适用于各种语气,包括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以及祈使句。通过对“背过”“读过”“写过”的历时梳理,推断类推化可能是“背过”出现的决定性因素,而网络语料中表达的需要又促使“背过”突破“动词+过”的语义限制,可以充当祈使句的主动词,表达要求或命令之意。

**关键词:** 背过;读过;写过;祈使句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28-06

作为一名小学生家长,笔者经常收到班级群的作业要求,如,“把《赵州桥》一文背过”或“背过《纸的发明》一文”,但是没有收到把某文“读过”、把某文“写过”或“读过”某文、“写过”某文的要求。如果在“读”或者“写”上对学生有要求的话,一般会说“阅读《赵州桥》一文”“抄写《赵州桥》一文”。同样是作业要求,为什么“背过”可说,而“读过”或者“写过”不说,造成它们用法不同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sup>①</sup>

## 一、析“背”“读”“写”

根据汉语的构形习惯,“背过”“读过”“写过”的构成方式可以表示为“动词+过”,为了解决引言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根据以上3个词语的构成方式,分别从动词“背”“读”“写”的释义开始我们的解密之旅。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以下简称《现汉》)中关于“背”(bèi)的解释如下。(1)名词。躯干的一部分,部位跟胸和腹相对。(2)动词。背部对着(跟“向”相对)。(3)(背儿)某些物体的反面或后部。(4)动词。离开。(5)动词。躲避;瞒。(6)动词。背诵。(7)动词。违背;违反。(8)动词。朝着相反的方向。(9)形容词。偏僻。(10)形容词。不顺利;倒霉。(11)形容词。听觉不灵。(12)名词。姓。<sup>[157]</sup>根据引言中的语例,本文主要涉及“背”的第6个义项,再查《现汉》关于“背诵”的释义“凭记忆念出读过的文字”<sup>[158]</sup>,简单来说,“背”指的是对某个内容或材料

进行学习并能够脱稿复述。为了更加便于观察“背”的语义,我们用语义特征分析法<sup>[2109,123]</sup>解析“背”,如下所示。

背[+动作, +记忆, +脱稿复述]

《现汉》中关于“读”(dú)的解释:(1)动词。看着文字念出声音。(2)动词。阅读;看(文章)。(3)动词。指上学。(4)(字的)念法;读音。<sup>[1132]</sup>本文主要涉及“读”的第1、2义项,“他读过《赵州桥》一文”的“读”可以理解为“看着文章念出声音”(即第1个义项),也可以理解为“阅读了这篇文章”(即第2个义项)。第1和第2个义项的差别主要是:第1个义项不仅要调动视觉感官还强调“念出声音”这个动作,而第2个义项仅强调浏览这个动作。在没有上下文暗示或者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他读过《赵州桥》一文”可以是“看着念出声音”,也可以是仅仅完成“看”这篇文章的动作。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来分析“看”。

看[+动作, +浏览, +念]

《现汉》中关于“写”(xiě)的解释:(1)动词。用笔在纸上或其他东西上做字。(2)动词。写作。(3)动词。描写。(4)动词。绘画。<sup>[11450]</sup>因为引言中谈到的《赵州桥》一文是小学三年级教材中的范文,是已经完成的作品,所以本文主要涉及到第1个义项,指抄写、记录。以语义特征分析法来看“写”,可以表示如下:

写[+动作, +记录/抄写]

收稿日期: 2024-10-08

作者简介: 唐艳(1984—),女,重庆荣昌人,编辑,硕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① 本文谈论的“背过”“读过”“写过”是作为主动词的。

为了探寻“背过”与“读过”“写过”用法不同的原因，我们将“背过”“读过”“写过”三个词语分解，即通过词典查询确定了“背”“读”“写”三个动词的释义，接下来，我们分别看看“背”“读”“写”单用是否适用祈使句。

“背”“读”“写”可以单用，表达祈使语气，如下所示：

- (1) 背《赵州桥》一文！
- (2) 读《赵州桥》一文！
- (3) 写《赵州桥》一文！

例(1)~(3)是分别从记忆、阅读、抄写三个方面对《赵州桥》一文的学习要求，3个句子全部成立，在普通话中可说，也是常用的表达方式。例(1)~(3)的成立表明动词“读”“写”不是造成“读过”“写过”在祈使句中不成立的原因。单用合格，组合不合格，焦点开始指向组合“动词+过”中的“过”，会不会是“过”和动词组合导致“读过”“写过”不成立？如果是，“过”又是怎样阻止“读过”“写过”适用祈使句的？让我们再来看看“过”的含义。

## 二、析“过”

《说文解字》中说，过“度也。从辵𠂔声。”<sup>[375]</sup>“过”本义“度过，动词”，在和其他动词结合连用中逐渐虚化为助动词“过<sup>2</sup>”(guo)<sup>①</sup>，如“背过”“读过”“写过”。吕叔湘先生说“动词+过<sup>2</sup>”(以下均写为“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也可以看作是动结式，表示动作完毕。<sup>[4246]</sup>如：

- (4) 今日作业：背过<sup>2</sup>《赵州桥》一文。
- (5) \*今日作业：读过<sup>2</sup>《赵州桥》一文。
- (6) \*今日作业：写过<sup>2</sup>《赵州桥》一文。

以上作业要求包含“要求、命令”之意，是祈使句。祈使句分为直接祈使句和间接祈使句<sup>[516]</sup>，例(4)~(6)是老师对学生发出的直接要求，属于直接祈使，那么“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是否有间接祈使形式？它们的适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将例(4)~(6)的作业要求改写成间接祈使形式，请看下面的例子。

- (7) 我希望你背过<sup>2</sup>《赵州桥》一文。
- (8) ? 我希望你读过<sup>2</sup>《赵州桥》一文。
- (9) ? 我希望你写过<sup>2</sup>《赵州桥》一文。

例(7)~(9)的例子是用陈述祈使手段“我希望~”

间接地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sup>[5186]</sup>，例(8)和(9)可以说，但是在实际语言表达中不说，我们通常会说：

- (10)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读了<sup>2</sup>。
- (11)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写了<sup>2</sup>。

通过(4)~(9)的例子，我们发现“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在祈使句的适用上是有差异的，“背过<sup>2</sup>”可以用于祈使句，直接或间接地传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要求、建议，而“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不能用于直接祈使句，可以用在间接祈使句中，间接地表达对听话人的一种要求，但通常不用，而是采用转换句式的方式“把……读/写了”委婉表达祈使语气，如例(10)和(11)。那么，三者只是在祈使句中有适用差别，还是在其他语气中也有同样的差别？

## 三、“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的区别

### (一) 各种语气适用上的异同

上文展示了“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在祈使句中适用上的差异，接下来我们看“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三个词语在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中的分布。

陈述句：

- (12) 《赵州桥》一文背过<sup>2</sup>了。
- (13) 《赵州桥》一文读过<sup>2</sup>了。
- (14) 《赵州桥》一文写过<sup>2</sup>了。

疑问句：

- (15) 《赵州桥》一文背过<sup>2</sup>了吗？
- (16) 《赵州桥》一文读过<sup>2</sup>了吗？
- (17) 《赵州桥》一文写过<sup>2</sup>了吗？

感叹句：

- (18) 《赵州桥》一文背过<sup>2</sup>了啊！
- (19) 《赵州桥》一文读过<sup>2</sup>了啊！
- (20) 《赵州桥》一文写过<sup>2</sup>了啊！

从以上举例以及上一部分的讨论中，我们观察到“背过<sup>2</sup>”适用于所有语气，包括祈使、陈述、疑问和感叹语气，“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适用于除祈使语气外的所有语气。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作为主动词的“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在各种语气中的分布图，如表1所示。

①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将“过”分成“过<sup>1</sup>(guò)”和“过<sup>2</sup>(guo)”，“过<sup>1</sup>”又分为动词和趋向动词两类，虚化为动态助词的“过<sup>2</sup>”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毕，也可表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事情。本文所探究的是在祈使句中为什么“背过”成立，而“读过”“写过”不成立，因此本文涉及的是“过<sup>2</sup>”“表示动作的完毕”义。

② 本文关于“了”所举语料都是取“了”作为时态助词，表动作完结义。

表1 “背过<sup>2</sup>” “读过<sup>2</sup>” “写过<sup>2</sup>” 在各种语气中的分布图

	直接祈使句	间接祈使句	陈述句	疑问句	感叹句
背过 <sup>2</sup>	+	+	+	+	+
读过 <sup>2</sup>	-	?	+	+	+
写过 <sup>2</sup>	-	?	+	+	+

由表 1 可知,“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并非在所有的祈使语气中都不可以说,在间接祈使句中可说,但是一般不说,这种情况属于弱适用。我们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各种语气的分布中可以看出,“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整体上正在朝着直接祈使的方向发展,在陈述、疑问以及感叹句中完全可以说,一只脚已跨入间接祈使,即在语感上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在间接祈使句中站住脚跟(没有实际的语言事实),而直接祈使完全不可说。实际的语言材料证明“背过<sup>2</sup>”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都可以适用于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它们的差别仅仅是祈使句。

## (二) “动词+(不同时态助动词)”适用上的异同

从上文笔者发现,“背过<sup>2</sup>”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的差别在祈使句中,“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在直接祈使句中不成立,间接祈使句中可说,但是一般不说。那么,这种区别是否只出现在“动词+过<sup>2</sup>(时态助动词)”中?在“动词+其他时态助动词”,如“动词+着”“动词+了”中是否也有同样的差别?为了验证是否是助动词造成句子不成立,下面看“背”“读”“写”与另外两个常见的时态助动词“着”“了”连用表祈使的情况。

先看“背着”“读着”“写着”在祈使句中的用法。

直接祈使:

- (21) \*背着《赵州桥》一文!  
 (22) \*读着《赵州桥》一文!  
 (23) \*写着《赵州桥》一文!

间接祈使:

- (24) \*我希望你背着《赵州桥》一文!  
 (25) \*我希望你读着《赵州桥》一文!  
 (26) \*我希望你写着《赵州桥》一文!

例(21)~(26)表明,“背”“读”“写”和表正在进行的助动词“着”连用不能用在祈使句中。

再看“背了”“读了”“写了”在祈使句中的用法。这类组合又分两种情况。

### 1. “背了+宾语”

直接祈使:

- (27) \*背了《赵州桥》一文!  
 (28) \*读了《赵州桥》一文!

(29) \*写了《赵州桥》一文!

间接祈使:

- (30) ? 我希望你背了《赵州桥》一文!  
 (31) ? 我希望你读了《赵州桥》一文!  
 (32) ? 我希望你写了《赵州桥》一文!

### 2. “把”字句

直接祈使:

- (33) 把《赵州桥》一文背了!  
 (34) 把《赵州桥》一文读了!  
 (35) 把《赵州桥》一文写了!

间接祈使:

- (36)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背了!  
 (37)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读了!  
 (38)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写了!

“背”“读”“写”与“了”结合,例(27)~(29)表陈述事实可以成立,但是在祈使句中不说,不能表达祈使的语气,例(30)~(32)在祈使句中可以说,但是日常很少这样表达;第二种情况是将例(27)~(32)转换成“把”字句,例(33)~(38)都可说且表达祈使语气。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列出“背”“读”“写”带助动词“过<sup>2</sup>”“着”“了”的祈使分布图(见表 2)。

表2 “背/读/写”+“着/了/过<sup>2</sup>”的祈使分布图

	直接祈使	间接祈使
背过 <sup>2</sup>	+	+
读过 <sup>2</sup>	-	?
写过 <sup>2</sup>	-	?
背着	-	-
读着	-	-
写着	-	-
背了(+宾语)	-	?
读了(+宾语)	-	?
写了(+宾语)	-	?
背了(“把”字句)	+	+
读了(“把”字句)	+	+
写了(“把”字句)	+	+

从上表我们可以观察到,“背”“读”“写”带“着”的祈使句都不能说,带“了”的“把”字句和“背过<sup>2</sup>”都可以表达祈使的语气,“背/读/写了+宾语”和“读/写过<sup>2</sup>”处于过渡阶段,在间接祈使句中可说但基本不说。由此我们推断时态助动词并不是造成“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在祈使句中不同于“背过<sup>2</sup>”的原因。

由表 2,我们还发现“背了”“读了”“写了”以及“背着”“读着”“写着”在祈使句中表现出整齐性,或者都可以说,或者可说一般不用,或者不可说。而“背过<sup>2</sup>”

在“动词+过<sup>2</sup>”的组合中表现突出,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步调不一致,显示出不和谐性。为什么“背”与“过<sup>2</sup>”结合后超出“动词+过<sup>2</sup>”组合的共同表义范围而变得更加活跃?

### (三) 历时频次差异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北京大学语料库(英文简称“CCL”)①对“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的历时发展脉络做进一步的梳理(见表3)。

表3 与“记住”义有关的词及“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次数 (单位:次)

	唐	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1910s—1920s	1930s—1940s	1950s—1960s	1970s—1980s	1990s—2000s
背过 <sup>2</sup>				1				5	4	7	50
背诵		5	5	3	8	56	1	4	13	44	46
记诵		2		1	16	71	24	75	897	682	1145
读过 <sup>2</sup>			11	2	14	100	80	200	1300	2000	3000
写过 <sup>2</sup>	2			3	6	19	26	170	1100	2300	3000

注:表中数据100、80、200、1300、2000、3000、170、1100、2300、3000均为概数

为了解释“背过<sup>2</sup>”的异常(活跃性),我们先来梳理“背过<sup>2</sup>”的历时源流。表记忆之义的“背过<sup>2</sup>”一词最早出现于记录元朝时高丽人学习汉语的《老乞大谚解》②中,只有1例,即下面的例子。

(39) 到晚,师傅前撇签背念书。背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若背不过时,教当直(原文如此)学生背起,打三下。<sup>[65]</sup>

通过CCL语料库检索(见表3),自元朝出现第1例“背过<sup>2</sup>”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3例“背过<sup>2</sup>”的语料,出现在老舍和曹聚仁的文学作品中,40年代报刊开始使用“背过<sup>2</sup>”,以《人民日报》为主,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是用于陈述句,进入21世纪,“背过<sup>2</sup>”的语料开始变多,其中网络语料21例、纸质报刊7例、百家讲坛(电视)3例、对话录1例,2009年以后,随着微博、微信的出现,“背过<sup>2</sup>”以口语形式大量出现在网络语料中。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在网络语料中首次出现祈使语气的“背过<sup>2</sup>”:

(40) 请同学们背过上重点词汇后,做200512月份的词汇真题。(CCL:2000s\2006\网络语料\网页\2006 Author C000020)

(41) 本书的附录中列出了这些句子,大家一定要背过。(同上)

“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最早出现于唐宋时期。明清以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读过<sup>2</sup>”出现的频率都高于“写过<sup>2</sup>”,70年代以后二者发展速度才大致相当。与“背过<sup>2</sup>”相比,“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的使用频率很高,自20世纪30年代始,是“背过<sup>2</sup>”的30~60倍;而表达同样语义的“背诵”“记诵”自北宋出现后,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并行,一直处于强势,这也许是“背过<sup>2</sup>”

数量并不多的原因。“背过<sup>2</sup>”在元朝出现过1例,之后500多年再没有它的踪迹,之前也没有“背过<sup>2</sup>”的用法。根据以上语料笔者揣测在《老乞大谚解》中出现的“背过<sup>2</sup>”是高丽人翻译的用法,不是本土的。“背过<sup>2</sup>”真正开始进入我们的语言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

(42) 演员决不仅是背过了剧本到台上去背诵,或是随意参加自己意见与言语,而是演员本人也是个艺术家……(CCL:1930s\1934\文学\1934老舍文学概论讲义.txt)

“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得很快,使用频率大大超过前代。根据汉语构形的习惯,一般认为“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是由“动词+过<sup>2</sup>”构成的动结短语,按照词语的聚合原则,前面的“动词”可以由同类性质的词语替换,由于“背”和“读”“写”都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具有同类性,即可归属于学习义场,因此就有了“背过<sup>2</sup>”,即汉语语法的类推。<sup>[7]</sup>

以上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背过<sup>2</sup>”历时数百年后重出江湖的原因。但是作为原型且使用频率高的“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在句子中作为主动词并没有发展出祈使语气,表达“要求”或“建议”之义,这是为什么呢?

### (四) 语义特征上的异同

从实现的难易程度上看,“背过<sup>2</sup>”需要通过“读过<sup>2</sup>”甚至“写过<sup>2</sup>”才能实现,因此,“背过<sup>2</sup>”高于“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也许正因为难以实现,“背过<sup>2</sup>”在书面语或者口语中出现的频率低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轻易不说。那么,为什么在“背”“读”“写”帮助动词“过<sup>2</sup>”“着”“了”的祈使分布图中“背”“读”“写”与“了”结合都可以适用于祈使句呢(见表2)?

① CCL是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统计的语料库,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英双语,总规模达到60亿字。

② 《老乞大》流行于元代,学界认为最初刊行于15世纪初(1423—1434年间),参见李泰洙:《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第1页。本文的参考文献《老乞大谚解》是《老乞大》的谚解本,是研究《老乞大》语言的重要资料。

请看下面的例子。

直接祈使：

(43) 把《赵州桥》一文背了!

(44) 把《赵州桥》一文读了!

(45) 把《赵州桥》一文写了!

间接祈使：

(46)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背了!

(47)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读了!

(48) 我希望你把《赵州桥》一文写了!

从例(43)~(48)中可以看出,将“动词+过<sup>2</sup>”中的助动词“过<sup>2</sup>”换成助动词“了”,“背了”“读了”“写了”在祈使句中都可说,这也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猜想,“过<sup>2</sup>”造成了句子的不成立。那么,“过<sup>2</sup>”为什么和“背”结合后使用场景没有限制,而和“读”“写”结合后使用场景有限制呢?

根据“背”“读”“写”分别和“过<sup>2</sup>”“了”结合后的使用场景,可以列出它们的语义特征矩阵:

背过<sup>2</sup>[+经历或经验, +强调完成的程度, +记住, +请求/命令, -易实现]

读过<sup>2</sup>[+经历或经验, +强调完成的状态, +阅读, -请求/命令, +易实现]

写过<sup>2</sup>[+经历或经验, +强调完成的状态, +抄写, -请求/命令, +易实现]

背了[+动作本身, +强调动作的发生, +记住, +请求/命令]

读了[+动作本身, +强调动作的发生, +阅读, +请求/命令]

写了[+动作本身, +强调动作的发生, +抄写, +请求/命令]

祈使句通常用来表达命令、请求或建议,祈使句的本质是命令或请求某个动作的发生或停止,而非关注动作的完成状态,它的谓语大多是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或动词词组。<sup>[8]35-40</sup>“背了”“读了”“写了”三个词语更多地关涉动作本身,强调动作的发生,可以表达祈使的语气。而“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都强调经历或经验,不适合祈使语气的句子,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应对各种考试(升学或者工作),出现各类线上及线下的培训机构,他们在辅导学员学习时高频率地强调记忆知识点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学员必须“背过<sup>2</sup>”,如:

(49) 本书的附录中列出了这些句子,大家一定要背过!(CCL: 2000s\2006\网络语料\网页\2006 Author C000020)

例(49)中的“背过<sup>2</sup>”不仅指某种经历,而且强

调完成的程度——记住。为了凸显完成的程度,言者必须辅以强烈的语气作出要求,即祈使才能达到强调的目的。另外,从“背过<sup>2</sup>”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之间的关系,即从目的性方面推断,只有不断加强手段或采取有力方式(“读过<sup>2</sup>”甚至“写过<sup>2</sup>”)才能实现目标(背过<sup>2</sup>)。从“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的语义特征矩阵还可以发现三者调动的感官不同,“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是通过视觉、触觉对大脑产生刺激,而“背过<sup>2</sup>”则需要运用逻辑思维对接收的信息进行编码和存储,属于更高级别的指令。因此,调动“背过<sup>2</sup>”需要“请求/命令”这样的指令,即祈使语气。

据笔者的亲身经历,小学家校交流群关于作业要求,家长或科任老师多用“背过<sup>2</sup>”,语文老师用“背诵”。如:

(50) 英语作业:重新背过<sup>2</sup>单词拼写。

(51) 语文作业:认真背诵第十一课《赵州桥》课文。

根据从CCL语料库中搜索的大量语料以及生活中的语言事实,我们观察到“背了”或者“背诵”仅指动作本身,而表祈使语气的“背过<sup>2</sup>”言简意赅,既表动作完成,又强调动作的结果——记住,如:

(52) 英语作业:重新背过<sup>2</sup>单词拼写。

(53) 语文作业:认真背诵第十一课《赵州桥》课文。

(54) 请把《赵州桥》一文背了!

例(53)、(54)仅仅关注记忆《赵州桥》的动作是否发生,而例(52)不仅要求听话人开始记忆单词的拼写,还要求完成,达到记住的目标。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活泼泼的“背过<sup>2</sup>”或将突破口语,进入书面表达语中。

## 结论

通过大量的语料调查及语言事实分析,我们认为“背过<sup>2</sup>”“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既是相联系又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三者是相互联系的。通过检索CCL语料库并分析所得的语料,我们推测现在使用的“背过<sup>2</sup>”的出现是由于“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的类推化作用。进入20世纪30年代,“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使用频率明显增加,根据汉语词语的构成方式,人们也将这种用法类推到表“记忆”义的“背”上,组成“背过<sup>2</sup>”。“背过<sup>2</sup>”一经产生,就表现出强适应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不仅表示动作完成,还突破了“动词+过<sup>2</sup>”的使用范围,能够用于祈使句,在语义上含有要求或命令之义。

其次,历时频次有差异。“背过<sup>2</sup>”有文献记载的出现时间是元朝,间隔500余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本土才有“背过<sup>2</sup>”的用法并延续至今,且低频运行,即使加上常用的表记忆的词语“背诵”“记诵”也远远不及“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的使用量,从认知角度来看,正是由于通过“读过<sup>2</sup>”(阅读)甚至“写过<sup>2</sup>”(抄写)才能达到“背过<sup>2</sup>”(记忆)，“背过<sup>2</sup>”是学习的更高层次的要求,相对来说更难实现,因此,表现为数量不多,与“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相差巨大;而“读过<sup>2</sup>”“写过<sup>2</sup>”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二者突飞猛进,表现出持续高频的态势。

最后,语义特征不同。“背过<sup>2</sup>”指的是学习或记忆的过程并强调完成的程度,要求记忆并能复述所学内容,可用于表达要求或命令,涉及到复杂的认知过程,实现起来相对困难;而“读过<sup>2</sup>”和“写过<sup>2</sup>”则主要描述基于视觉的阅读行为或书写行为的完成状态。尽管本土“背过<sup>2</sup>”出现时间晚,但在培训机构老师们的高频使用后,它逐渐突破了语气的限制,开始被接受进入祈使句的语境。此种用法言简意赅,语义丰富,既满足了人们日常表情达意的需要,又体现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书面语往往源于口语,随着网络的广泛传播,语言的使用和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背过<sup>2</sup>”的祈使用法或将突破口语的局限,进一步拓宽适用空间,逐渐进入书面语领域。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3]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等,校定.景宋重刊本.
- [4] 吕叔湘,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5] 尹相熙.现代汉语祈使范畴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
- [6] 奎章阁图书第九:老乞大谚解[M].影印本.首尔: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47.
- [7] 张建民.汉字构形的类化和汉语语法的类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31-135,141.
- [8] 黄伯荣.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cited” “Read” and “Written”

TANG Yan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words, “recited(背过)” (“action completed, recite”) and “read(读过)” and “written(写过)” can be written as “verb+过”, but the usage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recited” shows more powerful applicability in modern Chinese for a variety of mood, including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imperative sentences. Through the diachronic combing of “recited” “read” and “written”, the article speculates that analogy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the appearance of “recited”, the need of expression in network corpus impels “reci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semantic limit of “verb+过”, which can act as the main verb of imperative sentence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request or order.

**Key words:** recited(背过); read(读过); written(写过); imperative sentence

# 解析拉康主体与视界驱力的内在关系

王国华, 王芷若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拉康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主体”,是“欲望的主体”。眼睛与凝视的分裂开拓了无意识的场域,使驱力在视界层面出现并维持着主体的部分存在。“无意识”之凝视作为主体确证自身的运作机制,使主体在重复强迫的原则作用下完成了包覆自身的过程,视界驱力在重复运作中所朝向的欲望是主体存在的匮乏性根基,主体在本质上是一种空洞的存在。在欲望与视界驱力的转化中,驱力以制造“丧失”本身的循环达到了自身目的,在“不向欲望让步”的重复姿态中,主体寻找到了自身真相,进而在精神分析话语实践中拥有了新的认知可能性。

**关键词:**视界驱力;眼睛;凝视;分裂主体;欲望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34-07

在视觉的理论沿革中,视觉具有的共时性、恒定性特征使其在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拥有着特殊的地位。围绕“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一套用以建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规制的运作规则”<sup>[1]</sup>被建立起来。视觉的理论定位从人类知觉层次不断深入发展到其他领域。眼睛的功能——观看,成为了一种确定人类自我意识的方式。“凝视”为观看进一步发展的拓展性概念。相较于“观看”,“凝视”联结着更多的场域,包含着对象、被看对象、观看发生的界域等概念。“凝视”使视觉理论拥有了机制层面上发展的内在可能性。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都对视觉理论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拉康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对精神分析主体的阐述构建过程中,将“观看”与“凝视”的概念作为主体维持自身同一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内嵌进了主体内部。在拉康看来,异化是主体的宿命,主体的逻辑就是分裂与异化的逻辑。在观看与凝视的分裂中,一种关于主体分裂的“真相”得以在视界场域具象化,这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于反思主体身份同一性的认知具有批判性意义。

## 一、主体之“幻想”:视界驱力

拉康的驱力概念来自于弗洛伊德的“冲动”(Trieb)

一词。在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中,“冲动”是其理论核心,强调人类与动物在性欲方面的不同特征,也就是不受“本能”(Instinkt)的控制。<sup>[2]</sup>但在翻译过程中,这两个词往往被混为一谈。“本能”这一词,在德国生理学中一般用来描述动物那些先天具有的行为趋向。弗洛伊德在对这些行为趋向进行描述时并不使用“冲动”一词,他认为“冲动”这一概念与动物或者人的本能都不相同。<sup>[3]</sup>所以,弗洛伊德的“冲动”和“本能”概念在其思想中可以说是趋向于对立的发展路径。前者强调后天发生于人类主体内部的心理结构现象,而后者的使用主要在动物行为中,主要表现为一种维持生命体状态的特征,一种“神话性的前语言的需要”<sup>[2]</sup>。弗洛伊德的“冲动”相对于“本能”概念来说,已经向脱离某种固定的对象性存在迈出了一大步,但其论证过程仍在一种生物性框架内。拉康在弗洛伊德对“冲动”和“本能”作出区分的基础上,对“冲动”概念作了进一步发展,在语言的场域中对弗洛伊德理论中残留的原始性、生物性进行了彻底清除,主张一种完全脱离生物色彩的“驱力”概念。基于此故,本文对于“Trieb”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均采用“驱力”的翻译,以此强调拉康所坚持的脱离生物领域的“能指”动态环路过程。

拉康认为,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驱力”始终充

收稿日期:2024-10-21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互交课堂教学模式研究”(szkzy2023003);西南政法大学校级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借鉴与发展研究”(2019XZYB-05)。

作者简介:王国华(1976—),男,江苏丰县人,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斥着一种原始的神秘色彩,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诉诸于神话,只有将其引向语言的场域,给予其普遍化的意义,才能肃清弗洛伊德分裂主体的革新理论,使精神分析的“正统”理论拥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拉康延续弗洛伊德对于性欲力的探讨,将其与经济因素相联系,强调驱力“不是一个关系系统,而是一个旨在确保内部紧张的某种稳态的系统”<sup>[41]75</sup>。驱力拥有着稳定的内核,也就是“位能”。弗洛伊德提到,驱力源于有机体的刺激并表现为一种恒立力量,是一个介于心理与躯体之间的概念。在描述心理的过程中,需要引入“经济”的观点,心理器官活动除了考虑基本活动之外,还要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和困难的种种情况下拥有一种自我保存的原则(唯实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力比多活动受到压抑,唯实原则拥有了一种恒定性趋向。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驱力概念进行了“重写”,首先,他提到了驱力并非产生于外部性的刺激,相反,这是一种恒定的力,一种能够维持内环境稳定的系统。其次,对于驱力的满足来说,初看起来在于达到目标,但拉康提出了弗洛伊德的一个概念——升华。弗洛伊德反复告诉我们,升华也是对驱力的满足,但它是具有障碍性的,因为其目标被抑制,未能完全实现。尽管如此,升华仍然是对驱力的满足,而没有压抑。对于此,一种驱力的回路就产生了,如图1所示。

通过驱力的回转路线,我们可以发现处于“Aim”路径之外的客体—— $\alpha$ 。在引入这个对象 $\alpha$ 的不可及性时,拉康提出了一个疑问:“应该如何理解驱力的对象才能说,在驱力运动中,不管它是什么,它都是无关紧要的?”<sup>[41]68</sup>所以,对于驱力的绕圈路径,拉康认为“驱力绕着客体转”<sup>[41]68</sup>,也就是驱力所环绕的对象 $\alpha$ 并不仅在于生命体内在的器官驱力上。驱力的特征就在于维持一种恒定性,而这种恒定性需要去测量一个确切的“开口”而实现。也就是说,驱力的稳定性需要一种处于边缘的“开口结构”予以保持。<sup>[41]62-16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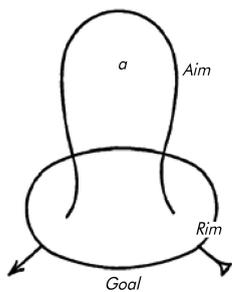


图1 驱力回转路线

拉康认为,驱力部分地代表着享乐的维度,主要在口腔、肛门、视界和祈灵四个方面呈现。对于生命体来说,无论人或是动物,都具有本能意义上的需要。如饥饿、口渴这种生理意义上的需要主要在前两种驱

力层面上显现。<sup>[2]89</sup>但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拥有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内驱力,这是对于“不可能”(对象 $\alpha$ )的需要。所以,“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主体就必须先去认同他者的需求,这就是驱力产生的时刻,他者的要求结构了主体的驱力”<sup>[5]381</sup>。拉康在解析主体的结构性力量时,引入了语言、大他者的维度,具有生物性色彩的“需要”变成了“要求”。主体在完成自身结构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去认同“他者”,在认同他者的时刻,驱力显现了自身。在本能被切割的意义上,在“需要”和“要求”的分裂间隙中,欲望作为这种间隙本身而出现并以一种回环状的形态维持着主体。但欲望作为一种“多余”的存在导致其不能完全包覆自身,在这个无法企及的欲望与前述四种驱力所指向的对象小 $\alpha$ (驱力客体)之间具有一种填补性关系,但由于这种“剩余”的存在并不能被对象 $\alpha$ 完全弥合,所以,主体必然产生一种外密性的分裂。

“眼睛与凝视——这就是对我们而言的分裂,在那里,驱力得以在视界领域的层面呈现。”<sup>[4]73</sup>拉康在关于观看(眼睛的功能)与凝视的讨论之中,主要采用法语词“regard”,英语学界在对于“regard”的翻译中,一般采用“gaze”而非“look”,这是为了强调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持续性行为的发生。相应地,在我国对拉康之“regard”进行聚焦探讨时,一般侧重于突出其“凝视”之意。相较于“观看”来说,“凝视”不仅仅停留于人类主体的知觉层次意义上,更多地隐喻着一种视觉运作机制。如大卫·摩根所说,凝视包含着图像、观看者和观看的行为,它们理解图像如何运作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框架。<sup>[6]3</sup>作为一种双边术语,凝视涉及主体与场域的关系问题。

在关于眼睛和凝视的阐释中,拉康的理论以一种不断深化发展的倾向,在时间维度上对二者进行了“另一种分裂”陈述。在早期,拉康对于视觉行为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显现的主体”一侧,以镜像阶段和镜子装置为例,“观看”的概念被大量使用——作为“中介”建构着主体的自我同一性。镜像阶段,拉康认为婴儿对于自身同一性的获得是通过观看镜子中的具有完整的主体形象来实现的;镜子装置中,花瓶和花朵合一的形象也是通过“观看”行为来予以说明的。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一时期,“观看”,也就是位于主体一侧的“眼睛”,在拉康的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观看”为我们提供着一种主体性视域,拉康在强调“凝视”分裂主体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着“观看”行为发生于视觉性动物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即使那是一种“幻想”。在第11期研讨班上,拉康对“regard”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regard”从“主体”

一侧转向了“他者”之域,即一种难以捕捉的“无意识”之域。但是,在“无意识”之场域凝视着主体的存在的力量也正是维持着主体自身存在的根源所在。

在这种纵向的理论深化发展中,法国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对拉康产生了很大影响。萨特提到:“那我与主体-他人的基本关系就应该能归结为我被他人看见的恒常可能性”<sup>[7]323</sup>,“‘被别人看见’是‘看见-别人’的真理”<sup>[7]324</sup>。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的凝视是结构着“我”的视觉可能性的“他在”,也就是说,“我”拥有着“观看”的可能性在于他者对于“我”的凝视。这种“凝视”也并非一种具有实存性质的行为,而是一种意识,“我”意识到“我”被“凝视”。“我”作为一个位置性质的存在,一种虚无,他人的存在包裹着“我”的存在,在“凝视”中,我们直接地、毫无遮蔽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为“他者”而存在。在拉康看来,主体的存在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幻想”,使这种“幻想”得以维持的根本在于一个“他者”。在萨特语境中,“凝视”仍在主体间性维度上发生,也就是一种主客二元关系(并非传统形而上学上的主客体关系)。但在拉康思想中,出现了“无意识”的“大他者”(另一个场景)的概念使“凝视”在一种三元结构中回转。拉康对萨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肯定了梅洛-庞蒂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中的论述,“尽管这种分析(对于萨特观点的分析)揭示了凝视的功能,但是透过钥匙孔正在偷窥的主体所受到的惊吓,我当时并没有提到这是一种完全被隐藏起来的凝视”<sup>[4]182</sup>。这种“完全被隐藏起来的凝视”就是拉康的“新发现”——无意识的凝视。梅洛-庞蒂从现象学的视角对这种交互性的关系效果进行了阐述。人的主体性通过“世界”的凝视得以确定,这种“凝视”将主体置于观看之下,是主体将自身体验为被观看的客体存在,这种翻转通过“全视者”而得以实现。拉康将其称之为“凝视的前存在”,“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sup>[4]72</sup>可见的机制发生在不可见之处,一种否定性的因素在支撑着可见之物。大他者之“凝视”使主体之“观看”得以可能。梅洛-庞蒂较之于萨特的不同在于他将他人的对象性“凝视”延展到一种结构性场景中发生,将聚焦点从他人身上转移到主体的交互性关系网络中。“在它看到自己的幻觉中,它的基础是由内而外的凝视结构。”<sup>[4]82</sup>这里的“它”即主体,“凝视”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而非具体的他者,使主体拥有了“看见”自身的可能性。但拉康对于梅洛-庞蒂之不可见的“全视者”并非完全赞同。他认为我们需要减少“意识”特权下的假设分析。这也体现出精神分析之于现象学的根本分歧——主体意识状态,这也是拉康欲颠覆笛卡尔以来的我思主体的确定性前提。精神分析认为意识状态是“误认”的产物,这个“误认”是一种出离其主体的存在。主

体本质上是一种欠缺,并非一种意识状态下的肯定性存在,而是一种否定性力量结构自身的“幻想”。同时,这种“幻想”也是一种“真实”,一种真理的“半说”。主体的分裂以循环结构出现时,主体得以显现,在“观看”与“凝视”的分裂中,在视界驱力的场域内,主体以一种结构性“幻想”维持自身存在。

## 二、主体之匮乏：欲望

拉康受到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将人的本质归于欲望。在欲望场域中的“凝视”支撑着主体,对于主体而言,不可满足之欲望是其存在的根源。欲望的对象不仅仅是欲望朝向的客体,也是引起欲望之原因。拉康提出,“主体对其自身分裂的兴趣是与决定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sup>[4]83</sup>。对于这个“决定它的东西”,拉康用了“object a”来表示,对象 a 所具有的悖论性质使其成为了主体的结构性力量,这个悖论性在驱力上得到了陈述性的意义指向,“驱力的整个目的就是在强化欲望满足的不可能性,强化满足的悖论性”<sup>[5]710</sup>。主体幻想结构公式( $\$ \diamond a$ )的功能运作回溯性地构建了对象 a 的“缝合点”,对象 a 作为一种匮乏的想象性表征、可分离的部分对象、实在的欠缺、他者的欲望,以否定性呈现自身<sup>[8]161-162</sup>。对象 a 作为主体化不充分结构性要素以非存在的本质成为了主体的创伤性内核场景。从欲望的领域展开的属于“凝视”的特有机制,它将处在视觉领域的主体维度转向了一种不可能的场域。在围绕着“不可能”之视界驱力的回环运作中,“无意识”的意义无法捕捉致使主体之“真”陷落,主体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存在。

对于“无意识”,弗洛伊德在“梦”中发现了其踪迹,拉康称其为具有脉动性的躲闪之物,一种意义永远不会到来的存在,拉康用能指的滑脱来对其进行阐述。不同于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相结合而产生意义的论述,拉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横线,抵制着意义的到来,能指的存在并不具象化主体的意义,而只是提供一种主体选择的语境。意义永远在逃遁之中,自我意识的离心化才是主体的本质。所以,无意识主体只有经过一种重复能指的回环运动才能把握到自己,主体的意义在一种回溯性运动中被暂时的“缝合”出来。在封闭的象征系统内部,由于能指的自动性(内在惯性原则)遭遇到真实必然产生一种重复的回返现象。“无意识”的无法把握注定其不能被象征化,只能作为一种“残余”出现,作为一种空洞性的存在。但同时,这种“残余”是主体的存在之真,实在界之“凝视”入侵着想象界与象征界之“观看”使主体之“观看”成为可能。对于欲望领域的“凝视”,这是一种不需要“眼

睛”的功能,是一种视觉盲点的存在。

拉康以视觉的几何学向度阐释了主体观点的消失。在笛卡尔《屈光学》中,盲人以两根棍子的交叉作用代替了视觉的“观看”效果。通过交叉的空间结构关系,空间领域成为了可以被想象和感知的“真实”。笛卡尔将眼睛的屈光作用描述为这两根棍子的交叉作用。所以,视觉的几何维度没有能够完全诠释视域本身提供给我们的原始的主观化关系。为了更深入探究视域,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透视在变形结构中的倒置作用。<sup>[486-89]</sup>几何光学中的三个项目在透视法中处于一种反转的位置关系,也就是说光源处在客体的位置,而几何点处在图画的一侧。一种他者的凝视在光源的位置上,而主体位于图画的位置,在几何维度中,主体被捕获、捕捉、操纵在视域层面上显示,人成为了世界图景中的部分存在。<sup>[491-92]</sup>在拉康将几何光学与透视法相联系的过程中,一个内在的维度,也就是凝视场域中的部分维度,一种与视觉完全无关的场域,以缺失的形式显现了出来。这也意味着视域驱力的轨迹是围绕着一种欠缺的欲望来运作的。欲望驱使着主体的“观看”,艺术的意义正是在于其作为一种满足主体的“观看”欲望的介质。拉康在提到霍尔拜因的《大使们》一图中时谈到,透过法国大使和官员们身上极尽奢华的衣饰和浮华的饰品,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倾斜的、漂浮的怪异之物,但无法识别那究竟是什么,它被那些装饰所遮蔽着。但当我们稍稍离开转身回望时会发现——那是一个死人的骷髅头。它被隐藏着,但也被呈现着。这个“骷髅头”利用视觉的几何维度来捕捉主体,是一种与欲望的明显关系。<sup>[492]</sup>在这里,遮蔽之功能类同于“眼睛”,正是由于“观看”行为的发生遮蔽着大他者的“凝视”。而欲望却正是以一种遮蔽的形式在捕捉着主体,使主体“陷落”其中。这种欲望的存在如同拉康与渔民一起出海打渔时漂浮在水面上的沙丁鱼罐头一样,如渔民所说:“你看到它了吗?你看见了吗?但它并不看你!”<sup>[495]</sup>欲望本身并不对主体显现,它模糊得像宝石所散发出的光点一样,也可以说它是屏幕上的“污点”。拉康认为,“在视觉关系中,主体在一种根本性的摇摆不定中悬挂于其上的幻想所依赖的这个对象就是凝视”<sup>[483]</sup>。所以,反过来也可以说凝视的运行机制掩藏了主体欲望之空洞所导致的自身同一性的溃散。

欲望在无意识的领域中,这注定了其作为一种无法言说、永远失落的存在。主体遭遇真实始终都只是一种错过的经历。主体在无法固定的转喻链条中流动回转,以一种“坚持”的品质始终寻找着意义所在。在将欲望与观看相联结的过程中,“通过引入驱力的循环机制,‘对象 $\alpha$ ’与被语言切割的身体结构联系在一起,成为驱力借以运转起来的‘部分对象’”<sup>[9]</sup>。驱力的回

转运作以一种拓扑学结构发生,驱力在语言维度上表现为能指的重复性现象,而能指的重复性线性运作具有一个“亏格”(无方向性表面)的代数拓扑学的表面结构,<sup>[10]276</sup>这个结构是无意识的结构,也是欲望的结构。以莫比乌斯带为例,不断翻转的正反面围绕着这个无法被约化的空洞,这个隐藏的分裂伸展出的驱力运动以三个结构性时刻完成了自身循环。以莫比乌斯带的轨迹来说,视界驱力回绕两圈回到了出发点,以部分驱力结构着主体。欲望是意识主体所不知的存在,主体无法把握自身,只能屈从于“随机性”之下,但这种“随机性”潜在地隐置着一种路径——重复强迫运动。重复强迫原则的概念可追溯到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对主体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发现主体对于原初性创伤情景具有一种无意识的“返回”行为。主体对于创伤性场景的固着使弗洛伊德认为主体的内在潜藏着一种寻求瓦解的力量,也就是生命对无状态的复归。拉康将这种复归趋向称为“死亡驱力”。拉康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中寻找到了象征网络之源头——法与罪。“禁止”行为的发生伴随着欲望的产生,对“法”的僭越在于能指突破意指链的企图,主体在能指链条中流转而朝向一种“陷落”,能指对于主体欲望的禁止已经带来了死亡的意义。所以,拉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每种驱力实质上都是死亡驱力”<sup>[11]719</sup>。在主体的辩证法中,主体在“他者”的欲望下“欲望”着的路径就是“驱力”。在欲望的引领下,主体通过“观看”和“凝视”的分裂来到了驱力运作中,在这种无意识的重复运动中寻找一种预先的、被回溯性建构起来的原初性“失去”。

在欲望的引领下,视界驱力作为主体追寻不可能之对象的替代性存在。主体的欲望实际上是“大他者”的欲望,是无意识的欲望,“不要屈从于自己的欲望”意味着不要屈从于“大他者”的欲望,驱力运作以“坚持”的信念使意义永远在横线之下滑行。“大他者”之欲望是主体不可能之遭遇,遭遇真实使主体永远在重复强迫原则的驱力运作中回转。视界驱力作为“部分”驱力填补着一种必然失落的“交集”,驯服着观看之欲望,以分裂主体的方式使主体自身避免“直视”欲望之真实——欲望之下空无一物。欲望在能指链上以转喻的方式前进,欲望主体同时也是能指主体,能指永恒地为另一能指代表自身,“由于把第一个能指带在身上,所以主体把没有之物作为可能性固着在身上”<sup>[12]118</sup>。能指主体的表征性已经同一地显现了主体的“空心人”本质,“S1,即第一个能指就是在主体丧失的瞬间为了填补其存在的空洞而在主体存在的场所产生的,代表被消除的主体的无的特权的能指”<sup>[12]119</sup>。在自我生成的过程中,象征、语言的侵入是欲望“人化”的阶段,也是主体欲望永恒化

的结构性时刻。拉康认为,对于婴儿来说,与母亲一体的欲望是本质性的,但从生下来的那一瞬间开始,这种一体性就注定成为一种原初性的创伤性场景,为了缓解这种母亲“不在场”的焦虑,婴儿就必然地给予自身一种替代性对象,所以,言语的存在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也就是“象征物首先是表现为物件的被扼杀,而这物件的死亡构成了主体中的欲望的永久化”<sup>[13]333</sup>。对物的谋杀作为一种“对象化”丧失在一种本体论意义上预设了主体“误认”的离心化后果。同时,对于人的欲望本质也在这一结构性时刻显现——“欲望出现在它具体化为语言的时刻、它与象征一同出现”<sup>[14]234</sup>。所以,欲望出现在象征的时刻,视界驱力结构主体的瞬间,主体就永恒地成为了一个空洞性的存在。

### 三、主体之“真”:视界驱力与欲望的分裂

对于欲望与驱力的关系,可以说,“欲望是单一且未分化的,而驱力则是欲望的部分表现”<sup>[2]90</sup>。拉康以黑格尔三一一体演绎的逻辑展开阐释欲望的辩证形式。欲望首先作为一种“纯有”的存在而对其进行具体化。驱力作为一种部分表现,从欲望中被分化出来维持着主体在象征界的言说。主体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只有借助于能指在象征界的重复强迫运动才得以表述自身,欲望的展开是欲望的辩证法。“拉康的主人能指概念继承了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思想,并将其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相结合,把人从欲望的主体转换为驱力的主体。从欲望到驱力的转换,是拉康对主体的视差之见。”<sup>[15]</sup>驱力与欲望的分裂具有一种视差性质。但这种性质是内在于对象中的,对象就是视差对象。黑格尔提出“凡是现实的必然是合理的”经典命题,现象反映着世界的内在理性、表现着本质。非本质与本质具有逻辑必然性意义上的同一,主、客体在现实意义上得到了“和解”。齐泽克认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对象自身内在地包含着视差之见,视觉差异并非仅仅在认识论之上,也在本体论意义上。拉康提出“主体的凝视总是在‘盲点’的掩护下,已经刻入那个被感知的客体。盲点‘处在客体之内,而非客体本身’。通过这个‘盲点’,客体把主体的凝视返还给主体”<sup>[16]26</sup>。这个“盲点”是主体所处但却无法看见的自身位置。在这个“盲点”的运作下,主体化和客体化的过程都得到了实现。人无法摆脱驱力,将自我视为现身于各种语境的经验实体。如果真的如此,可以说自我只是假象,但它是超验假象。<sup>[17]6</sup>欲望必然转化为驱力,只有在驱力的运作中,欲望主体才以结构自身的形式展现自己,以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超验假象”显现。拉

康所谓主体之“幻想”并非一种经验性的幻想,而是一种超越感官框架结构理解的“过剩”因素所支撑起来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建构性存在。

齐泽克认为,在欲望到驱力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同源性。康德在我们与“物”的差距中建构性地定义“实在”。<sup>[18]496-497</sup>对于由匮乏性本身指涉的欲望来说,驱力在这种被回溯性建构起来的与“物”的差距中实现自身,在一种类似于黑洞吸力所构成的轨道中否定性地完成自身。不在于追求不可能之物,而是在“弯曲路径中找到满足”<sup>[18]498</sup>。在这种欲望与驱力的内在转化之间所运行的机制在齐泽克看来是黑格尔否定辩证的动力所在。在欲望与驱力之间是无重复的目的论与无目的论重复的视差。对于欲望与驱力的转换,齐泽克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某人在试图抓住一个闪躲它的东西的过程中,突然从中获得了一种兴趣,开始与那个一直躲避他的东西嬉戏起来,这时,欲望就转向了驱力。<sup>[16]9-10</sup>实际上,欲望和视界驱力都指向的是同一客体,二者之差异是对象 $\alpha$ 在不同领域的显现。对于欲望的目的导向,可以说是双层意义上的,由在时间本体维度上的“失落原质”到在主体预期时间中到来的对象 $\alpha$ 所共同构建。<sup>[19]180-199</sup>欲望永远在导向目标的过程中以“不满足”为动力而超越己身。与欲望相比,驱力的设定是满足的,其在无限的循环中实现了自身。在二者满足目标的不同指向上,齐泽克对二者的区分作了一个前提性逻辑假设——匮乏与洞穴。匮乏在于空间意义上,而在洞穴的点位上空间秩序已经开始瓦解,一种“黑洞”般的存在。“欲望以构成性的匮乏为根基,驱力则围绕着洞穴旋转,围绕存在秩序中的缺口旋转。”<sup>[16]105</sup>在二者经验性的因果层面上来说(但并不仅限于此),欲望作为一种匮乏结构了驱力,驱力作为结构性效果以一种旋转模式,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扩张模式的时刻,达到了其自身。所以,在欲望的暂时性的意义凝定下,其作为主体空洞性的存在永远无法“缝合”主体的意义,只有在欲望分化自身转化为驱力的时刻,在将其“幻想化”为“凝视”的转喻性路径中才具有开启“无意识”主体化的可能性,但如齐泽克在对米勒界定小客体的批判中提到的那样,将关注转向“凝视”机制固然是一大进益,但仍是停留在了欲望的视域内,对于“无意识”“匮乏”“丧失”的关注并不是视界驱力运作的终点,无意识的疆域是无法把握的界限,直视其必然导致主体的崩溃。这种驱力的运动是直接制造“丧失”本身的存在。所以,固然主体作为一种空洞性存在,但在驱力的反复循环中,主体之“真”以一种“固执的”姿态出现。“当我们陷入这个封闭的、自我驱动的回环,即重复同一个

姿势并从中获得满足时,我们变成了‘人’。”<sup>[16]108</sup>相对于动物来说,人类内在地蕴含着驱力的维度,将人类提升到更高的层级设定下进行从属活动。驱力与欲望的分裂是主体之“真”的逻辑前提,也就是主体在视界场域内通过回溯性建构生成的必然结果。

劳拉·穆尔维实现了精神分析的政治性运用,将“无意识”的话语结构在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实践。<sup>[20]</sup>由“凝视”机制发出的对象 $\alpha$ 在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视界驱力运作中使女性成为了一种被结构的主体存在,成为了满足“大他者”“观看欲望的介质”。拉康将驱力的数学型解释为“主体在要求的切割中的消隐”或者是“驱力就是主体消失时产生的东西”<sup>[1]542</sup>。这里的主体指的是“无意识”的主体真相在“无意识”的无情碾压下,拉康语境中所有概念的同质性都被消解,“性别”“主体”“观看”等概念都被解离,同时这也使建制下的话语结构拥有了一种批判性的潜能。在拉康的四个话语论述中,主人话语由于历史性、结构性以及功能性的逻辑先在地处于论述的首位,<sup>[5]815-816</sup>紧接其后阐述的话语是大学话语。主人话语中占据“主导”位置,也就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主人 $S_1$ (一种隐喻)转向了知识 $S_2$ 占据“主导”位置的大学话语。但这种知识只是一种经过“伪装”的存在,其本质上仍与权力纠缠在一起。类同于福柯对于知识话语权力的揭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的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sup>[21]29</sup>。在拉康“不要向欲望让步”的号召下,在欲望分化为驱力的重复性坚持中,主体“幻想”存在已经掩盖了主体的真相,我们屈从于他者的结构运作中,在“凝视”机制运作下,主体已然成为被规训的存在。拉康认为,主体对自身同一性的认知需要将其置于“另一个场景”内才能发现主体之真相,对于眼睛和凝视的分裂以及欲望与视界驱力的分化实质上最终均指向了主体的分裂——无意识主体与陈述主体的分裂。也就是说,意识到主体实质上是一个为“大他者”构建的分裂主体,这正是主体的“真相”所在。

自古希腊以来,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提麦奥斯篇》中视觉作为“最有益的东西的源泉”到《形而上学》开篇中“益于视觉者为多”,视觉的静观性、距离性与持续性所带来的沉思意义都彰显了其核心地位。<sup>[11]2-7</sup>拉康对于视界驱力概念的提出,对于眼睛与凝视分裂的话语实践都指向着主体的身份认知问题。对于后现代语境下主体性的重新定位,拉康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以一种离心化的角度切入主体内部,以一种碎片化的语境、不可能的伦理向度重写着主体。在主体分裂的视域下,二元对立的现代思维以一种非对称的形式发展,对霸权

的反抗,对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的追求本质上需要一种复杂性批判思维来实现超越性转折。对“齐一化”概念的抵制,对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反抗是亟待深入思考的内容,以反抗强大的视觉话语建制性对笛卡尔以来的“确定”主体实现颠覆,对人类可能性的边缘力量开放是精神分析批判性分裂主体的“锚定点”所在。

拉康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发现中深耕,对整一性的主体概念予以倒置,而后在主体话语实践中进行重塑。在拉康对主体进行解构阐述的三界框架中,欲望的辩证法、对象 $\alpha$ 、驱力的运作是其理论的建构性材料。在逻辑时间上发展到视界驱力的原因——欲望,在凝视的维度上显现为闪躲之物,在其本质上表现为匮乏本身。对于欲望与驱力的分化指向主体的真相——分裂,在分裂的场域内,在悖论性的阐释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现拉康在话语实践中对于主体身份认知的回溯性重建。在离心化的主体意义下,对于既定的、已然的概念以及“大他者”压制性的捕捉力量有了新的批判发展的路径,对于主体自身身份认知亦拥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但具体的整合措施有待进一步阐释论述。

#### 参考文献:

- [1] 拉康,鲍德里亚,等,著.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M].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 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词典[M].李新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3] 张腾,刘振.对弗洛伊德“trieb”的误解及相关遗留问题的辨析[J].医学与哲学,2022,43(23).
- [4] LACAN J.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M]. Trans. by SHERIDAN A. London:Karnac Books, 2004.
- [5]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6] MORGAN D. *The Sacred Gaze: Religious Visual Cul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7] 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8] CHIESA L. *Subjectivity and Otherness: A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Lacan*[M]. London: MIT Press, 2007.
- [9] 吴琼.对象a:拉康的欲望诗学[J].哲学动态,2011(1).
- [10] 沈志中.永夜微光[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9.
- [11] LACAN J. *E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in English* [M]. Trans. by FINK B.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5.
- [12]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13] 拉康.拉康选集[M].诸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4] LACAN J.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M]. Trans. by TOMASELLI 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1.
- [15] 李西祥.论齐泽克的视差辩证法:康德、黑格尔与拉康的视差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2020, 57(4).
- [16] 齐泽克. 视差之见[M]. 季广茂,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 [17] KARATANI K, KOHISO S. *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 [M]. Trans. by KOHISO S. London: MIT Press, 2003.
- [18] ŽIŽEK S.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M]. London: Verso, 2012.
- [19] NEDOH B, ZEVNIK A. *Lacan and Deleuze: A Disjunctive Synthes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0] MULVEY L.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J]. Screen, 1975, 16(3).
- [21] 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城,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Analyz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can's Subject and the Scopic Drive

WANG Guohua, WANG Zhiruo

(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llege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120, China )

**Abstract:** According to Lacan, the subject is unconscious subject and desire subject.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eye and the gaze opens up the field of the unconscious, allowing the scopic drive to emerge and sustain the partial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The gaze of the “unconscious” serves as a mechanism for the subject to affirm its own operation, enabling the subject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enveloping itself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ompulsive repetition. The desire that the scopic drive aims for in its repetitive functioning is rooted in the lack of the subject's existence; fundamentally, the subject is an empty entit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 and the scopic drive, the drive achieves its own purpose by perpetuating a cycle of “loss”. In the repetitive stance of “not yielding to desire”, the subject discovers its own truth and thereby gains new possibilities for cognition with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Key words:** scopic drive; eyes; gaze; split subject; desire

( 上接第27页 )

### 参考文献:

- [1] 王成宇.《紫色》与艾丽斯·沃克的非洲中心主义[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4): 30-36.
- [2] WALKER A. *The Color of Purpl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 [3] WALKER A.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 Womanist Pros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 [4] 哈贝马斯.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M]. 沈清楷,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5] 杨波, 张辉. 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的互动关系探析[J]. 外语研究, 2024, 41(5): 52-59, 72.
- [6] 冯聪, 冯庆华. 汉英文学翻译中隐喻动词的使用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4, 56(3): 442-451, 481.
- [7] 胡江波, 郭棲庆. 亨利·詹姆斯《金碗》中的黄金隐喻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 39(4): 61-68.
- [8] 余薇. 后人类主义视域下黑人女性主体的“生成”研究[J]. 外语导刊, 2024, 47(3): 39-46, 159.
- [9] 薛慧莹. “艺格敷词”与女性凝视:《维莱特》中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J]. 外语导刊, 2024, 47(3): 47-54, 159.
- [10] 万星辰. 调解实践中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功能分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4(3): 40-54.
- [11] 刘希. 后结构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 以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妇女“主体性”为中心[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41(1): 177-188.

##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Purpl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SONG Liangliang

(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hu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efei 231201, China )

**Abstract:** As a cognitive mechanism of perceiving the world, conceptual metaphor is an important way of discourse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which helps to reveal the theme of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the novel of *Purple* focuses on the two central metaphors “life is a war” and “womanism is purpl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continuity of the novel. Under the male authority, the black women lack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sisterhood, and reconstruct their own subjectivity. Walker is commit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mmon fate of mankind, and the feminism advocated proposes a reasonable rescue path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sexes, which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topic of women.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Purpl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民主主体的分野与意涵

马艳玲

(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0)

**摘要:** 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中, 经历了以“感性、物欲的人”为代表的机械整体 (everyone) 到以“现实的人”为核心的有机整体 (all) 的认识过程。基于这两种“整体”及其关系的理论见解, 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对未来社会的民主形态进行了展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现实形态, 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足中国实际、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产物, 是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人民民主; 民主主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 现实实践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1-0041-0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现实形态, 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足中国实际、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产物, 是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要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 首先必须理解“民主”。要理解“民主”, 首先要理解“民”, 即民主的主体, 也就是所谓的“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的理解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人民被确定为历史的主体, 这一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民主叙事”的最深刻理论依据。因此, 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关于“人民主体”思想的民主意涵和核心关切, 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人民主体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样态与发展。

## 一、民主主体的“类”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两种整体性主体

关于历史的创造主体问题, 从古至今有神创造历史、人创造历史等众多论说。黑格尔认为历史是自由的进程, 是精神理性的自我发展、实现以至现实化的过程; 理性主义兴起之后, 费尔巴哈突出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性, 主张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应从“人”出发, 但这一观点在极大程度上脱离了实践范畴, 是基于“抽象的人”维度的主观唯心主义;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扬弃, 强调历史的创造主体经历了从“单一机械整体”到“具体有机整体”的流变, 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及生产力

的永续发展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互动交往决定的, 而这一流变过程则与“谁”参与民主过程息息相关, 因而为正确理解民主主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 以“感性、物欲的人”为代表的机械整体

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写作过程中筑就了自身研究视野从“抽象的个人”到“感性的具体的个人”的转变。为了克服伊壁鸠鲁自我意识的抽象性, 马克思指出, 人的“感官就是在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 正如抽象的理性就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那样”<sup>[1]</sup>。马克思意识到, 要从现实出发, 才能使表达个别的自我意识获得普遍的依据, 即“人应该在同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获得自由”<sup>[2]</sup>。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才能扬弃以前哲学对主体内在结构的抽象、片面的规定。在此, 马克思所表述的主体仍然是“单个个体”即“one”, 是感性的具体。这种主体缺乏实现的普遍性维度, 只是将主体从抽象的规定中剥离出来, 是自在的、被动的、静止的机械运动形式。因而, 以绝对化的“个人原子主体”为根据所理解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无质料的、空洞的“自由”, 必然会导致个人与共同体的内在分裂, 因而以此为主体的“民主”也一定是不复存在的。

在《神圣家族》中, 马克思通过改造法国唯物主义把主体规定为“利己主义的人”。他说: “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 (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连接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 而是利己主义的人。”<sup>[3][154]</sup> 把主体规定为“利

收稿日期: 2024-10-30

作者简介: 马艳玲 (2000—), 女, 山西怀仁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己主义的人”，就意味着“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而现实中核心的利益则是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物质利益。这种“利益”决定了人的思想，“‘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3]103</sup>。同时，这种利益也决定着现实活动的人的各个方面，它“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sup>[3]104</sup>。基于此，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经济）利益关系，就“人的类本质”所包含的社会性内涵作了深入探讨，揭示了此时的主体——利己主义的人，已经突破了“one”的局限，向着具有“现实的普遍性”——“社会性”的“everyone”进发。但这种普遍性仍然囿于“物质”范畴，强调具体的私有制利益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合理性，究其根本是一种历史断裂基础上的利益的简单、机械的叠加和堆砌，是被异化的、缺乏历史性的抽象观念。而在此种情境引导下的主体也囿于物质的高度依赖，是“不自由的民主”。

## （二）以“现实的人”为核心的有机整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彻底批判，指出历史的出发点是生活在现存社会中的现实的个人，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实现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从抽象的人到“现实历史”的人的转变，从而为民主理论的阐述提供了基本依据。

马克思以实践哲学的思维范式为根本遵循，对人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予以分析阐发，得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sup>[4]</sup>“历史不外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人的物质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统一运动并依次交替的过程”<sup>[5]51</sup>的结论。历史主体的发展与历史的变迁始终保持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促使主体同时具有有限性（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无限性（追求自在自为的理想状态的实现）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存在于社会才能生存，呈现为一种历时的绝对变化性，因而他的这些实践活动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这也决定了一定时期和社会环境中的主体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然而，这种“自由”并非臻于完善的自由，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有限的自由。另一方面，人作为主体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是呈现出与当下的社会物质条件相符的现实形态，表现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不断超越自由的有限规定性，使自身无限接近理想性存在、实现真正的自由的过程，即现实的、社会的、活生生的人。

马克思以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将自然、社

会和思维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正确阐明了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的关系——现实的人同时就是历史的人。一方面，历史是处于各种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历史是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sup>[5]124</sup>基于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而言，处于历史各个阶段的现实的人在持续变更的生产活动和生产环境下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在享有前人劳动成果的同时继续创造着各类生产资料，创造着独属自身的全新历史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人是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能动地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得以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都受到某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以及与该生产力阶段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sup>[6]</sup>。因而，任何现实的人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其在社会总体发展进程中总是受到历史运动所限定的物质条件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

总而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的有机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个体性的发展与社会普遍制度的延展始终是趋于一致的，每个现实的历史的人皆从属于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进程，必然要经历从“必然”到“自由”的历史性飞跃。现实的历史的人，将“one”的自然个性和“everyone”的社会普遍性，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揭示了人自在自为、全面发展的本质；将人的个体化的生存需求和社会化发展诉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人之为人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单个的人、物欲的人，而是现实历史与理想诉求统一的群体的存在，可将其称为“all”。因而，“现实的人”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民主体性”的历史前提，其既肯定了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又回答了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路径、条件等问题。

## 二、民主主体的唯物史观叙事：不同主体所表达的“民主”

从历史发展逻辑出发，马克思深刻洞察了人类从机械主体到有机主体的过程，破除了“感性依赖”和“物质奴役”的高度限制，在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规律和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将人民大众的本质力量熔铸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将“人民”（all）确立为历史的主体，使其真正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导者，深刻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民主”是人类主流政治文明的象征，是以“主体”和“统治”两词为主线的历史唯物

主义演进发展规律的具体研究。然而，“主体”“统治”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是极为不同的。基于此，马克思立足个体与整体的对立，深刻考察了封建专制的底层逻辑；立足机械整体和有机整体的对立，切实明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弊端所在；立足有机整体与机械整体的统一，对未来的民主形态予以了深刻展望，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解放与真正的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创新世界民主理论谱系、追寻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个人与整体的对立：马克思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直至19世纪，普鲁士资产阶级仍未完成对封建专制政治批判的历史任务，其经济上的软弱无力铸就了理论方面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高度限制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敏锐地看穿了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本质，将其与整个普鲁士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书报检查制度只是普鲁士封建专制的表现之一，现实指向是普鲁士政治社会对人的轻视，深刻揭露了普鲁士政府的虚伪本性，“专制政体的原则即为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sup>[7]</sup>。他们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利益，将一切专横和不讲理的现象归咎于个别的检察官身上，但究其事实，问题并不在于某个官员，而在于制度本身。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sup>[8]</sup>，深刻揭露了国王在法律层面的特殊地位和君主专制的突出特点（将国家权力视作个人权力，将君主个人视作国家的“最高的政治人格”）。基于此，马克思强调，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并不是同一主权的两个方面，而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观念，是“个人”与“整体”的对立。国王的地位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普鲁士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消灭封建的君主制，恢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真正的主体地位，追求民主的实现。而民主制并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强制力量，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人民主权”。

依循于此，将“君主个人”视作历史主体，这违背了历史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历史并非任意装扮的小姑娘，也并非个体的意志或行动所能单独塑造，而是客观的，有其自身的规律。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群体意识的变迁，是制度与社会的演化，是个体间共同性的“糅合”，而非单个人的思想。将君主个人视作历史主体的必然导向是“个人英雄史观”，历史就成为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是统治阶级享受的“专利”，是少数“精英”特权人物所拥有的“奢侈品”。因而，建立在这种历史主体上的民主只存在于“帝王”及“精英”的“狡黠”中，其本

质是“专制统治”。

#### （二）机械整体与有机整体的对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德国的解放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sup>[9]</sup>，将无产阶级视作是推翻一切阶级压迫实现“真正的民主制”的现实力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改造法国唯物主义把主体规定为“利己主义的人”，深刻地剖析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强制性的、抽象的机械论，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而言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其始终是狭隘的、残缺的、虚伪的民主，于富人而言是天堂，于穷人而言则是无尽的陷阱和骗局——是资产阶级为巩固私有财产而压迫无产阶级和众多劳动人民的手段，而不是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形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接续了《神圣家族》中批判机械论的进程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发展，以实践哲学的思维范式为根本遵循，通过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彻底批判，指出历史的出发点是生活在现存社会中的“现实的人”，强调现实的、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创造人类历史的伟大实践。

鉴于此，马克思对人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予以分析阐发，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予以了无情批判，极具现实性地指明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械形态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孕育的矛盾以及对人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的扭曲，即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后，其结果仍导向传统的“精英”治国，“民主”也最终沦落为一种只供富人、少数人享受的“虚假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机械整体）同全人类（有机整体）的对立，已经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必然面临着构建新形态的历史走向。

#### （三）有机整体与机械整体的统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民主形态的展望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sup>[5][89]</sup>人的全面发展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现实的个人”在时空中的接续发展，其生成的内生条件首先就是生产力的充分且蓬勃发展，即现实的人的活动在生产极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变化、丰富并最终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sup>[5][89]</sup>也正是基于这种基本情

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sup>[10]</sup>,个人能够在既定情形下突破他人、外物、民族以及地区等多种条件的限制,创造并衍生出广泛深入、普遍联结的社会交往新形式和新样态,塑造并形成自觉、自为、自主的多元个性——共产主义制度下有机整体与机械整体的统一。

“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sup>[11]</sup>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理想性主体与现实性主体在诉诸生产实践的有机过程中实现了统一。生产实践活动的状况决定主体所表现出的样态,并且为它超越这种样态提供了现实条件。不但如此,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还会否定现有的主体存在样态,使更高层次的主体付诸实践。这一点,无论是从理想性主体由自在形态到自为形态再到自在自为的形态的发展过程,还是从现实性主体由人的依赖形态到物的依赖形态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的历史演进,皆表明它们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并付诸实践的。依循于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基点,在革命斗争、利益争取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围绕民主力量、民主条件与民主实现途径对未来社会的民主形态进行了展望,主张切实发挥无产阶级力量,充分发挥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本质,消灭一切旧的社会形态,打碎资本主义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最终在社会主义有机实践中将人的价值倾向和价值目标作用于客体化的现实世界。

### 三、民主主体的实践阐发：当代中国“人民主体观”的样态与发展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以“人民主体”思想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打破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神话,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历史文化积淀,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基础上,依托于当代中国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融会贯通和民主主体的宪法巩固,并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践行发展着力建设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世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 (一) 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融会贯通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现代民主并非“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其中的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激烈争论可以追溯到民主理论中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的二元分野。规范性民主的主要关注点在

于民主的“应然”问题,强调民主的规范性价值和理想,主张民主应当体现人民主权、人民的自我统治等价值观念;经验性民主理论则侧重关注民主的“实然”问题,将民主视作一种程序化的制度安排,强调其在集体决策和国家治理中的工具属性,例如选举制度、政策制定过程等。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理论中的“经验性”与“规范性”往往交织共存,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关系在卢梭与熊彼特的理论中得到了典型体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明确指出政治权利应该归于人民,由人民来直接行使国家主权,但是因其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案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难以实现的障碍;而熊彼特的经验性民主则依据“人民的任务仅限于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sup>[12]</sup>观念,将民主视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和程序,提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熊彼特虽铸就了民主由价值取向到程序取向的变化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将价值从民主当中剥离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主程序与实质相割裂、相对立。依循于此,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应然”与“实然”的现实统一。

“中国式民主”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其价值理念和制度形态的逻辑起点在“人民”,统一发展在“人民”,切实保障“人民”利益。在人类现代化发展潮流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禀赋,以守正创新、开放包容之态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将中国式民主发展融入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宏大谱系之中,给出了民主道路探索的“中国答案”——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融会贯通、统一发展。其中,程序民主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针政策、流程规则等形式为实质民主的实现提供手段和途径,助力激发人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力量,具体体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制度和政策;实质民主则将人民的切实利益诉求作为程序民主的目标与价值引领,将较为抽象的民主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民主实践,助力其产生、发展和完善,具体体现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等。

#### (二) 民主主体的宪法巩固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价值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规范表达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理念,从理念和制度两个维度巩固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其一,宪法以确认、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为使命,对中国式民主

作出了系统性表述和根本性安排。具体而言，宪法所保障的民主高度区别于只有少数人享有主体地位的民主，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使人民主体地位在实施民主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皆得到展现，实现了“人民民主”原则的巩固和深化。其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项制度时，始终坚持赋权为民、用权在民。在此基础上，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因而，我们的民主不但是真正的民主，而且是最高层次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中“中国特色”这一所指，与宪法“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精神”高度吻合，它表明我们的宪法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具有“普适性”。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执政、强党兴国的根本底气。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民主事实法律化、制度化的基本形式，在巩固人民主体地位中发挥着根本保障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初心。”<sup>[13]</sup>人民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主体地位不是故步自封的，也并非他人恩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百余年的强党兴国奋进历程中拼搏而来的，是由宪法规定并通过宪法规制体现出来的。

###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深化

基于特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而言，“民主”即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其首先而且必然表现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基本制度（包括政治理念、价值原则、制度特征等诸多方面），是国家、政党力量组织领导下的人民发展与民主自由的互构共生问题。国家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为国家的根本政治秩序提供了制度支撑，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政党制度则内含着政治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等多重民主要素，其通过创新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保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为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提供了组织保障。在此过程中，人民、政党与国家之间彼此建构，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密切融入于中国政党政治运行的全过程，形成了完全区别于西式选举民主的独特政治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以至实现民主的创新之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其民主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基于横向国家间对比的分析视角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体中国人民在高度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孜孜以求，着力解构西式民主话语霸权、超越西方立法民主体系，追求民主、发展民主以至实现民主的创新之举。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了西式民主中“少数人的民主”的根本局限，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充分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超越了“间断式民主”的形式缺陷，强调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民主环节的全方位覆盖，充分保障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消除了西式国家政党博弈所带来的“虚假民主”和“功利民主”现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切实做到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充分实现国家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于纵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政治经验的提炼总结，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实践参与的方式来传递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具有调和社会生产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优势，是当代中国“人民主体观”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和实践证明，人民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民主的新发展、新创造。从制度层面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依托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依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现实实践，基于“人民民主”的底层逻辑积极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充分保障各主体在有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民主”的归位。从实践层面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政治参与范围、政治关系状况以及共同价值塑造等内容切实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建构过程中，使人民既能广泛参与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又能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彰显了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价值。

### 结语

人类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演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体思想的对立统一与革命实践的演进表明：人类对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唯有“人民”作为民主主体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厘清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民主主体的分野与意涵有

助于我们正确认知并阐发民主的主体理念和精神,破除长期以来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所带来的种种迷思,让“民主”回归现实、植根中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与挑战下,践行新时代“人民主体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守正创新,让人民主体观的创新表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践行与发展中焕发生机;必须维护人民群众最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将人民评价作为民主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为建设更加公平民主、繁荣多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必须将民主落实到人民的生存、生活与自主发展上,使民主治理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效能优势,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3.
- [2]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M].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3.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4] 肖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74.
- [7] 武高寿.境界与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13.
- [8] 朱传荣.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3
- [9] 张晋.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1.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 [11] 金哲.世界新学科总览[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487.
- [1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5-396.
- [13] 中国政府白皮书汇编(2021年):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74.

##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 Yanling

(College of Marxism,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issue of the creator of history, Marx and Engels, in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cognizing the mechanical whole (everyone) represented by “sensual, materialistic man” to the organic whole (all) centered on “real ma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insights of these two “who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Marx and Engels made a profound critique of feudal autocracy and capitalist democr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form of democracy in society. People's democracy in its entire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and realistic form of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essence,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which is based on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and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democratic ideas of Marxism, and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ory, history and reality.

**Key words:** people's democracy; democratic subject;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actual practice

# 论数据加工者的权利配置

## ——基于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

郑启福, 吴晨霖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 福州 350108)

**摘要:** 数据加工者是数据从产生到流通共享的重要媒介, 学界通过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新型财产权等对数据加工者权利进行配置的认识, 均存在一定不足。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在我国法律领域适用已久, 本质上是公共资源在人类社会分配过程中兼具公平与效率的方式, 应当以此对数据权利进行配置。依照投入劳动的不同, 将数据加工者权利二分, 以著作权及合同权利分别配置, 同时以自愿性登记作为权利的凭证。

**关键词:** 数据权利; 数据加工者权利; 劳动价值理论; 数据集合; 数据转化

**中图分类号:** 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1-0047-05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据已然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数据交易如火如荼。数据并非一经产生即可使用, 而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 其加工流程包括了付诸体力劳动的数据整合以及投入智力劳动的数据转化。数据流通的目的是获取数据计算价值、分析价值,<sup>[1]</sup>为了发挥数据的价值, 需要将大量数据整合起来进行分析和开发,<sup>[2]</sup>通过加工者的劳动付出, 数据方逐步出现规模化、体系化的特征, 形成数据集或者数据产品从而投入到社会化应用。可以说, 数据加工是挖掘数据潜能、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一环, 数据加工者作为数据加工处理主体, 对经其加工的数据应当具有相应的权利。

为促进数据更好地流通使用并保障数据加工者权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下称“数据二十条”)当中提出了“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构想,<sup>[1]</sup>并创设了“数据加工使用权”的概念。同时,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指出:“制定完善数据内容采集、加工、流通、应用等不同环节相关主体的权益保护规则”,<sup>[2]</sup>明确了对数据加工者相关权利进行保护的政策导向。数据是人类生产力水平跨越式提升后最

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 如何有效利用好数据为社会创造财富并稳步增强综合国力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向。<sup>[3]</sup>

然而, “数据加工者权”却尚未得到我国法律层面呼应。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 无论是在物权体系、债权体系还是知识产权体系中, 都未能有具体权利与“数据加工者权”适配, 甚至对于数据加工者权利的属性也存在争议。若无法及时明确数据加工者权, 势必会抑制对数据加工处理的热情, 最终阻碍我国数字化经济体系的全面构建。受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启发, 本文分析了将该理论应用于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的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价值溢出二分法为核心的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进路, 以期构建“数据加工者权”在法律层面的表达, 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落地实践。

### 一、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来源——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

#### (一) 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学说研究综述

目前, 学界对数据加工者的权利配置的主流观点包括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以及新型独立财产说。

物权说下, 其权利的边界与范围被明确界定, 对于数据加工产生的数据产品, 其流通规则更加接近传

收稿日期: 2024-10-27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的金融数据安全法律问题研究”(FJ2023B075)。

作者简介: 郑启福(1975—), 男, 福建仙游人,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金融法学、数据法学方面的研究。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国务院2022年12月19日发布。

②《“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国家数据局2023年12月31日发布。

统物权变动规则。<sup>[4]</sup>但是,将数据加工者权纳入物权体系与数据本身具有的非排他性特征相悖,过分强调私有产权权益会产生“反公地悲剧”<sup>[5]</sup>,赋予任何主体以排他支配权,只会加剧各角色之间的冲突。<sup>[6]</sup>债权说下,以采用合同的方式进行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足够高效且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但是,法律不直接划定数据加工者的权利边界,契约的灵活性在体现数据加工者及相关主体自由意志的同时,亦带来了数据加工者无法具备优先性权利的后果。知识产权说则认为数据的物理特征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均体现为非物质性)更为相通或接近<sup>[7]</sup>,因而大数据集合中的绝大部分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加以保护<sup>[8]</sup>,但是其忽略了数据整合这一体力劳动加工流程。有学者指出可以采用邻接权加以保护<sup>[9]</sup>,数据加工者却无法归类到现阶段邻接权的任何一类主体之中。新兴财产说则聚焦于数据流通的客体,吴汉东认为应对多重主体赋权,以数据获取和使用规则为重心;<sup>[10]</sup>时诚认为应将数据权利分解为数据生产关系、数据持有关系、数据流通关系、数据征用关系等四种形态,形成由“排他+治理”构成的数据权利配置;<sup>[11]</sup>陈兵认为可以采用“权利束”的模式对数据产权灵活划分。<sup>[12]</sup>

## (二) 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

劳动财产权学说来源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洛克认为人类付诸的劳动是世间私有财产权的原点,应以劳动赋予人类财产权。<sup>[13]162-163</sup>劳动之所以可以证成私有财产权,其基础便在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人格享有财产权”<sup>[14]</sup>。因而,劳动成为联结人类与公共资源的纽带,个人具有的价值通过劳动延伸至公共物品之中,使之成为个人可自由支配范围的一部分,这些私人化物品应被视为劳动的实体体现,人类通过劳动将某一物品置于自身可控制范围之内,物品的私有化就事实上完成了。紧接着,“谁占有谁私有”带来的后果是公共资源的急速衰减,“反公地悲剧”的趋势日益明显。洛克就此提出“留下足够好的东西为他人共有”<sup>[13]165</sup>,说明基数足够大的公共资源是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前提,不足量的资源带来的稀缺性无法满足足量同质物品的共有要求,个体之间的劳动赋权只能导致无休止的竞争。

马克思在继承洛克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财产权劳动理论进行了革命性改造。马克思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体系下的劳动就是社会劳动即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财产权的界限既包括“劳动”,亦包括“储存的东西不多于他能够使用的东西”

这一重要限度。<sup>[15]270</sup>同时财产权劳动理论应当具有时代特殊性,即“权利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16]435</sup>,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sup>[16]435</sup>,此时劳动赋予财产权显然已经无法适配于社会发展。从上述论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是迈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特殊理论产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新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各种劳动新形态,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仍是我们研究这些新现象所遵循的分析框架和参考标准。

不可否认,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能够给公共资源带来极大的流动性,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指出“对自然法感到恐惧的,不再是贪婪之徒,而是暴殄天物之徒”<sup>[17]242</sup>,人类的贪婪往往导致超出劳动赋权的限度而对公共资源无休止占有,因此,资源效率化配置是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的必要限制。区分合理劳动财产权与过度劳动财产权的关键界限在于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即劳动财产权所有者按照某种规则对其取得的财产进行充分利用,而非抱以阻碍他人利用之目的。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是公共资源在应用于人类社会过程当中,各个资源需求主体为了最大化扩大其能有效支配部分而提出利益配置理论,该理论在强调劳动的同时亦兼顾效率,成为了劳动主体视角下财产私有化的基石。

## (三) 以劳动界定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可行性

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是自然法体系中的基础哲学理论,其已然在法律上有所体现。早在数据财产权问题被广泛讨论之前,劳动理论就已经是正当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基础之一。<sup>[14]</sup>以民事法律领域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322条规定了“添附制度”,当加工者通过投入劳动而使得某物品的价值极大程度地提高,并远超出其本身具有的价值时,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该加工者能够凭借其投入的劳动取得该物品的所有权,这是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在我国民事法律领域的具体实践。应该注意到,我国民事法律并未将传统民法上的先占制度囊括其中,这是否意味着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在我国法律规范上不存在普遍适用性?笔者认为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第10条关于自然资源以及土地所有权归属的规定,阻却了体现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的先占制度在我国民事法律领域的直接适用,但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各地区野生动物保护举报救助奖励暂行办法等规定,构建了以政府机关

发放奖励取代物品所有权归属转移的模式,这一奖励正是对于其所付诸劳动的肯定,是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民事法律领域可行性的表现。

对于数据加工,数据整合体现了加工者的体力劳动过程,数据转化包含了加工者独有的智力劳动。虽然属性并不相同,数据加工者两种加工行为的核心却是一致的——劳动。数据加工者的劳动赋予了数据这一生产要素价值,并使得加工者可以对数据主张一定的财产性权利,这与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不谋而合。同时,数据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可复制性等特殊属性使得数据的体量极其庞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数据存在于互联网这一公共媒介中时,它是共有的;个人通过拨归将数据划为己用,数据的价值并未因此而减少,在加工处理后数据的潜在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对于数据这一资源而言,其价值总量反而上升,数据的财产化远远胜过了数据最初所保持的共有状态。同时,数据具有时效性,数据经加工处理以后时效不断进行更新,数据呈现出持续崭新的形态,持有数据的个人不曾毁坏可供他人使用的任何部分,数据不因个人拨归而腐坏,因而是个人勤劳所得,劳动赋数据财产权水到渠成。加之我国现行法律之中并未规定数据的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属性,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不存在高位阶立法的阻碍事由,其在我国数据财产权立法领域拥有极大的发挥空间。

## 二、数据加工者的权利配置进路

数据加工者的权利配置需要满足两个平衡——私人与公共平衡、稀缺与效用平衡。前者意指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需要结合数据的公共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不应当破坏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任排他性权利设置于数据之上,过度的私权化会带来严重的“反公地悲剧”,阻碍数据的流通与开发;同时过度强调数据的公共属性亦不合适,数据财产权设置最直接目的在于鼓励与促进数据加工者的开发利用行为,可以说,其权利具有一定的激励性质,而全盘强调公共属性必然带来私权利的弱化,在市场经济之下,加工者的热情会遭到限制。后者则指的是数据加工者权利配置应当尽可能克服“价值悖论”,在数据的稀缺性与数据的充分开发利用之间取得平衡,从巩固数据市场交易的目的而言,首先应当保持数据参与交易所必须的稀缺性,再对该稀缺性进行必要的限制,让数据能够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地提高其开发利用价值。

现阶段,其权利在通过传统的物权、债权或知识产权体系单一配置时,产生了顾此失彼的尴尬情形;新型独立财产权的配置方式对于数据权利配置而言确

为全新思路,但在这一视角之下,数据加工者权被直接纳入数据持有者权或纳入数据流通关系之中进行研究,这与“数据二十条”明确数据持有者权、加工使用权和产品经营权分置的基调相背离。将数据加工者权概括性地评价为其他相关权利,忽略了数据加工这一数据流通的关键程序,既无法体现出数据增值的过程,削减了数据产品定价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亦无法明确数据加工者投入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以后带来的权利之行使边界,不利于数据加工者行权。而相较于将数据权利独立形成新型财产权,基于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将数据权利化整为零,根据其内在属性的不同而纳入不同的现有权利配置体系之中,在取各体系之长而避开其弊端的同时,也为数据权利的配置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更加契合于数据权利配置需求迫切与规定存在空白的现状,下文将详细展开论述。

### (一) 权利配置的类型——对数据价值溢出的二分

数据价值溢出,指数据加工使用者投入体力或脑力劳动,对原始数据或数据集合进行处理、加工,使之形成新的数据集合或者数据产品,对这一新集合或产品相较于处理、加工使用前的数据所具有的额外价值。依据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数据价值溢出部分结合了数据加工者的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应当被视为数据加工者的财产而由其主张权利。两种不同劳动所带来的数据价值溢出存在较大区别。带来数据整合价值溢出部分的劳动内在凝结了人类社会最为基础简单的体力付出,外化体现为机械性重复行为。其不具有不可代替性,其他加工者实施相同的行为能够实现具有同样效果的数据整合。数据转化的过程则倾注了加工者大量的智力活动和体力劳动,每一个环节都经由数据加工者精心设计,具有独创性,其带来数据的价值溢出自然更多。不同劳动带来的价值溢出贡献不同,若予以相同方式或程度的保护显然不利于实施数据转化的加工者一方,应当将数据价值溢出部分一分为二,把数据整合产生的价值溢出与数据转化产生的数据价值溢出区分。

1. 数据转化者权。数据转化者主要通过智力劳动的投入,将原始数据或数据集合(数据资源)进行深度加工以后形成数据产品,此时,数据产品已然是加工者智力活动的客观外在表达。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3条将作品类型的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修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外延,数据产品以其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能够被视为数据加工者作品,转化者也就具备了作者的特质,本质上,这是对数据转化中所包含智力成果的保护。数据转化者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之规定,以作者的身份享有

对数据产品的发表、修改、署名等排他性权利，这是数据转化者权利配置最为直接的法律表达。

知识产品的产权化逻辑在于通过谨慎划定排他权的范围以最大化保护公共领域。<sup>[18]</sup>虽然数据产品的本质亦为数据，但是如同文字作品能够为作者支配而文字无法为任何人独占一般，数据产品的独创性并不意味着组成数据产品的最为基础的数据具备独创性，即《著作权法》所能保护的数据产品的最小单位是体现加工者独创性表达的数据集或数据单元，而这一最小单位包含的单个数据则属于《著作权法》排他性体系之外的具备公共物品属性的数据，不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若加工者对其具有体力劳动投入，则依照数据整合行为进行权利配置，否则基于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他人可以自由将其划归己用。

在此基础之上，数据较其他著作权客体而言更需要注意其流通属性，应当在以下 3 个方面对数据转化者权进行补充：其一，数据的存在与传播方式取决于其媒介，因此从数据转化者一方而言，其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向公众传播其成果，换言之，数据转化者可以发表或发行数据产品，亦可以通过广播或者信息网络传播其数据产品。根据权利一次用尽原则，发表、发行以及传播以后数据产品丧失其秘密性，数据需求者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第 24 条、25 条之规定使用数据产品。数据转化者不仅仅限于自然人，在追求转化效率目标的驱使之下，其往往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形式存在，数据需求者亦是如此，而《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一款之规定限于“个人”并不符合数据转化实践需要，笔者认为可以对《著作权法》第 24 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的个人主体进行适当扩张，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两大类主体纳入其中，便于数据更进一步地深入加工。其二，数据产品的作者行使或转让发行权时，若无特殊说明，默认一并授予公众或特定主体以改编权及汇编权，以此降低数据垄断风险，同时减少数据产品再加工的阻力。至于出租权，数据产品的本质是数据，数据的可复制性和非独占性导致数据出租与数据买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数据产品的作者并不享出租权。其三，数据转化者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的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其不能够对组成数据作品的任何数据部分皆主张以上 4 项权利，而仅限于数据作品中体现其智力成果的部分，即一个或多个最小保护单位。从便于实践的角度出发，该最小保护单位可以根据存储数据的基本单位字节（Byte）进行衡量，以能够体现数据转化者智力成果的最少字节量作为保护单位。

2. 数据整合者权。数据加工者实施数据整合行为，

投入了体力劳动而加工生成数据集合。相较于脑力劳动而言，体力劳动体现为加工者机械性行为的付出，法益保护性低于脑力活动，采用法定权利的配置方式在降低了数据流通效率的同时，还会导致私权利的快速扩张，诱发“公地悲剧”。此时，应当充分发挥债权所具有的任意创设性与平等相容性优势，将数据整合者权以债权配置，其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大部分依赖于双方的具体约定，同时遵循《民法典》当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权利配置中，数据整合者拥有的权利并非排他性权利，其应当遵循权利之相对性原则，不能够阻止其他加工者投入体力劳动提供相同或相似的数据整合加工服务。数据整合者可以在告知数据需求一方后将部分或全部的数据整合者权转移给他人，并且在不涉及人身专属性和特定身份性的情况下，针对数据整合者权当中的价金性质权利，双方订立的禁止转让之约定不能够对抗第三人，而其他的非价金性质权利禁止转让之约定亦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数据整合者权经由债权进行配置便于数据整合者设权与行权，价金性质权利的订立得以回报其投入的劳动付出，非价金性质权利的约定能够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对于促进数据整合者的劳动积极性起到正面作用；同时亦可促进数据流通，在避开了数据权属争议之问题的情况下，极大程度地便利了数据相关权利的流转，符合“数据二十条”所提倡的“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的导向。

就外观形式来说，宜采用书面合同方式进行数据整合者权利的配置，发挥意定权利的灵活性优势，至于具体采用哪一种合同，则根据数据交易双方的实际需求而确定。具体而言，数据整合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服务性质的行为，存在于加工者和需求者双方之间，数据整合者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向数据需求主体提供数据整合服务，而数据集合则是数据整合服务行为的结果。从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角度，服务加工行为的价值通过数据集合的价值进行具体的体现，二者在价值量上是等同的。数据整合者可以着眼于提供服务所付出的成本，与需求一方订立承揽合同，数据集合定作人既可以自己提供数据，也能够要求数据整合者依照其需求进行数据的整合，按照数据集合定作人的要求完成相应数据整合工作，在数据整合者需要向第三方收集相应数据时则通过订立委托合同的方式进行；其亦可以聚焦于数据加工后带来的溢出价值，利用格式条款向社会不特定的数据需求者订立批量化的数据集合供应合同，以实现数据整合者权利的合理配置。

#### （二）权利配置凭证——自愿性的登记

自愿性权利登记在保障了数据高效流通的同时，又可以保护数据加工使用者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

基于上述的价值溢出部分二分法,登记亦须分类讨论。

1. 数据转化行为产生数据产品的登记。数据转化行为投入了加工者独有的智力劳动,对于该部分的保护应当高于作为数据整合行为产生的数据集合。前述数据转化者权利应纳入《著作权法》进行配置,数据产品登记效力亦应参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著作权法》第12条:“作者等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认定的登记机构办理作品登记”,我国著作权的设立并不以登记为必要条件,《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曾考虑将登记作为著作权设立的要件,但最终还是采取了创作主义原则,无需登记,作者在作品产生之日起自动获得著作权保护。可以说,《著作权法》仅赋予了数据产品自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基础,自愿性登记的效力未有规定。对于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2024年公布了两批共计17个地方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北京、深圳等地的数据知识产权相关工作规定亦涉及数据登记,数据相关登记似乎迎来转机。但是目前而言,这一试点工作尚不成熟,无法立即投入满足需要,贸然将试点推广到全国容易造成数据知识产权领域的混乱。此时,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登记与新兴的数据登记制度接轨,相较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数据资产的登记更为成熟,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数据资产登记中心、海南省数据要素超市、贵阳数据交易所的成立皆为数据登记提供了有效渠道,因此,可以采取通过各地数据交易所与数据管理局等数据交易管理机构颁布相应数据登记、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其进行审核的方式以弥补知识产权领域有关数据登记的空缺。同时,应当参照特殊物权的登记对抗制度,引进数据产品的登记对抗制度,赋予数据产品的登记一定的排他性。数据转化者在数据产品登记以后,可以限制后来者对其数据产品的使用,并有权向该数据产品的使用者主张收益权。

2. 数据整合产生数据集合的登记。数据集合体现出数据加工者的体力劳动,登记行为针对的客体是数据集合而非其中单独数据。前文已述数据整合者在权利配置时可以注重于整合过程,亦可以侧重于产生的数据集合,若侧重于整合过程,则依据所订立的承揽合同、委托合同等不同类型的规定,可以确定数据集合的权属,而登记既可以顺延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得出的权属结论,赋予其公示外观的权利,亦可作为合同的补充,改变依据《民法典》得出的权属结论,赋予当事人双方以意思自治空间;若侧重于产生的数据集合,《民法典》第322条规定“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数据作为一种无体物,其发挥效用的关键在于流通,且数据具备复制性,将整合而成的数据集合同时赋权于数据需求者与数据整合加工者,可以最大限度兼顾双方的利益,二者可以就数据集合进行权利登记,本文仅论述数据整合加工者的登记行为。加工者就数据集合的权利登记是其体力劳动的法律代替,登记的目的应当设定为便于数据流通使用。权利登记赋予了数据加工者一定的消极保护力,可以以此对抗后来者主张已登记数据集合的使用权与收益权,以及数据集合当中某一数据来源方对其主张的收益权。反言之,该登记不具有排他性,即无法对同样投入了体力劳动的数据整合者主张数据集合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在其作为其他已登记数据集合的数据来源时亦无法向其主张收益权。

## 结语

作为数据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数据加工者权至今尚未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有效配置。法学界不同的数据权利分配学说亦使得数据加工者的权利配置变得更为困难。因此,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运用朴素自然法中劳动赋权原理,在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视角之下审视数据加工者权利,通过区分加工者投入劳动类型之不同,二分数据加工者权利。智力劳动价值更高,宜通过著作权这一法定权利体系进行配置;体力劳动价值较低但仍值得保护,宜通过合同方式由数据加工者与需求者依照契约自由设定,以此赋予数据加工行为以合法性基础,激发数据加工者的热情,提高数据加工效率,促进数据交易与流通,为我国数据交易流通体系与市场的构建奠定制度基础。

## 参考文献:

- [1] 冉高苒. 数据分享理论:数据法律基础概念的厘清与再造[J]. 东方法学, 2023(6): 56-63.
- [2] 李静萍. 数据资产核算研究[J]. 统计研究, 2020(11): 3-14.
- [3] 袁曾. 分配视角下的数据利用规则再造[J]. 东方法学, 2024(1): 38-46.
- [4] 姜程潇. 数据财产权动态限制取得体系构建[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89-96.
- [5] 周林彬. 数据权利配置的立法思路[J]. 人民论坛, 2021(15): 82-84.
- [6] 高富平. 论数据持有者权: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新范式[J]. 中外法学, 2023(2): 307-327.
- [7] 梁九业. 民法典体系下数据保护的配置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97-106.
- [8] 程啸. 企业数据权益论[J]. 中国海商法研究, 2024(1): 50-63.
- [9] 张素华.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法律实现[J]. 东方法学, (下转第63页)

# 集体的欢腾：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的 “心灵革命”（1949—1966）

袁博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村妇女进行了身份重塑，使之完成了从“家庭人”向“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在妇女解放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的心灵世界历经了一次革命洗礼，形成了“集体欢腾”。农村地区开展的识字扫盲运动，使妇女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使农村妇女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集体生产和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使她们逐渐构建了集体主义和爱国思想。通过这些活动，农村妇女不仅实现了身份的重大转变，也对国家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

**关键词：**集体欢腾；新中国；农村妇女；心灵革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1-0052-06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不仅自身获得解放，也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制度保障女性的平等地位和尊严。一系列国家运动尤其是农业集体化使原本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在社会角色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们的精神世界也得到充实和丰盈。

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论述宗教社会性等相关问题时提出了“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这一重要概念，即指人们在宗教仪式或狂欢中形成的强大的集体情感和无比兴奋的状态。在“欢腾”中，个人对集体产生了高度认同，开始进入真正的集体生活中。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地区普遍开展识字运动，使妇女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丰富多样的集体娱乐活动，使农村枯燥无味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集体生产和各种教育运动使她们逐渐树立了集体意识、爱国思想。可以说在集体化时代，农村妇女的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洗礼。虽然扫盲运动、剧团表演、田间劳动、政治会议等集体活动均与宗教无关，但却是具有仪式性的政治运动，是农村妇女走出家门融入公共空间的合理途

径，基本满足了农村妇女的“社会交往和精神需求”<sup>[1]</sup>，并使她们产生了精神上的愉悦与共鸣。本文以山东农村妇女的经历为例，记录、描述并剖析这种精神状态。

## 一、教育改造：文化素养的提升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教育中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农村人口中 90% 以上都是文盲，妇女文盲比例更是高达 95% 以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扫盲运动，使之成为继土改后又一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

### （一）知识的增长

在扫盲运动中，农村妇女既是被动的接受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在发动之初也遇到了一些阻碍，但动员起来的妇女大都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组织，同男性农民一样获得了学习机会。参加学习组织成为农村妇女寻求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

妇女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对妇女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各地形成了集中学习、分散学习，以及个别教学的包教保学和送学上门等丰富灵活的学习形式扫盲。为了不耽误生产，多数农村

**收稿日期：**2024-08-1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水文化建设的实践与经验研究”（22DDJJ01）；2024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精神生活研究（1949—1966）”（2024DZZS031）；德州学院人才引进项目“建国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研究（1949—1978）”（2020xjrc225）。

**作者简介：**袁博（1989—），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史与妇女史研究。

地区采取集中上课和分散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其中，识字班（组）是最普遍且较集中的学习组织形式，成员多是未婚的妇女和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妇女（直到今天，在鲁中和鲁东南沿海一带的方言中，人们仍旧把年轻妇女叫“识字班”）。例如在莘县张鲁乡刘庄村，冬季和初春采用集中上课、班级教学的形式；一般农忙时采用集体上课、分散复习的形式；在突击性的农忙时，又改为小组教学，把课堂搬到田间，利用生产休息时间学习；对个别不能参加集体学习的干部和孩子过多的壮年妇女，采用“亲教亲，邻教邻”、学生包教家人的方式进行包教保学。<sup>[2]</sup>这种固定与灵活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既保证了妇女学习时间，又符合妇女的特点，适应了生产和生活实际。

但受传统思想和现实生活的限制，识字班中的妇女们尤其是已婚青壮年妇女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较多。她们参加学习往往要过“五关”——个人思想关、公婆关、丈夫关、家务关、孩子关。为此，各地进行政策调整，设法帮助妇女解决实际困难。如很多地区动员年纪大的妇女组成托儿小组，并配备幼儿教师，专门帮助识字班的妇女看孩子。<sup>[3]</sup>但这也使那些帮忙照看孩子的妇女被排除在扫盲运动之外。当然，她们即使不看孩子，也可能会因年龄、认知水平等问题而不能有效参加扫盲。这说明，扫盲运动中妇女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年龄分层。

经过宣传和动员，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加入到扫盲大军中。一方面，妇女的学习情绪不断高涨，甚至在处理家务、干农活时也不忘学习。如济南西红庙村赵淑兰烧火、吃饭的时间都看书学习。<sup>[4]</sup>临沂市（今临沂市）高都乡中坦村的青年妇女尚兰英在纳鞋底、做饭时经常一边做活，一边教丈夫识字。<sup>[5]</sup>不少青年妇女下地干活时也带着石灰块，休息时就写，在地边、山坡画满了字迹。另一方面，通过学习，不少妇女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如莱芜县（今济南市莱芜区）鲁西村妇女经过识字班一年的训练，一般都能默写200个左右生字。这样的成绩在午校、夜校的青年妇女中亦较为普遍。<sup>[6]</sup>济南郊区西红庙村的张翠兰过去只认识10个字，学习后能认到2298个字。胶州胶县（即今青岛胶州市）某村一字不识的王玉珍学习后能认识2000字，会写200字左右的文章和总结。<sup>[7]</sup>总体来看，扫盲运动为农村妇女的解放和争取平等奠定了文化基础。

## （二）心灵的洗礼

扫盲运动除了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接受了知识，脱掉了“文盲”帽子，还使她们的心灵受到了洗礼。

而后者的影响更具深远意义。

参加集体学习让农村妇女获得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拥有了新的体验。这一点我们无法在文字档案中找到证据，但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不少受访者都提到了。“上课还挺有意思，男的女的坐在一起认字、看书本，老师在前头念，他念一句俺们学一句，有时老师还提问，俺们不认识，念错了底下的人就哈哈大笑。”<sup>①</sup>在农村妇女的回忆中，扫盲运动给她们带来的是新鲜感和精神振奋，她们很享受识字班带来的快乐，这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妇女积极参加扫盲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席卷全国的扫盲运动不仅是一场旨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运动，更是一场清除农民的落后思想，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认同感的政治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在组织妇女学习时，专门开设了政治班、政治课。政策要求“在冬学期间保证进行15至20次政治课（冬学、民校每5天或7天一次政治课，在中心任务紧迫时，在一定时候可酌情增加政治课时间）”<sup>[8]</sup>。山东各地民校大都执行了一周一次政治课的制度，并结合中心工作，由乡、社干部担任民校政治教师，给学员上政治课。民校逐渐成为动员群众、推动生产、政治教育的有力阵地。临沭县八区夏庄街东北村的李文荣学习后，政治觉悟提高，不但积极动员大家坚持将冬学转为长年民校，并经常教育大家说：“妇女想得到彻底解放，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将来学会使拖拉机耕地，必须识字，不识字就学不会，文化浅就学得慢，在新社会里，打茬户没有技术就吃不开。”<sup>[9]</sup>在学习班，许多妇女对国家政策有了深刻了解，对新政权也更加认可。潍县（今潍坊市）五区东贾庄的妇女通过参加识字班，认识到幸福生活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积极争取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sup>[10]</sup>可以说，扫盲运动在塑造农村妇女集体意识、国家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文娱活动：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传统农村社会，妇女的活动范围囿于婆家和娘家所在的村落，一般只能在庙会期间与外界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如演戏、唱歌、扭秧歌等得到发扬，广播、幻灯片、电影等新娱乐方式也渐渐走进农村，“社社锣鼓巷，处处歌声扬”成为集体化时期农村娱乐生活的写照。这些文娱活动不仅使妇女在公共场合的存在正当化了，而且将国家政策带到了农村。

<sup>①</sup> 据笔者2017年12月3日，在山东省武城县袁厂村对苏XX的访谈。

### （一）传统文娱活动的新感受

农村的文娱活动通常带有季节性，大都在节日和农闲时间开展。春节作为最隆重的节日，期间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在山东，各种民间杂耍、技艺，如胶州专区的地秧歌、德州专区的手鼓舞、惠民专区的打落子、菏泽专区的唢呐、掖县（今莱州市）农村妇女的挽水号子以及跑驴、旱船、舞狮子等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后，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不少妇女在表演活动中担任了演员、后勤保障等重要角色。如1955年春节，济南市郊二区马家庄的青年妇女们积极参与排演各种剧目和歌曲，高校毕业生李永芳不但把自己的剧词记住了，还帮助别人抄写剧词、练习表演；60多岁的魏莲英老大娘也忙着挨家给演员们借衣服、道具，排演时烧开水，收拾东西。<sup>[11]</sup>农村妇女俨然成为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组织者。

日常文娱活动也为农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成群结队的妇女们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如广饶县三柳树村生产队在农忙时有两次休息时间，第一次休息时大家读报或者看通俗小册子，第二次休息时，妇女们便在组长带领下，在地头上跳舞，“身上累啦，跳跳舞，精神一痛快，比歇息还管用，男的看了，心里一高兴，也就忘了累”<sup>[12]</sup>。1965年，齐河县孙耿公社（今济南市济阳区孙耿街道）崔许大队的妇女们每天晚上都到民校学习文娱节目，学唱《李双双之歌》等歌曲，每天上工和下工时，村子周围就会响起妇女们愉快的歌声。<sup>[13]</sup>这些新式歌曲歌唱妇女解放和全新生活，起到了政策宣传和民众教育的双重作用。日常娱乐活动既使繁重的劳动负担和身体劳累得到缓解，又使农村妇女了解了时代的变迁。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一些条件较好的高级农业社办起了农村俱乐部、文化站等，负责组织戏剧、歌唱、舞蹈、读书、体育、技术讲座等活动。如在即墨县（今即墨市），共产主义农业社的社员们利用劳动空隙和休息时间，开展了各种文娱体育活动，这些活动吸引着年轻的姑娘<sup>[14]</sup>，将办公室办成了临时的“俱乐部”，桌子变成棋手们的“战场”。曾生活在烟台栖霞伟乔村的刘某就是村俱乐部成员，采访时她很激动地说：“俺们村那时候就有俱乐部，三间大房子，一间房子用来对台本，里面有几张桌子，外面的两间是表演的地方。我在俱乐部唱了三年吕剧，从1956年冬天到1959年底。那时候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去俱

乐部，村里其他人也爱去，没有节目的时候就看我们排练。我爱唱，白天在山上干活休息的时候俺也拿出歌词本唱，练习练习，我觉得那时候天天都可高兴了。”<sup>①</sup>通过采访时老人表现出的神态和语调，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农村俱乐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更重要的是，在俱乐部里她找到了自信，获得了自我价值。这何尝不是文化娱乐活动给她们的精神世界带去的全新体验。

### （二）新式娱乐活动的新体验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加强在基层社会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改造，国家将先进的放映技术和设备投入到广大农村地区，露天电影院、电影放映队等纷纷开办建立。借此，农民既接触到了现代化的工业技术成果，又了解了国家政策和进步思想。作为国家主导的宣传媒介，现代化的电影既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要，又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文化素质。这一时期，《李双双》《刘巧儿》《槐树庄》《红色宣传员》《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等热门影片对宣传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精神，提高农村观众的政治意识起到了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

在笔者的走访中，当提及露天电影时，访谈对象都难掩激动和喜悦。作为农村夜间无聊生活的补充，电影给村民们带去了欢乐。对农村妇女而言，同样是一种耳目一新的经历。“看电影是干完一天农活之后最期待的趣事。”她们不仅可以看故事、开眼界，还能和邻居、朋友交谈聊天。“以前从没看过一次电影，有了电影队之后就把电影送上门来啦，可开了眼界啦！”<sup>②</sup>“放电影前是最热闹的。大家伙晚上吃完饭就早早去队上等着，你看吧，男人、娘们、孩子一大群，都可高兴了，电影一放完就呼啦全散了。”<sup>③</sup>虽然在妇女们看来，电影是一种全新的娱乐消遣方式，但她们也在无形中接受了电影中蕴含的革命话语、国家形象和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加强国家对乡村的权力渗透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幻灯放映作为电影放映的辅助形式而存在，人们经常把它称为“土电影”。之所以“土”，“除了说明它技术还不如‘洋’电影成熟，还标识出官方生产与本地创作之分”<sup>[15]</sup>。多数情况下，幻灯片由放映员将编成的故事、歌谣、顺口溜等写在玻璃片上，或将人物、故事情节在玻璃片上绘制出来，放映员一边播放，一

① 据笔者2019年1月16日，在山东省武城县对刘XX的访谈。

② 据笔者2018年6月10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冷水沟村对蔡XX的访谈。

③ 据笔者2017年12月3日，在山东省武城县袁厂村对苏XX的访谈。

边讲解，其中讲述最多的是模范人物的事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各地的幻灯片上出现了许多以当地妇女劳模为原型的劳动妇女形象。这些妇女形象为受众所熟知，使受众感到亲切的同时，对国家也产生了认同。

总之，农村开展的这些文娱活动获得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热情参与，尤其把农村妇女纳入了政治生活之中，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新气象。一般看来，妇女的积极性比男性要高些，一些女青年反映：“又劳动、又娱乐，天天真快活。”<sup>[16]</sup>虽然这些集体文娱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宣传色彩，但从妇女们的反映看，她们从中获得了新鲜感和充实感，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使人们集合在特定地点，借助一定的活动和仪式，激发了农村妇女的内心情感，促使她们形成了集体意识、体验到了集体生活的愉悦。

### 三、集体劳动：集体意识的构建

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的重大举措，是对传统小农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广大农村妇女成为动员的对象和参与的主体，被纳入公共空间之中。她们的精神世界亦得到极大丰富，产生了“集体欢腾”式的愉悦感和充实感，并在国家的引导和教育下，形成了集体意识。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妇女不仅要参加集体劳动，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扫盲班和其他娱乐活动，可以说集体生活使她们的身心逐渐突破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她们明显感受到自己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变化、个人尊严的提升、个人价值的实现，迄今她们仍时常回忆起那段虽艰难困苦却也能苦中作乐的日子。

当笔者向采访对象询问对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印象时，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下地干活。当问及劳动过程是怎样一种体验时，她们不时表现出兴奋和喜悦。“那时候出工敲锣，锣一响，大家就纷纷从自家出来往地里赶，成群结队地拉着呱，不一会就到地了。”<sup>①</sup>“一起劳动可热闹了，俺们经常说说笑笑，有时还互相扯皮，逗个乐子。”<sup>②</sup>日照东村的赵玉妻子在回忆自己去高旺庄炼钢铁的经历时，充满留恋，对她来说，虽然在那里与男民工一起干砸石头、送石头、抬

大筐等重活累活，但吃集体食堂、休息时不唱歌就开会。她把那段时间称为“自由的三年”<sup>[17]</sup>，这段激情岁月给她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传奇色彩。

农村妇女们的欢腾不仅体现在集体劳动中的氛围上，还体现在她们超乎寻常的干劲和热情上。郭于华从4个方面对这一表现做了阐释：宗教中的“集体欢腾”、“大同”的思想、“先苦后甜”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sup>[18]</sup>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妇女心理方面的因素和物质刺激的影响。首先，从心理因素看，许多妇女冲破父母、婆婆或丈夫的反对外出，为了证明自己，她们积极参加生产，掌握耕作技术，获得了较大的心理满足。其次，在物质刺激方面，许多妇女在参加劳动生产后获得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在国家宣传话语中，“能干”成为衡量妇女进步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妇女劳动模范获得的荣誉和嘉奖，使妇女们也认同了参加集体生产是获得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又产生了“解放”的感觉，最终将其化为参加生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集体化生产中。

集体化时期，各种会议随处可见。这是国家发布政策、改造农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妇女们消磨时光的体面场所。“那时候的会天天开，在地头上开，也到大队空地上开，有些人手里拿着针线活，边开会边干活。”<sup>③</sup>“夏天天长，白天干完地里的活，吃完晚饭就听见大喇叭招呼，让去场院开会，合作化刚开始那会基本上天天开，学技术、学文化、交公粮、征兵入伍，人民公社以后也是这样。俺们妇女就带着孩子，拿着簸箕（放针线的盒子）去，会后俺们都在那里玩一会儿。”<sup>④</sup>这些会议不仅提高了农村妇女的政治觉悟和认知水平，使其卷入到各项国家运动中，同时也拓宽了她们的社交范围。对她们来说，会议的内容不一定全部理解，或许过后也记不清楚，但与同村人之间的交谈和沟通却使她们产生一种欢腾的感受，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充实感和满足感。因此，开会为她们的“欢腾”提供了机会，而场院、田间地头则成为她们“欢腾”的公共空间。

总之，集体生活为农村妇女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所和理由。在集体化过程中，农村妇女从家庭空间走向集体空间，从家庭劳动者变为集体劳动者，她们在付出更多辛劳的同时，获得了更大的社交范围，在劳动、交流中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状态，精神世界得到了充实。

① 据笔者2016年9月4日，在山东省夏津县小李庄村对李XX的访谈。

② 据笔者2017年12月3日，在山东省武城县袁厂村对苏XX的访谈。

③ 据笔者2017年12月29日，在山东省武城县袁厂村对苏XX的访谈。

④ 据笔者2017年2月23日，在山东省武城县大王庄村对王XX的访谈。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作为文化符号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不仅实现了生产的组织化，也使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从而产生了对集体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中，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及社会教育的开展，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因此，村民在集体劳动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观念，集体意识被建构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集体意识比男性更为突出，可称之为“心灵的集体化”<sup>[18]</sup>。其实，农村妇女是一个矛盾性很强的群体，她们既保留有大量的传统思想观念，同时又因深受压迫而极具反抗性。她们被带入集体社会后，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引导，其先进性和革命性被激发出来，心灵受到冲击和洗礼，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

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府的认同。随着政策宣传的深入、妇女工作的开展以及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妇女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感增强，并模糊而又准确地称之为“上面”。妇女党员、干部，普通农妇等在经过学习和改造后，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共产党让农民彻底翻了身，应该大力支持新政府。随着集体化运动的步步深化，广大农村妇女体会到了解放的意义，并将之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如胶州专区王格庄的妇女们在参加了集体生产之后，一致认为“若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咱妇女在旧社会再劳动，累死也没人看见”<sup>[19]</sup>。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劳动中，各地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但妇女们并没有因此抱怨国家和政府，一些人依然相信她们和男人是平等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她们所理解的“平等”是政治领域的平等，她们因参加劳动走出了家庭的困囿，提高了家庭和社会地位。传统性别角色的改变是农村妇女认同中共政权、依赖国家权力的重要依据。

其次，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1951年的抗美援朝是广大农村妇女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契机。通过教育，许多农村妇女深入了解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就是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军支前和积极卖粮、交粮等。如据昆崙（现已并入威海市文登县）、牟平、乳山三个县统计，参军队伍中母送子的有1352人，妻送夫的752人，姊妹送兄弟的321人。一些农村妇女在受到教育后，主动订立爱国公约，用实际行动支持保家卫国。莘县裕民村有一妇女在爱国公约中加入“爱国就是祖国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国家需要时保证动员丈夫参军，今年共种棉

五亩，保证增产捐献棉花100斤”<sup>[20]</sup>。经过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农村妇女较明确地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敌斗争观念，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深化了对“国”和“家”的认识。

最后，集体主义观念的树立。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动发展，农民群众聚集在各种各样的集体生产组织、生活组织和政治组织中。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不仅和男性村民一起生活在大集体中，还有了自己的团体组织，社交范围的扩大使集体主义观念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妇女的集体主义思想主要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的。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使妇女们逐渐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和“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农村妇女的集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动走集体化道路，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爱护集体财产等行上。

与男性相比，女性集体意识的建构更为突出和深刻，她们把自己与其他农村妇女看成一个共同体，在一起经历一场巨大变革。在妇女解放的时代大背景下，集体化生产将农村妇女从愚昧压制状态下解救出来，在走出家门参加集体活动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性别角色定位，进入到公共领域，与男性农民一样参加田间劳作、学习，参加各种会议和娱乐活动，不再拘泥于家庭之中，在获得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同时，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和满足。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如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动员参加生产劳动、鼓励参与政治生活等对农村妇女进行身份重塑，使之完成了从“家庭人”向“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极大地推动了她们的解放进程。而农村妇女的思想集体化可以说是她们转变为“社会人”的结果与证明。日常生活经历所造成的心灵体验必然影响个人的精神状态。<sup>[21]</sup>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国家运动逐渐改变了农村妇女的传统性别角色。在扫盲运动中，农村妇女不仅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集体化时期农村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吸引农村妇女在闲暇时走出家门，加入到集体生活中，她们在公共场所的合法身份得到肯定。生产、扫盲、剧团、开会等都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的公共空间，给她们带来新鲜感、愉悦感和充实感。伴随着一系列集体运动的开展与深入，农村妇女们的心灵经历了一场革命，形成了集体意识。思想上的“集体欢腾”即思想的集体化，表明农村妇女社会身份的最终确立。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获得了振奋和欢愉的体验，产生了“解放”的想象，进而对国家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

## 参考文献：

- [1] 马维强. 双口村：集体化时代的身份、地位与乡村日常生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
- [2] 刘庄提前十年成为无盲村(1958年3月1日)[A]. 济南：山东省档案馆，档号A029-02-0638-005.
- [3] 孩子有人照应，妈妈学习安心(1959年3月20日)[A]. 济南：山东省档案馆，档号A029-02-0644-002.
- [4] 速成识字法实验点工作报告(1952年9月5日)[A]. 济南：山东省档案馆，档号A005-01-0019-009.
- [5] 关于临沂县高都乡中坦村组织妇女参加学习文化情况报告(1956年2月6日)[A]. 临沂：临沂市档案馆，档号0020-02-0007-002.
- [6] 吴微秋，潘岳. 山东冬学运动情况[N]. 大众日报，1950-03-30.
- [7] 关于发动妇女参加速成识字班学习经验的初步总结(1952年1月15日)[A]. 济南：山东省档案馆，档号A005-01-0019-015.
- [8] 山东省人民政府1954年冬学工作指示[N]. 大众日报，1954-11-16.
- [9] 冬学运动工作运动总结报告(1952年5月15日)[A]. 临沂：临沂市档案馆，档号0020-01-0002-009.
- [10] 传鸿儒. 东贾庄妇女识字班办得好[N]. 大众日报，1953-09-12.
- [11] 阎一强. 马家庄春节文娱活动的打算[N]. 大众日报，1955-01-16.
- [12] 申均之. 介绍三柳树村的田间文娱活动[N]. 大众日报，1953-06-12.
- [13] 齐河县孙耿公社崔许大队妇女工作总结(1965年5月6日)[A]. 德州：德州市档案馆，档号0017-002-049-003.
- [14] 社员们的文娱活动[N]. 大众日报，1957-04-22.
- [15] 郭燕平. 农村性别观的现代性改造：以20世纪50年代陕西地区的流动放映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2016(6).
- [16] 重视开展农村中的文化娱乐活动[N]. 大众日报，1954-12-25.
- [17] 郑卫东. 东村往事：1930—197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8.
- [18] 郭于华. 心灵的集体化：陕西骊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 中国社会科学，2003(4).
- [19] 1951、1952年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基本总结(1952年12月20日)[A]. 济南：山东省档案馆，档号A005-01-0019-006.
- [20] 1951年山东妇女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12月26日)[A]. 济南：山东省档案馆，档号A005-01-008-001.
- [21] 姜朝晖. 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239.

##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Rural Women's "Spiritual Revolu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1949—1966)

Yuan bo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tate reshaped the identity of rural women. Rural women ha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amily person” to “social person” and “national pers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 spirit of rural women had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which we can call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 literacy campaign had improved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women. A variety of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made the dull spare time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colorfu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production and various educational movements, they gradually formed collectivism and patriotic thoughts. These changes had given them a strong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dentity with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rural women ; spiritual revolution

# 伏流：顾颉刚社会党经历与其古史理论的发轫

张子帆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

**摘要:**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的“层累造成说”和“四个打破”是“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核心古史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不仅受到了各种学理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了包括顾颉刚的个人情感、人生经历等非学理因素的影响。其中,顾颉刚在中学期间加入中国社会党的经历,就是促成其古史理论形成的非学理因素之一。一方面,顾颉刚通过对这段经历的反思,认识到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层累”的过程,从而促成了其“层累造成说”的形成;另一方面,这段经历带给顾颉刚的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长期存在,从而影响了其“四个打破”的形成。经过这一人生经历向学术研究的“转喻”,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理论基本形成。

**关键词:** 顾颉刚; 中国社会党; “层累造成说”; “四个打破”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58-06

20世纪20年代是顾颉刚古史理论发轫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顾颉刚先后提出了“层累造成说”与“四个打破”,建构了“古史辨”运动疑古辨伪的一系列核心理论预设,成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以古史理论为指导,顾颉刚又提出了一系列极富破坏性的古史命题,不仅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上古帝王系谱,而且还撼动了儒家经书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刷新了时人对于古史的理解与认知。在《自序》中,顾氏对促使自己古史理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自我剖析,认为自己古史理论的形成,上可追溯到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姚际恒、崔述,下则是受了康有为、胡适等人的影响。此后,学界多沿这一理路,侧重分析“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各种学理因素。

诚然,倘若要追溯作为“古史辨”运动核心理论的“层累造成说”与“四个打破”的来源,学理因素是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此乃学术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使然。但“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sup>[1]25</sup>,史学家的个人性格、生活经历等非学理因素也会对其史学活动产生“过化存神”般的影响。这就是说,顾颉刚青少年时期“像火一般旺烈,像浪一般激涌”的性格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亦对其古史理论的形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历史当事者的顾颉刚毫不讳言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在《自序》中,顾氏就认为促成自己古史理论形成的“伏流”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sup>[2]3</sup>具体说来,自己幼年时听祖母讲故

事的经历使自己“发生了历史的意味”“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让自己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才有”。<sup>[2]4</sup>对戏曲的热爱则使他“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意识到“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在当时有没有这件事,我们已经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这件事是如此的纷歧的”。<sup>[2]12</sup>总之,顾颉刚认为这两段人生经历,同各学理因素一样,都是促成自己古史理论形成的重要原因。顾颉刚还在《自序》中回忆了自己在中学期间加入中国社会党的事件始末与心路历程,并将这一段经历视为“乱掷的光阴”。尽管顾氏耗费笔墨回顾这段经历,但所表露出来的大多是对自己年少无知的懊悔与自责,认为这段经历只给自己带来了“对于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认识”,并未对日后自己古史理论的形成发挥作用。毕竟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通过考察顾氏在中国社会党内的政治活动与政治主张,以及脱离社会党后的自我反思,不难看出这一经历事实上对其古史理论的形成产生了一种吊诡的影响。

## 一、乱掷的光阴：顾颉刚与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江亢虎提出了“融合种界”“破除世袭财产制度”等8条政纲。<sup>[3]</sup>中国社会党虽宣扬“鼓吹、破坏、建设”三大纲领,实际上以“实行铲锄强权,预备世界大革命”的

收稿日期: 2024-07-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史通史》”(17ZDA196)。

作者简介: 张子帆(2001—),男,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破坏思想为核心宗旨，主张彻底破坏现有的各项社会制度。<sup>[4]186</sup> 社会党甫一成立，就以其极富煽动性的主张和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年12月，江亢虎携党员陈翼龙、詹天雁赴苏州，召开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成立大会，吸引了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大批青少年前往听讲。据顾颉刚的好友叶圣陶回忆，江亢虎在会上“述社会主义之进行方法”，宣扬“破除一切世袭、遗产之制度”，以实现“绝对的平等，绝对的自由方达”。<sup>[5]65</sup> 顾颉刚对社会党的主张深以为然，于是立即报名入党，从此开始了他一年多的社会党党内生涯。

顾颉刚被社会党的主张所吸引，与他在辛亥前后愈发激进的思想密切相关。对于此点，马建强在《革命浪潮中的青少年——辛亥革命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成长与政治经历考述》一文中对这一时期顾颉刚政治思想的变化已有详细考述。<sup>[6]</sup> 早在1906年，顾颉刚就已接触到宣扬种族革命的《复报》，开始意识到曾经认为是“深仁厚泽的圣君”的清朝皇帝，原来是“一些虐待我们汉族的暴君”。<sup>[7]234</sup> 次年，顾托其父买回两册《国粹学报》，被其中革命党人“保种、爱国存学”的主张所鼓舞，从此成为该报的忠实读者，一直读至革命爆发。辛亥前夕，顾又读于右任主编的《民吁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种族革命的思想更加高涨。此外，顾颉刚就读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此时聘用留日归国的同盟会会员袁希洛为校长，袁校长以训练革命军队的方式教导学生，培养学生的革命意识。在革命党人思想的影响下，顾颉刚的种族革命思想日渐发展起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其后陕西、山西、云南、湖南等省相继独立。为了及时获取革命消息，顾颉刚在同学中担负起了买报、送报与读报的任务。同年11月，苏州独立。据顾氏回忆，光复后的苏州抚台衙门“一眼瞧去，只见大门前吹鼓楼上挂起了一面长方形的大旗，上写着‘兴汉安民’四尺见方的四个墨渍淋漓的大字，正在临风飞舞”<sup>[7]484</sup>。顾颉刚看到这个场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

革命的迅速成功，在顾颉刚那一代人看来是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双重胜利。一方面，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使汉人的种族革命获得胜利。另一方面，革命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府，又使中国的政治革命宣告成功。因此，顾颉刚积极投入革命洪流之中，不仅踊跃参加革命党人组织的学团与巷团，而且还在家族中率先剪去辫发，以示拥护革命。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接连的胜利，使顾颉刚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错觉，“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后，把社会革命这个最高的阶段就完成在我们的手里”<sup>[7]308</sup>。他说：“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种族的革命

算得了什么！要达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时方才尽了我们的任务呢。”<sup>[2]10</sup> 又说：“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世界在最短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可以直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sup>[7]236</sup> 正是对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的渴望，使正值血气方刚年纪的顾颉刚迅速加入了中国社会党。

顾颉刚加入社会党后，担任社会党苏州支部的文书干事，成了最热心的党员，经常因办理公务而彻夜不眠。入党后不久，顾颉刚就在社会党主办的刊物《社会党日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国家观念》一文，宣扬自己的社会革命理念。虽然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认为社会革命“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数辈所可竟”，因此“不能为过骤也”。<sup>[7]20-22</sup> 但这种理性的认识很快便被激进思想取代，以至于他主张在国际上应彻底打破国界观念，在国内应完全破除等级观念，直接达到无国家、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后来，顾颉刚又应党内好友华林之邀，为《新世潮》一书作序。在这篇序文中，他以更加激进的“世界革命”一词代替“社会革命”，认为“新世涌现，即在明日”，要求人们“放胆做去”，彻底摧毁政府、家庭、宗教之制。<sup>[7]23-25</sup> 总之，顾颉刚加入社会党后，已完全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想，其思想之激进程度同此前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

顾颉刚愈发激进的思想，引起了周围人的不解与困惑。如叶圣陶虽在顾颉刚的热切邀请下加入了社会党，但他认为社会党是“抱佛之旨而非佛之徒也，不有所谓宗教，唯恃我之自力以达我之宏愿”，因此并不完全认同社会党的主张。<sup>[5]73</sup> 亦有许多亲戚劝顾颉刚不该与社会党为伍，而彼时顾颉刚正服膺于社会革命之理念，幻想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因此对亲友的劝告置若罔闻。但随着顾颉刚在党内的时间不断增加，他逐渐发现苏州党支部内的大多数同志确如亲友所说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没有主义，开会演说时固然悲壮得很，但会散之后就把这些热情丢入无何有之乡了。他们说的话，永远是几句照例话，谁也不想把口头的主义作事实的研究。他们闲空时，只会围聚了长桌子坐着谈天，讲笑话，对于事业的进行毫没有计划。再不然，便是赌钱，喝酒，逛窑子”<sup>[2]10</sup>。再加上总务干事陈翼龙离开苏州后，党员们更加松懈，早把入党时的理想抛诸脑后。由于对苏州社会党人的失望，顾颉刚便应陈翼龙之邀，对家人谎称北京有一家报馆要他去做编辑，赴北京继续从事社会党活动。

但顾颉刚抵京后，正值革命潮流渐退、袁世凯的虐政和遗老们的复古风气肆虐之时，社会党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就在此时，顾颉刚的父亲得知其赴京的真

相,立刻赶到北京,声泪俱下要求他脱离社会党。在社会的压力和父亲的要求下,顾颉刚投考北京大学,入读北大后逐渐淡出了社会党。

## 二、激情后的反思:社会党经历与“层累造成说”的形成

顾颉刚脱离社会党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加深,对此前自己在社会党内那种不切实际的主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自序》中,顾颉刚袒露心声,认为这段人生经历使自己“换得了对于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认识”<sup>[210]</sup>。其中,对于“人世”的认识,主要指的就是顾颉刚通过这次经历,意识到以往那种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是不现实的。顾颉刚思想的这一转变,可通过他对前清“预备立宪”的前后不同认识中略窥一二。

在此之前,顾颉刚是社会党的忠实拥趸,坚信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方法是真理所在。为此,他极度热切地盼望在社会党人的努力下,社会革命能够彻底摧毁政府、家庭、宗教制度。正是这种对于社会革命的期待,加上在辛亥革命时期便已形成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观念,才使顾颉刚对清末“预备立宪”的那种渐进态度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都是鼓吹者“懦弱退让”的表现。<sup>[724]</sup>但在脱离了社会党后,顾颉刚对此前的激进主张进行了反思,转而赞同张东荪“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理由,而在实施”的观点,认为清“预备立宪”的“预备”确是必要的手续。<sup>[858-59]</sup>顾颉刚脱党前后对于“预备”的不同认识,恰能反映他此时已有意同社会革命的思想保持距离,开始对改造社会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

他认同好友王伯祥“所谓改进,必就现境出发,绝非摆脱现境,另求一界,以再谋良善也”的观点,认为“以前种种,必由足供改进之参考助力者在。若一切吐弃,然后创新,是犹返玉辂于椎轮,然后谋车;毁宫室以安穴居,然后求大建筑也”。<sup>[91]</sup>由此可见,顾颉刚在社会改造问题上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即放弃社会革命那种“摆脱现境”“一切吐弃”的方法,而是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出发,赞成通过一种更为缓和的方式改造社会。

在思想转变后,顾颉刚对社会党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在1918年写成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中,他批评了此前社会党“家庭革命”的激进主张,认为“有许多急进的人,就说要‘家庭革命’,去分居别爨,各不相谋;这一种人专在形式上着手,目光所注,过分浅短。……即看民国元年的社会党,势力尚是不大,只是为了‘无家庭’‘恋爱自由’几句新颖的话,被流氓、滑头、没道理人假借利用,男子抢了个‘狎娼’主义,来入党引诱女子,女子也抢了个‘倚门卖笑’的宗

旨,来入党引诱男子;社会主义的好处没有见得些微效果,这‘肉欲本能’,确格外的发挥周至”<sup>[736-37]</sup>。顾颉刚这段对社会党的批评更像是反思自己过去的忏悔书。在社会党内的那段时间,顾颉刚也是“家庭革命”主张的忠实拥护者。他也曾向家人宣传“家庭革命”的主张,认为必须打破旧家庭制度的束缚,甚至要请祖母搬到养老院去住,惹得祖母大发雷霆。不难看出,顾颉刚在这里对“家庭革命”的批评,不仅是对社会党激进主张的反思,更是表明自己已经完全同这种过激思想决裂。

在反思同时,顾颉刚还重新找回了读书的爱好。此前,顾颉刚因忙于党内公务而无暇读书。随着顾颉刚淡出社会党,他对自己个人“才性”的认识更加全面了。按照顾颉刚的自我分析,他本是一个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的人。他说:“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但因在他的性格中“智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弱”,所以他“学问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则始终走不上去”。<sup>[7401-409]</sup>显而易见,顾颉刚之所以能得出自己做不了“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党有关。与之相对应,顾颉刚也认识到自己智识欲太强,从此顺随了自己的“才性”,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也正与社会党的经历有关。

尽管顾颉刚后来多次对这段经历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吊诡的是,这段经历事实上在日后成为了影响他“层累造成说”形成的非学理因素之一。如前所述,脱离社会党前后的顾颉刚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发生了由急入缓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又影响了他“层累”思想的初步形成。以对家庭制度的认识为例,此时的顾颉刚意识到家庭制度的改革万不能像以前那般急于求成,因为家庭制度之恶是“自古积累而成的”,不是在他生活的年代才突然出现的。他们所见的老辈也是受了“积恶因”的古人的影响,因此不能承担恶制度的罪责。若要变革家庭制度,应该去改革“制造家庭的模型”,而非“可怜生涯里的老辈”。倘若不去改革家庭制度的根源,专去反对老辈人的旧思想,那么只能使这些老人在旧苦痛之外,更加一层“新发生的苦痛”,并不足以撼动整个家庭制度的根基。<sup>[736-37]</sup>总之,在家庭制度的问题上,顾颉刚认识到现有的家庭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乃是在长期“层累”中一点一滴地形成的;家庭制度的各种弊端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亦是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层累”而成的。

顾颉刚的这种“层累”性认识,在他对社会制度的反思中也有体现。顾颉刚认为,倘若要改革社会制度,社会党那种粗暴推翻一切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断不可行,正确做法是首先要“晓得社会所以成这坏现象的缘故,就这‘因’上去想法改造;不要就这‘果’上去卤莽反对”<sup>[738]</sup>。如果说顾颉刚此前“社会革命”的主

张是从“果”上去反对社会，以推翻现存的政府、家庭、宗教制度为目标，那么此时他主张从“因”上改良社会，便是在这一问题上有了“层累”的观念。因为社会制度之恶是“果”，是由社会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种种恶“因”所积累而成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虽是由我辈看来，更可推演上去，说：‘这是由怎样造成的？’‘这种道理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这种道理和事实是能否改变的？’”<sup>[7]39</sup>这种“推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追溯社会制度之恶如何一步步“层累”的过程，与此后他研究古史“层累”的历史演进方法有很强的相似性。

由此可见，顾颉刚通过反思社会党的经历，不仅意识到应当以社会改良取代社会革命，更意识到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之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由古至今不断“层累”而成的。那么，顾颉刚这种对于家庭、社会制度的“层累”性认识，是如何系统化、理论化为“层累造成说”的？换言之，顾颉刚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是如何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相联结，抽象为一套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的？前已论及，在顾颉刚自己看来，他是一个“智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弱”的人。特别是在淡出社会党后，他潜心学问，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如在1925年的《再论救国与工作》一文中，他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苦口婆心地劝告学生，入学修业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智识与修养，学生可以有政治热情，但不该加入政党，而是要把这种热情作为“治学与治事的出发点”。<sup>[7]221-222</sup>结合顾颉刚的个人经历，此时他对年轻学生的劝告，实际上也是自己心声的表露。

王汎森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书中，借用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的“转喻”理论，说明了生活中的挫折或生命中的烦闷是如何转化成思想理论的。他指出：“烦闷、生活挫折、日常小事的不如意可能被联系到一套更具理论性，更有延展性的思想系统，形成接口与接口的对接。”<sup>[10]9</sup>结合顾颉刚的这段经历来看，社会党的经历一方面使他对于社会制度的演进有了“层累”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他从此对改造社会的理想敬而远之，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交织，最终使他对于社会的“层累”性认识向学术方面“转喻”，从而有了古史理论中“层累造成说”的形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转喻”并非思想理论对于生活经历简单的、机械的反映，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并不完全就是他对社会的“层累”性认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人生经历“转喻”为思想理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相同一的关系，是一种在各种因缘与情势作用下实然的关系，而非应然的关系。

### 三、潜意识里的破坏：社会党经历与“四个打破”的形成

如前所述，脱离社会党后的顾颉刚通过对社会党经历的反思，逐渐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形成了“层累”的观念，这种观念又逐渐随着他走上学术道路而成为“层累造成说”的非学理因素之一。实际上，这一非学理因素对顾颉刚的古史理论产生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社会党经历的反思上，还表现在社会党经历在他头脑中形成的潜意识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四个打破”的形成就是后一方面向思想理论“转喻”的结果。

结合顾颉刚脱离社会党后的经历来看，社会党这段“乱掷的光阴”确实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在这种苦闷的心情影响下，他尽管不完全认同道家的消极避世思想，但还是读了一年的《庄子》，因为“庄子教人看得世间是轻轻的，众人是不可责以同志的，对于自己的修养是不可忽的。他教人外曲以处世，内直以处己”<sup>[8]70-71</sup>。同时，这时的顾颉刚还对农科产生了兴趣，因为“学了农，既可自给自足，不靠人家吃饭，不侵入这恶浊的世界”<sup>[7]325</sup>。尤其是在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顾颉刚的社会党内的好友陈翼龙被袁政府下狱处死，使得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对社会现实的反感与不满较此前在社会党期间有增无减。

诚如前言，此时的顾颉刚通过对社会党经历的理性反思，已基本放弃了社会革命思想，转向了社会改良。但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社会党与社会革命的思想仍然不时闪现在顾颉刚的头脑之中。如瞿骏指出：“正因顾颉刚有深入参与且超前思考的辛亥人生，日后他才会不时展露出熟悉‘社会主义’的痕迹……这样的思路正源自顾氏亲历革命、加入中国社会党的经历。他对中国、世界进入更高级‘社会’始终有终极性的憧憬和向往。”<sup>[11]74</sup>而这种意识的形成，不仅与上述顾颉刚在无力反抗现实时所表现出来的内心压抑有关，更与他的“像火一般旺烈，像浪一般激涌”的个人性格有关。这是因为在顾颉刚的性格之中，理智和感情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复杂的。顾颉刚认为：“人的所以杰出于他种动物，因为他的感情和理智都比别的动物强。”感情与理智固然都是性格中不可少的，但在二者之中，感情又远比理智重要。他说：“一个人的所以为人，原为要达到他的许多有生的欲望；他受了达到欲望的强烈的感情的驱遣，要活在世上，热蓬蓬的做一番事业。”至于理智，“原只是帮助感情，指示感情可以走的路的，并不是可以离了感情而独立。离了感情而独立的理智，那是冷酷的理智，卑怯的理智，而不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理智”<sup>[7]182</sup>。所以顾颉刚在与叶圣陶讨论社会问题时，虽然承认了社会革命式的极端主义的实行必须先提高人们的科学常识，

帮助人们确立确当的人生观，“待至人人自觉之后”，再“拿极端主义灌输进去”，最终按部就班地达到无政府主义的境界。但同时他认为，现在的世界形势已“不容得不发生极端主义”，极端主义的实行又“待不到大家自觉之后”。<sup>[18]57-58</sup>由此可见，此时的顾颉刚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与思考，但社会革命在他头脑中所打下的烙印仍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的痕迹还表现在顾颉刚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上。运动甫一爆发，顾颉刚就致信傅斯年与罗家伦，劝他们将运动风潮扩大。他说：“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改动一回。……所以这回的事非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sup>[18]235</sup>这里顾颉刚所说的“根本改动”与“根本解决”，实际上就反映了他头脑中这种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此后不久，顾颉刚在同叶圣陶谈话时，又说：“惟有希望过激派起来，土地资产归公，看他们平日娇养惯的，游荡惯的怎样过日子？我常想吾的心思要很平和，却被社会罪恶逼着向过激方面走去。”<sup>[18]63</sup>此种言论，实际上也是顾颉刚头脑中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的一种吐露与宣泄。尽管顾颉刚在此之前就已通过理性思考，放弃了社会党的基本主张。但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党革命与破坏的主张确实对他的思想世界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此后，随着顾颉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这种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逐渐向他的古史研究“转喻”，从而使他的古史理论带有强烈的破坏性。在《自序》中，顾颉刚回顾了这一时期自己治学的心路历程，表示他想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国学，凭一时的勇气去求得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原理，把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在他手中一起解决，以解决他对学问的饥渴。那时的顾颉刚在笔记中写道：“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犹有一杖邓林之力，非蝮蟾鸩鸣知已。”“学海虽无涯，苟大其体如龙伯，亦一钓贯六鳌耳。”<sup>[21]9</sup>顾颉刚在学问上这种“吸吞河岳的豪气”，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向学术“转喻”的结果。而这一“豪气”在学术上的极端表现，就集中反映在他所提出的“四个打破”中。

顾颉刚认为，古史研究必须先破后立，而自己所从事的应当首先是破坏古史的工作。他说：“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sup>[21]28</sup>在这种“破坏先于建设”的理念指导下，顾颉刚提出了“四个打破”，对古史传说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破坏。其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是要彻底推翻春秋以来形成的民族一元论观点；“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是要摧毁周秦以来人们理想中的地域认知；“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是要摆脱古代神话与历史杂糅不分的状况；

“打破古代为黄金时代的观念”则是要破除传说中关于三皇五帝时代的错误观念。在“四个打破”中，顾颉刚所做的工作不是在前人的研究上进行简单修补，而是要一次性打破这些陈规旧说，建立起新的信史观念。可以说，顾颉刚的“四个打破”在形式上与他头脑中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相联系，后者是促使前者形成的非学理因素之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固然不能代替各种学理因素的直接作用，但其作用亦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脱离社会党后的顾颉刚虽放弃了社会革命的政治理想，但头脑中这种社会革命式的潜意识仍然长期存在，这从他在“五四”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出。而随着他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这种潜意识就“转喻”为一种在学术上冲决网罗、破坏一切之决心，“四个打破”就是其结果之一。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种由人生经历向思想理论的“转喻”过程，并非单链条式的因果关系，而是从史料出发，为纷繁复杂的历史寻找一种“理想推度”之内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 结论

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是史学史研究的面向之一，以往的研究常关注学理的一面，侧重挖掘影响各种史学思想形成的学理因素。而历史学家作为历史上鲜活的个体，其思想学说背后亦隐藏着许多主观因素，对这些非学理因素的研究与揭示，正能体现出史学史研究的思想性所在。因此顾颉刚“层累造成说”和“四个打破”的形成，不可否认地受到了各种学理因素的影响，甚至这些学理因素在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无疑是促使其古史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顾颉刚的心理、性格与经历也会通过“转喻”这一过程对其古史理论产生影响，这种更为隐秘的、间接的非学理因素的影响，则是本文力图强调与揭示的，以求增进对历史全貌的了解。

## 参考文献：

- [1] 克罗齐. 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M]. 田时纲,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2.
- [2] 顾颉刚. 古史辨: 第一册[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5.
- [3] 中国社会党规章[N]. 申报, 1911-12-27.
-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M]. 苏州: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 [5] 叶圣陶. 叶圣陶日记: 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6] 马建强. 革命浪潮中的青少年: 辛亥革命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成长与政治经历考述[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8): 112-118.
- [7] 顾颉刚. 宝树园文存: 第六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8] 顾颉刚. 顾颉刚书信集: 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9]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 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78.
- [10] 王汎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1] 瞿骏. 立于以扶枝: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基本问题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Undercurrent: Gu Jiegang's Experience of the Socialist Party and the Origins of His Ancient History Theory

ZHANG Zifa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20s, Gu Jiegang proposed the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and the “Four Breaks Theory”, which are the core theories of the Ku-shih-pien school of questioning ancient history and distinguishing falsehood. The formation of this theory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academic factors, but also by non-academic factors such as Gu Jiegang's personal emotions and life experiences. Among them, Gu Jiegang's experience of joining the Chinese Socialist Party during middle school was one of the non-academic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ancient history theory. On the one hand, Gu Jiegang realized through reflection on this experience that the formation of family and social systems w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layering”,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theory of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xperience has given Gu Jiegang a long-term existence of social revolutionary subconsciousness, which has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his “Four Breaks Theory”. Through this life experience of “metonymy” towards academic research, Gu Jiegang's theory of ancient history was basically formed in the 1920s.

**Key words:** Gu Jiegang; Chinese Socialist Party;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Four Breaks Theory”

(上接第51页)

- 2023(2): 73-85.
- [10] 吴汉东. 数据财产赋权: 从数据专有权到数据使用权[J]. 法商研究, 2024(3): 3-16.
- [11] 时诚. 排他+治理: 数据权利配置的第三种范式[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4(3): 77-99.
- [12] 陈兵.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机制[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36-50.
- [13] 洛克. 政府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4] 刘冲. 劳动理论可以正当化企业数据财产权吗[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76-81.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 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彭刚,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3.
- [18] 刘维. 论数据产品的权利配置[J]. 中外法学, 2023(6): 1581-1599.

## The Assignment of Rights to Data Processors

— Based on the Labor Valu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ZHENG Qifu, WU Chenlin

(Law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Data processors are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in the gener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data.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llocated rights to data through property rights, contractual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ew types of property rights, but there are certain shortcomings. The labor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legal field for a long time, and its essence is a way of allocating public resources in human society that combine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t should be used to allocate data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abor input, the rights of data processor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with copyright and contractual rights being allocated separately, and voluntary registration being used as proof of rights.

**Key words:** data rights; rights of data processors; labor valu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dataset; data transformation

#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归依与路径优化

## ——以冀鲁边区为例

顾尧, 侯彦杰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推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冀鲁边区红色文化具有较为独特的内涵, 这为其在新时代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价值归依。当前, 冀鲁边区红色文化在赋能乡村振兴上存在诸如红色文化认同不足、省际沟通协调不畅、人才储备薄弱、发展模式趋同化等一些现实困境。要走出这些困境, 就需要多措并举, 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路径优化方案。

**关键词:** 红色文化; 乡村全面振兴; 冀鲁边区; 价值归依; 驱动路径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64-05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是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 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重要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sup>[1]</sup>。红色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战略具有强烈的内在相关性, 发挥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红色引擎”作用。

冀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可为冀鲁边区乡村振兴提供价值归依, 本文拟廓清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难题, 提出路径优化方案, 助力冀鲁边区的乡村振兴建设。

### 一、冀鲁边区概况与红色文化特质

#### (一) 冀鲁边区概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中共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等人联合各界群众在旧县(今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sup>[2][7]</sup>, 1938年9月中共冀鲁边区特委成立。“1941年4月, 北方局决定设立冀鲁边区党委”<sup>[2][10]</sup>, 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冀鲁边区党委与清河区党委合并为

渤海区党委。冀鲁边区在渤海区党委领导下, 继续抗日。

1938年, 中共中央任命肖华组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肖华在给罗荣桓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冀鲁边区的战略地位:“冀鲁边区东临渤海湾, 西靠津浦路, 北近天津、大沽, 南接黄河,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sup>[3]</sup>也正因为冀鲁边区遭受了日军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在此过程中, 广大冀鲁边区军民, 同仇敌忾, 先后参与对日伪作战近千次, 向鲁西、鲁南地区输送了15000多名干部和战士, 在数次战斗中累计牺牲人数高达十余万。罗荣桓曾高度肯定和赞扬冀鲁边区在艰苦的斗争中获得的伟大成绩, 认为冀鲁边区“扩大与创造了数目在两万以上的地方与主力部队, 独立开展与扩大了游击战争, 创造了有相当基础的根据地, 建立了十四个县的政权, 加强与扩大了地方党, 正确的执行统一战线, 发动了群众”<sup>[4]</sup>。正是在这种前仆后继的伟大牺牲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 冀鲁边区凝结了宝贵丰富的红色文化, 铸就了冀鲁边区独特的红色文化品格。

#### (二) 冀鲁边区的红色文化特质

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作为宝贵的革命遗产, 从精神维度、实践维度、价值维度方面, 造就了冀鲁边区的红色文化特质。

1. 精神维度: 震古烁今的民族气节。在精神维度上, 冀鲁边区人民自古以来就深受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 并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 形成了稳定的心理

收稿日期: 2024-07-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视阈下的道德建设研究”(23BKS1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研究”(22YJA710007)。

作者简介: 顾尧(2002—), 男, 山东武城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接纳与价值认同,为冀鲁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促使冀鲁边区在短期内迅速组织起一支规模庞大、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并最终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以生命和鲜血锻造了“敢为人先、大爱为国、不屈不挠、团结奉献”的冀鲁边精神,成为冀鲁边区红色文化的精神命脉。

2. 实践维度:敢为人先的开创贡献。在实践维度上,冀鲁边区率先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开辟了新篇章,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第一,“中共津南工委于1937年7月15日在盐山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sup>[5]</sup>,打响了冀鲁边抗战第一枪。第二,1937年8月,中共乐陵中心县委发动了山东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乐陵黄夹起义<sup>[6]</sup>。第三,1937年7月建立了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sup>[2]180</sup>。

3. 价值维度:鱼水情深的军民情谊。冀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平原地区建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与大多数依托山地优势“以山制敌”的革命根据地相比,面临地貌上的天然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难度。然而,冀鲁边区坚决贯彻了徐向前元帅所提出的“人山”军事战略思想<sup>①</sup>,将人民群众视为“最高的山”,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边区革命舵手”马振华和“革命母亲”常大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冀鲁边区也成为山东六大抗日战略区中,主力队伍发展最快、人数最多的一个区,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彰显了军民一心的深厚情谊。

## 二、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归依

在推动冀鲁边区红色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首要任务是精准定位其价值归依。尽管学术界已从教育启迪、产业革新、治理提升等多个维度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未能进行整体审视,缺乏对其价值归依的系统性挖掘。鉴于此,本文拟从5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 (一) 以红色基因传承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960万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sup>[7]</sup>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深层次的新特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一方面,深入挖掘冀

鲁边区红色文化精神内涵,拓展表达载体,推动革命精神的艺术化呈现和具象化演绎,充盈广大群众内心世界。另一方面,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承深化广大农民对家乡的挚爱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重塑其乡村文化自信。

### (二) 以文旅结合路径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红色文化资源应当被确立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性支点。红色文化资源深度整合至乡村文旅产业,不仅能够有效激活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驱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更能有效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让游客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与熏陶,从而强化对红色文化价值观的深刻认同与积极践行。

### (三) 以价值观念重塑引领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支撑和源头活水。冀鲁边区红色文化承载边区军民披荆斩棘的奋进力量,是激励当代广大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精神法宝。一方面,冀鲁边区红色文化具有资政育人功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使其成长为促进农民富裕、农业繁荣和农村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向全社会传播红色文化,激发社会各界对乡村振兴事业的广泛关注,鼓励更多有识之士抓住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战略机遇,积极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聚人气、增底气。

### (四) 以发展模式重构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建设联系紧密,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的重要资源。一方面,在红色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要坚持“思政红”引领“生态绿”的文化建设导向,致力于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目标协同,深化对当地居民的生态伦理和环保意识教育,激发他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与责任感,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和日常习惯。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向生态建设领域的价值转化,利用“红色文化+生态旅游”的乡村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契机,扩大招商引资与政府投入,抓住机遇加快乡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因地制宜推进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和农村改厕,完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协同推进农村有机生活垃圾、粪污、农业生产有机废物资源化利用”<sup>[8]</sup>,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飞跃式提升与生态经济的富足增长。

<sup>①</sup> “人山”军事思想是指将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以弥补平原抗战在地形上的劣势,系统阐述于徐向前所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

### （五）以培根铸魂底色促进乡村组织振兴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和“第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确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成为战斗堡垒。”<sup>[8]</sup>农村基层作为社会矛盾与公共利益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充斥着各种繁复与艰辛的基层工作，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容易陷入职业倦怠，基层党组织建设长期面临着被弱化、虚化、边缘化的潜在风险。红色文化能够激发基层党员干部的奋斗激情，确保相关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的精准落地与高效实施。红色文化还能增强群众互帮互助意识，引导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摆脱“原子个人化”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 三、冀鲁边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冀鲁边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理想价值认同、宏观战略协调、具体行为管理等诸多层面。从整体来看，冀鲁边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已初见成效，但从局部审视，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 （一）声名不显，资源筹备困难

冀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与贡献不容忽视。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与井冈山、大别山、延安等在全国享有盛誉的革命老区相比，冀鲁边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外界充分关注，导致冀鲁边区在吸引外部投资和获得各类资源扶持等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井冈山、大别山等革命老区借助其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成为红色旅游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地，吸引相关社会资本持续投入，业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赋能发展路径。相比之下，冀鲁边区在产业资源获取上往往局限于周边小范围的地方性投资，难以汇聚充足的人力、资本、技术等关键资源要素，赋能实践难以有效推进，更无法提炼出具有示范意义的发展模式与先进经验。

### （二）省际协调不畅，政策下行不力

冀鲁边区红色文化发源地覆盖山东省德州市、滨州市辖下的十余个县市，以及河北省沧州市辖下的七个县市，地跨两省，联结多市，行政区划复杂，出现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等现象。例如，各区县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馆数量众多，但由于缺乏协调，不同纪念馆在内容展示、展品选择乃至建筑风格上都极为相似，导致资源浪费和功能重叠；又如，冀鲁两省在交通设施建设上各自规划，影响了游客的参观

体验。以上诸多问题，既不利于红色文化先进建设经验的广泛传播以及差异化个性塑造，又削弱了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产业资源在各地、各村落之间的流动转化效率，加剧了同一产业间的恶性竞争。除省市间协同机制不畅外，同一地区上下级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亦面临诸多挑战，尤为突出地体现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层面上。部分乡镇政府受困于单一的线性协同模式及尚不完善的服务体系，诸多资源开发政策往往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收在盒子里，难以为广大群体带来实实在在的精神滋养和文化浸润，更遑论其经济效益的开发。

### （三）人才储蓄薄弱，造血能力不足

冀鲁边区，相较于毗邻的济南、石家庄、天津等大型城市，在人才队伍建设领域存在的先天劣势，制约了当地红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储蓄严重不足。目前，冀鲁边区从事红色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当地村民为主。虽然这些村民对本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但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所需的专业技能和行业知识。二是人才培养能力欠缺。当地高等院校数量有限，难以有效培养出数量充足的、专门服务于当地红色文化产业建设的文化技能型人才。三是人才吸纳面临严峻挑战。当下高技能、高学历的青年人才往往热衷于选择就业机会多、经济动能强、发展空间大的大型城市，而冀鲁边区深受周边大型城市人才虹吸效应的影响，导致区域内青年人才大量外流，进一步削减了当地红色文化产业的人才基础。

### （四）开发模式趋同，特色融合欠深

红色文化的生成，根植于特定历史时空的民众革命实践活动之中，不同地域红色文化在共享中国革命普遍精神特质的同时，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红色文化地域特性挖掘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红色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竞争中能否脱颖而出。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产业既缺乏同本地区相关资源的有效整合，也未能充分彰显其独有的红色文化底蕴，难以形成具有强竞争力的特色品牌优势。例如，冀鲁边区所辖的广大地区，拥有乐陵小枣、南宫大枣、邢台板栗等诸多农产品资源，德州黑陶、南路丝弦、沙河皮影戏等诸类民俗技艺。以上这些资源本身是拓展冀鲁边区红色文化的表达载体，丰富文化产业链条的有效途径，却长期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具体而言，除乐陵市政府以当地特色枣树资源为依托所打造的“双红”文化品牌之外，其他区县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仍多以纪念馆、革命遗址等浅层开发为主，在展览内容和形式、旅游线路设计、文创产品销售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

#### 四、冀鲁边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

针对当前冀鲁边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挑战,要坚持“对标先进找差距、对标实际定策略、对标目标促落实”的原则,针对当前赋能过程中的具体困境,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为冀鲁边区乡村振兴再跨越夯基立柱。

##### (一) 提升社会知名度,扩大资源筹备渠道

解决冀鲁边区红色文化社会知名度不高和资源筹备困难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文旅部门要积极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制作专题纪录片、拍摄微电影、举办线上展览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冀鲁边区的革命历史,提高其社会知名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导演和编剧,创作反映冀鲁边区革命历史的影视作品,在央视和各大视频平台进行播放,扩大社会影响。同时与携程、马蜂窝等旅游平台开展合作,推出冀鲁边区红色旅游线路和优惠套餐,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二是争取政策支持。积极整合各方力量,共同申报国家级或省级重点项目,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三是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各区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通信、住宿等相关配套设施,为外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四是健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降低企业和投资者的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具体而言,可设立专门的红色文化产业服务中心,提供项目咨询、政策解读、手续办理等全方位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 (二) 强化建设统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各地在开展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秉持大局观,注重红色资源开发工作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第一,要善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大力开展数字平台建设。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信息集散功能,结合各方力量共同打造红色文化旅游APP,推动政策信息、文化资源以及开发经验在不同地区的迅速传递与共享,进而打破地域壁垒,促进红色文化保护、宣传及开发等方面的跨省市深度合作,实现乡村红色文化产业服务的错位发展与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的服务监督功能,通过收集用户反馈、监测服务效果,实时跟踪评估红色文化产业服务的实施情况,向社会各界展示红色文化产业服务的进展和成果,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确保红色文化相关开发政策覆盖至“最后一公里”。第二,制定统一的红色文化开发利用标准,明确保护与开发的原则和底线,执行责任共担机制,对红色文化旅游项目的规划、开发、运营各环节进行统一严格管理,确保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

用,打造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产业利益共同体。可以京杭大运河为文化纽带,开发红色文化旅游专线,将冀鲁边区各地红色文化场景同黄河故道、农业采摘园、运河风光等生态休闲场景紧密串联起来,通过各地政府、各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打造集约化、串联式的乡村红色旅游网络,整体带动冀鲁边区区域协调协调发展。

##### (三) 强化人才供给,构建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培养与引进人才相结合、引才和引智相结合,拓宽乡村人才来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sup>[9]</sup>,这为乡村文化人才的培养工作指明了可行路径。第一,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开设冀鲁边区红色文化精品课程,邀请革命前辈及革命后代来校讲述冀鲁边区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培养与强化当地青年学生自觉投入红色文化建设事业的责任担当与使命意识。另一方面,开展情景式体验教学,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冀鲁边区红色文化遗址,亲身体会革命历史的厚重。第二,加强人才引进。相关政府要制定“引才入乡”的优惠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借助抖音、快手等新型媒介开展政策宣传,鼓励和吸引身在外地的冀鲁边人士反哺家乡建设。同时,利用与周边大城市距离较近的优势,加强与这些大城市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学、师资共享、项目合作等形式,引入高水平的红色文化研究与开发人才,将地缘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赋能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要加强当地农民与外来人才的互动,借此传授先进的文化产业运营知识,提升老区人民的红色文化素养,培养一批熟悉当地社情民意的“本土行家”。

##### (四)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打造区域品牌形象

在全国革命老区竞相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另辟蹊径,凸显本地区红色文化特性,就很容易在全国红色文化产业竞争中失去辨识度和竞争力。第一,坚持多元文化的互融互通。冀鲁边区享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要积极探索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共生点,秉承“多元共融,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挖掘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忠勇爱国”的精神传统,凸显齐鲁文化“自强不息,刚健为国”的儒家文化底蕴,将革命历史深邃性同地域文化多样性有机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红色文化叙事。第二,坚持因地制宜的开发导向。当前,乐陵市作为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的核心区域,有关部门依托当地农产品资源,在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领域取得了良好成绩,并力求打造“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的红色文化品牌。其他地区有关单位应当充分借鉴乐陵市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建设道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J]. 求是, 2021(10): 4-10.
- [2] 安作璋. 山东通史: 现代卷 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刘秉荣. 八路军新四军全传[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914.
- [4] 李维民, 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37.
- [5] 新华月报. 永远的丰碑: 十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46.
- [6] 乐陵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乐陵县志[M]. 山东: 齐鲁书社, 1991: 484.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66.
- [8] 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 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N]. 人民日报, 2023-10-14.
- [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 (2021-02-23)[2024-11-0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2021-02/23/c\\_112713038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2021-02/23/c_1127130383.htm).

**Red Culture Empowers the Value Attribu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ake the Jilu Border Region as an Example**

GU Yao, HOU Yanjie

( College of Marxis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

**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The red culture in the Jilu border area has a unique connotation, which provides a value for it to empowe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red culture of the Jilu border area i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uch as the fading of red culture, poor inter-provincial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eak talent reserve in old areas, and heavy convergence of development models.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se predica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ultiple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ath optimization schemes in a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 red cultur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Jilu border district; value attribution; drive path

##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域出版数据库、中教汇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 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德州学院学报

# 价值·挑战·路径：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机理

王翔宇, 李兴平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州 730010)

**摘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要求。数智技术的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实践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同频共振,共享着相同的愿景与目标。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有效运用数智技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实践,应当通过构建数智文化数据库与基础设施,深化文化内涵挖掘与全景式展示,强化文化精准传播与交流合作等措施,创建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体系。

**关键词:**数智技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活态传承; 数智文化数据库; 跨文化传播人才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69-0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植于民族精神的深层,具有独特的鲜明特质,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新时代新征程,“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sup>[1]</sup>是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近年来,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变革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在激发文化内容的创造活力、展示文化形式的改革创新、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塑造文化环境等方面作用明显,显著增强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感与参与度,数智技术正日益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当前,学界关于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创意产业和数字文化消费的研究,如李凤亮、单羽指出,数智创意产业是源自新兴数智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sup>[2]</sup>二是关于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研究,如周建新指出,数智技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涉及多个层面。<sup>[3]</sup>三是数字化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研究,如王育济、李萌认为,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sup>[4]</sup>但是学术界关于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的逻辑机理研究,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通过挖掘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价值意蕴,分析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面临的现实挑战来探索其优化路径。

## 一、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价值意蕴

数智化的飞速发展使数智技术成为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契合、与现代社会相融通的有效因素和关键环节。

(一)数智技术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革新

一方面,数智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提升与深度体验提供了外在驱动力。我国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物珍藏,但这些文化遗产难以复制,难以移动。现在,通过高精度的数智扫描、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古老的文化遗产得以活起来、动起来,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同时,数智技术还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创新演绎,如数智化古籍突破了传统文献的生产方式,实现了文献形态的再生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两创”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与创意灵感。线上博物馆、数智化图书馆、智能文化APP

收稿日期: 2024-12-06

作者简介: 王翔宇(1998—),男,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等平台兴起,不仅拓宽了文化传播的渠道,也促进了文化内容的持续创新,使得“两创”实践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传统平台承载的文化内容近距离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 数智技术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创新

一方面,数智技术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样式传承的数智化形态。一直以来文物遗产靠世代保护,经典古籍靠代代修缮,特别是传统技艺,更是靠口耳相传、师徒传授。现在,数智技术可以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元素、艺术形式及文化内涵进行数智化采集、处理与再现,从而创造出既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又符合现代审美与功能需求的数智化产品和服务。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对古典文献、传统艺术、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的数智化转化,还包括利用 VR、AR 等先进技术,构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全新的数智化形态呈现给公众。这样,既便于传播与保存,又增强了互动性和趣味性,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内生活力。传统与现代既是源与流的关系,又是古与今的关系。源与流是强调二者之间的紧密相连,古与今是强调二者之间也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运用数智技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创新潜力,正是让传统文化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其与现代社会的审美、功能需求相契合,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传承与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三) 数智技术有助于推进沉浸式传统文化环境的营造

借助 VR、AR、3D 打印等尖端科技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能够栩栩如生地再现于数智空间之中,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文化环境。可以说,数智技术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物、文字、图画等,转化成了数字代码,利用虚拟空间实现了传统文化从物质形式到非物质形式的重大转变。这样,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多的人可以如身临其境般感受传统文化。此外,数智技术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比如与影视制作、电子游戏、时尚设计等诸多行业的紧密结合,催生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独具匠心的文化产品,充分满足了现代人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与审美取向。这些大受欢迎的传播途径使传统文化展现出更加多元、开放与包容的全新面貌,对于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不无裨益。

## 二、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面临的现实挑战

新时代以来,我国数智技术迅猛发展,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创”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现实挑战,具体表现为文化“两创”发展的有效平台数量匮乏、文化“两创”发展的数智技术壁垒依旧明显、文化“两创”发展与数智化时代的兼容抵牾三个方面。

(一) 有效平台数量匮乏

文化的创新、传播及繁荣离不开合适的媒介与平台支持。然而,传播、传承文化“两创”的各类平台,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明显充足。一方面,传统大众媒介诸如报纸、杂志等,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深受当代受众娱乐化倾向以及快餐式阅读习惯的强烈冲击,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片面化和表面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既定的发展轨迹,其中物质载体倾向于资本市场的运营与商品化,而非物质载体则主要依赖生产性途径进行传承。在这一过程中,两者所蕴含的文化形式过多地被经济利益所驱动,而对其深层内涵的挖掘很不充分。此外,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两创”方面的政策时,力度仍显不足;各级政府乃至社会组织对于增强“两创”的金融扶持、资金保证的强度仍显薄弱;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在培养“两创”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方面,精度仍显不够。以上各方面,形成了建设文化“两创”有效平台的综合性制约。

(二) 数智技术壁垒依旧明显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形式与表达的数智化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丰富的象征意义、深厚的历史背景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往往难以通过简单的数智化手段得以完整表达。例如,古典文献中所表达的重视体悟、重视生命、重视精神的特征,书画作品中的笔墨韵味,以及传统音乐中的节奏与旋律,在数智化过程中往往难以被精确捕捉与再现。第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格,这些文化元素在数智化呈现时,需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当前的数智技术往往难以全面覆盖这些文化差异,导致在数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文化信息的遗失或误解。第三,新的数智化手段与技术不断涌现,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呈现却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发展,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滞后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化时代的传播与创新。此外,数智技

术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对文化“两创”的数智化发展形成了一定限制。众所周知,数智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数智技术更多是被年轻人接收和掌握,老年人整体上适应能力差、技术水平低,必然被数智技术边缘化。而年轻人由于阅历、经验甚至学识等方面的制约对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转化、发展则不够准确、贴切。

### (三)文化“两创”发展与数智化时代的兼容抵牾

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然而,数智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一方面,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同时,部分数智化产品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与内涵,导致文化的浅表化、碎片化传播。比如,一提起中国风,龙、凤、京剧、瓷器、中国结、剪纸等就成为了固定的符号,然而,公众未必真正知晓这些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文化消费观的急剧变化,使得数智技术赋能的文化产品更加趋向商业化,出现“文化同质化”的风险。如何在数智化浪潮中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把准传统文化发展方向,避免文化精髓的流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三、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优化路径

数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在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语境下做出的微观数智化选择,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在时空上的拓展。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进程中,数智技术已然成为其核心驱动力,其应用需重点观照文化资源转化、文化呈现创新以及文化交流拓展等三个方面。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协同推进,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数智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体系。

### (一)构建数智文化数据库与基础设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与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资源普查、名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sup>[5]</sup>。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数智技术在此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转化与整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构建数智文化数据库关键在于构建并联通各地区、各层级、各类别的文化数据库,以此打破以往资源孤立、互不联通的局面,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此外,加强数智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尤为重要,这既确保了文化数据资源能够得以充分

利用,又能为人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使用途径。

1. 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据库。“中华民族积淀了五千多年的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和源泉。”<sup>[6]</sup>一方面,在深入调研各地文化资源现状,着力构建内容丰富、分类清晰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具体言之,要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不同类型,采用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分类存储;要提升资源整合效率,增强资源的可获取性;要优化管理流程,满足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各层级、各领域数据资源库建设主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形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架构。通过建立清晰的坐标体系,加强数据资源的内外联系,提升单个文化机构内部数据的协同性,并推动不同机构及不同领域间数据资源的交汇融合,既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创作与传播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支持。

2. 构建数智文化数据库关键在于强化数智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构建覆盖区域广泛、具备强大算力的智能计算中心。这将显著提升文化数据在采集、传输、分发及交易等各个环节的处理效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并满足文化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在计算机中心的助力下,市场化机制将自发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据资源实现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共享,充分展现并有效传承其内在价值。同时,加快推进文化公共服务中数智技术的无障碍化进程,致力于消除数智不平等,缩小数智鸿沟。具体言之,一方面,要开发成本低廉、功能直观易用且便于学习的文化产品和系统,让便捷的数智服务惠及广大民众。另一方面,为打破以往单一的传统生产与传播模式,要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积极推动文化机构人员及相关领域从业者向数智化转型,激发他们学习、掌握先进数智技术的热情。在此基础上,鼓励广大民众利用自媒体、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创作出具有民间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产品。

### (二)深化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掘与全景式展示,拓展传统文化的意义边界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环境中,应深刻意识到“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的要求。具体措施包括“推进数字化保存和传播”“实施网络文艺创作传播计划”等。<sup>[7]</sup>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应借助数智化、网络化平台,以三维虚拟展示技术全景式地展现给公众,并通过互动共享的方式,让人们获得自

由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意义的能力。此外,还可以运用多模态展示技术来显著提升公众的文化感知力,进而推动信息的广泛流通与空间共享的简便实现。

1. 应用数智技术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一方面,通过提炼历史文化的主流美学元素,精选出符合数智媒介特点且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要素。例如,《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就运用环幕与 AR 技术,融合国学经典、古籍与国宝,创造出了穿越时空的视觉体验。另一方面,聚焦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鼓励深耕传统文化和数智技术的专业研究人员实现跨学科合作,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等通力合作。一是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拣选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或元素,为公众形成和提供系统化、精确化、普及化的传统文化学习资料;二是共同构建有效的、可施行的制度体系和评估体系,来保证公众对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不偏离正确方向。可以利用数智技术开展人们与文物遗产、经典古籍的穿越式对话交流测试,或者利用数智技术搭建专业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对话交流平台,以调研各类人群对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掌握程度,以此为基准,形成和制定合理的制度规范和评估机制。同时,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应积极运用数智技术,在事理结合与古今交融的框架下,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素的展示层面。实际上,利用具有高度交互性的数智技术平台,可以显著缩短观众因教育背景、生活经历或价值观差异而与传统之间存在的距离,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含义。通过采用这样的展示手法,数智技术不仅为经典作品的当代诠释增添了丰富手段,而且构建了一座沟通传统经典与现代观众之间的桥梁,为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途径。

2. 运用数智技术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目前,无论是在虚拟的网络平台还是实体的线下空间,最新科技进展已使文化展现形式变得更为鲜活多维,这显著提升了观众的沉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潮流,正由这种融合了多种表现手法的呈现方式所引领。一方面,结合当前的审美潮流与社会背景,数智技术凭借其卓越的时间延展特性,可以创新性地演绎并重现历史的时空演变,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度展示与数智化重塑;另一方面,数智技术被深度运用来打造高度仿真的虚拟场景,从而可以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为公众提供更为多元且深刻的文化感知与体验。在这个数智领域中,时空的局限性被超越,文化的传播不再受物理条件的束缚,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会显著增强,主动

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也将随之提升,这充分彰显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巨大潜能及其深远、积极的影响。

(三) 强化传统文化精准传播与交流合作,促进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广泛宣传与互鉴

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准传播与交流合作,促进其在国内外的广泛宣传与互鉴,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课题。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现代数智技术,打破地域与语言的界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便捷、深入人心的方式触达全球受众。

1. 以先进的数智技术算法,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精准而高效的推送。利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技术推动文化产品向更为精准、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可以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分析,更好地理解受众需求,确保文化内容与受众兴趣相匹配,从而增强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还需打破国别、城乡、区域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智鸿沟,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数智文化产品的便利。实际上,构建开放、包容的数智文化生态,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共享。当前,新兴社交媒体平台鹊起,抖音、快手、哔哩哔哩、TikTok、YouTube、Facebook 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要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做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工作,它们可以采用生动、直观的方式迅速推广文化产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融入民众生活,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国外的桥梁。这些平台不仅传递了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还能丰富大众的文化体验,潜移默化地提升民众的文化修养与审美能力。

2.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跨文化对话也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传播与交流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sup>[8]</sup>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会议、文化节、艺术展览等,结合数智技术推进文化交流项目,如在线国际艺术节、跨国文化工作坊等,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艺术家、学者与国际同行合作,共同创作融合中西元素的文化作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此外,还应重视语言翻译和文化注解工作,以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准确性和深度。可以利用机器翻译技术和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帮助外国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寓意。当然,

推进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关键靠人才。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培养价值立场坚定、学科知识储备充足、国际化视野广阔的跨文化传播人才。要充分借助和利用数智技术,以新兴社交媒体平台和海外孔子学院为载体,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精准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静止于稳定社会结构中的历史定格,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动态连续且深刻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机文化体系。要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那么,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充分应用数智技术是不二途径。数智技术的推动可以让广大民众在数智网络空间中变得愈发活跃,使其深入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创作与传播,这些广泛且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目标的不竭动力之所在。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肩负着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与融通之处的文化使命,要致力于创作出更多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孕育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

#### 参考文献:

- [1]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001).
- [2] 李凤亮, 单羽. 数字创意时代文化消费的未来[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6): 44-49.
- [3] 周建新. 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悖论及其超越[J]. 理论月刊, 2024(2): 89-97.
- [4] 王育济, 李萌. 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产消机制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41-50.
- [5]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求是, 2024(8): 4-13.
- [6] 高书生.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技术路线与中心环节[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23):15.
-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7(6): 18-23.
- [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Value, Challenge and Path: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Two Creation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nabl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ANG Xiangyu, LI Xingpi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continuously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two creations” practi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nate at the same frequency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context, sharing the same vision and goal.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to effectively utiliz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assist the “two creations” practi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digit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database and infrastructure, deepening the excava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anoramic presen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precis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should be taken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two creations” practice system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two creation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ving inheritance; digit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databas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lents

# 清代越南燕行使阮辉莹的大运河书写

胡梦飞<sup>1</sup>, 程明亮<sup>2</sup>

(1.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2.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工程, 不仅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也是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越南来华使节阮辉莹于乾隆年间所撰, 书中对运河水工设施、城镇风貌及名胜古迹有着大量的记载和描述。阮辉莹对大运河的细致描绘, 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了解, 也反映了中越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其所记运河风物不仅展现了清代运河区域的社会风情, 亦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运河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 清代; 越南; 阮辉莹;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 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1-0074-05

阮辉莹(1713—1789), 越南后黎朝河静罗山人。景兴九年(1748)进士登第, 赐探花, 官至吏部左侍郎, 封都御史。年七十致仕, 赠工部尚书。《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是阮辉莹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一年(1766)间出使中国时所写日志, 记录出使沿途的风景, 以及各种公务之事, 尤以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记述最为详尽, 是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中越关系的重要史料。

清代前期, 越南出使中国的外交路线, 以广西、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直隶(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等地的水路为主要线路。<sup>[1]</sup>《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雍正二年议准, 安南国贡使进京, 广西巡抚给与勘合, 由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水路行, 回日由部照原勘合换给, 仍由水路归国。”<sup>[2]5793-5794</sup>这条线路也被称为“东线”, 是阮辉莹使团行走的线路。具体的行程为: 从广西走水路经湖南抵达湖北武昌后, 沿长江顺流东下抵达南京, 后过长江, 进入扬州仪征境内, 随后沿运河一路北上, 到达山东济宁, 再从济宁往北转陆行, 经直隶最终抵达北京; 返程时, 由北京陆行到济宁坐船, 由运河抵南京, 原路返回国内。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 阮辉莹对运河沿线的交通水利设施、城镇风貌等做了大量记载和描述, 对研究运河史和区域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地方志等史料, 对其所载清代运河风物

进行分析和考证。

## 一、阮辉莹所记运河水工设施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二十五日, 阮辉莹一行离开南京北上, 仪征是其进入大运河的第一站。仪征古称“真州”“仪真”, 运河在这里汇入长江, 是通过运河和长江向京畿地区运送粮食物资的重要港口和码头。为解决船只通行问题, 明成化十年(1474), 工部巡抚郎中郭升在仪征主持修建里河口、响水、通济和罗泗四闸, 康熙四十九年(1710)重修。“闸河长690丈, 额设闸夫120名, 浚河修闸钱粮均由盐运开支。”<sup>[3]514</sup>清人陈文述在《仪征浚河记》中云:“仪征在扬州西南五十里, 为淮南每岁百万引盐出江之所。内河自江都三汊河朴树湾新城至天池察院署止, 分淮水以西注, 约五十余里。外河自沙漫洲经捆盐洲、鲍庄、黄连港、猫儿泾, 分江水东注入河。复自河以达江, 约长四十余里, 是为干河。内河之通外河者, 自子盐河, 历响水、通济、罗泗、拦潮诸闸, 由都会桥达鸡心洲, 分东西两小支, 入外河达捆盐洲, 是为支河。”<sup>[4]178</sup>《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水利》记载:“成化十年, 工部提河郎中郭升建议置仪真外河罗泗、通济、响水、东关四闸。”<sup>[5]5793-5794</sup>

阮辉莹在其日记中, 对仪征四闸亦做了记载:“(九

收稿日期: 2024-11-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经费研究”(19CZS02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 男, 山东临沂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

月)二十五日,出小河,越扬子大江、八一港,到都会桥,此是仪征县城西门,过头闸、二闸、三闸与东关河闸,闸后有报春楼。自此河道浅狭,官置石闸,障水通舟,制如兴安之陡。”<sup>[6]109-110</sup>阮辉莹提到的“都会桥”位于原关帝庙之西,为东西走向石砌单孔拱桥。<sup>[7]152</sup>因其架于通江河上,桥下为江、淮、泗三水合流,故称“都会桥”。<sup>[8]8</sup>《康熙仪真县志》记载都会桥在关圣庙右通河西。<sup>[9]87</sup>《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三《舆地志·津梁》记载都会桥:“在关圣庙右通河西,乾隆二十年,邑人重修。”<sup>[5]128</sup>

阮辉莹等人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六日到达清江浦。他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记录了淮安清江浦闸坝设置情况:“明初都燕难于漕运,仍决黄河与淮河二水,入为头江,名曰‘里河’,以通粮道。但水势冲击,上溯颇艰,于更改苗月河分流,名曰‘越闸’。”<sup>[6]114</sup>对洪泽湖岸边的镇水铁牛,阮辉莹亦做了记载:“由清江闸历福兴闸、通济闸、惠济闸,闸溯上三草坝山,……岸上有一大铁牛,铭云‘铁牛作镇奠淮阳(扬),永除昏垫报吾皇’。”<sup>[6]115-116</sup>从其相关记述中,可以看出淮安在清代河漕治理和南北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sup>[10]</sup>

枣林闸位于微山县鲁桥镇枣林村,元延祐五年(1318)建成,明洪武十四年(1381)重建,又于明正德二年(1507)、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先后重修,是往返运河的必经之地。《康熙山东通志》<sup>[11]600</sup>和《乾隆兖州府志》<sup>[12]742</sup>均有记载。<sup>[12]742</sup>《居济一得》记载枣林闸:“上下俱不深通,故每遇天旱之年,辄有浅阻;而以上师家庄仲家浅新闸,并无浅阻之患。乙酉初夏,遇浅阻,船不得行;予设一法,令启师家庄闸板,而船仍不行;又启仲家浅闸板,而船遂通行,直过上两闸,上下俱无浅阻,此亦已试之一法也。然又须南阳、利建、邢庄多下闸板,草塞蓆贴,不使过水,则水不妄泄,而船可通行?”<sup>[13]16</sup>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记载:“二十里到枣林闸,河水坚凝,厚已一尺,闸关官先下木栅二重,岸积柳条、苇荻,刻期封闭,乃湾船于此,有枣林待闸。”<sup>[6]120</sup>阮辉莹的描述与《居济一得》的记载相互印证,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山东运河船闸的管理和运作以及船只通行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 二、阮辉莹所记运河城镇风貌

扬州历史悠久。《乾隆江都县志》记载:“古九州之一,江都为之附邑,袤延数百里,北枕三湖,南抵大江,今昔称海内一大都会,且为南北襟喉,漕运、盐司关国家重计,皆洩斯土。”<sup>[14]62</sup>阮辉莹在其日记中对扬州

的城市面貌做了简要评价:“自仪征到扬州六十五里,扬州古广陵城,街市稠广,亚于南京。”<sup>[6]110</sup>邵伯镇,古称“甘棠”,因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于此筑坝造福于民而得名。阮辉莹记载:“六十里至邵伯镇,昔谢安镇此,筑土堤成田万顷。人怀其德,比于召公,故名。对岸是邵伯湖,渡船可万余只。”<sup>[6]111</sup>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十一日,阮辉莹一行由淮安沿运河抵达宿迁:“县城临流有宿关税务厂,系是委员所管,匾‘宿迁县关’。”<sup>[6]118</sup>日记中提到的“宿迁县关”,在地方志中亦能找到相关记载。《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关:“额征税银四万八千八百八十四两,盈余银七千八百两。案:明时有中河工部分司征收,国朝康熙五年,归淮扬道;七年,归徐属河务同知;八年,复归中河分司;十七年,归淮徐道;雍正五年,改归淮安关监督管理。旧凡分设三处:一在徐州,一在宿迁城外运河西岸,一在宿迁城外黄河东岸,共征收银及盈余银如前数。”<sup>[15]403</sup>《乾隆徐州府志》记载宿迁关:“在县北运河南岸,明时有中河工部分司在夏镇、徐州、吕梁、宿迁四处征税;又有徐仓户部分司在夏镇、徐州征税。本朝康熙五年,归并淮扬道管理;(康熙)七年,改归徐属河务同知管理;(康熙)十七年,罢分司归并淮徐道兼理;雍正五年,将宿迁关归并淮安关监督兼理,今监督遣人在关征收,其黄河南岸、白洋河口及对直之运河南岸商贩往来,皆稽察焉。”<sup>[16]350</sup>

进入山东境内以后,阮辉莹对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风貌亦做了详细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日,行十里,经山东、江南石碑界。三里到台儿庄,庄属山东。自此,人家多砌砖,台高可二丈,平头无起脊。二十四日,到韩庄铺。过此,左是沛湖,即孺子濯纓处。”“六十里到夏镇,镇属江南省徐州沛县,乃汉祖故乡,今有泗亭驿及泗亭渡,帝尝为泗上亭长即此。”<sup>[6]119</sup>二十五日,到南阳驿汛。“汛属鱼台县,两边皆湖,即春秋辰棠邑,隐公观鱼于此。”<sup>[6]119</sup>越南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从其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阮辉莹对中国历史文化可谓极为熟悉。

## 三、阮辉莹所记运河名胜古迹

扬州名胜古迹众多。《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迷楼、九曲、凤池、萤苑之名,甲于前代;而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之景尤为佳丽,以至春风荡城郭,满耳拂笙歌,与夫重城向夕绛纱万户,珠翠填咽于街陌者,又天下所无也。”<sup>[14]62</sup>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记载:“穿城出拱辰门,柳木参天,可以千计。有隋苑、迷楼及二十四桥遗迹,今往往耕得金钗、石镜。其天宁寺

右行宫,……中有董子祠匾‘高明光大’。圃有芍药三十二种,惟金带圆球者不易得。城南江岸有寺,匾‘哄不得他’,僧众二百余。”<sup>[6]110</sup> 阮辉莹在这里提到的“天宁寺”在扬州府拱宸门外,原名“谢司空寺”,宋徽宗政和年间,改名“天宁寺”。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天宁寺西侧建行宫。行宫的大宫门与天宁寺山门平排,大宫门外有牌楼。进大宫门内有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垂花门、西殿、内殿、御花园等。御花园中建有大观堂、御书楼和珍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据《康熙朝起居注册》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初八,康熙帝第三次南巡途经扬州时,赐天宁寺僧广元御书“禅心澄水月”五字,“佛门堂”三字,“皓月禅心”四字,“寄怀闲(兰)竹”四字。初九,赐天宁寺僧广元御书“鹰堂”二字。<sup>[17]106</sup>

董子祠原位于扬州两淮盐运司的后堂内,是西汉儒学大家董仲舒的故居。明正德时,改建于扬州北柳巷,当时称“正谊祠”。康熙南巡时,赐“正谊明道”匾额,于是改称“董子祠”。<sup>[17]144</sup> 康熙年间,漕运使朱之瑞、转运使刘德芳都曾对其进行重修;康熙四十四年(1705),御书“正谊明道”匾额悬于祠中;乾隆八年(1743),转运使朱续晔买下了其原址旁边的一处宅院,对其进行了扩建。<sup>[18]817</sup>

扬州芍药自宋代始,集中栽植在扬州市东郊沙口翟家庄一带。清陈撰子《花镜》说“芍药唯广陵(扬州)者为天下最”。扬州芍药经过历代园艺家的培育,现品种已多达70多种,其中以金带围、观音面、大富贵、铁线紫、胭脂点玉、白玉楼台、虎皮交辉、金玉交辉最为有名,称扬州八大名种。<sup>[19]171</sup>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冈西录》记载:“扬州芍药冠于天下。乾隆乙卯,园中开金带围一枝,大红三蒂一枝,玉楼子并蒂一枝,时称盛事。”<sup>[20]260</sup>

阮辉莹在日记中提到的“城南江岸有寺”,根据位置判断,该寺庙很有可能指的是“高旻寺”。《乾隆江都县志》记载:“扬州郡治四通八达,为东南都会,江都附郡最称繁剧。……其河之上下多沃壤,民乐业其中;东南有张纲沟、大桥、嘶马诸镇,地濒于江潮汐沂通,生殖甚繁;又迤邐而南则江洲,可居之地棋布星列,足为内蔽,田肥美,人殷富,盖邑之奥区也;又正南则高旻寺,浮图屹然拱峙,据三面水,一由真州入江宁,一由瓜洲下镇江。”<sup>[14]60</sup> 《扬州画舫录》卷七《城南录》记载高旻寺:“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扬州运河之水至此分为二支:一从仪征入江,一从瓜洲入江。岸上建塔名天中塔,寺名‘高旻寺’,其地亦名‘宝塔湾’,盖以寺中之‘天中塔’而名之者也。”<sup>[20]109-110</sup>

在由扬州沿运河北上的过程中,阮辉莹对其沿岸

风景亦做了详细记载:“行七里至王台山,江上有香阜寺,匾‘名香清梵’。”<sup>[6]</sup> 香阜寺位于扬州江都县运河东岸,此地土阜隆起,如龙之昂角。香阜寺原称五台寺、天心寺,始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三十八年(1699)御书“香阜寺”匾额。<sup>[17]122</sup> 《乾隆江都县志》记载香阜寺:“在便益门外,旧名五台山,国朝康熙二十二年,僧野静始创寺;三十八年,御赐‘香阜寺’额,金刚药师经各一部,渊鉴斋字帖一套,观音唐诗五言绝句一幅;四十二年,又赐‘名香清梵’四字额。”<sup>[14]478</sup> 《大清一统志》记载香阜寺:“在江都县东黄金坝,旧名五台山,本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幸其地,赐名香阜寺,‘名香清梵’额并墨宝法物;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皇上南巡,御制额联并有御书诗,并赐墨宝恭藏于内。”<sup>[21]2475-2476</sup> 《民国续修江都县志》<sup>[22]458</sup> 亦有记载。

阮辉莹记载:“道社湖畔有露筋娘娘祠,门牌题‘留芳今古’,殿内匾‘名节芳躅’对联云。”<sup>[6]111</sup> 阮辉莹在这里提到的“露筋娘娘祠”即高邮的“露筋祠”。露筋祠,又称“贞应祠”,俗称“露筋娘娘庙”,位于扬州江都区原渚洋乡运河西岸,祀唐代某贞女,始建年代不详。清朝方志中对露筋祠多有记载。《乾隆江都县志》记载露筋祠:“在邵伯镇北三十里,事见《列女传》,宋米芾有庙碑,国朝康熙四十六年,赐‘节媛芳躅’四字额。”<sup>[14]217</sup> 又《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在甘泉县邵伯镇北三十里,康熙四十六年,御赐‘节媛芳躅’匾额。”<sup>[23]2193-2194</sup> 《大清一统志》<sup>[21]2474</sup>、清人董醇《甘棠小志》<sup>[24]200-201</sup> 亦有记载。

十一月初一,阮辉莹一行抵达高邮县城。“住承天寺,寺制极高且大。”<sup>[6]112</sup> 阮辉莹在这里提到的“承天寺”,全称“承天大梵讲寺”,位于高邮城北门外。《雍正高邮州志》记载承天大梵讲寺:“在州治北新城多宝楼桥西,元至元年间,把常大士建;洪武、永乐、宣德、正统间,僧祖拳、得玠、惠能、永中俱增修;隆庆五年,耆民夏新、柴茂重修。”<sup>[25]405</sup>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亦有记载:“在多宝楼桥西,光绪二十二年,正殿灾,僧克朗募集巨款重建;(光绪)三十一年,邑人就其西院开设公益小学堂。”<sup>[26]242</sup>

在离开高邮后,阮辉莹等人前往宝应,对宝应城内的忠烈庙、碧霞宫等古迹亦做了记载:“行一百二十里到宝应城。县古名安宜,有忠烈庙,匾‘佑我蒸民’,是祠纪信,俗传最能护童子者。临江有碧霞灵迹,二重门,左祀岳武穆像,殿内匾‘望岳明祀’,后楼匾‘圆通自在’。碧霞娘娘是泰岳禅神,敕封‘天妃元圣’,自此在在多有行宫。”<sup>[6]112</sup> 这里的“忠烈庙”指的应是宝应县的“城隍庙”。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城隍庙所供

奉的城隍神多为“纪信”。纪信为刘邦部将,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围困荥阳,危在旦夕之际,纪信假扮刘邦直出东门,声言降楚。刘邦乘机从西门逃脱。假降计被识破后,项羽把纪信活活烧死。纪信以“荥阳误楚,身殉汉皇”,博得“汉代孤忠”美名。<sup>[27]262</sup>《嘉靖宝应县志略》记载城隍庙:“在东南隅,洪武四年,知县王骥造;天顺间,知县李伸重建,庙前为忠祐桥;嘉靖五年,知县闻人途有记。”<sup>[28]23</sup>《万历宝应县志》记载:“城隍庙在县东南隅,洪武四年,知县王骥建……(嘉靖)四十三年,知县李瓚重修;万历十一年,知县韩介重修;二十二年,知县陈燧重修。”<sup>[29]94</sup>《民国宝应县志》亦有记载。<sup>[30]43</sup>历代宝应县志中均未提及城隍庙所祀神灵为“纪信”,阮氏的记载对于研究宝应县城隍庙的历史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日记中提到的“泰山殿”位于宝应县城北首古运河旁,原为“晏公庙”。明嘉靖四十年(1561)在此建碧霞宫,主祀碧霞元君。《万历宝应县志》记载晏公庙:“在北门外,洪武十七年,邑人钮常建,后废,今即其地建碧霞宫。”<sup>[29]49</sup>碧霞宫:“即晏公庙旧址,嘉靖四十年建,殿宇弘敞,楼阁辉映,为江淮巨观。”<sup>[30]50</sup>阮氏的记载无疑可与地方志相互印证,为我们了解宝应泰山殿的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史料。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十一日,阮辉莹一行由淮安沿运河抵达宿迁。在其日记中,阮辉莹记载了宿迁城内的项王祠、寿天禅寺:“行一百五十五里,经宿迁县城,城外有项王祠,有虞像在侧,匾‘英雄情钟’。江阜左有寿圣禅林,匾‘昙云妙谛’。”<sup>[6]117</sup>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还记载了宿迁皂河龙王庙:“五十里到皂河口,与盛老行,后诣金龙庙谢风。查自杨家至此二百三十五里路。庙临黄河岸上,正殿匾‘福佑荣河’,中门匾‘五色云生’。”<sup>[6]118</sup>皂河龙王庙在今宿迁西北20公里的皂河镇南端,建于清康熙年间,供奉金龙四大王、禹王、东海龙王等神。《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其建于康熙年间,雍正五年(1727)奉敕重修。<sup>[15]432</sup>《同治徐州府志》卷一记载:“御书皂河龙王庙匾额‘福佑荣河’,联:‘惠泽澄涵资利涉,神功普应叶安澜。’”<sup>[31]38</sup>匾联题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初二第二次南巡回銮之时。皂河龙王庙御碑亭北是怡殿,怡殿正门悬“五色云生”大匾一方。阮氏对皂河龙王庙的记载,为我们考证其历史沿革及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

## 结语

大运河是连接中国南北的纽带,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窗口。这种对运河文明的跨域书写与阐释,成为大运河形象的域外见证,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sup>[32]</sup>以往学者对朝鲜、日本及西方学者的运河旅行日记研究较多,而对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中的运河景象则较少关注。有清一朝,中越使节交往频繁,越南使节对沿途的地理景观和人文风情多有描述。在众多中国景观风貌中,运河及其沿线风物无疑也成为越南使节关注的对象。通过记录大运河,越南使者不仅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也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越南使者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才华,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赞赏。

与其他国家的燕行文献相比,《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虽略显简略,但却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阮辉莹通过对大运河风貌的细致描绘,展示了大运河在彼时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分析和考证其内容,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大运河的了解和认识,亦可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照,对于推动大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运河故事,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邢幸.越南使臣入清京师路线考述:以汉文燕行文献为中心[J].历史地理,2017(1):130-138.
- [2] 大清会典则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 [4] 陈文述.颐道堂文钞[M].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 [5] 王检心,修.刘文淇,纂.道光重修仪征县志[M].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 [6] 阮辉莹.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M]//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仪征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仪征文史资料:第8辑[Z].内部资料,1992.
- [8] 仪征县地名委员会,编.江苏省仪征县地名录[M].扬州:仪征县地名委员会,1983.
- [9] 汤有光,纂.马章玉,增修.康熙仪真县志[M].清康熙三十二年增修本.
- [10] 胡梦飞.越南燕行使者笔下的淮安:以《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中心[J].淮阴工学院学报,2022(4):1-6.
- [11] 赵祥星,修.钱江,纂.康熙山东通志[M].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 [12] 觉罗普尔泰,修.陈颀联,纂.乾隆兖州府志[M].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3] 张伯行.居济一得[M].清同治正谊堂全书本.
- [14] 五格,修.黄湘,纂.乾隆江都县志[M].清光绪七年重刊本.
- [15] 李德溥,修.方骏谟,纂.同治宿迁县志[M].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 [16] 石杰,修.王峻,纂.乾隆徐州府志[M].清乾隆七年刻本.

- [17] 故宫博物院. 康乾南巡匾额楹联通解[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7.
- [18] 阿克当阿, 修. 姚文田, 纂. 嘉庆扬州府志[M]. 清嘉庆十五年刊本.
- [19] 武占坤, 主编. 中华风土谚志[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 [20]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4.
- [21] 和坤, 主编. 大清一统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 钱祥保, 修. 桂邦杰, 纂. 民国续修江都县志[M]. 民国十五年刊本.
- [23] 赵宏恩. 乾隆江南通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4] 董醇. 甘棠小志[M]. 清咸丰甘棠董氏刻本.
- [25] 张德盛, 修. 王曾禄, 纂. 雍正高邮州志[M]. 清钞本.
- [26] 胡为和, 修. 高树敏, 纂.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M]. 民国十一年刊本.
- [27] 李剑平, 主编. 中国神话人物辞典[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28] 闻人谄, 修. 杨周南, 纂. 嘉靖宝应县志略[M]. 宁波天一阁藏明刻本.
- [29] 陈燧, 修. 吴敏道, 纂. 万历宝应县志[M]. 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 [30] 戴邦楨, 修. 冯煦, 纂. 民国宝应县志[M]. 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 [31] 吴世熊, 修. 刘庠, 纂. 同治徐州府志[M].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 [32] 李刚. 京杭大运河文化形象的跨域书写与解读[J].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8(5): 11-16.

## The Grand Canal's Writing by Nguyen Huiying a Vietnamese Envoy to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U Mengfei<sup>1</sup>, CHENG Mingliang<sup>2</sup>

(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Grand Canal is not onl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ancient Chinese working peop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he General Song and Diary of the Envoy of Yanjing* was written by Nguyen Huiying, Vietnamese envoy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recorded his experiences on the way to China. The book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canal hydraulic facilities, urban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sites,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Grand Canal traffic history, urban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Qing dynasty. His delicate depi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shows his keen interest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reflect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Sino-Vietnam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Canal scenery recorded in it, it not only shows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Canal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s a more diversified and unique perspective for the spread of the Canal culture and the telling of the Canal stor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Vietnam; Nguyen Huiying; *The General Song and Diary of the Envoy of Yanjing*; the Grand Canal

#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山东运河区域方志所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周嘉，赵传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地方志是研究区域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明清时期大运河的贯通进一步推动了方志业的发展。运河区域各级市镇都纂修了大量志书，保存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许多史料，揭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与途径。对山东运河区域方志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山东运河区域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山东运河；地方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C95；K249；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1-0079-06

自2010年国家正式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下文简称“民族‘三交’”）这一理念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成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核心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的民族工作中具有突出实践意义”<sup>[1]</sup>。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加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sup>[2]</sup>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再次强调：“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sup>[3]</sup>民族“三交”因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至今依旧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当前，学界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民族“三交”进行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例如，巴晓峰<sup>[4]</sup>、徐灿<sup>[5]</sup>、王平<sup>[6]</sup>、孙守朋<sup>[7]</sup>等学者通过碑刻、家谱、游记等资料，探索其中所蕴含的民族“三交”历史。即在研究民族“三交”的过程中，各类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它们是民族“三交”的重要载体，能够最大程度还原民族互动的真实面貌。李全中<sup>[8]</sup>、潘清<sup>[9]</sup>、张景明<sup>[10]</sup>、王明德<sup>[11]</sup>等学者则以某

一地区为研究对象，金炳镐<sup>[12]</sup>、赵健君<sup>[13]</sup>、马瑞雪<sup>[14]</sup>、孙进己<sup>[15]</sup>等学者对“三交”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产生机理进行了研究，对当下国家促进民族融合有积极意义。

山东地区有着悠久的运河开发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菏水以及连接济、淄的河渠，东晋太和年间有桓公沟，隋唐时期有永济渠，北宋时期有开封至定陶的五丈河。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将运道裁弯取直，相继开挖济州河与会通河，使得南北运河全线贯通。明朝永乐年间，重新疏浚会通河，并修建了戴村坝等各级闸坝，引汶河之水汇入运河，开南阳新河，大大便利了运河交通。山东运河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部，最南端为台儿庄，运河由此向西向北蜿蜒，经过济宁、泰安、聊城、临清，穿德州进入直隶地区，长度约为大运河总长度的三分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山东运河的畅通，引起了沿岸城乡及辐射区域剧烈的社会变迁，<sup>[16]</sup>对山东运河区域的文化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山东地区的文化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生产生活习惯。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南北方文化得以交流、融合，各民族也借此交往交流交融，对山东运河流域及周边区域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推动了这

**收稿日期：**2024-11-13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大运河区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整理与研究”（2023-GMA-017）；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京杭大运河商业文化与区域社会研究”（23CLCJ03）；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李奉翰治河档案整理”（202403）。

**作者简介：**周嘉（1983—），男，山东莱西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运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各地书院林立，“人文飏起，名卿蝉联”，文化气氛十分浓厚，为方志的繁荣奠定了交通与人才基础。

学界虽然已经形成了对特定史料或特定空间的研究，但是，对于方志这一重要文献中记载的民族“三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本文将在民族“三交”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下，进行时空相结合的个案研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流动四个层面，选取山东运河区域为研究范围，以地方志为基本史料，挖掘其中所涉民族“三交”史实，探讨山东运河区域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总结山东运河区域民族“三交”的特点与途径，从而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运河区的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 一、政治层面：硝烟散尽，走向和平

李奉翰在《乾隆永平府志序》中曾谈到：“志者，固辅治之书也。”<sup>[17]</sup>就搜集到的史料而言，方志中记载的政治方面的资料最多。当然政治方面的民族“三交”也最具代表性。方志中记载了不同时间段中不同民族在该区域进行“三交”的历史，包括政权建立、不同政权之间的相互征伐等。山东运河区域的民族“三交”史对应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大融合史，即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之交—元明清时期。

据《德州乡土志》记载：“厉幽以降，野民聚党为群，河、漯之间为戎所据，桓公略地后收入于齐。燕乐毅将诸侯之师取齐灵邱，破之济西，经由今州地。”<sup>[18]</sup>又有《乾隆东昌府志》载：“辛巳十二年（公元前 640），齐人、狄人盟于邢。”<sup>[19]</sup>这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在今天的山东区域已经出现了民族间的争战与会盟，可视为民族“三交”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羌、羯、氐、匈奴等民族都在本区域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在这段战乱纷争的历史时期，山东各地都存在着民族间的冲突与相互征伐。“永嘉元年（公元 307）丁卯，荀晞大破汲桑于东武阳，桑退保清渊，荀晞追击。”<sup>[20]</sup>频繁战争促进了当时临清地区民族间的交往。前秦（氏族）皇始三年（公元 353）十一月，“故赵乐陵朱秃、平原杜能、清河丁烧、阳平孙原各拥兵据城邑来请降。燕以秃为青州刺史、能为平原太守、烧为立节将军、原为兖州刺史，各留抚其营”<sup>[21]</sup>。后赵（羯族）乐陵、平原、清河、阳平地区各地方长官率兵投降前燕（鲜卑族），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东晋成帝咸

和八年（公元 333），“赵丞相石虎以羌帅姚戈仲率众数万居清河之滹头”<sup>[19]</sup>。后赵丞相石虎（羯族）派羌族将军姚戈仲率军前往清河地区，说明东晋时期的聊城地区已经是少数民族的实际掌控区，民族间各种形式的交往频繁。

唐宋之交，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粟特、沙陀、突厥、铁勒、回鹘等西部少数民族逐渐向中原地区靠拢。在《道光东阿县志》中，记载了唐高宗时突厥人阿史那贺鲁叛唐自立，程知节带兵前往镇压的历史事件：“显庆二年（公元 657）授（程知节）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师次怛笃城，有敌人数千家开门出降，知节屠城而去，贺鲁遂即远遁。”<sup>[22]</sup>方志中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以平原太守颜真卿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共同阻击粟特人安禄山带领的叛军：“十二月，东平太守吴王祗、濮阳人尚衡、平原太守颜真卿均起兵讨贼。诏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锐济河为助。”<sup>[21]</sup>对于同一事件，《德州乡土志》中是这样描写的，“真卿使亲客怀购贼牒诣诸郡协谋举兵讨贼，克魏郡，收禄山将袁知于堂邑，执逆党段子光腰斩以徇，于是山东诸郡共推真卿为盟主，军声大振”<sup>[18]</sup>。唐宝应元年（公元 762），突厥人史朝义败走贝州（今河北清河），铁勒人仆固瑒与其战于临清：“壬寅宝应元年（公元 762），史朝义走贝州，与两节度使合，仆固瑒追至临清。朝义引兵攻之，瑒设伏击之，败走。”<sup>[19]</sup>唐元和四年（公元 809），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契丹族）割让德州、棣州上献朝廷，“九月承宗劫昌朝，囚之。十月私移长河县于白桥永济河西岸，帝以田涣为二州团练，使诏令归昌朝，承宗拒命，帝遣吐突承璀讨之”<sup>[23]</sup>。沙陀人杨光远引诱契丹兵陷贝州：“甲辰晋开运元年（公元 944）春正月，杨光远诱契丹入寇，契丹陷贝州。权知州事吴彦死之。二月契丹渡河，晋主自将及遣李守贞等分道击之。”<sup>[21]</sup>宋朝时，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实力日渐强大，经常寇掠宋北方地区，宋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经常爆发矛盾冲突，但也以这种方式进行持续的民族交融。“庚子三年（1000）春正月，莱州防御使田绍斌以功进秩，契丹至瀛洲，都部署康保裔力战死之。契丹遂自德、棣、济河掠淄、齐而去。”<sup>[21]</sup>，“契丹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大举入宋，陷德清军，遂抵澶州，萧后驻兵于阳谷。”<sup>[24]</sup>宋真宗时契丹入侵中原，阳谷为萧太后驻兵之地，说明女真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在山东地区有活动痕迹。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以及前辽主之弟昝览率军攻宋，至澶渊地区，在馆陶东南修筑小城以供休息，后人名萧城。

元明清时期,尤其是元代和清代,由于政权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因此朝廷的各种做法为即可视为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点在山东运河区域体现得十分明显。首先,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前期会经历一个与前朝统治者或者农民起义军争夺势力范围的过程,此过程中,战争冲突是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例如“己未开庆元年(1259)夏六月,蒙古皇弟忽必赉(忽必烈)次濮州”<sup>[21]819</sup>。“中统三年(1262)济南李坛反,蒙哥力战死之。”<sup>[1]813</sup> 顺治年间,反清起义军宋鸭蛋等进入高唐州,被清廷平定。在明末清初有多支反清军,彼时民族间以斗争的方式进行交往。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对山东进行了持续一个月的进攻,造成“残破者八十余处,兖州残破者十九处,环攻济宁,力守不下,至今称南北雄镇,以速有备也”<sup>[25]411</sup>。其次,在顺利入主中原之后,统治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如开通大运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283)癸未,长江、淮河等航运要道淤塞,世祖便命令兵部尚书粤鲁花赤从任城开渠,导汶、洸、泗水一路向北,至须城安山进入汶水和济水故道,经东阿至利津入海,至此航运渐通,漕粮得以顺利北上。又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命断事官忙达儿、尚书张孔孙、郎中李处巽等开会通河,置都水分监于景德镇(今张秋)”<sup>[26]54</sup>。以上举措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除此之外,朝廷还通过各种手段赈济灾民,以收人心平天下:“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十二月饥,遣尚书武鼎赈之。”<sup>[27]244</sup>“乾隆十三年(1748)春饥,诏免地丁银两。”<sup>[24]428</sup>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一月康熙皇帝南巡回京途中,“经往平高唐恩县有赦”<sup>[19]105</sup>,足见清代皇帝南巡也是一种维持国家安定的手段,此过程也是民族交往交流的一个过程。再次,在统治后期,百姓不满朝廷统治,起兵反抗,战事再起。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分道渡河,徇河北地师次临清,遂引而北克德州至通州,帝北奔”<sup>[21]827</sup>,标志着元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崩溃。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王伦起义,“起于寿张,滋扰阳谷至临清”<sup>[24]429</sup>,后被满汉官兵合力围剿荡平。咸丰“五年乙卯(1855)春二月,僧格林沁收复高唐,贼窟踞在平之冯官屯,旋即荡平,州境以安”<sup>[20]59</sup>,后一举荡平太平军。

## 二、经济层面:胸怀天下,哈达传情

民族间经济层面的“三交”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以及朝贡、商贸互动、

对外贸易等,还有朝廷关于经济制度的制定等。赋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因此在经济层面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以赋税的形式进行,政府通过蠲免赋税等方式来表达对于民众的关心与体恤,本质上也是一种稳定民心、巩固统治、促进民族团结的方式。

《光绪山东通志》的《列圣训典》记载,每逢遭遇旱灾、水灾、粮荒,清廷便以各种形式积极赈恤。如“朕(雍正)思被灾地方有轻重不等,若被灾既重,即征收漕米一半,闾阎亦觉艰难。着山东巡抚于四十三州县五卫所之中悉心详查。其被灾稍轻之处,仍照部议缓征一半;被灾重者准其全缓”<sup>[21]47</sup>。1731年“上谕内閣: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从前积谷甚多,因去年水灾之后,朕特命大臣动发仓粮赈济,用谷一百八十余万石,又念今春二三月间,青黄不接,小民粒食维艰,再发仓谷二十万石,重赈两月,是三府各州县存仓谷石,俱作赈济之用。虽登莱青三府,尚有存仓之谷百余万石,而转运甚难,与济、兖、东三府无益”<sup>[21]50</sup>。“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丙戌上谕:军机大臣等,据山东巡抚阿里衮奏称,德州仓已经截留漕米五万石,足资接济。今又令将漕粮五万石原船带运德仓,先后共截留十万石,为数过多,不如分贮临清、济宁二处近河一带州县,有需用之处可以随时酌拨等语。”<sup>[21]58</sup>“嘉庆二十四年(1819)秋九月,河决武涉,由张秋归大清河入海,腊月十九日夜雨树凝冰,枝多折,诏普免山东历年民欠正耗银米。”<sup>[24]430</sup>此外还有“自禹城辖境,以至商河及徒骇河南岸滨州地段,堤工均着次第堵筑,应用经费除该省已筹款项外,不敷银两尚巨,着户部如数支拨的款以资工用”<sup>[21]54</sup>。这些措施不仅有效缓解了灾情,救百姓于水火,也促进了各地民众对满族的接纳与认可,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乾隆年间清政府在临清钞关“改设满、汉官各一员,监督户、工二部,分权商税、船料,岁额二万余,减明额之半而榷之,署关悉仍旧制”<sup>[20]390</sup>。《民国德县志》记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冬巡泰山,驻蹕德州,诏令减免当年钱粮十分之三,赏赐兵、民年七十以上者。山东巡抚爱必达未请示朝廷批准,在德州修建恩泉行宫。次年乾隆再至德州,见行宫过于奢华,作《德州行宫示山东大小吏》诗,批评地方官吏先斩后奏、耗资费财。

清时,临清的哈达可谓首屈一指。随着大运河的畅通,哈达的生产技术、生产模式、商家商号等等都不断向全国各地扩展,在临清形成了独特的哈达业,其繁盛时期远销今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哈达的生产和销售见证了汉族和蒙古族、满族之间的

交往。《康熙临清州志》中提到当地手工产品有“布、丝、手帕、幌、毡、裘……”<sup>[27]44</sup>《民国临清县志》有载“前清季世最为发达时期，全境机房七百余，浆房七八处，收庄十余家，织工五千人。其织机有大小之别，出品有净货、浆货之分。净货为佛像、佛字、丈哈达、八宝、通面等。浆货为浇花浆、本丈绢等。统售销于内、外蒙古及察绥等地”<sup>[20]134</sup>。哈达在方志中的记载，由最初的寥寥几笔到后来的重点着墨，从一开始的简单提及到最后的详细描述，无不体现出哈达业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而不断壮大。它不仅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还肩负起促进汉族、满族和蒙古族之间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关键角色。

### 三、思想层面：儒学为本，双向互动

思想文化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能够主动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并提倡儒学、文教，进而在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学习、继承，由此推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康熙在平县志》中有一篇圣庙记，题目已无法辨别，但内容保存较全，“今民匠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抹兀，为县达鲁花赤暨县尹侯永祚重葺庙庑。……大德十一年（1307），抹兀重治焉。……又三年，达鲁花赤伯颜、县尹裴珪遵制作东西亭于两庑之次，以图十儒像，然殿尚卑小，靡称尊敬之仪。五年，县尹魏君口<sup>①</sup>、达鲁花赤沙不丁撤旧改作大殿，闳深雄丽，实为伟观”<sup>[28]371</sup>。这段描写记述了元朝至元年，蒙古族统治者与汉族士绅合力修理、布置当地庙学的事情，可见彼时蒙古族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并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因此带来的民族间交往和合作。元、清两朝统治者多次加封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仁宗延祐三年（1316），封孟子父孟系氏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文宗至顺元年（1330）改封孔子父为启圣王，母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充国复圣公；曾子邾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顺帝元统三年（1335），封颜子父无繇为口国公，谥文。国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朱熹于堂值次十哲”<sup>[29]58-59</sup>。这正说明元、清两朝重视儒学的发展，并希望借此稳固统治。这种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在思想文化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交融。“至元二十四年（1287）郑尹德邻实改筑大成殿，余役有所未暇。越二十有七年，奉议大夫、高唐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尹利用至，奠谒礼成，叹两庑卑陋未称，且地基狭隘，礼殿

之后仅容讲肆，而生徒弦诵之舍无所，谋于监郡武略将军干朵忽都、同知州事张居大、判官马誉，同出俸金，言举斯役。会邻有隙地，厚其值市之。前徐州判官刘守仁义不受值，斥所居之地乐施，遂得增益宽敞。左庑外有地，故隶于官，亦割而归之。乃新作东西庑，赋功庀役，监尹分董之。”<sup>[29]251-252</sup>这一合作可以看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家文化，并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体现了民族间良性的文化交流。“关圣庙在西城，上元天历己巳（1329），东昌府总管达鲁花赤伯颜不花修”<sup>[20]364</sup>，可见道教神话传说、汉族民间信仰已被少数民族接受。

在明清时的中国精通汉儒经学的回族被称为“回儒”。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儒家学说不仅增加了个人的学识，也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明末清初的南京，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思想、著作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即“伊儒会通”或“以儒诠经”。他们“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尊崇孔孟文化，对儒家思想中的“仁义”“忠孝”“纲常伦理”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以此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把伊斯兰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元明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与繁荣，众多伊斯兰教教徒和回民商贾落户济宁，在此修建清真寺，宣扬伊斯兰教。到了明末清初，以常志美、常杰、李永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结合儒学、理学、心学而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由于地处儒家发源地，在实践中“伊儒会通”、独树一帜，因此被称为“山东学派”。“山东学派”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它积极吸收儒学伦理，强调忠君爱国，重视学问与品行，提倡经学教育要破除陋习，培养新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回汉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与交融。

### 四、社会层面：跨越地区，流动共赢

民族间的社会流动，打破了过去民族隔离的状态，丰富了山东地区的民族构成，为民族共同体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西晋时期，民族之间人口流动频繁，包括整体性迁徙和个别人口流动，如“咸和四年（公元329）己丑秋，赵徙氏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二州”<sup>[20]53</sup>。由此看出临清地区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及由此引起的民族交往。“建威将军闾粹说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石勒被掠，卖为茌平人师僮奴，僮奇其状貌免之。僮家邻于马牧，勒乃与牧师汲桑结壮士为群盗。桑始命

① 因原字无法辨认，故以口代替，下同。

勒以石为姓,勒为名。”<sup>[19]54</sup>由此可知西晋时期,民族之间人口流动频繁。《德州乡土志》则对德州地区回族人的社会流动作了记载:“本境于满、汉户口外,有回民一种,温安二姓一种,皆奉回教。回民来德之始盖已莫能考,年久生息蕃衍,散居于城外南营、北营、西关及东乡夏家庄、五间房、白家集,南乡甜水堡、三十里堡、达官营、梁家庄、宋家庄,西乡之赵鲁屯、北乡之柘镇,与齐民相处而不通婚姻。又因宗教之异,风俗礼仪间有与汉人不同者。温、安二姓,苏禄国王之裔。苏禄国在东南海中,明永乐中其王巴图噶巴达喇来朝,归至德州,卒,遂奠焉。以其次子温哈喇、三子安都鲁及侍从十余人守墓。当时因言语不通,其与汉人相接皆回民,导之子孙遂习于回俗,而奉其宗教。国朝雍正中,查明苏禄国王留德守墓子操以温、安为姓,二姓各立奉祀生一名,现有五十六户,散居北营、西关,与回民世为婚媾。”<sup>[18]183-184</sup>由此可知,德州地区的回族分布广泛,在当地的多个区域都有回族聚居区,足可推断当时民族间流动及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同时,明朝时苏禄国王在德州去世后,明廷为其修陵筑墓,其家属后人在此守墓也对当地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裔成了当地回族的一支血脉,在当地生根发芽,与其他民族进行了持续数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雍正九年(1731),朝廷同意他们“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sup>[30]612</sup>,这既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后裔们国家认同和祖先认同变迁的结果,入籍后的苏禄东王后裔成为中国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sup>[31]</sup>

方志中记载了一批为山东地区造福的少数民族官吏和籍贯为山东地区而在边疆地区为国家民族事业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迁徙虽是个体的、官方的,但他们积极融入当地,不仅身体力行地与当地人民交往交流,还利用自己的身份积极促进当地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受到了官民的一致爱戴。

元至正九年(1349),蒙古族人脱脱面对山东沿河沿运地区发生的水灾,“即言于帝请躬口其事。帝嘉纳之,乃命集群臣议廷中”<sup>[22]889</sup>。蒙古族官员耶律伯坚“为恩州同知,凡赋役重者,辄曰宁得罪于上,不可得罪于下,必力诤止之”<sup>[21]2290</sup>。女真人乞石烈·延年在做平原尹时,“修庙学增礼器。方春劝课各乡子弟孝弟,力田有赏,荒惰弗艺有罚。革吏胥之弊,惩往来之扰。定力役法,著甲乙籍”<sup>[21]2296</sup>。蒙古族人忽都纳世代监理高唐,致力于发展农业,受到百姓的赞颂并为之立碑。有《高唐斡朵忽都政绩碑》以记之。元延祐年间(1314至1320),大都间任在平达鲁花赤,置书5000卷于学宫,

他们均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作出了贡献。

派往西南边疆的一批德州籍官员,在西南民族交往史上留下了印记。如张惠任监察御史巡按云南时招抚当地土官,平定贵州少数民族叛乱。<sup>[30]56</sup>杜萱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时,“土寇木邦作乱,萱奉檄往谕之,出入白刃间,志不少懈,寇难遂平”<sup>[22]554</sup>,为云南的改土归流政策的顺利实施作出了贡献。田雯任贵州巡抚时,“粤省方议会剿苗种,雯阻之议遂寝。有十二州县未设学,(雯)请立之”<sup>[23]442</sup>,维护了当地的安全,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兴起。又有孙勳在督学贵州时,“择士之秀者,集黔阳书院亲教之……巡历各郡,扫除陋例,及代资斧不具,黔抚刘荫枢密疏荐之”<sup>[23]447</sup>。石云俸“特授西路副将军挂振威将军印。甫至边,于土古鲁及巴尔库尔之东、西、北三面设卡巡踪贼踪立三法,日以尘扬辨,夜以烟火辨,雪天以脚印辨,瞭望十分严密,整顿驼马、器械、牧厂、添兵防范,屡立功”<sup>[23]456</sup>。又有雍正二年(1724),马国栋授予武进士后,“亲督率军民辟草,莱定疆界,勒口艺土,膏尽出田以沃饶。奉檄与准噶尔清界,领五百军夜渡瀚海,准噶尔兵屯木垒、乌兰乌苏,国栋分兵五队,伏叉路外,一人,一骑家丁,一通事,一捧部檄。入塌滩相见,不卑不亢,议遂成界,各守其旧。”<sup>[23]458</sup>

## 结语

从以上山东运河区域方志文献中所记的史料来看,山东运河区域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雏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往更为密切,到元明清时期到达顶峰。在这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民族“三交”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山东运河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之间虽然有碰撞与矛盾,甚至产生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但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依旧是主旋律。

当前学界对于在这一进程中作出贡献的个体,仍需给予更多关注。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许多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仁士循吏涌现出来。他们摒弃民族偏见、胸怀天下黎民,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史为鉴,在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时,我们应该强调民族共性和平民史观。秉持“石榴籽”精神,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国家和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坚持共同繁荣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高永久, 杨龙文.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概念内涵与逻辑依循[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4): 13-21.
- [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4-09-30(1).
- [3]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 人民日报, 2022-03-06(10).
- [4] 巴晓峰. 河南开封回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基于开封清真寺碑铭的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127-134.
- [5] 徐灿, 丁晓昌. 文书视域下清代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6): 192-198.
- [6] 王平, 田小玲. 《容美纪游》: 一部反映历史上汉族土家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古籍[J]. 民族大家庭, 2023(3): 27-31.
- [7] 孙守朋, 宋清颖. 从满族家谱探析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1(6): 10-18.
- [8] 李全中, 张军. 试探川西北地区的民族交流与融合[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0(1): 74-77.
- [9] 潘清. 元代江南文化风习与民族关系[J]. 学海, 2000(3): 157-161.
- [10] 张景明, 肖瑞. 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区位优势及其在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贡献[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3(5): 60-75.
- [11] 王明德. 运河: 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J]. 广西社会科学, 2011(2): 89-92.
- [12] 金炳镐, 肖锐, 毕跃光. 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66-69.
- [13] 赵健君. 论民族交往[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2): 14-18.
- [14] 马瑞雪, 李建军, 周普元, 等. 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35-46.
- [15] 孙进己. 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J]. 史学集刊, 2003(1): 10-15.
- [16] 王云.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乾隆永平府志[M].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李奉翰序.
- [18] 佚名. 德州乡土志[M]. 影印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 [19] 胡德琳, 修. 周永年, 盛百二, 等. 纂. 乾隆东昌府志[M]. 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 [20] 张自清, 修. 张树梅, 王贵笙, 纂. 民国临清县志[M].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21] 杨士骧, 等. 修. 孙葆田, 等. 纂. 光绪山东通志[M]. 影印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5(民国四年).
- [22] 李贤书, 修. 吴怡, 等. 纂. 道光东阿县志[M]. 影印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 [23] 王道亨, 修. 张庆源, 纂. 乾隆德州志[M]. 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 [24] 董政华, 等. 修. 嘉靖阳谷县志[M]. 影印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 [25] 徐宗干, 修. 许翰, 纂.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M]. 咸丰九年刻本.
- [26] 林芄, 修. 马之驩, 纂. 康熙张秋志[M]. 影印本.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27] 龙图跃, 纂修. 康熙高唐州志[M]. 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 [28] 王世臣, 修. 孙克绪, 纂. 康熙茌平县志[M]. 影印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 [29] 于睿明, 修. 胡悉宁, 纂. 康熙临清州志[M]. 康熙十二年刻本.
- [30] 何洪, 修. 郑灏, 纂. 嘉靖德州志[M]. 明嘉靖七年刻本.
- [31] 郭福亮. 从客居“王裔”到入籍“平民”: 德州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认同[J]. 回族研究, 2015(1): 54-58.

## Though Distant Deographically, the Mainland and the Frontier Enjoy Similar Cultures —Research on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n Shandong Canal Area

ZHOU Jia, ZHAO Chuan

(Institute of Canal Studi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Local Chronicles are an indispensable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nn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ronicles. All levels of towns in the Canal area have compiled a large number of records, among which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facts of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covering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and culture, social life and other aspects, etc,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ways of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Shandong Canal region,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ethnic groups in Shandong Canal region,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forg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handong Canal; local Chronicles;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 卢见曾与两淮盐引案考述

王守栋, 王 瑞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乾隆三十三年(1768), 震惊朝野的两淮盐引案案发。乾隆帝认定此案属特大贪污窝案, 即命大学士刘统勋、刑部尚书英廉等负责全面调查; 案件的主要涉案人是前任盐政官高恒与普福, 卢见曾与其并无直接关系, 却被牵连其中, 判处绞刑, 死在狱中, 卢见曾的门生故吏也被株连。根据正史、实录、上谕档、御批奏折及方志家谱等相关史料, 系统梳理本案发现, 清廷忌惮卢见曾在文人中的影响力, 欲借此案对其进行打击, 幸得大学士刘统勋为其昭雪。

**关键词:** 卢见曾; 盐引案; 乾隆时期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085-07

卢见曾(1690—1768), 字澹园, 又字抱孙, 号雅雨, 又号道悦子, 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 历任洪雅县、蒙城县知县, 六安州、亳州、溧州知州, 庐州府、江宁府、颖州府、永平府知府, 江西分巡广饶九南道, 长芦盐运使、两淮盐运使等职。卢见曾学识渊博, 经、史、文、诗、词、曲以及古籍整理、注疏校勘等广泛涉猎。他性情慷慨, 爱才好客, 主政扬州期间, 东南大儒惠栋、戴震、顾栋高、沈大成、卢文弨、杭世骏、全祖望、程庭祚、沈起元、吴玉搢、任大椿等云集于其幕府, 研经论学, 流连唱和。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卢见曾发起的“红桥修禊”, 更是空前的文坛盛会, 卢见曾作红桥修禊诗, 和修禊韵者多达7000余人, 确立了其文坛盟主的地位, 终成一代宗匠。乾隆二十七年(1762), 72岁的卢见曾辞去两淮盐运使之职, 自扬州致仕还乡。乾隆三十年(1765), 乾隆南巡途经德州时召见卢见曾, 赐亲书“德水耆英”匾, 以示褒奖。卢见曾致仕6年后, “两淮盐引案”发, 主要涉案人为前两任盐政——高恒与普福, 与其间担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并无直接关系。但卢见曾却被判与主犯同罪, 卢家被抄, 78岁的卢见曾死于狱中。案件还牵连到卢见曾的亲朋、门生、故吏, 诸如纪昀、徐步云、赵文哲、王昶、黄骏昌等人。本文根据正史、实录、起居注、上谕档、御批奏折及方志家谱等相关史料, 对案情的发生、发展、审理及结局进行梳理, 并对案情的疑点, 作出系统论证。

## 一、盐引案发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初五, 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上奏, 称前任盐政在“预提盐引”中, 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 因以自私, 事皆未报部”<sup>[1][1072]</sup>, 引发了震惊朝野的“两淮盐引案”。

乾隆时期, 盐利在国库收入中占据了将近半数的比重, 而两淮盐业税收占整个盐业税收的半壁江山, 可谓重中之重, 因而朝廷高度重视。清代食盐专卖实行的是“官督商卖”制, 即盐商向官府输银领取“盐引”, 再根据盐引数额领取食盐, 然后自行贩卖。对食盐专卖的监督与管理有“盐政”和“盐运使”两大系统。康熙年间改“巡盐御史”为“盐政”(秩正二品), 督察“盐引”与“盐税”等事务。“盐运使”(秩正三品)是产盐区主管盐务之官, 具体负责盐的生产、销售, 管理灶户与盐商, 亦负责产盐区的行政事务。盐政监督盐运使, 地位在盐运使之上。两淮盐引案主要涉案人是在这期间负责发放、监督“预提盐引”及征收“公使钱”的两任盐政——高恒与普福, 而与此前担任盐运使的卢见曾本无直接关系。

清代盐引发放的数量, 按年度有严格的计划限额。乾隆十一年(1746), 淮盐行销地区人口繁滋, 需盐量增加, 朝廷按年度计划派发的盐引数额不足, 引起供求关系紧张。于是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来年盐引发放, 即所谓“预提盐引”。根据所需, 每年提引20万到40万不等。由于乾隆南巡屡次驻蹕扬州, 兴建行宫、园林, 极尽奢华, 所用钱财均由当地出资, 再加上每年的上贡, 置办

收稿日期: 2024-11-27

作者简介: 王守栋(1967—), 男, 回族, 山东商河人, 教授, 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物品,费用极大。于是盐政高恒在预提盐引中,每引加征银三两为“公使钱”(亦称“余利银”)<sup>[1]1072</sup>,作为办差、办贡之用。从此成为惯例,一至延续下来。但两任盐政高恒、普福就公使钱的征收及用度,都未向户部做册申报,结果被新任盐政尤拔世告发。乾隆帝认为这部分钱“显有朦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sup>[2]355</sup>,下令全面追查,从而引发该案。因为“公使钱”征自每年的“预提盐引”,所以该案史称“两淮预提盐引案”。自乾隆十一年(1746)加征“公使钱”,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案发,这期间监管两淮盐税的主要是前两任盐政——高恒、普福,管理两淮盐务的主要是前任盐运使卢见曾。此三人被乾隆列为重大案犯。高恒、普福均为旗人。高恒为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之子,恩荫入仕,官至两淮盐政、吏部侍郎,其从兄高晋为两江总督,满门“出将入相”“台阁清要”。普福亦满洲贵族出身。只有卢见曾为汉族士大夫出身,这也是在本案中乾隆对其格外关注,并“加以刑讯”的原因之一。

乾隆帝认定此案为两淮历任盐政、盐运使及盐吏与盐商多年来相互勾结,上下串通,欺君罔上,侵吞官银,属巨大贪污窝案,情节恶劣。因而命大学士刘统勋、刑部尚书英廉等负责全面调查;地方由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山东巡抚富尼汉、八旗副都统萨哈岱等分头调查审讯前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盐运使卢见曾及其他涉案盐吏、盐商。<sup>[2]355</sup>查案进展及时上折奏报,乾隆帝则根据案情进展下达谕旨,形成雷厉风行、严肃查处之势。

## 二、立案侦查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初七,乾隆下旨查办盐引案:

据尤拔世奏称:“上年普福奏请豫提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等语,此项银两该盐政等何以历来并未奏明私行动用,甚可骇异。因令军机大臣检查户部档案并无造报派项用数文册可稽,显有朦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若以每引三两计算,二十年来银数,应有千万余两,自须彻底清查。但阅年既久,其中头绪纷繁,恐尤拔世一人不能独办,著彰宝密速前往扬州,会同该盐政详悉清查,务使水落石出,毋得丝毫隐饰。<sup>[2]355</sup>

乾隆根据尤拔世的上奏,按每年提引数额推算,自乾隆十一年(1746)以来二十余年,应缴银额高达千万余两。如此巨大数额,历任盐政竟没上报户部,显然有“朦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形。即命江苏巡抚彰宝赶赴扬州,会同两淮盐政尤拔世彻查此案。

彰宝、尤拔世首先传讯涉案总商黄源德、江广远等。总商是指官府指定的垄断淮盐运销的大盐商,预提纲银就由他们负责征收、经办。六月二十五日,根据黄源德、江广远等人供述,彰宝上奏:

查普福任内豫提丁亥纲银十八万九千余两,曾开销银八万四千余两,惟是豫提引张银两一切俱系总商经手,因传唤总商详讯,并令其开出清单,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余利银:一千九十余万两。据称历年办贡及豫备差务共用过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尚有各商未缴余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伏思此项银必与盐政等有暗行馈送情弊,复加严讯,据总商黄源德、江广远等供称:辛巳纲,两次缴过高盐政银八万五千九百余两;丙戌纲,又送银四万两;乙酉纲,又送银一万两,均系管事人顾蓼怀经手收进。又自乾隆十四年起,代吉盐政办贡物,共垫银三千余两;又二十一年,代普盐政办如意银三百二十两,此外有无另项,并未吐实。<sup>[3]987-988</sup>

彰宝所查历年应收“余利银”总和共 1090 余万两,历年办差、办贡之用 467 万余两,还有 600 余万两亏空。故乾隆认定是盐商与盐政勾结,暗行馈送,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是当朝贪污大案。

这些数字只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账面亏空数额,并非实数。因为当时公使钱的征收是因需而征,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每引二三两银的引价,既不为商人普遍遵循,也不为朝廷认可。所谓千万余两罪状清单,只是理论上的数字,而不是实际征收数字,更不是两位盐政贪污的具体数额。<sup>[4]</sup>乾隆看到彰宝所奏亏空数额如此巨大,震怒。当日,针对彰宝调查的初步结果,乾隆连下三道谕旨<sup>[2]345</sup>,强调严惩涉案当事官员及盐商。

第一道谕旨,命将前任盐政高恒、普福,前任盐运使卢见曾,总商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江广达、程谦德、汪启源等革职削衔,严行查办。彰宝奏折只提到前两任盐政——高恒与普福的重大嫌疑,即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 3 次共 10 余万两;普福任内,则收受丁亥纲银私行开销 8 万余两。彰宝并未提及前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总商黄源德、江广远等也未供述卢见曾收受或私行开销纲银。但乾隆认定卢见曾参与其中,故特别指示:“前运使卢见曾在两淮日久,经手之事尤多,卢见曾亦著革去职衔,解往扬州,交与彰宝一并审讯。”<sup>[5]283-284</sup>

乾隆年间卢见曾曾先后两度任两淮盐运使,乾隆二十七年(1762)致仕。在任其间,颇有惠政。卢见曾出身山左名门(一门三翰林,六代八进士),家学深厚,学识渊博,长期主政扬州,兴学重教,招贤纳士,扬州成为东南地区风雅之都,文化之盛前所未有的。正如清代画家郑板桥所言:“海内文士,天下英奇,来归者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趋数泽也。”<sup>[6]302</sup>清代学者陈其元亦云:“我朝爱客礼士者,惟德州卢雅雨都转……一时士之奔赴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sup>[7]149</sup>卢见曾爱才重贤,不问出身,只论学问。无论是文宗硕儒,还是寒门穷士,无不折节相交。清代学者李斗云:“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sup>[8]230</sup>经学大师惠栋、戴震、顾栋高等长期在卢府研经论学,推动了乾嘉学派的勃兴。卢见曾“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sup>[9]29</sup>,在汉族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而不免有“树大招风”之嫌。

乾隆皇帝将卢见曾列为主犯之一,除所谓“在两淮日久,经手之事尤多”之外,恐怕另有深意。

第二道谕旨,则主要针对卢见曾,命山东巡抚富尼汉押解卢见曾至扬州,并严密查封卢见曾家产。主要原因是“卢见曾久任两淮运使,提引一事皆伊经手承办,似此上下通同舞弊,岂得诿为不知”。因而,“著传谕富尼汉,即行传旨,将伊革去职衔,派委委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并案审讯;仍一面将卢见曾原籍贓财即行严密查封,无使少有隐匿寄顿。”<sup>[2]345</sup>

第三道谕旨,命彰宝、尤拔世等彻查、追缴“余利银”,所有亏空由盐商按数分赔。“传谕彰宝等,即速按款查究,除摺内所称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缴余利六百数十万两,并该商等代盐政等一切冒滥支销,应行追出归公之项,人等名下按数分赔。”<sup>[2]345</sup>

乾隆对此案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三道上谕后仍余怒未消。二十六日一早,又召集军机大臣,连下五道谕旨<sup>[5]348</sup>,重申“历任盐政、运使等营私侵蚀,情弊甚大”,着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山东巡抚富尼汉、八旗副都统萨哈岱等,严加审讯。同时追查前两任两江总督尹继善、高晋失察之责,指出“从来总督有稽察盐政之责,伊等如此恣意妄为,宁竟毫无闻见……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sup>[5]248</sup>。除了高官要员之外,乾隆也对诸如彰宝所奏高恒管家顾蓼怀等涉案小人物刻意关注,特别传谕彰宝:

昨据该抚习奏内,有商人送交高恒银两,系家人顾蓼怀收受之语,是此人乃案内酿成事端之要犯,不可令其漏网。……该犯往来盐政衙门,办事多年,其平日借端肥橐,情罪殊重,所有顾蓼怀原

籍家产,亦著遴委委员,密速查抄。<sup>[5]248</sup>

命彰宝将顾蓼怀拘捕审讯,并押解至京,交刑部会审。同时,秘密查抄顾蓼怀苏州家产。乾隆对一小人物如此关注,可见对案情考虑得缜密与细致。

以上涉案人员有三类:一类为盐官,前任盐政高恒、普福,前任盐运使卢见曾等;一类是总商,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江广达、程谦德、汪启源等,预提纲银的代办者;一类是官商之间的“掮客”,如高恒管家顾蓼怀,代高恒收受“余利银”。乾隆对三者区别对待:对前任盐政高恒、普福,前任盐运使卢见曾严惩不贷,革职抄家。对总商则仅革去加封的官衔,赔付亏空银两,但保留其总商地位,继续运营。对代高恒收受“余利银”的“掮客”顾蓼怀则严加审讯,逼其招供。

### 三、抄家风波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初,山东巡抚富尼汉受命赶赴德州查抄卢见曾家产,但出乎富尼汉意料的是,卢家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衣物亦寥寥无几。富尼汉怀疑卢家提前将财产隐匿寄顿。于是,张榜悬赏揭发,当地监生李容、卢家仆人陈桐等告发卢家已于六月十一至十八日提前转移隐匿财产,并供出扬州商人程永益借欠银5000两,张瑞昌借欠银4000两,卢辉曾(卢见曾弟)寄放银700两等。七月初八,富尼汉据此上奏。<sup>[3]1003-1004</sup>乾隆得报震怒。因为查封卢见曾家财的“廷寄”,于六月二十五日驰发,且未传抄,卢家何以提前得到风声,在密旨发出之前就转移财产。乾隆由此断定有朝内机要人员提前为之通风报信,于是下令彻查,不惜对卢见曾动刑,逼其招供。为此,乾隆于七月初八连下三道谕旨,传谕山东巡抚富尼汉、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大学士刘统勋、刑部尚书英廉等,“详悉根究,据实覆奏”<sup>[2]366</sup>。

第一道谕命富尼汉对卢见曾严加审讯,追查为卢家通风报信之人。

(卢见曾隐匿财产)情节甚属可恶。岂有旨未到,而外人已知之理,必须严切究审,令将得自何处何人,实情供吐,不得任其稍涉含糊,如卢见曾坚执不吐,即应加以刑讯,著富尼汉传旨于彼。伊是受朕深恩之人,若其天良尚未尽泯,一经讯鞠即将豫通信息之人和盘托出,尚可免其用刑;若尚模棱,则朕之于大小事件,必欲水落石出之处,想伊亦晓决不苟且完案,此系伊等恶贯满盈之日,然伊终属运司,其上自有盐政在也。富尼汉接到此旨,著即密速办理不可迁就了事,以要声誉。如审

得确情即行据实奏闻，再将卢见曾锁押解赴扬州，并案问罪，至其家财衣物，已据李容及家人陈桐等，供首寄顿借欠各项，此外或尚有未据供明，潜行隐寄情事亦著该抚一并详悉追讯具奏。<sup>[2]366</sup>

第二道谕命富尼汉及彰宝、尤拔世等对卢见曾严行讯究，彻查卢见曾在德州及扬州所寄财产。先由山东审结，然后锁押赴扬，并案治罪。

据富尼汉奏，“查抄卢见曾家产，并无银物，及出示招首，始据监生李容等，呈出寄顿各项，并据家人陈桐供出扬州商人程永益借欠银五千两，张瑞昌借欠银四千两，卢辉曾寄放银七百两等”语。卢见曾现留山东交富尼汉严行讯究，伊因何早得风声豫行寄顿，俟审明再行锁押赴扬，并案治罪。所有供出之商人程永益等名下借欠银两，即著彰宝、尤拔世就近严审明确，照数著追，至卢见曾在两淮日久，与盐商交熟者多，今查出家财衣什等项，隐寄累累，而商人程永益等亦有借欠之事，恐此外尚有寄扬藏匿之物，及伊在任时托诸商收存营运者，谅复不少，并著彰宝等一并详悉根究，据实覆奏。<sup>[2]366</sup>

第三道谕命大学士刘统勋、刑部尚书英廉等审讯此案，将在京应试的卢见曾子卢谟、孙卢荫仁押送刑部审讯，交待为卢家通风报信之人。

据富尼汉奏，“查封卢见曾家财，伊已豫先得信，于各处隐匿寄顿，已经究出数处。今伊子卢瑛（谟）、伊孙卢荫恩（仁）现在赴京应试，请敕交刑部就讯等”语，著传谕刘统勋、托恩多·英廉即将卢瑛（谟）、卢荫恩（仁）提拏，隔别详细研讯，务将豫先得信及隐匿寄顿各处彻底根究，毋使稍有支吾遁饰，仍即行具摺覆奏。富尼汉原摺并著钞寄。<sup>[2]366</sup>

得谕后，刘统勋立刻采取行动。此时，卢谟已回德州，刘统勋对卢荫仁拘押审讯。

七月十日，刘统勋上奏审讯卢氏一案进展。据卢荫仁供述，侍读学士纪昀先告知两淮盐务事发，六月十四日差家人回德州报信；刑部郎中王昶又告知两淮历年提引事发，遂又雇人回家送信；接着刑部司员黄骏昌又透露查抄高恒家产传言。其叔卢谟心惧，于六月二十七日，起身回家报信。乾隆闻奏大怒，下谕：“所有漏洩此案情节之纪昀、王昶、黄骏昌均著革职，交刘统勋等分别严审具奏。”<sup>[5]309</sup>

七月十四日，刘统勋上奏卢见曾一案的新进展。卢见曾门生、内阁中书徐步云亦参与其中。徐步云曾给卢见曾寄信，通风报信。乾隆下谕：“分别严审。”<sup>[2]384</sup>

七月十八日，乾隆传谕，对卢家进行株连惩处，

将卢见曾长子湖北黄德道道台卢谦革职，充军塞外。理由很牵强。第一，在上一年查审所属官吏黎明五贪污修堤款一案，审理不当；第二，所辖董家口江堤修葺一事，办理不善；第三，卢见曾罪行深重，不株连惩处，不足以示惩戒。<sup>[2]387</sup>

七月二十日，山东巡抚富尼汉上奏，在德州拘押了回家报信的卢见曾子卢谟。据卢谟供认，六月二十七日去见内阁中书徐步云，徐告知扬州盐引案发，然后又至纪昀家探问，结果与徐步云所告相同；对于卢家事先隐匿财产之事，卢谟则坚称不知情由。而前日刘统勋在京审讯卢见曾孙卢荫仁、家仆张起及纪昀本人，均供称纪昀在六月十三日见到卢谟等，告知两淮盐政有事，卢谟遂于十四日寄信回家，纪昀应是最先泄密之人。两地口供在时间上相矛盾。<sup>[2]394</sup>

乾隆根据两地口供分析案情，认为卢谟在说谎。第一，卢谟所说六月二十七日先见徐步云得信后，才见纪昀确认，显然为纪昀开脱，因为纪昀是卢氏亲家（纪昀女嫁于卢见曾孙卢荫文）；而事实则是六月十三日纪昀告知两淮事发，次日，卢谟便差仆人张起回德州报信，张起报信后又悄悄赶回北京。卢家得信后，提前隐匿家产。六月二十七日，当卢谟听说高恒家被抄，感到事态严重，由家人张起陪同回家报信。然后，张起再次潜回北京。第二，对卢家寄顿家财情节，卢谟坚称不知情由，实属诡词狡饰，殊不可信。卢谟既在京得知案发，预先通信德州，授意将资财早早藏匿。第三，卢家仆人张起，两次回德州报信，必知内情，应严加审讯。<sup>[2]394</sup> 基于上述分析，乾隆传谕富尼汉：

著富尼汉将卢谟亲提严讯，不得令其饰词抵混。至卢见曾家财，既据查出李容等各家寄顿情节，岂有此外更无藏匿之理，并著富尼汉一并严切研究，毋任丝毫隐饰。今张起现在京缉获。著刘统勋等即就近严加审讯，务令将卢谟知情寄顿缘由据实供出，并即讯卢见曾家财，除伊戚李容及家人陈桐供首寄顿之外，复于何处潜行隐寄，逐一严鞫，取具确供，具摺奏闻。<sup>[2]394</sup>

经过大学士刘统勋连日侦查、严讯，为卢家通风报信一案终于查清。七月二十四日，刘统勋等奏，先后向卢家透露消息的官员有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内阁中书徐步云、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刑部郎中黄骏昌等。乾隆下谕称，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着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徐步云作为卢见曾门生，遇此等紧要案件，敢于顾念私情，暗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着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其余涉案人员赵文哲、王昶、黄骏昌等统统革职。<sup>[5]325</sup>

值得注意的是，因抄家风波，卢见曾已从“从犯”

上升到“主犯”,乾隆对其审查与关注度,已远远超过了真正主犯高恒。

#### 四、案件审结

江苏巡抚彰宝对高恒管家顾蓼怀严加审讯,追查“余利银”具体用度。顾蓼怀供述,乾隆二十三年(1758)收受黄源德等五商银48000余两,收洪充实银30000两;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收黄源德等五商银71000余两;乾隆三十年(1765)收汪启源银10000两,前后共代收余利银100000余两。此外还有高恒家人张文学经手收受银40000两。<sup>[2]366</sup>

七月初八,乾隆根据彰宝对顾蓼怀的审讯结果,传谕彰宝进一步追查,对顾蓼怀继续严讯,查明顾蓼怀所受银两有多少被高恒中饱私囊,有多少是办贡品所用,两者严加区分。<sup>[2]366</sup>

根据以上涉案人的供述,卢见曾并未参与其中,这是乾隆所不愿相信的,所以传谕彰宝,对卢见曾要“彻底穷究,无任丝毫隐匿”。

运使卢见曾于奉查封家产谕旨之前即将家产寄顿各处,若非伊平日有通同作弊分肥之事,何以一闻信息即自忖情亏,豫防祸及,其恶迹难掩,更属显然。且伊既作此狡狴伎俩,则恐寄顿之处,尚不仅如监生李容所首,及家人陈桐所吐诸家而止。而商人既为伊收存银两,则其平素之与诸商交结,尤不问可知。彰宝等办理此案,必须彻底穷究无任丝毫隐匿。至于运使与盐政最为切近,盐政凡有举动,运使知之最真,若运使稍有执持,盐政何由独逞其贪壑,即或其劝阻不听,何难据实奏闻。乃高恒等狼藉若此,卢见曾前此从无一言,设非与盐政通同勾结,恣欲侵渔,岂肯甘心代人受过。此等情节,尤不可不切实严究,以定罪案,毋致稍有不实不尽。……著传谕彰宝等,逐一严切查办,毋得稍有瞻徇,仍即速行奏闻。<sup>[2]366</sup>

卢见曾已成乾隆重点关注的要犯。七月十九日,彰宝上奏,查讯两淮提引一案进展,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16000余两之多。<sup>[2]390</sup>乾隆传谕彰宝“即提各商到案,详悉开导,逐层研诘,务令供吐实情,水落石出,不得任其含混抵饰。……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一万六千余两之多,可见其上下串通,分肥侵蚀,俟解到扬州时,一并严审究拟具奏”<sup>[2]390</sup>。

七月底,本案的重要涉案人顾蓼怀被押解至京,乾隆命军机大臣严加审讯。不料顾蓼怀翻供,称其所经手的盐商所交“余利银”150000余两,具系代商人置办

进贡及官用所需物品,并非交与高恒;并声称在扬州时,主审官扬州知府杨魁刑讯逼供,不准说代办物件,只能说交与高恒。<sup>[2]426</sup>

八月初一,乾隆传谕主审军机大臣,传扬州知府杨魁、甘泉县知县龙灿岷、总商江广达等相关人员“即赴行在,听候查讯,与顾蓼怀质对”<sup>[2]426</sup>。于当堂质对后最终得出结论:“顾蓼怀初到扬州时因无高恒可质,即妄供交高恒收受;及至解京又以无商人可质,即称系商人托令办物,其实顾蓼怀经手之十五万两,系高恒托令向商支银,制办物件,并非高恒尽行侵用,亦非商人托令代办,承审官委无用刑勒供情事。”<sup>[3]1101</sup>

至此,本案基本审结。所谓贪墨“余利银”,真正坐实的只不过区区150000两。这150000两也并非高恒一人私吞,而是“高恒托令向商支银,制办物件,并非高恒尽行侵用”。普福收受丁亥纲银80000余两,这与案发时所谓“千万余两”,相差甚远。至于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16000余两”,与本案无直接关系。

八月三十日,江苏巡抚彰宝审结卢见曾一案,以“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之罪,处卢见曾绞刑,待秋后处决。<sup>[3]1086</sup>刑部议覆,乾隆下谕批准。根据山东巡抚富尼汉、江苏巡抚彰宝对卢见曾一案的审理结果分析,卢见曾罪状有二。一是寄顿财产。据富尼汉所奏,卢见曾亲戚德州监生李容、卢家仆人陈桐等告发卢家转移隐匿财产,供出扬州商人程永益,借欠银5000两,张瑞昌借欠银4000两,卢辉曾寄放银700两等。二是收受古玩。据彰宝所奏,卢见曾在扬州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16000余两。

第一条罪状所谓隐匿、转移“提引银两”:根据查抄结果,卢家除以前借出的银两外,现有财产只有卢见曾弟卢辉曾寄放银700两。区区700两,对于一般大户人家来说都是不大的数目,何况卢家为德州世代名宦望族。这与数百万两的“提引银两亏空”很难挂钩。至于第二条罪状“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一万六千余两”,何时何人所买何物,均无对证。即便所列属实,也与“提引银两”无关。

是年九月二十八日,78岁的卢见曾卒于扬州狱中。当时,只有一孙守候身旁。前日,卢见曾自知大限将至,留下遗书,请时任安徽布政使的胡文伯为其殡殓,且“经纪其丧以归”<sup>[10]106</sup>。

#### 五、案件隐情

从此案的审理过程和结果看,卢见曾确有冤情。前文述,清代对食盐专卖的监督管理分盐政与盐运使两大

系统,而盐引的发放由盐政负责,盐运使无权干预。按照当时主办此案的盐政尤拔世、江苏巡抚彰宝的奏报,案子出在前任盐政高恒、普福所负责的“盐引”上,与盐运使卢见曾所负责的“盐务”并无直接关系。

乾隆接到奏报后,进行廷议,主观认为卢见曾久任两淮盐运使,与前任盐政高恒、普福等有串通作弊、徇私舞弊之嫌,所以下令将卢见曾革衔查办,押解到扬州,由江苏巡抚彰宝一并审讯。同时,查抄卢家。但乾隆对卢见曾是否参与贪腐,并不确定,更无真凭实据,谕旨也只是说“似此上下通同舞弊”<sup>[3]989</sup>,仅凭一个“似”字,就抄家,未免过于草率。且案子并非出在卢见曾所负责的“盐务”系统,而是出在负责“盐引”发放的“盐政”系统。所以,卢见曾并非此案的直接当事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盐政尤拔世在发现舞弊后的第一次上奏、江苏巡抚彰宝奉旨做初步调查后的上奏中,都指出前任盐政高恒、普福等存在徇私舞弊,并未提及盐运使卢见曾。

在没有调查且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对卢见曾的处置一次比一次严重,据六月二十五日的乾隆谕旨,卢见曾俨然成了头号主犯,革衔、严办、抄家。谕旨中对直接当事人高恒、普福的处置是:“高恒、普福均著革职,严行看守,俟彰宝等审覆到日,再行逐款审拟具奏。”<sup>[3]989</sup>八月三十日卢见曾被判绞刑。九月十三日,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主犯高恒、普福“均应照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十月二十七日朝审时,被乾隆勾决处死。令人费解的是疑似“从犯”的卢见曾为何不等彰宝查实,就抄家呢?为何对他的处置要早于主犯的处置呢?是否有恶意报复,故意打击之嫌呢?费解之余,只能有以下两种解释。

一是高恒、普福均为旗人。高恒、普福均为满洲贵族出身。乾隆明知主犯为满洲贵族,却让汉族士大夫“陪绑”,是清代满汉两族在法律上不平等的反映。

二是卢见曾“树大招风”,引起了乾隆的猜忌。卢见曾主盟东南文坛,成为一代宗匠,特别是他所主持的“红桥修禊”活动,有数千人参与唱和,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的庞大文人团体,卢见曾作为这个群体的核心,有一呼百应之影响力。朝野上下与之应和,朝中权贵也与之相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人势力。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的结社活动非常警觉,清初就曾取缔“复社”及所有江南文人团体。卢见曾的“红桥修禊”,使汉族士大夫再次“抱团”,引起了乾隆的猜忌。但乾隆时期,仍打着“尊孔兴儒”,大兴文治的旗号,所以对卢见曾所搞的文人雅集活动又不便直接镇压。盐引案使乾隆终于抓住卢见曾的把柄。因而,在没有查实的情况下,就把他“往死里整”,借此打压汉族文人势力。

可见,乾隆在没做调查,没有真凭实据之前,仅

凭“疑似”就给卢见曾定了罪。先“加罪”,后“查实”,卢见曾即使没罪,也要查出“罪证”,否则就会“忤旨”。但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查抄卢家时,却发生了意外,并没搜出所谓的“罪证”——真金白银。乾隆怀疑卢见曾提前藏匿家产,命富尼汉对卢见曾严加审讯,如其不招,“应加以刑讯”,这样就给了富尼汉严刑逼供的权力。当时,卢见曾已年近八旬,怎能经得住刑讯?命大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等,将在京应试的卢见曾三子卢谟、长孙卢荫仁二人押赴刑部审讯,具查通风报信之人。审讯的结果,据《乾隆实录》卷八一五记载,卢见曾子卢谟、孙卢荫仁在侍读学士纪昀、中书徐步云等处探得消息,命家人张起回家送信。乾隆将纪昀、徐步云及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军机章京上行走赵文哲、刑部郎中黄骏昌等走露风声的相关人员革职,纪昀充军乌鲁木齐,徐步云充军伊犁。

纪昀是卢见曾的姻家。王昶在扬州时,曾是卢见曾幕府的重要成员之一,二人关系甚密。赵文哲是王昶的好友,亦是当年卢见曾在扬时的文友之一。徐步云为卢见曾门生,这些人都与卢见曾关系密切,故均有动机。但他们是怎样得到的消息,又是怎样及时送达卢家的?众说纷纭。《清朝野史大观》卷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纪晓岚(纪昀)得知要抄卢见曾的家,于是拿出一个信封,什么字都没写,只在里面装了一把茶叶,外以面糊加盐封固,然后派人星夜兼程送到卢家。卢见曾看到以后,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恍然大悟——“此盖隐‘盐案亏空查抄’六字也”!于是卢见曾转移了全部财产。野史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纪晓岚得到消息后,感到事态紧迫,就派人赶到卢家。此人见到卢见曾后,什么也没说,而是伸出手来,卢见曾见其掌心有纪晓岚写的一个字“少”,马上明白了纪晓岚字谜的谜底——“抄”,于是赶紧转移家产。

不管是正史也好,野史也罢,疑问还是非常多的。当时,乾隆下达给山东巡抚富尼汉的抄家谕旨是密旨,纪昀等人是如何得知的?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他又怎样赶到官差之前把消息送到卢家的?这些都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卢见曾可能根本就没有贪污,家里也没有真金白银,更没有转移财产。乾隆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将卢见曾的罪定实。同时,打击同情卢见曾的汉族士大夫集团。所以,所有的调查、定罪就按乾隆皇帝的“既定方针”办,将卢见曾之罪“查实”。“查实”的罪证是什么呢?据《乾隆实录》卷八一五记载:“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至一万六千余两之多。”<sup>[3]1023</sup>所谓“商人办买古玩”到底是什么古玩?《实录》未载。清人(佚名)所作《骨董祸》,详细描述扬州大盐商汪某“雅贿”卢见曾的三件“骨董”

(今称“古董”): 汉末蔡邕之《石经》原拓本、宋人赵千里临摹唐李昭道之《仙山楼阁图》及宋张择端之《清明上河图》。《骨董祸》并非信史, 未必可信。即使以上都是事实, 也与“预提盐引”无关。

### 结语

大学士刘统勋为卢见曾昭雪, “诸城刘相国统勋力白其诬, 幸高庙圣明, 悟其无辜, 立予昭雪”<sup>[11]5</sup>。流放塞外的卢见曾长子卢谦也得以复官, 授直隶广平府同知。乾隆四十二年(1777), 卢谦请假还乡, 利用所积攒的官俸, 及四方亲友的资助, 赎回德州城南纪庄墓田, 安葬其父。是年三月十七日, 卢见曾灵柩下葬, 去世9年后终于入土。城南纪庄墓地, 是卢见曾生前自选生圻, 至此终于如愿。<sup>[12]125</sup>翰林院编修充侍读学士卢文弨题写墓志, 盛赞卢见曾一代学宗的成就。

###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 乾隆朝上谕档: 第5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 清高宗实录[M]//清实录: 第18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汪崇笈. 乾隆两淮提引案辨析[J]. 盐业史研究, 2004(4).
- [5] 乾隆帝起居注: 第27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6] 郑燮. 板桥家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 [7] 陈其元. 庸闲斋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8]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 [9] 民国德县志[M]. 民国二十四年刊本.
- [10] 卢文弨. 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M]//闵尔昌. 碑传集补. 民国十三年刻本.
- [11] 卢荫溥. 卢文肃公年谱[M]. 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 [12] 卢谦. 皇清诰授中大夫两淮盐运使司运使显考雅雨府君行述[M]//卢光泽. 续修卢氏家谱. 1950年抄本.

## Lu Jianzeng and Case of Salt Tax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

WANG Shoudong, WANG R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irty-three years of Qianlong(1768), the case of salt tax in Yangzhou was disclosed. Emperor Qianl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thought the case must be a major corruption case. So he ordere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governor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thoroughly. Before the case concluded, salt official Lu Jianzeng was hanged, died in prison. But the main persons of interest were Gao Heng and Pufu. On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truth, it appears that Lu Jianzeng has been wrongly accused. The reason was Qing court wanted to crack down on influence of Lu Jianzeng. Prime minister Liu Tongxun exonerated him, and the case was finally settled.

**Key words:** Lu Jianzeng; case of salt tax; the reign of Qianlong

# “重回荒芜”：论臧海英诗中的土地想象

周水寿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州 510275)

**摘要：**不同于过往新诗作者的“捐输”，臧海英以“重回荒芜”想象土地。这一诗学想象背弃土地是要用于种植的普遍经验。关注人与大地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能提炼出有关“荒芜”的诗意，诗作《野外》中“重回荒芜”的愿景取自诗人的内心景象，暗含诗人对世界的基本理解。“重回荒芜”作为人的选择是对人之所能的放弃，这种“能不”去种植的诗学想象，或构成新诗中有关人地关系的新诗学。

**关键词：**臧海英；土地想象；《野外》；荒芜；德州诗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1-0092-08

“德州诗人”臧海英<sup>①</sup>算不上当代实力不俗的诗人。与同姓的“北京诗人”臧棣一对比，便可知晓，德州的耀眼度自然不如北京。诗人写作能量的多寡，与自身天赋及其所受诗歌教育、人生经历有关，基于这些点，臧海英不是必须要被议论的诗人，如其自呈：“匮乏的人生何以写作。”“匮乏”对于臧海英而言，指向的是“没什么才华，没读过多少书，没经历过跌宕起伏，没去过什么地方”；但诗人珍视此种匮乏，“匮乏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匮乏在教育我”。<sup>②</sup>或许正是匮乏，以及与匮乏相伴的普通<sup>③</sup>，注定臧海英的写作不先锋，没有天才式的创造或巨匠般的营造。当代新诗诗坛的璀璨群星中，臧海英无疑不是耀眼的那颗。当然也因为普通，臧海英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样本性质，能让读者知悉当代诗人的普遍状态与诗歌观念。这里谈臧海英的诗，更多的是将其作为触及更深诗学问题的“跳板”。这并非说臧海英的诗质地一般。作为跳板，弹性与坚固程度是要被考量的因素。换言之，臧海英的写作虽不耀眼但够坚固，具弹性，能让读者跃升到更深广问题的讨论中去。

臧海英出版过三部诗集，《出城记》《战栗》和《一

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本文所要谈论的诗作《野外》收录于第三部诗集。全诗如下：

父亲着迷于一块田  
我着迷于田边一块荒地  
父亲在田里除草，杀虫  
我惊喜于  
乱草中，一只瓢虫在产卵  
在荒地和田地之间  
我相信，一定有解决不了的矛盾  
劳作之余，父亲觊觎着荒地  
一个被饥饿吓坏的人  
他一生的愿望  
“所有的荒地，都种上粮食”  
我也常常在扑蝶中，停下来  
幻想着，周围的田地  
重新荒芜<sup>④</sup>

诗中“父亲”与“我”各执一端：“父亲”爱拓荒、爱田地，其愿望是“所有的荒地，都种上粮食”；“我”爱扑蝶、爱荒地，幻想的是“周围的田地/重新荒芜”。

**收稿日期：**2024-10-26

**作者简介：**周水寿(1994—)，男，浙江海盐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诗歌写作及新诗研究。

①“德州”具有某种标识性，既指向诗人实际的生活工作地点，也指向文学想象中的德州。相关诗作有《在德州》《旧货市场》《在半空中上班》《暂居德州》《冰川纪》。如诗人所言：“德州，是我众多异乡中的一个。虽然我出生的地方，隶属德州，但我无法把它当做故乡。但这里，是我写诗开始的地方。这些诗，写在德州。记录了几年来我所有的感受。我的脆弱、挣扎、孤独，以及我对这个尘世深深的沮丧，和深深的眷恋，都在这里。”参见臧海英诗集《战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的后记《表达》。

②此处的“普通”并非贬义词。日常生活作为写作资源，日益成为当下诗人的写作选择，其要抵达的正是普通，又或者说诗意本身就应当是普通的。普通是一种承认，承认渺小，承认更神圣之物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习以为常的普通实则有着它的奇迹。

③该诗写于2017年10月27日，发表于《山东文学》2019年第9期，后收入诗集《一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另外，本文所引臧海英诗作均来自于这三本诗集，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该诗结构清晰明朗，不存在阅读上的障碍，但仔细想，又让人不得解脱：为何荒地和田地之间“有解决不了的矛盾”？用通俗的话讲，是因为“父亲”与“我”之间有因年龄而来的“代沟”。换言之，为诗人所察觉的“都种上粮食”和“重新荒芜”这两件事，是不同社会语境、人生经历下所产生的不同思维模式。这种不同也即关于土地“种植”与“荒芜”的两种观念，被诗人有意识地呈现，并在最后选择“荒芜”作为诗意生发的要素。这一有意的呈现与对“荒芜”的选择，暗含臧海英对于土地的形象，与以往新诗中的土地形象有较大的不同。

### 一、背弃“种植”的公园实验

在土地乃是需要被“种植”的普遍经验下，要理解臧诗中关于“荒芜”的诗学想象，并非易事。此种难解在于“荒芜”有悖于现实的虚幻性。巧合的是，臧海英写作《野外》后不久，深圳这座现代化都市上演了一场关于舍弃“种植”的公园实验。“重回荒芜”的诗学想象，以现实的方式发生在深圳的植物学大会纪念园里。

2020年9月12日，位于深圳的“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开园。<sup>[2]</sup>该公园是为纪念2017年7月在中国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而建造的。纪念园以“少做甚至不做的景观”的办法纪念对象（植物学大会），完成了对常规纪念方式的突破。<sup>[3]</sup>与种满景观植物的大多数城市公园不同，该公园只种泥土<sup>①</sup>。只种泥土，不代表这个公园无植物，因为“人不种，风会种，鸟会种，昆虫会种”<sup>②</sup>。但这也意味着园内最初只有土壤，看上去是荒芜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将植物面貌交还自然意志的城市公园，其设计理念是：“放弃我们通常不假思索、习以为常地对植物施加人类意志、人类挑选的方式，而是交由自然本身去选择植物，去形塑大地。”<sup>③</sup>作为仅有的设计，园中的线性看台可为游客观察园内的变化提供方便。另外，还有一场长达100年（2021—2121）的科学实验（“2121计划”），邀请公众参与公园生态环境的观测。相比建成时的“荒芜”，“如今走进纪念园，却满眼郁郁葱葱，有草，有树，有花，还有鸟”<sup>[4]</sup>。据公园建成半年内的数据统计，至少已长出11个科属，37种植物，如豆科的含羞草、田菁，莎草科的香附子、碎米莎草。<sup>[5]</sup>

之所以能想到“种土”而不种植物，与设计者庞伟的生态意识有关。庞伟认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概念，认为植物不应该作为装饰，而应“成为土地意志的流露

和赞美”<sup>[5]</sup>。依据这一理念，庞伟完成了对纪念园的设计构想。这一构想早有预兆，在2009年庞伟对功利主义的城市植物景观设计观念——“植物作为物，而不是生命被挑选、取舍，被工具化、被审美对象化”，进行批评。庞伟惋惜自然伦理的思想虽进入知识界，但并未“实质性地结合入我们全球最浩大的城市化工程中”。<sup>[6]</sup>纪念园的设计正是对这一惋惜的弥补。纪念园打破对植物之“用”的索求，而回归植物自身。

植物所依靠的土壤，是其设计的关键要素。土地之“土”深入人类的生活，而不被真正理解。“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很容易忘记，肥沃的土壤依旧是这颗地球上大量人口聚集的基础。”<sup>[7]</sup>地球上看似易得的“土壤”，实际上有着漫长的诞生史。土壤的组成包括腐殖质、矿物质、水分和空气<sup>[8]</sup>，按道库恰耶夫的说法，其“是母质、生物、气候、地形和年龄综合作用下的结果”<sup>[9]</sup>。不同成土环境中，土壤形成的速度会有不同，“据估计，土壤形成速率大约为0.056毫米/年”<sup>[10]</sup>。来之不易的土壤并非长久存在的资源，也会被消耗，人类的活动（如林木砍伐、工业污染、城市建筑等因素）正在加剧可用土壤的消耗。要真正理解、珍惜土壤，或许要借助地球以外的星球。与地球同处太阳系宜居带的火星，如今干旱又寒冷。火星的宜居性演变，是否存在生命等问题，可为理解地球家园提供参照。<sup>[11]</sup>样本研究或将为我们解开火星宜居性演变的奥秘——探测火星并取回土壤样本，是近年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太空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火星显然不适宜人类般的生命存在，电影《火星救援》中宇航员马克·沃特尼利用火星土壤种土豆的自救困难重重——如火星的土壤无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相比于火星的恶劣环境，地球上可耕种的土壤以及水和空气的存在令人感到幸福。

因为耕作需要而至至关重要的土，却遭到城市的嫌弃。光鲜亮丽的城市，充满科技的想象与对清洁的要求，并不容纳“土里土气”的“土”。摩天大楼虽有地基但并不接地气，其要告明的是超越脚下的泥土，耸入云霄才是其梦想。都市与乡村的区别，在对待“土”这一物质的态度上便可知晓，前者拒绝后者容纳。能产生这种差别，在于产业分工的不同，也在于人类文明进程中对自然的轻视。在充斥人造物的都市世界，自然界的土显得陌生。但都市与乡村原本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土壤生产能力的发掘，正是城市建造的基础，也使人口得以汇集城市开展与土（农业）无关的产业。即使与土无关，城市建设也和农业的种植共享同一副逻辑：生产。机器

① “种泥土”是略带比喻性的形象说法，指的是从深圳各个有代表性的地方移来泥土放在园内。

② 庞伟. 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公园，“有温度的存在——广州设计三年展2024”，地点：广东美术馆，展出时间：2024年1月6日至2024年5月31日。

的生产,高楼的生产,消费的生产,等等。换言之,城市也需要被施肥,它才长出作物——生机勃勃的城市。而无论是乡下人与土地的关系,还是城市人与城市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和大地的关系。如要简括这种关系,“耕种”一词仍旧不失时宜。耕种的目的在于“种植”某物,而非物的随意蔓生,换言之耕种是有目标的劳动。庞伟指出,“土地不能被索取,只被‘种’这‘种’那,当年种粮食,现在‘种’房子,土地在当代充满诸多的问题,面临污染,面临生态危机,面临权力资本的贪婪侵吞”<sup>[12]</sup>。在这一背景中,庞伟背弃“种植”的城市公园设计,放弃人的力量,让土壤回归自身,成为自然力量的呈现者。表面上,庞伟改变的是植物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庞伟重新理解了人地关系。

在深圳这座“时间就是金钱”的城市,设计师庞伟能以“荒芜”(只种土)作为公园设计的构想,极为珍贵。这与庞伟的人文关怀、文学素养息息相关。沿用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庞伟认为“设计学也应该是人学”<sup>[12]</sup>;甚至访谈中,庞伟曾言“做景观要学诗”<sup>[13]</sup>。设计景观,对于庞伟更像是一件心灵的活计。如果说庞伟以设计打开了土地在“种植”以外的设计经验,那么诗人臧海英描写鲁西北土地的诗作,则是以诗的方式完成了关于土地“荒芜”的想象。“荒芜”背弃土地就是要被种植的生存经验,出脱于过往诗人对于土地的诗歌想象。

## 二、“捐输”:新诗中的土地想象

人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农业革命”(距今约1万年)之后,人逐渐放弃狩猎和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定居的农耕文明。“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sup>[14]</sup>,种植的作物和饲养的家畜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种植的情形,如《击壤歌》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sup>[15]</sup>作为农民可自食其力,与“帝力”无关,但与“土地”有关:“原始的先民们对土地怀有感激之情,但也夹杂着恐惧敬畏之心。他们幻想土地有神灵,并乞求神灵保佑。”<sup>[16]</sup>五谷丰登的愿景中,土地在人力之外扮演着产出者的角色,这种产出或多或少直接影响耕地者的幸福值。在工业革命前,这种来自土地的幸福值伴随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种地者就是和泥土打交道,“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是“黏着在土地上的”<sup>[17]</sup>。“乡土中国”的诗歌想象当中,土地扮演着重要角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土”盛接劳动的汗水,转化出“盘中餐”。古代关于农事的

一系列诗歌都包含“土地”这一要素。农事诗的主题在文人笔下分化出两种路径,或是哀民生多艰或是抒隐逸情怀。<sup>[18]</sup>同样是关于土地,农事诗(特别是田家诗)含劳作的艰辛,田园诗则更关注审美情调,即“在大自然中追求逍遥自在、任情适意、快然自足的乐趣”<sup>[19]</sup>。田园诗中的主人公并非普通的耕地者,其大多是生活优渥的文人士大夫,故能将农事的艰辛摒除在外。涉及耕种的“田园”理想,从古至今连绵不绝,如陶渊明般“守拙归园田”的诗情画意,仍可在当下“李子柒”<sup>①</sup>的短视频中找到。

传统田园理想中人与大地和谐相处,依此所呈现的耕种图景中并无作为主体的自然。这种现象延续至新诗的写作当中。新诗的诞生与社会变革的希望密切相关,乡土诗的创作中土地主体性依然不在关注之列。早期新诗中的人地关系主要反映为耕种的艰辛与阶级的压迫。如刘半农诗作《老牛》中,老牛吃力地戽水,不嫌劳累,是为“可爱的秧田”的成熟。<sup>[20]</sup>如刘大白诗作《驾犁》反映地主的剥削,老农“拉牛耕地,力尽筋疲”,却只迎来“吃饱田主,饿死自己”的悲剧。<sup>[21]</sup>“耕地”作为人与大地的联结行为,以悲沉的象征存在于新诗作者的想象中。穆旦诗作《赞美》中有关农夫犁地的描写,正是这种悲沉的凝练化表达。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sup>[22]</sup>

在土地上耕种的农夫(及其犁),成为“受难”的象征物,多少朝代都是如此,忍受着希望与失望的双重夹击。与活生生的农夫一起作为受难形象的,是已经溶解在泥土中的他的祖先。农夫的生活与祖先的生活无异,“祖先留传下来的”生活公式<sup>②</sup>是“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新诗中的“土地”意象能成为关于“土地的诗学”,归功于艾青及“七月派”的系列诗作。如吴晓东所言:“艾青以及深受艾青影响的‘七月派’诗人群,在战争年代贡献了特出的美学:一种根植于大地与泥土的雄浑而凝重的诗美风格。”<sup>[23]</sup>艾青所代表的“土地的诗学”,构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史上关于土地的主要想象。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诗人的田园梦境难有立足之地。战

① 李子柒是短视频的制作者,所拍短视频含有对田园生活的传统想象。

② 参见臧克家《泥土的歌》,星群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30页。

争让人将目光从乡土中挪出，“土地”成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呼唤。艾青的诗集《北方》中有十多首诗作以土地为抒情对象，是新诗史上第一次集中的“土地”想象。

我们踏着的  
古老的松软的黄土层里  
埋有我们祖先的骨骸啊，  
——这土地是他们所开垦  
几千年了  
他们曾在这里  
和带给他们以打击的自然相搏斗，  
他们为保卫土地  
从不曾屈辱过一次，  
他们死了  
把土地遗留给我们——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它的广大而瘦瘠的土地  
带给我们以淳朴的言语  
与宽阔的姿态，  
我相信这言语与姿态  
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  
永远不会灭亡。<sup>[24]</sup>

土地变为“国土”，其中暗含对国家疆域清楚认识，保卫土地也即保卫疆土。带上“国”字的土地，所要完成的并非是粮食的生产，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埋葬祖先的土地，世代耕耘的土地，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要守卫的国土，这并不意味着土地不再是产粮的土地。“瘦瘠”作为土地的形容，关乎土壤的肥力（粮食产量），更关系到国家的实力高低。无论是作为国土的土地，还是耕牛劳作的土地，都呈现出某种悲哀。但土地作为产出者的形象，并未因战事的紧张而遭到改变，土地之所以重要仍是因为国人的生存需要土地。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战争的硝烟从土地上退去，而“吃饭”的问题仍挥之不去。如何在土地上种出更多的粮食，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相关办法有：“用各种办法把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好地”“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sup>[25]</sup>，等等。自1964年起，1980年终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正是这些努力的体现。大寨是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小村庄，自然条件恶劣，但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大寨作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生产明星，受到中央领

导人的关注<sup>[26]</sup>，学大寨的农业运动在全国展开。例如山东省编印的《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指出要“让大寨之花开遍山东大地”<sup>[27]</sup>，并认为“有了这种愚公移山精神，穷山恶水能治服，盐碱涝洼能改造，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sup>[27]</sup>。1977年出版的《山东省农业学大寨民歌集》展示了此种战天斗地的精神与农业上的奇迹：“荒山劈成黄金海”<sup>[28]</sup>“调水遣山展宏图”<sup>[28]</sup>“敢挑荒山敢围海”<sup>[28]</sup>“盐碱薄地踏出油”<sup>[28]</sup>。

大寨所体现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sup>①</sup>的精神是毛泽东所倡导的，这是与天地争胜的敢“斗”精神<sup>②</sup>，这种精神在农业上的发扬或自延安时便已落根。在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口号下，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大生产运动。这一运动，首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而“开荒”是最直接的方式。诗人卞之琳用诗句记录了当时（1939年）的精神氛围：

荒脊里要挤出膏腴，  
你们向黄土要粮食。  
翻开了暗草的冬衣，  
一千个山头都变色。<sup>[29]</sup>

因为劳力的加入，“山头都变色”，荒脊也能变成种植庄稼、产出粮食的田地。卞之琳认为这是“用了人工/依自然丰美了自然”，但事实上人的开荒“翻开了暗草的冬衣”。开荒能解决饿肚子的问题，自然是好事，透露出希望的明天：“不怕锄头太原始，一步步开出明天。/你们面向现实，/‘希望’有那么多笑脸！”<sup>③</sup>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水少，这片荒芜的“无风景”之地要“变色”成“有风景”的绿色，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能完成风景的转换，来自于人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如茅盾《风景谈》中所言，“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sup>④</sup>“由此，茅盾笔下的‘风景’才获得了一种崇高的美感，它并非来自自然本身，而是来源于开荒者对自然的征服、主宰与创造。”<sup>[30]</sup>当时的屯垦政策是让军队投入农业生产，缓解了军队后勤供给的压力。大生产运动所凝结出的“自力更生”精神，作为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也被铭刻于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对土地的“开荒”，并不会因为温饱的解决而停止。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厂房、住房拔地而起。土地在种植之外，还需被“种房子”。“土地，就如同俄底修斯的女奴一样，只是一种财富。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经济为基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② 所谓敢“斗”的精神，也即“强调自我主体的活动性、斗争性”，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③ 该诗有过几处改动，本文中所引的四行诗，根据的是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雕虫纪历》中的版本。

④ “有风景”和“无风景”的说法以及对茅盾《风景谈》的引用，均来自路扬《风景与劳动：大生产运动与延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载《文艺争鸣》2023年第4期）一文。

础的,人们只需要特权,而无须尽任何义务。”<sup>[31]</sup>昔日人对土地的开垦,人所受的饥饿经历,在当下被另一现象所取代——年轻一代中,不要浪费粮食成了需要号召的事情。“光盘”之难的另一边是耕地的过度使用,二者构成极大的反差。既然要浪费,何必极力种粮?而空置的住房也与浪费的粮食一样,匮乏而又满溢。这一疑问事关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也关乎社会的精神气氛。诗作《野外》中的“父亲”这位饿怕了的人,其拼命种植的行为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个缩影。李蓉的文章《土地、经验和想象——论中国现代诗歌“土地诗学”变迁中的三种路向》,以艾青、多多、海子三位诗人为例,对新诗中的土地想象有较深刻的勾勒。文章余论处,李蓉注意到土地主体性在新诗表达中的缺失:“艾青笔下的土地是功能性的,土地对人的意义是奉献,人对土地的基本姿态是索取,他这里的土地是沉默的、没有主体性的”;而多多与海子面对现代化扩张的现实,选择将乡村经验浪漫化,“将乡村和城市予以二元对立”。<sup>[32]</sup>如果说艾青的土地诗学受到战争的影响,融合了由“土地”到“国土”的国家想象<sup>①</sup>,那么多多与海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则尚未来得及对生态问题给予观照。在“土地诗学”变迁的几条路径中,“荒芜”作为土地经验仍旧人迹罕至。以白庆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农民诗人”<sup>②</sup>遵循古老的耕作经验,讲求天地人的和谐,笔下的乡村、土地延续着产出者的角色。

土地如母亲般产出粮食,供人生存。新诗诗人对土地的想象中,还将这种产出与国家的独立、富强相联系。“捐输”一词或许可以概括此种产出的无偿性与目的性。捐输在词典中的解释为:“犹捐纳。多指因国家有困难而捐献。”<sup>[33]</sup><sup>[360]</sup>“捐输”之所以能成为概括新诗中土地形象的关键词,主要是基于土地作为产出者的无偿性以及产出的服务对象即国家。当然,土地并非“人”,无自主的捐献意识。但这并不影响土地成为新诗中的捐输者,土地或与国家合为一体成为国土,或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肥力,“把一切捐输”<sup>③</sup>的土地未曾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作为捐输者,土地所迎合的是现代社会中对自然的索取需要。人的劳动成为完成这一索取的合理行为。诗人田禾的诗作《骆驼坳的表姐》所写的“田地存折”,以经济学的利息概念展示了“土地+劳动”的生产逻辑。

对于表姐,土地就是存折,洒下汗水

就是不断地往存折上存钱

那些红薯、麦子和土豆,是每年可取的利息<sup>[34]</sup>

土地可以不断产生“利息”(如红薯、麦子和土豆),但土地作为捐输者,其并无确定的犒赏。当受惠人的视线一直停留于每年有所获的“利息”,那么土地作为隐没的生产者不但是无名的,也可能是殒身的。

### 三、作为潜能的“荒芜”与新诗学

只种泥土的纪念园设计以及新诗史中“捐输”的土地想象,可为更好地理解《野外》这首诗提供帮助。“荒地”与“田地”之间“解决不了的矛盾”,原因并不止于“饥饿”的记忆。下面让我们细读这首诗。

《野外》可以“在荒地和田地之间/我相信,一定有解决不了的矛盾”这两诗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父亲”与“我”在土地上的不同表现,第二部分解释这两种表现的原因所在。这两部分中,“父亲”与“我”互为对照,按“父亲”如何,“我”如何的叙述方式行进。第一部分共五行,其中“我惊喜于”虽未成句但断为两行,这将原本可四行解决的四句话变为五行呈现。这五行中,前两行以动词“着迷”的相似说着迷之物的不同,即田(地)与荒地。虽都为土地,但诗人将其严格区分。这种区分又因“父亲”与“我”在土地所做之事,而更加明显,“父亲”是忙于除草、杀虫,“我”则是在观察瓢虫产卵。“父亲”所要灭除的“虫”反而是“我”要观察的。就诗的形式而言,诗人是赞赏(起码是在强调)这种观察的——“我惊喜于”以换行的方式显示“惊喜”的重要程度。这一换行的伎俩也在第二部分再次使用于“重新荒芜”四字当中。这两处打破句子正常节奏的换行,前后呼应,以“行”的具体形式表明诗人的情谊倾向,即“瓢虫”与“荒芜”。第二部分是诗人对两种不同行为的补充与解释。“父亲”着迷田地,打理现有的田地还不能使其满足,这是因为“父亲”过往的饥饿经历。因粮食匮乏的恐惧,希望所有荒地都种上粮食,这成了“父亲”“一生的愿望”。而“我”则近乎孩童,喜欢扑蝶,并因此希望田地的荒芜能带来更多的“蝴蝶”。

诗作以“父亲”与“我”的不同行为、不同愿望展开,在结构上并不复杂。两两并行的对比中,“田地”与“荒地”作为矛盾的象征逐渐被突显。需再强调的是,“田地”与“荒地”在诗中有着严格的区分。诗人通过“父亲”和“我”的具体行为,提醒人们田地与荒地的不同。“人通过‘事’而与‘物’打交道”<sup>[35]</sup>，“田地”与“荒地”

① 参见段从学《现代新诗的国家想象:从“地图中国”到“土地中国”》,《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② 2021年,白庆国入选由《星星》诗刊负责评比的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

③ “把一切捐输”一语,取自陈敬容的诗作《捐输》(载《诗创造》,1947年第4期)。

这两个相同的物（都是土地），在“事”的不同中显出区别：“父亲在田里除草，杀虫/我惊喜于/乱草中，一只瓢虫在产卵。”田地要除草、杀虫，才能确保肥沃的土壤之力都到作物中去。荒地的乱草才有“瓢虫”产卵的可能，这种可能的来源在于杂草而非作物，在于荒地而非田地。除草和杀虫都需要使用“农药”，诗人此处的对举，或意在表明农药之下瓢虫不存的事实。这让人联想到《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有毒化学药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昆虫对人类自身的伤害。<sup>①</sup>诗中虽无明确的生态呼吁，但有生态保护的意识在发挥作用——“我”与“父亲”的行为正好对应荒地与田地，也对应生态与非生态。

《野外》所透露出的这份生态意识，关系到国人由乡入城的命运轨迹。除诗作《野外》之外，臧海英关于父亲的其他诗作，可补全这位“农民父亲”的形象：他是没有退休金的老头，一辈子在泥土里打滚儿（《差别》）；他是晚年随子女进城，不到一月走遍全城的人（《地理》）。“父亲”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晚年生活并非完全由庄稼地构成，“父亲”进城了。臧海英能如此关注土地，是因为她作为曾经与“父亲”一样的农民，熟悉土地，感念土地。臧海英多次描述由乡入城的感受。

从窗口望出去  
楼群的后面，还是楼群  
  
但眺望的时间长一些  
会看见楼群的后面是村庄  
继续眺望  
会看见2010年的我  
站在田埂上  
  
她不住地眺望  
向我此刻站立的地方  
  
——《眺望》

岔河分开城区与郊区后，继续流淌  
黄昏，经过岔河桥时  
我停顿了一下。但从不认为  
自己从属于哪里  
在城市居住多年，我骨子里  
仍然住着一个农民  
每天的工作就是耕种  
  
——《过岔河》

来自城市的眺望视线，没有让乡村再作为“田园诗”般的风景所在。诗人所见不再是袅袅炊烟的和谐之境，

而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山水间诞生的冲突。这也就让臧海英对于自然的观照冲破自然文学的界限，进入生态文学的范畴。<sup>②</sup>在与花语的访谈中，臧海英这样形容家乡的土地：“我的家乡在鲁西北，地处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平淡的像一个一生都没有起伏的人，又被过度地开发，身上没有一块土地是原生态的。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庄稼，看到人。”<sup>[36]</sup>长诗《开发区》对土地的过度开发，有更为详细的审视。

有时去市里与朋友聚餐，  
有时回乡下，看望父亲。  
市区是城市的样子，  
乡下是农村的样子，  
开发区，在它们之间，  
和我一样，长着一张混沌的脸，  
一直在开发。

白杨砍了种上悬铃木，  
野草铲平铺上了地砖。  
今天在康博大道，我看见  
野草，又从砖缝里钻了出来。

开发区一直在开发，  
一直未完成。

开发区位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是“混沌”的。这种混沌在于开发的未完成性（“一直在开发”），其既不是城市也不再同于乡村。所谓“开发”即是使荒芜之物繁荣，是对资源的开发，对有用之物的组织，充满人类的意志（“白杨砍了种上悬铃木”）。但自然之力斩不尽，砖缝中的“野草”又会长出来。因此，开发区的未完成性还在于人力与自然力之间的较劲。开发区为促进经济而设，和农业的“种植”一样，都构成对土地的索取姿态。这种被开发的命运，不单落在土地身上，也落在“我”身上。和开发区一样，“我”何尝不是一直在被开发？“我一直被开发。/他们用学校，建筑工地，道德教育，社会成功学……/一个男人试图用爱。”因此，《开发区》不单是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之诗，也是对“我”的探寻与反思之诗。

关注土地，关注生态，不意味着能提炼出有关“荒芜”的土地诗学。外在风景的发明，还在于内心世界的景象，“荒芜”亦是臧海英所要选择的生活姿态。要言之，“荒芜”背对“开发”，是对开发的拒认；“荒芜”关系失败，是对成功的拒绝。“荒芜”的内面是对“无用”的赞赏。土地之所以要“荒芜”，“荒芜”之所以

<sup>①</sup> 参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sup>②</sup> “生态文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参见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能生态,正是源于对“无用”的回归。诗人曾直言这种无用(《无用》):

一棵树  
放弃做一把椅子,一张床,或一副棺木的可能性  
放弃点燃  
一个人拒绝成功学,干着无用的活计  
食不果腹,却满心欢喜

但“满心欢喜”何尝不是一种有用?诗人因此发出叹息:“我已经不再问自己/为什么写诗。”如果和“满心欢喜”一样,写诗也是为寻得“有用”,那么诗人似乎达不成诗作开头的目标:“就是要自己无用。”对无用的赞赏与诗人对自我的发掘有关。臧海英对“我”有着很深的探寻,如诗作《陆地生物》《致软弱》。此种探求发现了“虚弱”(失败)的重要意义。

而最近,腰间盘突出  
让我不能远行  
躺在床上,终日思考着  
一颗稻草,是怎样从喂养我的那棵  
变成了压倒我的那棵

——《陆地动物》

与一个人相拥,我也很想告诉他  
“相比你强大的部分  
我更喜欢你小面积的虚弱”

——《致软弱》

《陆地动物》中的“我”本是吃稻谷从婴儿长大成人,但又无法一直是健康的站立者。疾病会缠身,“稻草”也就不永远是供人茁壮成长的粮食,而是伴随苦痛的喂食。相较于站立,“压倒”所显示的无奈,在诗人的诗作《致软弱》中得到缓解。在《致软弱》中“虚弱”也是可以产生敬意的地方,相较于茁壮,软弱的身体也是有力量(“一个英国记者,从德兰/满是皱纹和萎缩的脸上/看到了力量”)。诗人不忌讳虚弱在通常意义上的“无力”,将其表述为“我更喜欢”的部分。弱感也交付出诗人对写作的“失败”体认。《星空下》便是将“失败”化为写作气息的诗作:“今天,我又写了一首失败的诗/我的沮丧,是无法描述星空的沮丧/我啊,其实一直站在/星空和残稿之间/——一个笨拙的转述者/他结结巴巴。”不管是“荒芜”对于土地的指认,还是“失败”对于写作的承认,臧海英都以“弱”顾及世界。换言之,“荒芜”作为对土地的理想希冀,暗含诗人对世界的基本理解。

“荒芜”词典中的释义为“田地不加管理而杂草丛

生”<sup>[33][95]</sup>。野地并不存在“荒芜”一说。“地都荒了”的“地”不是指自然界的土地,而是指“田地”,固有“荒”之说。“荒”字的本义是指“田地生草,无人耕种”,也可引申为“收成不好,凶年”。<sup>[37]</sup>如“大逃荒”所要逃避的,便是来自田地收成不佳而吃不饱的“荒”。原本靠人力可有的东西如田地的收成、学业的进步,因人力的不再或是无法投入,而走向田地荒芜、学业荒废。“荒”与“不荒”间,含有人力与自然搏斗的成分。荒芜是人力的消失,如外出打工者的田地可能会荒芜。人作为人力的发挥者,总是希望充满力量,不希望力的消失。因此渴望荒芜,于“荒芜”一词而言情理不通。诗作《野外》正是这一悖论的呈现,诗人希望主动放弃人力,让田地变回荒地。如果说土地有耕种的潜能,那么“荒芜”便是对这种潜能的荒置。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因为人力的不相加而未显示这种潜能。当然,对于大自然而言并无“荒芜”,所谓“荒芜”反而是人力未及处的自然之本相。

“荒芜”并不意味着永远荒芜,也不意味着繁荣能力的丧失,而是一种“丧失的在场”,是阿甘本所言“潜能”<sup>①</sup>的体现。土地潜能的发挥具有二重性:其一,土地是否被种植事关人的潜能的发挥;其二,土地是否长出或毁灭植物,则与土地自身潜能的使用有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能”与“潜能”相对,代表着“阙失”。<sup>[38]</sup>依此,荒芜的土地是无能者,其是被褫夺了粮食资格的存在。阿甘本在亚里士多德对于“潜能”理解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不转化为现实的潜能,即土地不单只有能(被)种植的潜能,也含有能不(被)种植的潜能,荒芜的土地体现的正是第二种潜能。阿甘本指出,“人类的潜能的伟大——同样也是它的悲惨——就在于,它首先是不行动的潜能、黑暗的潜能”<sup>[39]</sup>。在此意义上,“重回荒芜”作为人的选择含有对人之所能的放弃。这种“能不”去种植的诗学想象,或构成新诗中关于人地关系的新诗学。

## 结语

“重回荒芜”是天真的理想,而非现实。但正是因为诗人不切实际的想象,土地的“荒芜”才能生成,并在比拼产量的“田地”之外创建出自己的“荒地”。荒地上可扑蝶的浪漫想象,出脱于人们对土地的种植、收获期待,成为格格不入的闯入者——虽然“荒芜”本身是无需犹疑的正常。这一正常,因诗意的人地关系之解释而存在于《野外》一诗中。“荒芜”所代表的对“种植”的超越,也体现在其他事情上。诗作《在半空中上班》写在康博大厦 24 楼上班的“我”：“我的工作，就是日

① 参见尉光吉《阿甘本的无用概念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

复一日/坐在办公桌前,给天空写信。”工作本是对人的潜能的发挥,而写信当然也可以作为工作,但“给天空”的虚幻性否决了这种工作的有效性。换言之,给天空写信是拒绝“工作”的。尽管抱此虚幻,但诗中“给天空写信”的重要性远高于产生实际效能的工作。可以说,“重新荒芜”与“给天空写信”的工作一样,都是诗人天真的表现。天真的“荒芜”背后,是诗人对无用、失败的诗学认领,也是对阿甘本所言“潜能”的呼应与深切理解。

臧海英的写作扎根于现实生活,勘察内心的响动,试图为忙碌向前的、无所不能的世界装上减速器。《野外》中“重回荒芜”的愿景,取自诗人的内心景象。对于无用的关注,对于过度开发的拒绝,对于自我的失败体验,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使得“荒芜”作为对土地形象的希冀脱口而出。或许《野外》并非一首出彩的诗作,但“荒芜”作为“捐输”之外的土地想象,还需我们珍视。“荒芜”既是关于土地的诗学,也是关于写作的诗学。那份够不着星空的残稿,“结结巴巴”出述说的无能(《星空下》),就景象而言不也是荒芜的吗?在此意义上,深感匮乏的臧海英,或许有她身处黯淡(而非灿烂)却依旧写作的理由。

#### 参考文献:

- [1] 臧海英. 匮乏的人生何以写作(创作谈)[J]. 诗潮, 2022(8): 10.
- [2] 中央深圳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2021深圳年鉴: 第37卷[M]. 深圳:《深圳年鉴》编辑部, 2021: 266.
- [3] 李娟, 冯宁璐, 薛源. 少做甚至不做的景观: 以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园为例[J]. 景观设计, 2022(3): 10-15.
- [4] 黎存根, 易芝娜, 陈晓楠. 这个公园, “不种植物只种土”[N]. 羊城晚报, 2023-04-07(11).
- [5] 庞伟. 信任自然很难吗?[EB/OL]. (2024-02-28)[2023-03-01]. <https://mp.weixin.qq.com/s/3F8sUbBEiEdExOqErBt1Fg>.
- [6] 庞伟. 从功利主义到土地伦理: 城市化中的植物观和“节约型”绿地思考[J]. 园林, 2009(2): 13-15.
- [7] MONTGOMERY D R. *Dirt: The Erosion of Civilizations*[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3.
- [8] 舒良树, 编. 普通地质学[M]. 3版.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9: 153.
- [9] 张凤荣, 编. 土壤地理学[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5.
- [10] 杨帆. 土壤形成, 究竟要多久?[EB/OL]. (2016-12-06) [2024-02-28]. <https://mp.weixin.qq.com/s/9StXL8Yw3QyTEXpDFRAnGw>.
- [11] 史诗. 从“找水”到“采样”, 探索火星生命之谜[N]. 科技日报, 2023-01-17(6).
- [12] 庞伟. 序[M]//庞伟, 张健, 黄征征. 景观·实践: 广州土人景观作品选.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3.
- [13] 城市建设处. 访谈《大师话城04|景观诗人庞伟》[EB/OL]. (2020-04-24)[2024-02-28]. [https://ghzjy.gz.gov.cn/ywpd/cxgh/cssj/content/post\\_5805945.html](https://ghzjy.gz.gov.cn/ywpd/cxgh/cssj/content/post_5805945.html).
- [14] 赫拉利.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77.
- [15] 沈德潜, 选. 古诗源[M]. 闻旭初, 标点.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
- [16] 郝铁川. 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 中国民间神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43.
- [1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3.
- [18] 罗丽, 编著. 中国古代农事诗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5.
- [19] 葛晓音. 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31.
- [20] 刘半农. 扬鞭集: 上卷[M]. 北京: 北新书局, 1926: 35.
- [21] 刘大白. 卖布谣[M]. 上海: 开明书店, 1931: 46-47.
- [22] 穆旦. 穆旦诗文集: 第一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69.
- [23] 吴晓东. 战争年代的诗艺历程: 40年代卷 导言[M]//谢冕. 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6.
- [24] 艾青. 北方[M]. 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9: 23-24.
- [25]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历史的丰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经济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72.
- [26] 李静萍.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3-66.
- [27] 中共山东省委编写组, 编. 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1.
- [28] 山东省革委文化局创作办公室, 编. 千秋大业我们创 山东省农业学大寨民歌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7.
- [29] 卞之琳. 慰劳信集[M]. 昆明: 明日社出版部, 1940: 65-66.
- [30] 路杨. 风景与劳动: 大生产运动与延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J]. 文艺争鸣, 2023(4): 7-16.
- [31] 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35.
- [32] 李蓉. 土地、经验和想象: 论中国现代诗歌“土地诗学”变迁中的三种路向[J]. 文学评论, 2016(6): 106-114.
- [33] 阮智富, 郭忠新, 编著. 现代汉语大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 [34] 何言宏, 编.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诗歌卷[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31.
- [35] 杨国荣. 基于“事”的世界[J]. 哲学研究, 2016(11): 76-85.
- [36] 臧海英. 花语. 臧海英: 我得做我孤注一掷的事[EB/OL]. (2017-09-11)[2024-02-28]. <https://www.zgshige.com/c/2017-09-11/4234871.shtml>.
- [37] 李学勤, 主编. 字源: 上[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48.
- [38]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93.

# 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道”眼观照

答风华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历来重视对“道”,即宇宙人生本原、实相、真理、规则的表现和探究。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理应立足于这一实际,从“道”的角度观照教学内容,力求挖掘其深层内蕴,彰显其“本来面目”。将这一教学方法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需要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欲“明”之“道”的阐发;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未“明”之“道”的揭示;三是适度回归与中国古代文学相适应的、具有独特把握世界之价值的统观天人、会通万物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引入“道”眼,符合文学艺术的本质,且不失是一个克服该课程教学现有弊病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关键词:**教学;中国古代文学;“道”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1-0100-05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在培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人才、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活动的蓬勃开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处在层出不穷的变革中。目前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所做出的种种改革,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不少弊病,如大多数教学改革停留在形式上,在装饰、技术、场面、娱乐性乃至诵读声腔上大做文章,却忽视了课程的内涵和对课程内容的深度挖掘。一堂课下来,看似轰轰烈烈,学生却没有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与这类处于改革翻新中的教学相比,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有其长处,但也存在过分偏重书本知识传授,忽视学生主动性和创新思维的培养等缺陷,而且与前者一样,都有使学生思维机械化、狭隘化,所获信息表面化、碎片化的弊端。中国古代文学本来是一门内蕴极其丰厚深邃的学科,在教学时以对形式技巧、知识碎片的追逐代替对学科与课程内涵的发掘与充实,无异于舍本求末。

受特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是与“道”,或者说与对宇宙人生本原、实相、真理、规则的探究密切相关。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sup>[1]</sup>如刘勰所言,中国古人普遍认为,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来源于自然之道,“文”是“道”的体现,并且因其对“道”的揭示而大放异彩。正因其与“道”的密切关系,古人心目中的“文”是经天纬地之物,绝非一般的文字游戏产品。这种对“明道”“载道”“传道”的重视,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包蕴极其广远、内涵极其深刻的语言艺术。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道”实际,借鉴中国人观照世界的经验智慧,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引入“道”眼,亦即站在宇宙人生(包括文化创造)本原、实相、真理、规则的高度对教学内容加以观照,挖掘其深层内蕴,彰显其“本来面目”,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不失是一个克服上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弊病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将这一教学方法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既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欲“明”和未“明”之“道”的阐发与揭示,也需要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的转变与优化。

收稿日期:2024-09-28

作者简介:答风华(1974—),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研究。

## 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欲“明”之“道”的阐发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品本身就是为表达某种“道”而作。具体到不同作品，其“道”又有显、隐之分。对于这类作品，要注意结合相关的社会、文化、思想背景，阐发其欲“明”之“道”，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作品的主旨。那种忽视作者所表之“道”，或者对此语焉不详的态度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对于其中“道”表达得比较隐晦，甚至不易察觉的作品，更要留意。例如宋代杨万里有《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云：“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云：“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sup>[2]</sup>这两首诗，一般人读后会有浅俗、琐屑之感，觉得作者闲极无聊，顶多读出点“诚斋体”的生活情趣来。但若联系宋代理学盛行的文化背景去看，这两首诗却是深蕴大道。理学家视“天理”为宇宙人生之本原，并认为此“天理”就体现在吃饭、穿衣、睡眠、戏耍等日常生活行为中。杨万里本人即是一位理学家，他的诗歌“成功地将理学与文学融会在一起”，可谓“浅俗其表，深雅其质”。<sup>[3]</sup>此二诗所写日常生活，俗中见雅，静中见动，童真中见沧桑，无聊中见有趣，绝不是一般人眼中的日常生活，而是站在某个宇宙人生制高点上看到的日常生活，故而张紫岩（张浚）见到“梅子留酸软齿牙”四句，有“廷秀胸襟透脱矣”<sup>[4]</sup>之赞叹。在教学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等诗歌时，就要注意阐发其中深藏不露的“道”。又如《西游记》第五十七、五十八回“真假美猴王”的情节，一般读者看后只觉得有趣、好玩，但细品原文，可知其中深蕴哲理，这由文中真假猴王且行且斗，直打至雷音圣境，如来遥见乃告大众“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sup>[5]</sup>的话语才可见出。如来话语所涉之理，可从佛经中获得理解和印证。《楞严经》卷二有这样一段言论：“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是非月。”<sup>[6]</sup>依佛学之说，人心本是清净圆明的，能够照见十方世界。本为清净圆明之心，无须有所明，但它偏要有所明，这样一来妄念就产生了。妄念出来后，原来的真觉反而被当成了妄觉，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就如同《楞严经》中所打的比方：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有个人也斜着眼睛去看天，结果又看到一个月亮，于是就有了哪个是真月亮，哪个是假月亮的疑惑和分辨。其实天上本就一个月亮，不生妄念，不去作虚妄分别，也就没有是非月非月的疑惑。同样的道

理，在《西游记》中，猴王原本只有一个，因为妄念的缘故，又出来个假猴王，于是就有了真假猴王的纠葛；如果不起妄念，没有心中纷扰，也就不存在这些分辨与纠葛了。妖魔起自人心，也要靠心来慑服。假猴王只有如来能识破，因为如来代表着真觉和唯一真相，在唯一真相面前，假相是无处遁形的。《西游记》这部作品就是如此，在虚幻与戏谑中寄寓着极深之理，需要结合相关哲学理论加以阐发。

阐发古代文学作品欲“明”之“道”，不能一味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去解读，或者只作些大而空、俗而滥的解读，而应力求回归到作品所营造的特定语境中去理解其所表达的“道”，并在此基础上对作品所表之“道”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学生读后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熟能生巧的道理，但提供这个道理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养生主》开篇就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即为人处世不应以物为事，而须“缘督以为经”。据王夫之的解释，“缘督以为经”也即“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sup>[7]28</sup>。文中接下来用了“庖丁解牛”等五个比喻来阐明上述道理，“庖丁解牛”故事的寓意实为“牛虽多，不以伤刃，物虽杂，不以累心，皆得养之道也”<sup>[7]30</sup>。此“道”在今天看起来有些消极，但其所体现出的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还是可取的。学生理解此“道”也有些难度，然而不能因为其难以理解就用某些普适性废话式的“真理”取而代之。教学《红楼梦》也是如此，这部小说中寄寓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但现今课堂教学对小说思想内涵的着眼点往往是封建制度的腐朽、新旧事物和思想的冲突之类，而对其看似荒唐的“梦”话“空”言注意不够。对此，需适度结合对作者影响极大的佛、道等思想，以及作者的社会人生体验加以阐释，才能解得其中深至之味。

## 二、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未“明”之“道”的揭示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些不是为“明道”而作，或者其主要创作目的不在“明道”。对于此类作品，也需要施以“道”眼的观照。即便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在“明道”上，但是，一切文学作品，包括其中所写人、事、物、景、境，其中所包含的作者思想情感，连同其艺术面貌与特质，无不有远、近、大、小之源头，无不是某种规律、原理的体现，总之无不与“道”难解难

分。从“道”的角度,对这类作品作一高屋建瓴的考察,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刻、透彻地把握作品,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超越纷繁万象契入事物本质的洞察力。例如汉代有不少诗歌抒写了乐生恶死的情感和愿望,它们可以引发对于生死问题的深入思考。从两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等诗歌来看,面对无常短暂的人生,人们有寄希望于天国、仙乡、神药的,有感觉时不我待汲汲于功名富贵的,有提倡饮美酒、服纨素,甚至斗酒相娱、弩马破车出游,乃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的。然而无论是服食求仙,还是功名富贵,亦或是及时行乐,都不能使人彻底摆脱生死问题的困扰。对于汉代诗歌所抒写的上述情感、愿望,须从“道”的高度,结合儒、道、释诸家学说乃至西方哲学思想,引导学生加以理解、评论、思考。比如让学生认识到,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唯有不断求索、上进,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高度和生命维度,才能最大程度地看破生死问题,从而获得摆脱生死困扰的良方。

一般都将陶渊明散文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看作一个反映小私有生产者美好生活愿望的乌托邦,更有将其解释为阴间鬼界的奇谈怪论,但若从“道”的视角对其加以观照,则会另有一番发现。依据台湾学者蒋勋的解说<sup>[8]</sup>,文中渔人在茫然无觉中进入桃源胜境,客观上是在告诉人们:“忘掉目的性之后,才会碰到美景”;没有心机,天机就会出来。“桃花源的水源也是我们生命活水的来源”,通往桃花源的那个山上小口“正是我们生命中要打开的洞口”。渔人向官家出卖桃源,带差役来骚扰,却在寻找当日离开桃源所做记号时迷路了,这就是说,“一有心机,天机就不见了”。这番道理,难说是作者撰文之时就能意识到的,或者清晰完整地意识到的。但是,从作品本身极强的象征性出发,在教学时完全可以从宇宙人生哲理的高度对其作出贴切到位的全新阐释,这不但有利于学生对作品本身的理解和把握,还可以使学生获得某种心灵启发,乃至真的为他们的生命打开一个“洞口”。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作家所处境遇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化造诣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在教学中要注意总结、揭示这方面的规律。对此,古人已提出一系列相关看法。择其中著名者而言,从孟子的“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疢”,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赵翼的“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众多命题一脉相承,在不同的角度、范围、层面上申述着一个共通的规律。如果进一步考察上述观点及相关论说,还可以从中发现挫折与成功、不幸与幸运等对立事物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从而引发更为深

远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往往还体现出这样一条规律,就是一个阶段的文学重理性、重内容,到另一个阶段又变为重感性、重形式,再到下一个阶段又出现反拨,如此循环往复,重理性、重内容与重感性、重形式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实际上也是对立事物之间辩证关系的反映。套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来说,这正是所谓“阴阳互根”“一气消息”。在教学时若能如上所述,探察到某些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乃至其背后的总原理,学生在认识许多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时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举一反三了。

### 三、向统观天人、会通万物思维方式的适度回归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道”,是中国古人统观天人、会通万物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产物。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要学会从古人的认知维度和理解世界之习惯上看问题,否则难以对古代文学作品欲“明”之“道”作出准确、到位的把握和揭示。这种统观天人、会通万物的思维方式,以其本身自具的艺术之特性和不可替代的把握世界之价值,对探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未“明”之“道”也有很大帮助。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要对教学内容施以“道”眼观照,不能一味“以今揆古”,而需要适度回归中国人统观天人、会通万物的思维方式。例如《诗经》惯用比兴手法表达情思,其中用以起兴的诗句富含很多天人之道,并且与下文有着隐约深微的内在联系。如果单从今人的思维习惯出发,很难领会到兴句中潜藏的“道”,也很难准确把握兴句与下文的微妙联系,甚至看不出兴句与下文有何意义联系。但若回归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读《诗经》,便会发现兴句及相关诗句所呈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比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第一章《诗经》部分讲“兴”的运用情况,书中以《小雅·鸳鸯》第二章和《小雅·白华》第七章为例,认为这两处同以“鸳鸯在梁,戢其左翼”起兴,而前者接以祝福语“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后者接以怨刺之言“之子无良,二三其德”,由此断言这两处兴句与下文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sup>[9]</sup>。这就是典型的以今人的思维习惯去解读古诗。如果能像古人那样在思维中将人与物打通,就会发现上面两处兴句与下文还是存在一定的意义联系的:前者是从正面起兴——鸳鸯在河堰上雌雄相伴,敛翼安息,正如君子安享其远大之福;后者是从反面起兴——鸳鸯在河堰上雌雄相伴,敛翼安息,人间夫妇也本该如此和睦相处,但是却有人生出了三心二意。同样的起兴诗句,所接下文虽截然不同,但都

与下文在安、和这个意义上相通。又如依照古人的感知习惯去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类诗句，看到的将会是一幅宇宙间阴阳相悦相配，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妙图景。受初民物我不分的宇宙观影响，《诗经》中的人与鸟、兽、万物往往是同属一体，相互衔接的，“兴句所咏之事物与应句的内涵，在早期诗文初创之际，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sup>[10]</sup>。至后世，这种人与物共属一体的观念逐渐淡化，但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却始终保留着一种统观天人、会通万物的传统。宋代经学家林光世曾言：“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阴阳造化、鸟兽草木无所不知，不必读繇辞、爻辞，眼前皆自然之《易》也。世道衰微，《易》象几废……”<sup>[11]</sup>这话虽说得有些夸张，却非常中肯地点出了中国古代人善用形象思考问题，善于探测天、人、万物之通理的思维特点。没有这种思维方式，就不能很好地领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道”。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有一种惯用的叙事模式，即采用各种预兆或预言暗示、呼应事情的走向和结局，或者解释事情的因果关系。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预兆、预言是合情合理的，有科学或现实依据的，有些则带有迷信、传奇的色彩。考虑到中国古代人认知维度和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对于那些今天看起来带有迷信色彩的预兆、预言，不能一概以“迷信”视之。比如《左传》“秦晋殽之战”（见《僖公三十二年》《僖公三十三年》）中写到，晋文公重耳卒后“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晋国负责卜筮的官吏卜偃乃言“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sup>[12]</sup><sup>[1832]</sup>晋文公的灵柩发出牛鸣一样的声音，卜偃将其解释为国君亡灵发出的指示，并认为这是兵戎将起的征兆。在后文中，秦果然谋袭郑都，晋军在殽地击败秦师。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卜偃所说自然是迷信荒谬之语，即便是古人也有不信其说的——为《左传》作注的晋代学者杜预即认为卜偃不是真的以为晋文公死后显灵，并对卜偃之言作了一个较为雅驯、正经的解释：“卜偃闻秦密谋，故因柩声以正众心。”<sup>[12]</sup><sup>[1832]</sup>不过，考虑到《左传》喜用神秘化的征兆、言辞以作预叙的记事惯例，这一解释显然背离了作者的本意。联系中国古代人的认知特点来考察，作者实际上是站在一种天人合一、物类相感的立足点上看问题，所以特别关注天地万物的异常之处，因为在作者意识中，此处可能关联着彼处。这种思想虽有主观化、绝对化的弊病，但也有其合理性。《左传》所记“柩有声如牛”的异事，《汉书·五行志》认为是“鼓妖”（即声音之预兆），并解释了所谓“鼓妖”的成因：“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

发于音声，故有鼓妖。”<sup>[13]</sup>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此说不无道理。就“柩有声如牛”而言，当晋文公的灵柩由绛都被运往殡地曲沃的时候，周围正酝酿着一场战争，彼时气氛必有异样，影响到人的感知和心理，故而人们会出现听觉的错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或者把本来正常的声音听成异音，也就不足为奇了。上面这个例子也说明，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需要适度回归古人的特殊思维和认知场域，如此才能较好地体察到作品的原生形态，才能探测到作品中的“道”之精髓，而不致落入某种简单化、粗暴化的作品解读窠臼。

借鉴中国古代人认知体系中的有益成分去领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道”，可以使人在一个更为阔大、深远的时空领域鸟飞鱼跃、探骊得珠，可以使人更览物心通、见微知著的智慧，对于建构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话语也大有裨益。

## 结语

《庄子·天道》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sup>[7]</sup><sup>[120]</sup>所谓“意之所随者”与“彼之情”，也即处于意、言之表的“道”与事象的实情、世界的真相。此语虽有神秘主义意味，但仍能给人以有益启发，这就是：读书不能局限于作者的言辞及其字面意思、所陈事象，而应努力探求书籍、言辞、事象背后的“道”；能使人在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程度、层次上对“道”有所得，这才是读书的最大价值所在。这种对“道”的探求，也是阅读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海德格尔即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诗（Dichtung）”“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tiftung）”，故“艺术之本质乃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因此艺术作品“决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理，而不只是一种真实”；当“自行遮蔽着的存在”被“澄亮”，并“把它的闪耀嵌入作品之中”，这种被嵌入作品之中的“闪耀”（Scheinen）就是美，所以“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sup>[14]</sup>既然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一切艺术作品的美即在于其通过特定方式对真理的再现，那么在文学作品的阅读

和教学中,就理应重视对“道”的探求和阐释,否则我们所能领会到的文学作品的“美”就要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引入“道”眼,并辅以相应的“道”心、“道”手,不但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而且也符合文学艺术的本质,这必将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它可以使人在古代文学的山川原隰中探寻到更多、更好的宝藏;可以使人在采菊东篱、南山鸟还的平淡生活、寻常景物中发现“欲辨已忘言”的生命真意;可以使人在寻芳泗水之滨,面对无边新景时不致眼花缭乱、不知所从,并产生“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豁然通达之感;可以使人在目睹昔日曾经千般向往的庐山烟雨、钱塘潮汐之后,摆脱可能会有的“不过如此”的失落感,获得“正是如此”的万事洞明之心境。对于那些舍本逐末、流散无穷的课堂教学来说,这种教学方法也可以使师生多些“一言而终”的提要钩玄本领,而不致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知识碎片中。

中国古代文学是在儒、道、释等诸家思想以及中华深厚文化传统的哺育下生长起来的,对其施以“道”眼观照,需要具备足够的哲学及思想文化修养,乃至一个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文化大视野。否则,在教学中就不免“目光短浅”,或一叶障目,或仅得皮毛,或蜻蜓点水,或语焉不详,从而难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发掘出真正的、有价值的“道”。

#### 参考文献:

[1] 刘勰.文心雕龙注:上册[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

- [2]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9-190.
- [3] 沈松勤.古代文学的“和合”秉性与“和合”研究[J].文学遗产,2014(1):145-148.
- [4]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4[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60.
- [5] 吴承恩.西游记:下册[M].3版.黄肃秋,注释.李洪甫,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719.
- [6] 赖永海,编.楞严经[M].刘鹿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79.
- [7] 王先谦.庄子集解[M].沈啸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蒋勋.《桃花源记》:坦荡得一如清水时,就会看到最美的东西[M]//蒋勋.蒋勋说文学:从《诗经》到陶渊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94-199.
- [9] 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65.
- [10] 周英雄.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兼论早期乐府以鸟起兴之象征意义[M]//邝健行,吴淑钿.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82-319.
- [11] 林光世.水村易镜:第1卷[M].通志堂经解本.1680(康熙十九年):自序.
- [12]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班固.汉书:第5册[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421.
- [14]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37-308.

## The Exploration of “Tao”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Universities

ZAN Feng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expression and exploration of “Tao”, that is, the origin, reality, truth and rules of the universe and life.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e should be based on this reality, look at the teaching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o”, and strive to tap its deep connotation and highlight its “true colors”. To implement this teaching method into specific teaching practic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ne is to elucidate the “Tao” that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orks want to show; the second is to reveal the unspecified “Tao”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hird is to moderately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that integrates heaven and man, and connects all things, which is suitable for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as a unique value of grasping the worl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ao” eyes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nforms to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vercome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of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Key words:**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ao”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探究 ——以山东省普通高校为例

侯深燕<sup>1</sup>, 刘文霞<sup>2</sup>, 桑艳霞<sup>1</sup>

(1. 德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山东德州, 253023; 2. 德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德州, 253023)

**摘要:**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大学英语教学应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入, 实现大学英语课程的品格塑造和价值引领功能。从课堂教学到教学管理、从教师素质发展到课外教学实践, 打通大学英语教育各个环节与要素,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融入大学英语课程, 以期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效果, 有效实现大学英语课程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地方高校

**中图分类号:** H319;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1-0105-06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下称《纲要》), 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sup>[1]</sup>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 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sup>[2]299-300</sup>。它不仅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作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融入到高校思政课程和专业及公共课教学的全领域、全过程。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 在各类高校中有着广泛的受教群体,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是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的重要一环, 在高校立德树人环节中不可或缺。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两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sup>[3]</sup>, 强调各民族命运与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紧密联系及其在实现中国梦中的重要性。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载入党章,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政治理念和民族工作方针。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总结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 作为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所制定的战略规划, 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各族成员对这个共同体客观存在的感知和认识, 以及对其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sup>[4]</sup>。这一概念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一体性特征, 而且突出了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包括对中华文化的共享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建、共担、共享意识。其内涵复杂而深刻, 它不仅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层面, 还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等多个维度。这一意识的铸牢不但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根本, 国家统一之基石、精神力量之灵魂。

在教育领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大学教

收稿日期: 2024-1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系化思政教育研究”(23JDSZK060)。

作者简介: 侯深燕(1975—), 女, 山东德州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英语教育研究。

育的影响和意义尤为深远,为大学教育教学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应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具备国际视野,有理想信念、有民族担当的人才。从课程思政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增强学生的“四个自觉”“四个自信”“五个认同”,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奋斗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交织交融关系”<sup>[5]</sup>。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意蕴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是由大学英语课程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是大学英语课程本身性质和地位的必然要求。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科技、人文等领域进行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教育部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下称《教学指南》)指出:“大学英语是高校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sup>[6]</sup> 工具性即学生通过英语课程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用英语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工作、学习等,同时促进思维发展,提升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人文性即学生通过英语课程能够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形成跨文化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大学英语的人文性既包涵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鉴赏与比较,也有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价值观的引导。人文性的本质是育人功能,由此,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符合当今时代国家发展需求的人才才是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及责任担当。当今社会,国际风云不断变幻,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性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中国需要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思路、中国方案。在这一背景下,“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sup>[7]</sup>的人才尤为重要。而能肩负起提高我国国际义务履行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担的人才首先要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用英语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中国国情,是能通晓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有强烈认同的人才,是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能够观察到并较好应对彼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人才。由此,只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挥英语课程的思政育人作用,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合力,才能培养出上述适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具有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自信感的,能在国际事务中贡献中国智慧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这一属性可以为培养上述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是适应地区社会民情,高校校情、学情和高校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我国大多数省份多民族杂居。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 56 个民族齐全,2021 年全省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 10062 万余人,回族人口 53.57 万人,朝鲜族、满族和蒙古族人口均过万<sup>[8]</sup>。在各高校中,也有不同数量的民族学生。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学校学生来自全国 22 个不同省份,从北疆到南国,从西陲到沿海,包含 16 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族和壮族最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不仅是民族地区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非民族地区普通高校育人的必然需要,对于维护地方的民族团结、安全稳定、长治久安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正是地区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和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民族构成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的教育教学对于各地方高校而言是思政育人的应有之义。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是响应地方高校自身定位和发展特点的需求。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肩负起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地方、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的使命。全面推进城校融合发展、校企共建地方,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高校教育的组成部分,更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保证。很多地方高校都有师范专业底蕴,拥有数量不等的师范类专业、数量占比不等的师范生。其中,一定数量的毕业生会进入到基层各个学校,走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岗位,践行他们的教书育人职责。另外大部分毕业生走入其他行业,在岗位上履职尽责,发光发热,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在此过程中,大学英语的育人功能“参与了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过程,并将在学生进入社会生活后持续发挥重要作用”<sup>[9]</sup>。只有从源头上

把握好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质量,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中,把未来的教书育人者、社会建设者培养成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才能在实践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架起各民族相互学习、沟通、理解的桥梁,增强民族凝聚力。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践探索

#### (一) 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学英语是一门公共必修课,教学对象是全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可谓教育受众广泛,因此其育人地位和价值显而易见、毋庸置疑。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西方的文化、思想、风俗、政治、经济、科技等,蕴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任务巨大,要从外语课程思政视域下,深入挖掘教材,系统研究教育方式方法,认真探讨教育教学内容,实现价值引领。

在教学中教师要深挖育人元素,增强文化认同,厚植爱国文化情怀。课堂教学作为育人的重要阵地,教师要挖掘外语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元素,以价值导向贯穿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维锤炼中。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语言和文化不能脱离彼此而存在<sup>[10]</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而且是其发展的动力和凝聚力的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复合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sup>[11]</sup>受传统教学的影响,教师往往把语言技能的培养放在首位,较多关注教材中有关西方文化的学习,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不够深入。以笔者学校所使用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下文称《新视野》)为例,一册教材8个单元,每个单元包含A、B两篇文章,两篇以选词填空和词语习惯搭配为形式的课后阅读练习材料以及两段英汉互译材料。这6个语篇内容涉及西方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科技等领域,选材也注重了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但是涉及中国文化的部分只有汉译英的一个语篇翻译,反映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内容的比例严重不足,另外各单元的课后练习活动、习题的设计比较侧重于语言知识,“没有形成以育人目标为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sup>[12]</sup>,因此在价值塑造方面没有形成显隐结合的内在张力。由此,中国文化输入量严重不足,这显然不利于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因此,教师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深入挖掘现有教材中隐性的文化和思政元素,不拘泥于原教材内容,对教材内容合理取舍,增删选调,

及时补充相关中国文化等内容。比如,《新视野》第三册中,在讲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翻译语篇时,要及时补充、拓展有关“中国梦”这一语境下的词汇短语,采用任务式、合作式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厘清中国梦的内涵及形成过程,同时和“美国梦”加以比较,通过对比分析,使学生认清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不仅是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各民族团结一致的重要纽带。从文化共同体意义上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凝练价值共识,为国家认同打下文化和心理基础”<sup>[13]</sup>。在教学中教学生甄别中西文化差异,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高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凝聚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二) 在教学管理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学英语教学管理质量和水平是提高大学英语教育质量的保障,对于英语课程的育人水平有着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统领作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教材的选择、课程体系的建设和教学效果的评估都离不开教学管理部门和人员的决策和顶层设计。《教学指南》指出,“教学管理涉及教学目标管理、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以及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sup>[6]42</sup>。

1. 在教学目标管理方面,教学管理者应落实《教学指南》的指导思想,根据本校的特点和定位,贯彻教育部《纲要》的要求和精神,修订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体现课程思政内容。首先要明确思政教学目标,在教学大纲中构建系统的课程思政框架,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关系和意义,有计划、有目标、有机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用以指导和规范大学英语的教学及评估工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内容分门别类、系统地列入校本教学大纲中,明确大学英语各个阶段的文化教育内容,要做到系统化和量化,以便使教学内容更加有的放矢。将反映时代发展的现代文化内容、文化词汇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中,增加我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比重,提高我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只有在顶层设计中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和计划性,才能在提高学生理解现代中国的能力前提下,使其在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认同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在教学材料的选用上,要紧跟时代要求,响应国家政策和导向,选取合适的教材。教材承载教学内容,传播新知新念,对学生的知识、观念、思想都有长远深刻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学指南》指出,教材“要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坚守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应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6]39-40</sup> 我国高校的英语教材中选用的材料大多来自西方的经典著作、报刊、演讲等, 这些阅读材料体现的是西方文化, 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蕴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教师的课堂教学以教材为基础, 教材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的融入。一方面高校在选择教材时一定要好好甄别, 及时更换过时教材, 选取符合新时代要求和发展的教材; 另一方面, 教师要抛弃“以本为本”的观念, 抛弃照本宣科, 对教材的使用要适当取舍, 舍去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相左或相悖的内容, 适时补充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素材, 坚持经典性、时代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 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 有机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厚植爱国情怀,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世界观, 才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学英语课程一般由通识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英语三部分组成, 后两者为限定选修课或任意选修课。在线下课时有限、教学时间紧、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 利用数字教育平台, 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教育网络阵地。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网络学习平台为线上线下混合教育教学提供了无限可能, 打破了学校、地域的限制, 使无数优秀的教育资源得以共享。在学校层面上, 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 加大跨文化交际、文化对比及反映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习俗等内容的比例, 把一些校本在线课程纳入到课程体系中。通过两年的公共必修课的大学英语学习, 学生有了一定的语言知识基础, 理解力和思辨力也有所提升。要充分利用网络课程多样性、开放性的优势, 实现全过程育人。以本校为例, 教师自主开发了线上课程《中国与世界》《探秘大美中国》等多门网络课程, 课程内容涉及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等方面。学校可以从管理层面给予支持, 给予学分认证, 鼓励学生积极选修此类文化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 学生不但可以系统了解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人文思想、艺术形态, 培养国际视野, 还可以这些文化内容为载体提升思辨能力, 讲好中国故事, 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 提升民族责任感, 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 在教师专业发展中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水平

教师是课程思政育人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是保证教育立德树人的

关键一环。部分教师自身理论学习不足, 思想上不够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大学英语教学融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教学中更多地沿袭传统英语教学中的知识传授与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培养, 不能自觉地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故此, 教师要转变观念, 丰富自身文化素养, 以新标准要求要求自己。

1. 丰富自身文化素养, 改变传统知识结构。教师不但要有丰富扎实的语言专业知识和教学基本功, 还要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广泛的知识面, 不但要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包括教育、文学、艺术、历史、建筑等等, 还要全面、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2. 以新时代教师准则要求自己。教师不但要做到“四有”, 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 还要有家国情怀, 有端正、严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具备创新性和批判性的思维与意识, 否则无法为学生提供超越语言知识之外的内容, 不能有效引领其价值塑造和素养养成。

3. 教师要转变教育理念, 要把育人和价值塑造的理念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用、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效果的评估等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到价值引领和育人导向。教师通过选用适宜的教学材料, 设计富于逻辑层次的教学活动, 挖掘、提炼课程中的显性和隐性思政元素, 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各个环节的系统框架, 把握育人方向。同时教师要与时俱进, 跟上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 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化教学手段, 创建多元的教与学环境, 利用网上优质教学资源, 丰富思政教学内容, 拓展思政育人阵地,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 将外语教学转变为外语教育。

(四) 在课外实践活动中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仅要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还可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与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紧密结合, 以收到最佳效果。

高校是各民族学生汇聚之地, 要创建各民族学生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校园文化环境。各高校要利用校园这个阵地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加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是“群体中社会成员通过寻找文化上的共性或差异的过程中对某一文化所形成的认同感, 在整个认同体系中居于最核心、最基础的位置”<sup>[14]</sup>。增强文化认同是加强民族团

结的根本,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各高校要把握和创造机会,结合地方实际,让学生了解地方优秀文化和各民族特色文化,并在各种重大场合、重要节假日和重要集会上,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如各高校可以由院系牵头定期举办民族文化讲座、沙龙等活动,特别是利用传统节日(如中秋节、国庆节、端午节)举办庆典活动,请不同少数民族的学生介绍、表演、演绎其传统的民族文化习俗,引导学生了解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文化的来龙去脉,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和文化观。传统节日中蕴含着时代记忆,不但能唤起大众“对过去的记忆,形成‘我们感’,同时有助于感知当下的生活与成就,且能增强信心、形成客观感知、引起情感共鸣,从而促进共同体认同”<sup>[15]</sup>。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大大丰富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还可以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感情,使民族文化得到发扬和光大,做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使学生学会尊重差异、开放包容,在相互学习中架起沟通、理解的桥梁,构筑起强大的精神支柱,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数字化自媒体平台,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定期推介文化专题,并在英语第二课堂(如英语角)中设置话题进行讨论,丰富同学们的课外实践,拓展交流机会,和网络新媒体、课堂教学形成协同效应。还可利用地方各种文化资源,实地实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各地博物馆、民俗馆、纪念馆、红色文化基地、非遗文化基地等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直观形象的实物性资源,利用好这些资源,组织学生进行参观,开展“我是讲解员”活动,学生通过提前收集资料、查找文献,面对在华外国人用英语进行宣讲,通过语言的活学活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语用能力,提高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更使学生感受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革命文化及时代文化,提高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教育”的效果。此外,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有代表性的体现时代主题、反映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有事半功倍之效。大学生处于思想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具有民族特色、反映时代主题的视频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可以激起学生共鸣,从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促进其形成中华民族是一家,是共依共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应主动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国家繁荣兴盛的历史使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全过程,教育学生“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提升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增强学生的文化包容和责任感,深化学生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激发学生巩固发展民族大团结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在学生的脑海里,落实到行动上。

##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6-05)[2024-07-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EB/OL]. (2014-09-30)[2024-07-22].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49.html>.
- [4] 赵红伟. 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8(1): 20-25.
- [5] 康静雯, 陈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价值与路径: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4(3): 110-115.
- [6]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M]. 2020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7] 肖琼, 黄国文.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20, 17(5): 1, 10-14.
- [8] 辛树人. 山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 (2021-05-21)[2024-07-10]. [http://tjj.shandong.gov.cn/art/2021/5/21/art\\_6109\\_10287502.html](http://tjj.shandong.gov.cn/art/2021/5/21/art_6109_10287502.html).
- [9] 于鸿波, 马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高校外语教育问题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11): 87-91.
- [10] NIDA 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998(3): 30-34.
- [11] 常轶军. 增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J]. 探索, 2024(3): 14-23.
- [12] 刘正光, 岳曼曼. 转变理念、重构内容, 落实外语课程思政[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43(5): 21-29.
- [13] 王希辉, 王文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与趋势[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6): 23-30.
- [14] 崔榕, 赵智娜. 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 民族学刊, 2021, 12(8): 1-8, 120.

[15] 马大正. 从中华民族一词的产生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1-4.

## Incorporating the Awareness of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to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Teaching

— A Case Study of Ordinary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HOU Shenyan<sup>1</sup>, LIU Wenxia<sup>2</sup>, SANG Yanxia<sup>1</sup>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d into curricula,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priorit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wareness of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integration serves to realize the character-molding and value-guiding functions of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a. By connecting various aspects and elements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anging from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to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and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practices, the awareness of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effectively embedded into the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a.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fully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a.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wareness of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gional universities

---

( 上接第99页 )

[39] 阿甘本. 思想的潜能[M]//王立秋, 等, 译. 巴特比, 或论偶然.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9.

## “Returning to Desolation” : On the Imagination of Land in the Poetry of Zang Haiying

ZHOU Shuishou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Abstract:** Unlike the “donations” of previous new poetry authors, Zang Haiying envisions the lan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turning to desolation”. This poetic imagination deviates from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land being utilized for cultivation. A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earth does not necessarily yield a poetic essence regarding “desolation”. In the poem *Wilderness* the vision of “returning to desol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poet’s inner landscape, implicitly reflecting the poet’s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s a choice made by individuals, “returning to desolation” represents a relinquishment of human potential. This poetic imagination of “the ability not to” cultivate may constitute a new poetic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earth within new poetry.

**Key words:** Zang Haiying; land imagination; *Wilderness*; desolation; Dezhou poet